

《马克思主义论坛》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宋士昌

副 主 编 韩民青 郑贵斌

编 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王 晓 明 刘 海 涛 李 荣 海 李 爱 华

张 凤 莲 徐 东 礼 袁 红 英

执行编辑 张凤莲 冯 锋

前 言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已走过了一个半世纪的辉煌历程。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哪一种理论、哪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能对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及其创始人的名字，已深深镌刻在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思想进步的丰碑之上。这一点已得到了包括西方在内的人们的普遍认同。1999年，在英国广播公司等多家西方媒体组织的公元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的评选活动中，马克思高居榜首，被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2003年，在美国权威的《图书》杂志评选出的“改变美国的20本书”中，《共产党宣言》名列其中，被认为是对美国今日历史影响至为重大的著作。在中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反复检验，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理论上实现了三次历史性的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绩。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旗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保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永葆生机和活力，根本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客观、准确地反映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始终把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根本指针，真正实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二是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理论，

具有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一个半世纪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时代的发展和本国的国情出发，以创造性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从而保持了它的巨大影响和旺盛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可推卸的重要任务。

2004年4月，党中央作出了大力加强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决定，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同年5月，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宣告成立，这是山东省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大力加强和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决定的重大举措。为了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提供一个理论探索的新园地。从2005年起，我们决定不定期地出版《马克思主义论坛》。

《马克思主义论坛》第一辑设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总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个专栏。以后，我们将视情况的发展开辟新的栏目，力求全面地反映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新动态，为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 and 爱好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平台。

本辑《马克思主义论坛》难免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马克思主义论坛》尚处于初创时期，它的成长离不开国内外学术界同仁的广泛支持和帮助。

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目 录

前 言	(1)
-----------	-----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专论

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王修智 (3)
---------------------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李荣海 (13)
浅谈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科学化	崔桂田 (2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	王晓明 (28)
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涂可国 (42)
江泽民外交国际战略思维和特色风格简论	林辉基 (52)
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建设	郑贵斌 (66)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秦庆武 (72)
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杨金卫 (77)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袁红英 (90)
新工业化与马克思主义	韩民青 (101)
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徐东礼 (113)

马克思主义总论

谈谈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黄楠森 (129)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新解 ——兼谈马克思主义教研体系改革问题	高 放 (131)

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源

- 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陈建坤 (144)

重读马克思

- 读什么 为什么读 怎样读 卢培琪 (153)

马克思主义哲学

-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 李景源 (163)

- 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赵剑英 (170)

-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郝立忠 (187)

体系和观点

-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二题议 鲁 鹏 (198)

- 论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问题 孟庆仁 (207)

- 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郭淑英 (216)

- 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 杨春花 (220)

- 马克思对西方近代人权理论的扬弃 杨巧蓉 (224)

-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处理好的几大关系 张友谊 (23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 《资本论》中的循环经济思想 马传栋 (247)

-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董建才 (253)

-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几个基本理论的再认识 赵海成 (266)

-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及现实意义 蔺栋华 陶震安 (276)

科学社会主义

- 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与阶段性 宋士昌 (289)

- 和谐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解读 包心鉴 (295)

“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

- 对列宁“社会主义公式”的思考 李爱华 (306)

- 21 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模式创新、百态纷呈” 林建华 (319)

丧失阶级性必然失去先进性

——由苏联衰亡的历史教训引发的一点思考	李建军 (327)
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	邵景钧 (335)
从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出发理解党的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	张志慧 (346)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异化理论探源：从卢梭到马克思	王晓红 (359)
坚持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把握社会发展	
——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	张 磊 (370)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探析	田 贵 (377)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专论

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王修智

最近，胡锦涛总书记在会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时强调指出，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对此，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全面理解，深刻把握，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进一步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面临的新形势

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与此相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课题。这些新情况、新课题迫切需要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首先，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求我们必须时刻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西方敌对势力为了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在总体发生积极变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模糊甚至错误的成分；在理论研究领域，存在着脱离实际，针对性、时效性和说服力、感染力不强的问题，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错误和教条式理解的问题。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有所增长，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变换不同面目，利用多种方式，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这种情况下，要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用马克思主义牢牢占领思想理论阵地，不给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以可乘之机。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而逐步形成的。理论和实践都已证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奋斗的根本指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固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迫切需要进一步研究和阐述这一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完成十六大确定的各项任务，迫切需要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研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把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迫切需要运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回答干部群众关心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增强人们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能满足学习、坚持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提出的上述要求，也才能开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再次，当今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强烈呼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迫切要求我们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伟大理论。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实践性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与社会现实生活、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以及与具体的历史和时代条件紧密相联，决定了它只有关注社会生活 and 实践，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才能够与时俱进、长存常新，发挥其对现实的指导和革命性变革作用。当今世界，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在国内，改革开放稳定地向前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逐步形成，社会生产力和综合

国力不断增强，各项社会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关键时期。国内国外发生的这些巨大变化向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正视和回答的问题，例如，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如何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等等。要回答现实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必须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深入研究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当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主要任务。

第一，要不断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我们党 80 多年的奋斗历程充分表明，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面对怎样严峻的形势和任务，只要我们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指导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我们就能找到正确的道路，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开创党的事业蓬勃发展的局面。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

我们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思想宝库，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知半解、浅尝辄止，只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为此就必须深入研究、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核心，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和具体观点不可能超越时空一成不变，但其基本原理却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但没有过时，反而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研究、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目的在于掌握这些基本原理所体现的基本精神、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教条主义地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述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时所使用的具体观点和具体结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进行研究和坚持。对具体观点或具体结论，则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底是如何讲的，在什么背景下讲的，其针对性所在，以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教条式搬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

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和倒退。

第二，要特别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我们党成立以来，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领导人民夺取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这三大理论成果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密切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强大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篇章。因而，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同时，要特别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当前，我们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要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深入研究贯穿于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要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要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等等。

第三，要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理论创新。

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理论创新是创新的重要内容，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停顿，首先理论上不能停顿。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断保持先进性、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获得发展的根本保证。进入新世纪，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这都迫切要求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我们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一定要坚持实践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离开实践谈理论创新，就会犯主观

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也是错误的、有害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在理论联系实际和理论创新方面给我们做出了光辉的典范，我们要好好学习。最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对于我们建设什么样的现代化、如何建设现代化形成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又一理论创新。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入研究、积极贯彻。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深化理论探索的崭新起点，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自觉地把思想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不断在理论上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三、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组织领导

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党中央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重大举措，意义深远，任务繁重。我们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贯彻执行。

第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和旗帜，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保证。丢掉了马克思主义，党和国家就会迷失前进的方向，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打下的社会主义江山就会被断送。因而，要充分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一任务的必要性、重要性，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作为当前的一件大事、要事来抓，决不能掉以轻心。

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绝不允许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意识形态领域不可能纯而又纯，有一些噪音、杂音，难以完全避免，关键是要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为此，党的各级组织都要增强责任意识和阵地意识，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认真学习胡锦涛在会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工作实际，加大人力、物力、资金、精力投入，做到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及时指导，加强督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加强领导必须改善领导。要正确处理思想理论领域的问题，注意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要密切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的联系，关心他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多为他们办实事、办好事，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科建设和教材建设。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其核心是加强理论研究。加强研究的举措包括：（1）努力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学科建设，努力消除目前研究工作中的浅尝辄止、不系统、不全面的现象。（2）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究工作，要深入研究和准确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帮助人们深刻认识和更好地掌握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3）研究和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教材。把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教材编写联系起来，把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材建设中，充分反映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事迹和基本经验，充分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形成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材。在这方面，我省已做出了一些成绩，如山东社会科学院组织撰写的四卷本的《科学社会主义通论》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力作，此书的出版给我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和教材编写工作起到了带动和示范作用，今后还要撰写出版更多的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专著。（4）要研究和编写全面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教材。要深入阐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些领域的基本观点，形成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学科的教材体系。

第三，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

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培养一支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传承和高扬，需要通过一代代具有鲜明的阵地意识、历史使命意识、具有高度的理论素养和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完成。对此，毛泽东、邓小平多次强调，江泽民、胡锦涛也多次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需要一大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治党、治国、治军的干部，而且需要有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骨干，要培养一代又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是一种职业，而且应该是一种信仰。一个马克思主

义理论工作者，必须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把信仰的力量、自身的人格力量和理论本身的真理力量结合在一起。

要建立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必须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的培养机制、选拔机制、管理机制、使用机制，努力营造一种鼓励探索、鼓励创新的良好理论环境，形成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人尽其才的良好氛围，开创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大好局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还要分层次来抓：（1）要努力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涌现出了一批学贯中西、享誉中外的理论大家，这些理论大家带动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繁荣，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今中国，在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致力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时候，应该也一定能够产生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我们要有这种责任感，要有这种雄心壮志。（2）要努力培养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带头人。理论带头人是理论发展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表明：理论带头人与理论发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培养出一批带头人往往能迅速推动整个学科水平的提高。为此，要努力培养一批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带头人。（3）要努力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要着眼于未来，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多加鼓励、关心和提携，鼓励他们深入钻研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现实问题。着力培养一批年富力强、政治过硬、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4）要成立必要的研究机构。最近成立的山东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是我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加强理论队伍建设的重要举措，该中心要切实发挥骨干作用，不仅要把自身的理论研究搞好，还要积极组织全省的研究力量，争取尽快撰写出版一批理论研究的精品力作，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做出应有贡献。

（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党委副书记、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李荣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国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大热点问题。任何问题的提出，都有其客观而现实的根据作为支撑。从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作为具有生命力的科学体系，其价值意义就体现于无产阶级政党运用其解决本国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实践过程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科学把握及操作，关涉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及其命运。这样一个真问题、大问题被理论界所重视、所讨论，显示出理论界对社会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也是社会实践的“深刻性”向理论提出的需要与诉求。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包含着无穷意蕴的命题，有着错综复杂的方法论要求，就此而言，这一命题不可能在一定时期得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而需要在时代发展中长期探索、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随时求得新解。因此，立足于当代条件审视、研究这一问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遍性，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有着在普遍性关照下的特殊性内涵和要求，它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针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产生并生效于中国的理论形态，其根本的含义是指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但是，这一“中国实际”亦是包含有丰富内涵的一个概念，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时空复合坐标上理解，其结合对象涉及多维性要素；从结合的价值效果审视，“结合”本身又有着深刻的方法论要求。

作为一种以改造现实为己任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对世界历史的深刻影响，对世界格局的积极改变，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但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价值的

发挥，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审视，这句话的内在意蕴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与马克思主义运用者所处的现实条件及其社会发展趋势相关联，这是“当时”二字所包含的“时间性”要求；二是与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状况以及现实的相互结合为条件，这是二者结合的“空间性”要求。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国家结合的结晶物，即“马克思主义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马克思主义与民族、国家“当时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结晶物，必须以一个新的理论形态来表现，这种新的理论形态，必须植根于当地的实践条件，必须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同时又构成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的出发点。这种新的理论形态，给马克思主义增添着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这样，“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也就构成了推动社会历史连续进步的过程。

在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实践中，形成了“物质”成果即十月革命的胜利；获得了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即“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俄国革命的成功中得到启发：“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怎样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毛泽东在1938年鲜明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③。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上探索的课题，并进而成为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以及改革胜利发展的法宝。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和简单的实践过程。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所要结合的对象是什么，它在和对象结合中的方法论要求是什么，并不是一个简单而清晰的问题。按照中国学者的传统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审视这一命题，马克思主义所要结合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当今时代所面临的某个具体实践，从理论的价值意义、传播方式、价值显现诸角度来看，这个“对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系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首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作为形成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理论，若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生长、开花结果，首要一点，就是通过文化背景的移植而与中国文化传统相融合，成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国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结合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一，中国文化传统，是属于“前现代”的，而马克思主义则是现代催生出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一方面以一种具有强烈批判性的新型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强有力的冲击，使其改变漫漫历史中所形成的惰性而延伸到当代；另一方面又把中国文化传统中仍有生命力的内容接纳到新型现代文化中，使其通过这种转型而获得新的生存方式及生命活力。其二，这一结合的实践意义在于：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在中国发挥其历史性价值，是建立在“改造世界、改造中国”这一基础上的，而担当改造中国历史主体的则是中国人民。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影响中国人才能在改造现实中凸显自己的理论价值。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熏染的中国人已形成了自身固有的思维方式、理论认知方式。马克思主义不实现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就会被中国人的意识框架所排斥，也就难以在中国历史的推进中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

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品格和鲜明特征。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马克思主义这种改变世界的性格和实践责任，使之成为一种不是局限在书本、课堂上的学问，也不是通过书斋里的苦思冥想而精心构建、探寻的体系性“知识”，而是面对现实、思考现实、变革现实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关键在于与中国共产党人所不断面临的现实任务相结合。通过对中国实际问题的不断求索，从根本上实现中国的历史性变革。离开了对中国问题的解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失去了真实意义。这种结合既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应有的理论特质，也反映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所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的主旨，即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在一个个现实问题的解答中，走出中国特色的辉煌之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再次，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明成果和时代特征相结合。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世界文化积聚到一定程度的最新、最高成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不是二者的简单拼凑，而是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宏大背景下，以此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为参照而实现的有机统一。世界文明尤其是西方文化，本身是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土壤，在马克思逝世后，西方物质文明有了巨大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其精神文化的发展也高潮迭起，无论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或是从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的跃迁，都反映着人类历史推进的踪迹。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明成果相结合，才能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气息和当代意义。在这样的前提下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才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产生真正的价值。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是在科学把握时代特征基础上实现的结合。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的实践问题，世界的文明推进，也是流变性运转的。只有把握时代特征这一动态要素，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的实践变革中发挥出应有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命题的内涵可以概括为：在时代特征的关照下，经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互动，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塑造中国社会的实践主体，并在吸纳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解答并解决中国的历史任务和现实问题，从而促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以往人们的讨论中，过多地停留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实实践和文化传统的改造上，似乎这一过程是一个单线运动，换言之，似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实践和文化施加单边作用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这样，二者在出发点就失去了公平。由此导致的后果，一是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的理解，二是造成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形态与另一种理论形态一经发生关系，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都是互化、互动的。如果这种对话、交流，产生一种“吞没”、消解另一种的结局，只能说明其被消解的一方已丧失了任何存在的意义和被融合的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包括实践与文化现实）的结合，只能是一个相互改造、相互运动的过程。只有通过这种“互化”，才能显示出“结合”的生命活动及其真实意义，才能促成中国社会实践的鲜活特征。

这种互化的意义表现在诸多方面：首先，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看，它不是凝固的理论教条，而是在面向实践、面向未来时塑铸出自己的开放性特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要求它在与其他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互动中展开、丰富自身。从解释学的观点来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人们立足于时代通过主观因素的渗入而对马克思思想文本的诠释过程。因此，人们不可能在理解中真正使马克思进行历史性

“还原”，总会在理解马克思的同时实现着对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不这样理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凝固物对待并以其把握现实，只能衍生出教条主义，只能造成实践的僵化和社会进程的混乱。因此，面对中国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当代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观点、原理，也有一个“被改造”的任务。其次，中国文化传统总归属于“前现代”的思想形态，对于积极追求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而言，有着相当的时间距离而不可能和现实形成完全的“契合”，而世界文明成果又与中国的实际存在着“空间距离”，因此，只有以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文化传统，才能产生出中国社会进步的实践效果。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社会实践的“互化”，这本身体现着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本质理解，也体现着对理论与理论、理论与实践互动过程的自觉把握，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意蕴、效果的历史体悟。再次，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角度审视，一方面，理论通过指导实践主体而对社会实现着改造，另一方面，理论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也在被检验、被丰富、被发展。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在与中国社会历史变革中互动关系，已经确证了这一特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与实践“互化”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可能不会有太多的思想障碍。但一个尖锐的问题不容回避，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实践所“改造”。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包括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这一“结合”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也是马克思主义融入中国民族思维方式与实践方式，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任何既存的文化形态，都融合着历史，而在文化的历史流动中保持了民族的特色和特质。作为人类理性体现的文化，不仅存在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而且具有永恒的性质。孔子、老子的思想，仍然像 2000 多年前那样是一种现实，不仅包括过去和现在，而且将向未来延伸。受这一文化传统所影响，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甚至包括实践方式，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种特色，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史所积淀而成。任何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若想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意识框架，就必须首先融入其中，融入的过程实际也是被改造的过程。那么，以中国文化传统以及影响下的中国人的意识心理作为参照，马克思主义需要在哪些方面得以“改造”呢？首先，从中国的文化特点以及中国人的认识视角来看，应该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隐孕着强烈的伦理、道德意味，由于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版本”是在特殊的革命以及“阶级斗争”时期形成的，因此，突出了“阶级斗争”的意义而忽略了伦理道德因素。当今天强调社会发展有序化，强调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时，这既是中国文化中和谐思想张扬的结果，更是现实

对秩序、和谐、伦理思想的吁求和呼唤。因此，在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照下，提炼马克思主义的伦理价值，使之融入中国文化的伦理传统，对于协调社会的和谐秩序，对于引导、塑造中国人的道德和伦理意识，既意义重大，又是必然趋势。其次，从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出发，“改造”马克思主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整体”文化。中国文化传统强调整体精神，塑引人的集体价值观念，内含着强烈的辩证精神，这一特有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秩序的构建和维护，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按照这一特点“改造”马克思主义，就要从整体上凸显马克思主义辩证精神，并在此前提下构建包容着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成果的具有崭新面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再次，中国人的接受方式有着理论与实践结合以及简明扼要的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必须去除繁琐论证、远离实践的弊病，展现马克思主义现实性和生活化的特点，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髓与人的现实生活追求达到真实的统一。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影响力的扩张，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相互“改造”，并不是按照人的主观意志随意进行的。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除了实事求是的传统之外，还有着教条主义传统这一伴随物。所谓教条主义，一般是指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只注重结论，忽视了对引发结论的具体事物的背景和过程的关注，只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代替一切。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此种现象深恶痛绝，曾明确指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① 教条主义在“结合”中的表现，即是以马克思主义代替、统领一切，以既成的理论解释甚至代替实践；在文化的理解上，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全然代替中国文化传统，或者以马克思主义单向度地改造文化传统而断然否认文化传统“改造”、“融化”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在实践的表现上，即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改造的同时，完全忽略文化传统在中国当代实践中的影响，尤其是正面价值。这样的“结合”自然是不对路的。在强调改造、融通相互性特点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相互改造这一过程，应该突出两个特点：一是当代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都是在“当下”进行的，因此，在实践的基础上，在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与时俱进的同时，使之高水平、高境界的结合、“改造”，通过强强结合，形成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超越。二是民族性。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世界性的共同精神财富，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9~420页。

总归属于“外来”文化形态。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思维方式已部分地融入中国人的意识框架，但是，与二者在人们头脑里达到有机统一、圆融贯通这一要求，还有相当的距离。因此，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践的结合，真正转化为中华民族极富创造性的文化形态，应该是二者结合的目标。

三

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一般理解是用马克思主义处理中国社会的实践问题。这当然是对的，但是不完全。这一理解由于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工具”角度，因而不乏“短视”、“功利”等视角偏狭之嫌。依这样的理解，既难以真正有的放矢地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也难以真正做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实践的结合文章。马克思主义是在具有独特文化传统和实践方式的中国发挥其指导价值的意识形态，而且这种指导意义是长期存在的。对于肩负着实现民族复兴重任的中华民族，未来的任务是繁重而长期的，因此，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角度考虑，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多重的价值目标。

1. 承续、创新中国文化传统

中国五千年文明，积淀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以自己固有的风格特点及民族个性，伴随着中国历史的运行而丰富、发展。在当代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已被世人所认识并接受。东方思想的世界性传播，儒家文化的全球化影响，甚至包括中国传统春节的日益国际化，均是中国文化传统影响扩展的例证。文化的价值意义是巨大的，作为记录，它凝缩了一个民族发展过程，形成民族特点的历史；作为精神之源，它启示着民族的现实发展选择；作为目标，它则引导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发展方向。因此，文化上的积淀的深厚与否及其规范程度，是一个民族现实与未来发展设计的前提。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在历史发展中缺乏变化与创新的激情，延至现代，面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跃迁，它仍属于前现代形态。这就要求，在现代语境中诞生、且在当代仍处于世界文化高地的马克思主义对之予以嫁接、冲击、改造，以使之与当代中国赶超世界现代化的洪流相适应。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本身承担着传承创新中国文化传统的历史任务。具体说，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标，去对中国文化传统进行梳理，并对其思想内容进行改造，真正使中国文化传统合理而连续地走入当代。其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改造，还包括以中国的传统思想成果为参照，重新解释、塑造

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包含的以民为本的历史智慧，和而不同的辩证方法，革故鼎新的变法精神，小康社会和谐秩序的理想追求，这些影响历史甚至影响当代的意识精华，就是我们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背景性思想蓝本。再次，在改造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真正的圆融统一。在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意识框架方面，使二者毫无痕迹地揉和为一个思路体系。这种结合的目标，就是创立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意识形态，使之在指导中国社会实践的发展以及文化历史的演进方面，成为一个统一的思想坐标。这样的思想结晶物，才属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目标的实现，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发展，确定精神动力和文化之源。

2. 扩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资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本身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国际形势和中国国情的变化，着眼于社会实践问题的解决而提出的一个科学而全新的命题。从其初衷来看，这一命题提出的直接目的，即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指导思想，因而，这一命题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存在和发展息息相关。扩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资源，无疑是我们今天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价值。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然有其特殊的执政资源。这种执政思想资源的独特性，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所赋予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这块土地的革命实践中所诞生的政党，它的服务对象是中国人民，而且，中国共产党虽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由此构成了其生存、发展包括执政的主要思想资源，但这不应该是惟一。当代政治学一般认为，政党的执政规律，既有一般规律，也有特殊规律。以马克思主义去分析、研究、借鉴世界各国执政经验，固然也构成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资源，但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特殊性角度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和实践相结合，才是真正反映中国共产党的个性以及执政的特殊风格的思想资源。当代世界发展在呈现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的多样化成了一个趋势，在这一趋势中，一个执政党的思想资源也应该有多样化的来源。这也是破除思想教条主义的思想前提。因此，适应这一趋势，中国共产党要巩固自身的执政地位，必须立足国情、面向世界，在实践的基础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达到有机统一。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有雄厚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才能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同时，对于明确中国共产党制定现实路线方针政策的取向，刻划出自身执政的未来方向，均具有重要意义。

3. 解决中国实践问题

邓小平认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

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① 马克思主义根植于实践中，通过对鲜活实践经验的吸收而生存和发展。这一特征，正是我们提倡、坚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深刻用意，即是使之成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之大“道”。

上述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价值实现，即传承、创新中国文化传统，扩展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想资源，固然有其独立意义，但从社会运动的根基和目的来看，都有服从推动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意义。更为重要的，这一结合的直接目的，还是在于解决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实践问题。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使自己获得和保持改造中国的自觉性、能动性、主体性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对中国问题正确而成功的解答，赢得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

当代世界发展，经济交往日趋紧密的同时，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伴随而生，人类社会实践呈现着日益复杂化的特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与世界互动的发展，世界实践的复杂化特征总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折射和体现出来。在这一情势下，单凭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资源，难以彻底地解决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问题；只依赖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资源，也难以推动中国当代社会历史的展开。由此，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中国社会实践的结合，才能在把握中国社会实践发展方向、在借鉴全球化过程中社会治理经验的前提下，解决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

在新的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人民面临着一系列的历史任务。20多年的改革走过的是由易到难的渐进性历程，各种深层次矛盾的显现，使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战，小康社会目标的达成，面临一系列困难和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所与之结合的中国社会的根本实践问题。因此，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关注中国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着眼于中国社会矛盾以及人与社会、人与人矛盾的发现和解决，从而使中国社会发展有一个理想的方向和目标，这是社会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责任。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实践资源的结合中，审视、理解、把握当代实践中的矛盾和问题，把中国社会推入世界发展潮流，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旨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重大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进步的“世纪”性之因。但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中的理论形态，蕴含着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质和内在诉求。中国的“实际”，包括文化资源、实践发展，也处于不断更新的过程之中，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注定成为常谈常新的一个时代性课题。在世界发展背景下立足于中国的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方法，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也就具有前提性价值。

（作者单位：中共聊城市委党校）

浅谈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科学化

崔桂田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规律，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和发展走势。对当今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重要的不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而是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综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社会主义所发生的某些错误、挫折，甚至失败，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进程中不能科学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所造成的。即便是今天，有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者在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寻找具有本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模式时，也存在着某些不科学的因素。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基本原则通过本国化、民族化、时代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既使马克思主义本身得到丰富发展，又使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寻找最佳的生长点和发展模式。可以说，“有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目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真谛，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灵魂，多样化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体现，而实践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科学与否和成功与否的标准。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和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探索来看，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不是一句时髦的话语，而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理论创新和模式创新工程，不仅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而且要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含义、逻辑起点、基本原则和判断标准做科学界定，要有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科学化问题，涉及内容很多，这里结合当今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探索的经验教训，主要就如下几个问题谈点看法：

第一，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含义和社会主义的本国“特色”。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探索实践来看，都涉及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含义以及社

会主义的本国“特色”的理解问题，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不能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比如，朝鲜的“主体思想”是朝鲜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探索的重要成果，是朝鲜式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灵魂，它本来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反对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倡导要了解朝鲜的历史，了解朝鲜的文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体现于朝鲜现实”，在各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特点的进程中形成的。但他们在提倡“主体思想”一色化的过程中，把“主体思想”绝对化了，有些观点也值得商榷。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先前的社会主义学说，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先前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把物质经济的因素看作革命斗争的根本条件，未能指出加强革命的主体、增强其作用是革命的根本途径”，“把社会主义提到新的科学基础之上来的历史课题，由于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创立了主体思想，并以主体思想为基础独创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理论才胜利地得到了解决”^①等等，就需要很好的研究。再如，古巴社会主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社会主义的民族性，将社会主义与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融合在一起，社会主义成为了民族独立的代名词。社会主义固然要扎根于民族的土壤，与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相结合，但不应把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划等号。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进程中，首先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哪些是永恒部分及基本价值，哪些原理现在仍然正确并继续指引人们前进，哪些论点符合经典作家当时所处的情况，但已不符合现在的实际，等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有两个：一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创新精神，也就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吸收时代精华，对自己的理论不断扬弃、丰富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强大生命力之所在。由此可见，民族化、本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上，不能丢“魂”，民族化、本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必须是具有科学依据、时代精神和民族特点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能科学回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给社会主义带来生机活力。所以，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基本原理与民族精神和民族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第二，要科学地分析和研究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正确把握国情特点和时代主题。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出发点、依据和客观基础。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探索的经验来看，重要的不是要不要从国情和时代的实

^① 肖枫：《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上），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389～390页。

际出发，而是如何科学地认识国情和时代，以什么样的国情因素和时代因素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就国情而言，它是一个综合范畴和动态概念，是一定社会形态的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历史、自然条件和国际环境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及特点的总和。国情的核心要素是社会性质和社会生产力状况。从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来看，对国情的认识和研究应注意三个问题：首先，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来认识和把握国情，不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宏观的认识主要是要对本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国力状况以及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本国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国情的宏观认识是战略决策的基础，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基石。微观的认识主要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某一领域、某一层面的国情因素的现状和走势进行分析。国情的微观认识是策略措施的基础和依据。其次，要以多向思维的模式认识和分析国情，既要看到国情因素的有利方面，也要看到其不利方面。同一国情因素，可以产生不同的认识，会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针对中国建国后“一穷而白”的烂摊子，有人认为共产党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而毛泽东则认为这如同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图画；针对中国人口众多的最大国情，有人认为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沉重包袱，而毛泽东则认为世上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这就是说任何国情因素都有其双重性，不能用单一的思维来认识。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足是好事，但也会带来人口素质低、就业压力大、各种资源人均占有率低等问题，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最后，认识和分析国情的方法要科学，最主要的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力诫主观主义。

同样，对时代的分析和研究也要科学，不仅要了解和把握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世界面临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以及现时代起决定作用的社会力量等，而且还要了解和把握时代发展演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以及发展趋势，更要了解和把握造成时代变迁的内在因素。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角度来说，分析时代特征要注意三个问题：首先，要抓住时代的问题。马克思曾经指出，所谓时代的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也就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时代问题的同时，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时代化。其次，要找出和把握住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用各国民族优秀文化和时代精神的精华进行“滋补”的过程，充实丰富的过程。尤其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中，一定要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和现代文明，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人类最新文明成果融为一体，使社会主

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果看做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就会使社会主义失去人类文明的历史沉淀和营养,从而失去发展的生机和活力。最后,要抓住时代发展提供的机遇。“时势造英雄”,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科学分析和把握本国社会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以及革命、建设、改革的中心任务,并不失时机地根据时代的转换调整自己的战略,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才能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掌握自己的历史命运。

第三,要科学地处理好社会主义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努力寻找适合本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殊形式。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不断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或者说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关系的过程。所以,如何使这些关系正确“结合”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中心工作。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在按什么要求和标准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有三种涉及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需要正确处理,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未来社会主义理想模式与本国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别国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与本国特殊国情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关系;本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到。由于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多年形成的理论思维习惯,虽然认识到要正确处理这些关系,要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要找到其“结合点”,但往往在“结合”中还是用普遍性代替或否定特殊性。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想模式与本国落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中寻找结合点的时候,“结合”的天平往往倾向于经典作家的理想模式;在别国已有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有影响的大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与本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时候,“结合”的天平就往往倾向于已有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处理本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到,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固守已有的经验,缺乏创新性。可以说,用普遍性代替或否定特殊性,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是一种经常性的现象。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科学化,就是在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时候,应当首先进行理论创新,清除各种教条主义错误和习惯思维,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懂得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本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真正含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寻找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和特殊方法。

第四,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经验教训表明,仅仅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本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的正确认识,对搞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正确的方法和途径使三者达到有机的统一,而这个方法和途径就是实践,就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这虽是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老话，但社会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却屡见不鲜。例如，毛泽东最讲实事求是，但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却犯了许多不能实事求是的错误，从反右扩大化，到急躁冒进向社会主义过渡，再到发动十年文化大革命，哪一件不是在提倡实事求是的情况下发生的？虽然说实践是历史的、具体的，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在此基础上的认识都要受到一定的制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是一个不断反复的过程，犯错误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现象，但在犯了错误之后必须敢于面对并坚决地加以纠正，并尽量避免今后犯同样的错误，这才是真正坚持实事求是。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理解和判断实事求是的“实事”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说，是现实世界中的“实事”和“实际”还是主观世界中的“实事”和“实际”？是社会实践需要的“实事”和“实际”还是个人发展需要的“实事”和“实际”？当今中国社会发展中某些人搞的所谓“形象工程”和“数字游戏”，哪一件不是打着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造福一方的幌子？可哪一件是真正的实事求是？所以，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探索的进程中，搞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而检验和判断其真伪的惟一标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一定要防止和清除人们附加在“实事”和“实际”中的主观成分和因素。就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来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最主要的是要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不能违背生产力发展的“铁则”。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把制度设计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结合的过程，即以本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构筑本国社会主义大厦。制度设计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现实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怪想”。而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过程，不能人为超越。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跨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所以，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和判断制度设计的好坏，凡是能带来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能够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将社会主义由“不够格”引向“够格”的制度设计就是好的设计，达到这一目的的“民族化”才是科学的、成功的。

总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探索上，也有一个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既不能搞教条主义、主观主义，也不能搞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既要坚持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又要注意回答现时代提出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解决好当前人民群众所关心的事情。长远目标解决好，人民群众有奔头；现实利益维护好，人民群众有干劲。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有用性”和社会主义的好处，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奠定雄厚的群众基础。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伟大成果

王晓明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开启了社会主义从一国胜利到多国实践的历史时期，开辟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纪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经过艰苦卓绝的探索，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崭新革命道路。在这个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思想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成功中国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过列宁主义的创造性丰富和发展之后的又一个创造性丰富和发展的高峰。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成为现实，并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宝库中有着重要地位，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产物

1. 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第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迫切需要新的理论指导，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社会条件。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民族创造过灿烂辉煌的古代文化，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当欧洲一些国家在17世纪逐步摆脱封建束缚、开始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了工业革命进程的时候，中国却在清王朝“康乾盛世”的眩目余辉中走向了衰败。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殖民主义者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大门，随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加入侵略和掠夺中国的行列，从此，中国逐步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之，两大历史任务摆在了中国人民面前：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为了完成这两大历史任务，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个漫长的探索和追求过程中，一大批仁人志士都曾努力向先进于中国的西方寻求真理，希望通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用资本主义文明挽救中国，终究都行不通。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① 一再的挫折和失败使中国人民明白，不管是中国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还是西方资产阶级创立的所谓先进学说，都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要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人民幸福的奋斗目标，就必须去寻找能够抵御和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新的思想武器。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送来了一种新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方向。“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② 从此，中国人民革命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时候，必定有一个使两者相结合的过程，也必定会有一个适应中国社会历史条件和革命斗争需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出来，毛泽东思想应运而生。

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思想理论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催生了中国共产党。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会有毛泽东思想。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了思想上的准备。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兴起，作为一场影响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启发了人们的民主主义思想，激励人们探求强国富民的真理，也开启了世界上各种思想流派进入中国的闸门。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现实实践，在中国思想界引起巨大震动，马克思主义迅速被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传播开来。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李大钊，在1918年、1919年，两年间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新纪元》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文章。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

^② 同上，第1471页。

1919年5月又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也加入到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随之，在中国最早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并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来考察中国革命的问题，使之成为了中国进步思想的主流，进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以《新青年》、《湘江评论》、《觉悟》等为代表的一批刊物，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起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这一切，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并最终形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三，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发展，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阶级基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初步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也开始形成。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中国民族经济得以较快发展起来，工人阶级队伍随之迅速壮大。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现代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00多万人。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它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又由于它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因此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同时，因为中国工人阶级大多出身于破产农民，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从而形成强大的革命斗争力量。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工人阶级就开始了反抗压迫者的斗争。辛亥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斗争的内容也逐步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舞台，并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和领导阶级。工人队伍的发展壮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准备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第四，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为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和形成提供了实践基础。实践是理论的源泉。1941年5月，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① 一经实现了这种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① 这种结合需要一个过程，一个深刻认识中国状况和基本国情、完整正确认识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实现二者完美结合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第796页。

探索过程。当时的中国就进行革命的条件而言，既与马克思主义诞生地的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也与列宁主义诞生地的俄国不同。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一方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把握不够，一方面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了解不够，对于中国革命的内容、进程、方式等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中共一大纲领只是明确宣告把“推翻资产阶级”、“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奋斗目标；中共二大则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提出了中国革命应分为反帝反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随之才有了中共三大确定与国民党合作，联合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历经大革命胜利与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失败与再胜利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实行国共合作开展国民革命、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领导革命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逐步有了完整、统一的了解，才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的正确结合、制定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也才最终创造和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理论——毛泽东思想。

2. 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脉络

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到北伐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毛泽东在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过程中，特别是在大量进行农民运动和农村阶级关系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和思考。《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表现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中国社会的研究和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问题的科学认识，明确提出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基本思想，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初理论成果，从而为中国革命进入新的阶段做了理论上的准备，也成为了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标志。

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践上、理论上的探索不断深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吸取教训，相继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武装暴动，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历程。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根据形势的发展，从实际出发，果断做出了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的地区进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心从城市转移到了农村。毛泽东一方面领导了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探索，一方面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在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历史和现实

经验的基础上，相继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反对本本主义》等著名著作，科学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系统回答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问题，阐明了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和土地革命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探索的成功和理论探索的突破，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阶段。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中的核心地位确立起来，中共实现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把中国革命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实现了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的结合，成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组织基础；经历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又取得新胜利，成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实践基础；抗日战争的兴起，使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性、复杂性充分暴露和展现出来，既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诸多需要迫切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课题，也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新的实践经验，这也成为了推动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毛泽东写出了大量著名篇章，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为代表，完整提出、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为代表，发展和完善了统一战线理论；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为代表，丰富了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理论；以《共产党人 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自由主义》等为代表，完善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以《矛盾论》、《实践论》等为代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基础。另外，以《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为代表，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思想。这一切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完整理论体系，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3. 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成熟

“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1938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1939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原

则。随着全党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革命理论和路线的正确性的认识加深，中共其他领导人和一些理论工作者在讲话和文章中都不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对这个理论、这条路线的评价问题，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等提法。1943年7月，王稼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并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相结合的结果。此后，这个概念逐步为大家所接受。

在形成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共识的过程中，延安整风起到了重大的历史性作用。这次整风是一次中国共产党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同时也是一场系统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到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经过长时期的酝酿和讨论，中国共产党在对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问题上，认识达到了一致。全会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表明，要争取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就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共高级干部思想认识的统一，为全党的思想统一打下了基础，也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修改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①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做出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②至此，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地位得以确立。

二、毛泽东思想有着科学的内涵、丰富的内容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1.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① 《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科学理论体系。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典范，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创性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结果，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基础上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毛泽东思想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和表现形式结合起来，运用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和语言表达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了不但具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独特内容，而且具有中华民族独特表现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什么时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胜利，就发展；什么时候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什么时候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失败，就倒退。只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同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全部思想和言论的总汇，而是为实践所证明的真理体系，那些在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思想理论观点，即使出自毛泽东本人的言论，也不能纳入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之中。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对其中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和概括的结果。一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中居于首要地位、起了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人民共同奋斗的历程，因此，毛泽东思想中凝结着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同时，中央领导集体中的其他成员也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思想作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创性理论体系，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总结。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入研究了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

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关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从中国国情出发，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略理论。

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形成了一整套军事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理论，人民战争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论证了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政策和策略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敌斗争的策略原则，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正确地制定和实行党的政策。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毛泽东深刻论证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包括：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重视党的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实践中形成了完整的党的建设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党的建设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相联系，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首要任务，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3. 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或精髓。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中国共产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简明概括，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中最基本的原则。1938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共产党

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① 1941年5月，毛泽东对实事求是做出了科学、唯物和辩证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 从根本上说，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长期研究探索的基础上，经过延安整风和中共七大，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最集中的中国化表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要包含着三方面的内容：其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者“原则”出发，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这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其二，理论联系实际。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做到实事求是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其三，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这是做到实事求是的重要条件，也是实事求是的根本归宿。总之，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核心内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和一切工作都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形成的根本工作路线和基本工作方法。它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和观点，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立足点，是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其基本含义包括：其一，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觉为人民谋利益，一切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其二，一切向人民负责、向党负责，把二者的一致性作为工作的出发点，不仅体现在主观动机上，而且体现在客观效果上。其三，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团结、教育、引导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包办代替，而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争取胜利。其四，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把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人民群众创造的知识 and 经验集中起来、总结提高、推广出去，使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化为革命和建设的力量源泉。二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它揭示了党和人民群众关系，指出了党实现正确领导的根本途径，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在一致性，把唯物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具体化为科学的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就是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弄清人民群众的愿望和需要，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以其为依据形成和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群众中去，就是把已经形成的方针、政策、计划等等，拿到人民群众当中去做宣传、解释的工作，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化为人民群众的具体行动，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以理性认识指导具体实践的过程，也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过程。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和根本作风，既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也是党的根本组织路线。它反映了党的作风的实质，而中国共产党理论联系实际、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无一不体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靠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的结论。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坚持的一条基本的原则。独立自主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立足于中国实际，坚持走适合自己基本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是国际性的事业，但世界各国各自有着不同的基本国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革命和建设，必须使之与本国实际相结合，从实际出发，找到适合国情、独具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其二，着眼于本国的力量，在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基础上，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一个国家革命的发生、发展、胜利，主要取决于其自身的客观条件和革命政党、人民的奋斗。革命如此，建设亦如此。但同时，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国际无产阶级相互之间的援助，是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建设过程中，外部的援助也同样是十分必要的。其三，在国际交往中坚持独立自主，同时尊重别国人民独立自主的权利。适合本国基本国情和特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只能由本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从本国实际出发，领导人民去寻找、探索 and 实现，而不能是本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组织或个人强加的。在坚持本国独立自主、不允许他国干涉内政的同时，也充分尊重、支持他国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革命和建设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处理国际、党际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都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立足点和根本保证。

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地位和伟大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无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还是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看，毛泽东思想的贡献都是极其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具有不可易移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19 世纪 40 年代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指南。但是，马克思主义产生在当时生产力相对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环境和条件具有自身的特点。马克思在其晚年虽然也曾致力于东方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并提出了一些精辟见解，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他不可能对在东方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给出答案。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诞生的列宁主义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但是，列宁也只能解决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革命胜利的道路的问题。虽然列宁也高度关注着帝国主义时代的被压迫民族问题，并提出了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纲领，但是，同样的，在具有不同国情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被压迫民族究竟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他也不可能开出一个普遍适用的“药方”来。在当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仅比欧洲低得多，也落后于俄国，而在历史传统、基本国情和思想文化背景方面，更是迥然不同。当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送到中国，怎样把这个科学的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问题，就历史地摆在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面前。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和 30 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曾经盛行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在失败和挫折的教训面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顶住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压力，冲破教条主义和其他“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考察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践过程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并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世界无产阶级行动的指南；不是适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社会历史条件的僵死的结论和公式，而是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不是在某一个或某几个方面，而是全面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方面，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中国近代史上，在中国共产党之前的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提出过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中国人民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实现国家独立和富强的斗争因此都以失败告终。只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的探索中都取得了成功，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思想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思想政治基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难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毛泽东思想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成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和平赎买政策改造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了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革命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中国此后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发展的又一个重大成果。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以前苏联经验为鉴戒，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尽管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出现了曲折甚至发生了严重失误，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仍然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国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和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交往中树立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形象，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先导。毛泽东思想关于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这种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先导；而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探索，则成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找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重要借鉴。毛泽东思想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现实指导意义，是不可抹杀的。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的关系，也无可置疑。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根据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指出，中国革命应当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前提和基础，也在思想理论上、物质上做了必要的准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纲领，更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经验和借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和工作方针，例如，为使社会主义制度获得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农业体系的思想；为了建成社会主义，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必须建设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的思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营造良好的政治局面，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等等。特别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若干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被广泛运用并有了新的发展。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和轻工业的关系，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国民经济总方针；关于正确处理中央同地方的关系的思想、重视价值规律作用的思想，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政治基础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向；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长期的指导思想，等等。应当明确，因为客观条件和认识水平的局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总体上没有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没有真正弄清楚，但这并不能否定他所提出的诸多精辟思想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精神支柱。中国百年近代史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史，当这个进步的潮流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出现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交汇在一起，中国共产党就应运而生。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责任。中国共产党这个区别于中国任何其他政党的特点，体现在政党性质上，就是它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

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体现在党员政治品格上，就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既是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又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主要代表者，既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正如刘少奇所说：毛泽东思想，一方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又完全是中国的，“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毛泽东思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①而且，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领袖人物，其精神特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其个人品格具有超凡的感染力，其思想理论具有非凡的号召力。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毋庸置疑，毛泽东思想汲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真谛，又凝结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团结振兴的坚强精神支柱。毛泽东思想的巨大精神力量在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发挥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作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程中仍将继续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毛泽东思想也是开放的体系，发展的理论。只有既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使之在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中，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获得不断发展，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坚持经过了实践检验的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特别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之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基础上，运用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于新的时代，创造性地研究新问题，分析新情况，做出新判断，得出新结论。毛泽东曾经以哲学家的思考做出过一个充满辩证法的精辟论断：“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②这也同样适用于毛泽东思想。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社所）

^① 《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第3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

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

涂可国

对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采取的是辩证的、客观的、历史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张要破除封建旧文化，建立新文化。另一方面，他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民主性精华，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这种对传统文化既批判又继承的文化观，仍然是我们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有力思想武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基本原则。

一、对中国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加以批判

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一贯的文化态度。这种态度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的分析基础上。

首先，从传统文化总体来说，毛泽东主张批判地继承。

早在1938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1940年1月，毛泽东又强调，在当前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不把这两种反动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建立不起来，“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②还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② 同上，第695页。

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裂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①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科学阐明了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既要继承又要加以批判的正确态度，同时深刻揭示了这一文化态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概括起来就是：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包含许多珍品或精华；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主义者不能割断历史；剔除传统的糟粕吸收其精华是发展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不破不立，只有破除旧文化，才能建立新文化；新文化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等等。

其次，从传统文化的学科维度说，毛泽东也是主张批判地吸收。

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文学艺术遗产时，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② 这里尽管只是讲对古代文学艺术要批判地吸收，但联系毛泽东其他地方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他从总体上也是主张对传统的文艺、体育、哲学、道德、法律等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应进行辩证的扬弃，以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扬长避短的目的。

再次，对传统文化中以儒学为主干的各家各派学说，毛泽东也是坚持“一分为二”，主张有取有舍。

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主体构架是儒释道三位一体，其中，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1964年，毛泽东曾写下过“孔门充满矛盾”的批语，体现了他对孔子文化“一分为二”的一贯态度。毛泽东曾对儒学提出了许多不同看法，甚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袖，必然要倡导革除传统文化观念，破除旧的思想传统。而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自从汉代被定于一尊后，两千多年来一直为统治阶级服务，它本身也包含许多需要加以剔除的封建性糟粕。要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文化，不能不批孔反孔。然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而，毛泽东毕竟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对儒学从未全盘否定，一直认为儒学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一次临时会议上，毛泽东认为孔夫子是革命党。1958年，毛泽东强调说孔夫子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在他的早年和晚年虽表现出较多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否定，但即便如此，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毛泽东自始至终都没有绝对抹杀孔子学说的历史价值。

对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毛泽东尽管很少有直接的、否定性的评价。但是由于这两种文化都具有有神论（带有宗教意味）和唯心主义色彩，在庄子思想体系中还存在大量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杂质，这些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毛泽东必然会加以批判和拒绝。而从毛泽东大量引用老庄思想去解释许多问题看，他又充分肯定了道家文化积极的一面，尤其是道家的辩证法更是受到毛泽东的称赞。毛泽东由于受母亲的影响，少儿时代就信佛。即使后来在思想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不再信佛，毛泽东也多次对佛教的创始人及其宣扬的教义表示赞许。为了贯彻好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毛泽东对佛家哲学还做了较深入的研究。

由上可见，毛泽东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持唯物辩证的扬弃态度，既主张批判否定，又倡导继承和借鉴。这一科学的文化选择立场和文化观具有极其深远而又广泛的社会意义和实践价值。一方面，它可以克服激进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论把中国民族传统文化说得一团漆黑，完全抹杀其历史地位的文化虚无主义，有助于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古为今用，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另一方面，它能够防止文化保守派死守旧有文化传统不放、缺乏批判精神、不求文化变革的文化国粹主义，有助于剔除传统中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成分，使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沿着健康的现代化轨道前进。“批判地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等，已经成为指导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

二、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源泉

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包括众多领域、众多层面、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它的来源多种多样。总的来看，毛泽东思想主要有四大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及其他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著，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等等；二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家、墨家、佛家等学说；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四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以往，许多人比较重视和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即使到了晚年，毛泽东仍然不断地从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吸取思想营养。

为什么说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并构成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呢？第一，毛泽东阅读了大量传统文化典籍，并注意加以评用。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遍览中国古代文艺、历史、哲学、军事、政治等各种书籍，像四书五经、《老子》、《道德经》、《孙子兵法》、二十四史、《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均为涉猎对象。这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环境和条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毛泽东思想。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可谓积五千年之精华。这一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既定的文化环境，具有极强的穿透力、辐射力和影响力，客观上必然要塑造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思想和行为。就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来说，不仅表现在他一生长期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受到中国儒释道等精英文化的熏染上，而且还表现为长期生于斯长于斯的农村使他对中国民间文化有着独到的了解和感悟，从中吸纳了许多有益的养分。就民间文化的影响而言，毛泽东主要从乡村文化中选择了来自中国广大下层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的质朴本色、反抗精神和均平思想。就精英文化的影响而言，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国大文化传统或精英文化，既借助于读书活动而内化到毛泽东的精神领域中来，成为毛泽东思想取之不竭的源泉，同时它们还体现在中国社会中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价值准则、道德规范、文学艺术等领域或层面之中，成为一种既定的文化环境，借助于历史传承、言传身教、耳濡目染等方式而内化到毛泽东的精神世界中来。第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科学的文化观使毛泽东积极主动地去吸取中国的优秀文化。如果说在未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尚处于朦胧的、不完全自觉的状态的话，那么在上个世纪20年代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科学的文化观指导下，毛泽东就主动自觉地、卓有成效地去吸取中华文化宝库中的“民主性精华”。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哲学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分阶段的、间接的过程，有时甚至是可以实现跨越的，但又是连续的、不间接的，文化也莫不如此；传统文化本身是一分为二、充满矛盾的，既有糟粕，又有精华；既有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成分，也有积极的、可以为后人所用的健康有益因素。正是具备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养，确立了科学的文化观，毛泽东一生才矢志不移地从读古书中借鉴古人的文化智慧，才乐此不疲地评点中国历史人物，才孜孜不倦地从中国历史长河中汲取灵感、动力和营养。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多方面培育了毛泽东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吸收了儒家的人生智慧和政治智慧

儒家的中心思想是修己安人，其核心理念是仁、义、礼，其主导价值诉求和人格

范型是“内圣外王”，其基本智慧则是为人处世之道和为政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儒家文化从许多方面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滋养了毛泽东思想。

一是注重伦理立身和以德治国。儒家文化是一种讲究血缘亲情和等差秩序的伦理型文化，它倡导“仁者爱人”和“为政以德”。毛泽东多次讲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显然，这种精神是以引领人昂扬向上的道德自律为主要特点的。毛泽东之所以大力提倡向张思德、白求恩、刘胡兰、雷锋等英雄人物学习，正是在于他们的英雄事迹凝聚和展现了儒家的重义轻利、克己为人、自我牺牲、勤俭反奢、自强不息等品格。在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倡导的高尚、纯粹、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有益于人民的人，同儒家所推崇的君子人格，具有内在一致性。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并称赞闻一多宁可倒下不愿屈服、朱自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人救济粮的气节，分明可以看到孟子所倡导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的印迹。

二是儒家的实用理性和现实主义精神。儒学具有浓厚的实用理性，它的治学宗旨是“不离日用”，讲求经世致用，要求人们“言必行，行必果”，做到知行合一。毛泽东重在实践的现实主义观同儒家文化中的人道实践原则前后一致，一脉相承。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所作的《讲堂录》里，引用了《论语》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话，用以说明躬行实践的重要。1916年12月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阐述智、仁、勇（德智体）三育并举时，引孔子、孟子事迹作为论据：“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危墙之下’。”1930年5月，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要求做领导工作的人要“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这里强调的是调查研究。

三是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重教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统。孔子作为教育家所开创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教育原则等对后世影响很大。毛泽东也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某些教育思想。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肯定了孔子兴办私学的历史意见，提到要“回复到”孔子“因材施教”的方法。1964年2月，毛泽东在讲到学校课程多、学生负担重时说：“孔子教学生的课程只有六门：礼、乐、射、御、书、数”，“就这样还教出了颜回、曾子……等四大圣人。”虽然毛泽东也批评过孔夫子里没有农业知识，教出来的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但总体上还是对儒家教育思想持肯定态度，并吸收了其中大量合理要素。

2. 借鉴了道家的辩证法和认识论思想

老子和庄子开创了中国道家学派。毛泽东在长沙上学时就读过《老子》，熟悉《老子》一书中的思想。例如解放前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所作的批语中，毛泽东否定老子所讲的“大同社会”的虚无性，但在1949年《别了，司徒雷登》中却借用了老子的思想：“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① 不过，道家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生成和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其辩证法和认识论。就前者而言，毛泽东采用了老子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1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巧妙地运用了《老子》“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辩证思想；《矛盾论》中用老子“相反相成”古语说明“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在《辩证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毛泽东也引用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思想。就后者而言，毛泽东多次以庄子的事迹和《庄子》的寓言说明各种认识论问题。例如，用“庖丁解牛”的故事说明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正确性，引用“逍遥游”来解释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等等。

在评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汲取了儒家、道家思想，还移入了佛家、名家、法家、兵家等学说；不仅继承了传统哲学思想，还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史学、文学、军事学、政治学等方面的思想。从《孙子兵法》及古代各种战例中，毛泽东吸纳了古人知己知彼、以弱胜强、后发制人、声东击西、围魏救赵等军事战略战术；从中国古典诗词、历史小说中，毛泽东形成了诗言志、诗要用形象思维、反其意而用之致用等史学思想，等等，不一而足。

必须指出，毛泽东并不是简单地套用传统文化，更不是囫囵吞枣，而是在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进行改造、革新，赋予其新的涵义，新的生命力。“执两用中”、反对过犹不及是孔子的重要思想。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质量观对此做了新的诠释。他说，反对过犹不及，是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过”和“不及”，都是因为没有合于一定的质。他还上升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阐释儒家的中庸观：“‘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② 并指出，“过”就是人们常说的“左”的东西，“不及”就是人们常说的“右”的东西。毛泽东还运用唯物主义改造传统道德观，认为“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6页。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①。并据此指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属于认识的范畴；而仁勇则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应采取的态度。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加以改造最有影响的是发展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语出自东汉班固所著《汉书·河间献王传》。书中在称赞汉景帝的儿子刘德的治学态度时，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代颜师古释其义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将“实事求是”命题概括为我们党的认识方法论和思想路线，并做了新的规定：“实”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正是通过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熔铸、补充、修正和改造，丰富和完善了毛泽东思想体系。

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利用传统文化赋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

从19世纪晚期起，马克思主义开始从西欧传入中国。它之所以在同其他各种思潮竞争中取胜，赢得越来越多中国人的认同，并最终成为我国占主导地位的指导思想，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国社会实际实现了有机结合。其中，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机制何在？从文化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文化形态，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前资本主义文化形态。表面上看，这两者是根本对立的。正因如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一度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峙起来，在认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对我国文化传统采取激烈批判和拒斥态度。大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意识到这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开始或是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或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解释、宣传马克思主义。当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就开始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起来，并在20世纪30年代上升到高度自觉状态。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角度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的意义与可能。“共产党员

^① 同上，第147页。

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

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之所以可能结合，就在于：

第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相似相通之处。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一样具有许多可以为全人类所共识共享的普遍性因素，例如它们关于人类社会发历史规律、辩证法、人生智慧、普遍伦理等方面的思想。从人类文化发展史看，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代表人类文化的肯定阶段，资本主义文化是否定阶段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代表否定之否定阶段。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原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必定存在许多重复、重合之处。就道德原则来讲，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集体主义原则与中国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家庭团体本位、利他导向、社会为先等价值观念，具有相通的因素。

第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需要也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得到顺利传播并生根、开花、结果，为全体中国人所接受，乃至变成他们的信仰，就要为其喜闻乐见，就要赋予中国作风、中国特色。每一民族成员都具有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如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更易为中国人所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化典籍言简意赅，精要独到，借助于中华民族文化形式去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也有助于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另外，中国文化要打破惰性，实现自身的更新，走向现代化，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加以指导、融合、补充、冲击、变革。

第三，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中外文化有机整合的自觉意识和实践，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由可能变为现实。自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李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达、艾思奇等在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的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探幽发微，梳理诠释，努力总结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以来的中国文化遗产，挖掘那些仍有生命活力的因子，发掘那些同马克思主义相通相融相补的内容，以此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赋予它以中华民族的形式和特色，使之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并进一步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在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起来方面做出了两大贡献。

其一，运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去解释马克思主义，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时，毛泽东引用了儒家的正名思想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体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但是作为哲学的部分（或作为实践理论）来说又是对的。庄子思想虽然具有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消极方面，但也蕴含着不少合理的朴素辩证法因素。毛泽东经常借用庄子辩证法界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毛泽东在《读艾思奇 哲学选辑 一书的批语》中，引用了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的话，借以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还比如，毛泽东在1967年在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到物质无限可分性时，也借用了庄子“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动静辩证法，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①实际上，在毛泽东的论著、书信、讲话、批语等中，随处可见像这样用中国固有的语言、典故、思想、神话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事例。它充分表明毛泽东具有高度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的文化自觉性。

其二，创建了植根于民族文化土壤上的毛泽东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文艺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科教思想等，并创建了系统完善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其中，实践论是毛泽东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相结合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现实、重实践、重经世致用的特点，作为从小就接受传统教育的毛泽东显然对此深有感悟。而自明清以来，湖南逐渐形成了重视现实问题、直面现实政治、讲求实用理性的湖湘风气，这也使毛泽东深受实践主义的熏染。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意义上就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些因素促使毛泽东运用中国人的语言和风格去讲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3页。

述实践论，并以此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变为能够为中国人所掌握、所运用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人生态度等。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借用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去说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例如，在讲到认识的第二阶段时，毛泽东就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来形容概念性的认识；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来阐述直接经验的重要。

毛泽东把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结合，从其积极效果来看，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既正确地指导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实践，又促使中国文化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新世纪新阶段改革开放向纵深拓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背景下，只有进一步将中国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才能更好地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才能更好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儒学所）

江泽民外交国际战略思维和特色风格简论

林辉基

江泽民的国际战略新思维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之一，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外交国际战略思想一脉相承，而又牢牢植根于冷战后和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崭新实践之中，汲取了当今世界各国国际战略思想的新经验和新营养，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和风格。

一、江泽民对邓小平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进行了高度科学的概括，确立了新世纪走向民族复兴的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活动的基本准绳和指导思想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之初，正是国内政治危机刚刚平息尚等深入解决，国际资本主义特别是西方顽固的反共势力在冷战结束前向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联手发动全面进攻之时。中国首当其冲。国内的敌对势力与国际上反华反共势力连成一气，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及外交工作形成严重的威胁。摆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的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空前紧密地联在一起。解决任何国内问题都必须与解决国际问题相互协调统一筹划。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崩溃和东欧剧变，使整个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面对这种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遵循邓小平的教导，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一方面打破西方国家的封锁和高压，积极稳妥地有针对性地推进外交工作；与此同时，又对邓小平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研究，适时做出科学的理论概括。

江泽民明确指出，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是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外交工作的指导思想。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邓小平在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同时，总结历史，正视现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冷静地认识我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生产

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增长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的发展。为此，邓小平要求外交工作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并提出了我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在外交上进行了两个重要调整：一是改变了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指出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为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客观科学的依据。二是改变了“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我们的态度和政策。

为了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邓小平提出了对外开放和“一国两制”等基本国策，并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以根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平等互利的国际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这为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活动确立了基本准绳和指导方针。

二、江泽民坚持邓小平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世界多样性观点，对时代本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新旧转移和外交目标等根本性重大问题结合新的实践做了新的阐发和论述，从大局上把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活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

江泽民结合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形势的新特点和外交——国际战略的新实践，对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做了全方位的丰富和阐发。其中有不少独具创意的新思想新观点，世界多样性观点是最有代表性的观点之一。

江泽民的世界多样性观点包括如下重要内容：其一，世界多样性是一种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普遍现象和基本特征。江泽民指出：“世界是多样性的。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由上千个民族所组成的近 200 个国家，不仅存在着自然环境的差异，而且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这就形成了各种社会制度、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①其二，人类应当以科学的态度认识和分析世界多样性问题，正确判断和确定其客观价

^① 《人民日报》，1993 年 11 月 20 日。

值。江泽民指出：“世界丰富多彩的多样性，是件好事，不是坏事，它可以通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转化为互补性和相容性，可以促成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① 以往，在世界多样性问题上人类认识有不少盲目性和片面性，只看到它们之间相斥的一面。江泽民的论述扫除了这些落后、消极、陈腐的观点，还世界多样性以本来面目和科学的客观的价值。其三，世界各国政府应当在世界多样性问题上尽快达成共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江泽民指出：“各国人民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发展道路，制定自己的政策和法律，任何国家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涉别国内部事务”，“只有各国互相尊重、求同存异、平等相待、和睦相处，才有可能维持持久的世界和平，为各国的共同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条件。”^② 其四，世界多样性是当代人类面临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新旧转移的最重要的客观依据。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多样性问题是世界各国人民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反对霸权主义，共同解决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世界主题，创造一个和平、公正、繁荣发达的新世纪的必要前提。在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转化为互补性、互动性和相容性，必将成为这场跨世纪的世界历史大变革和大发展的巨大动力。

江泽民的世界多样性观点是冷战结束后开始的空前的世界历史大变革的产物，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思考和科学研究这场大变革的理论结晶。它的产生源泉和成功运用的舞台首先就是这场大变革中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活动的伟大实践。

世界多样性观点是当代世界国际战略思想领域内的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举世公认的能够公正合理、卓有成效地处理各种复杂棘手的重大国际事务的理论法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此极大地推进了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跨世纪发展，同时又使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达到一个更为成熟的崭新的水平。

三、江泽民从中国和世界跨世纪发展的大局出发，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以恢弘博大的胸怀和创新思维，积极推进亚太战略合作，以科学的亚太观和高超的外交艺术把中国在亚太的地位和作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0 世纪后半叶，亚太地区的崛起和发展愈益突出地成为举世关注的热门话题。

^① 《人民日报》，1993 年 11 月 20 日。

^② 《人民日报》，1992 年 4 月 8 日。

80 年代最后一个年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成立后，亚太之声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声音。中国作为亚太地区大国和 APEC 的重要成员，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骄人成绩及政治、文化和理论思维等多方面的综合优势，为亚太崛起和发展，为 APEC 的健康成长做出了特有的贡献。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亚太问题一直予以高度关注。特别是江泽民从 1993 年以后连续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就亚太和世界的发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江泽民的重要讲话，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结合亚太合作和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丰富了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理论，确立了当代中国的亚太观，为中国进一步在亚太和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江泽民提出了亚太合作的总目标和总方针。他反复强调，APEC 领导人会议既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又要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这两大国际战略目标。在此前提下，江泽民又对中国与亚太的关系和中国在亚太中的重要地位做出了最权威的科学阐述和论证，指出，社会主义的中国，特别是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为亚太的崛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从客观的发展趋势来看，还是从综合国力、社会制度和文化特点及对外开放的重点来看，都可以肯定地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和世界，亚太和世界也得益于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中国实行全方位开放，面向世界，首先面向亚太地区。重视并积极参加和推进本地区的经济合作，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方针。

江泽民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不仅为中国处理亚太合作提供了基本的政策依据，而且还为新旧世界格局的转换、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跨世纪的世界历史大变革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和指导思想。

中国作为亚太大国，同时也是世界大国，必须对以新旧世界格局转换和新旧世界秩序更替为主要内容的跨世纪的世界历史大变革承担更大的义务和责任。与亚太问题相比，这显然是一个更加重大的全球性的宏观课题。1993 年江泽民在首次 APEC 会议上阐述了我国政府的立场，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下一个世纪”的问题，指出：“逝者已矣，来者可追。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 21 世纪，这是我们这一代领导人必须认真探索和解决的重大问题。到本世纪结束还有好几年时间，我们还来得及做些事情，应该有所作为。如果经过我们的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排除障碍，为人类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那么世界人民将会感到我们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大好事。如果在进入 21 世纪的时代世界还是一个乱糟糟、没有安全感，经济艰

难的世界，我们就向世界人民交不了帐。”^① 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下 21 世纪，说穿了就是要不要对 21 世纪的世界进行根本变革的问题。江泽民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多极化世界格局的问题。在 APEC 领导人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强调亚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 APCE 机制化演变必须符合世界历史大变革的总趋势，亚太的发展应当为这场世界大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二是说明跨世纪的世界历史大变革将为亚太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保证。在论述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江泽民特别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作用和历史使命，诚恳告诫 APEC 各国领导人，在商讨亚太经济合作时，应从大局出发，站在历史的高度，充分认识发展中国家在亚太和世界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充分认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对促进亚太与世界共同繁荣的重要意义。全球性经济发展肯定不会长久地建立在少数国家发达、多数国家落后的基础上。在这种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一个震惊世界的著名论断：“在我看来，如果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的崛起是 20 世纪下半叶国际局势演变的一大特征，那么它们在经济上的腾飞则将是 21 世纪世界新格局的一个重要标志。”^② 从而向亚太和世界揭示了这样一个不可抗拒的真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场跨世纪的世界历史大变革中是举足轻重的生力军，它们的政治崛起和经济腾飞是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新旧转移的真正动力和最大的希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泽民决定中国正式参加 APEC 组织，亲自参加一年一度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为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制定了崭新的亚太战略，集中体现了新一代领导人的彻底唯物主义的理论和充满辩证思维的创新精神。从客观上讲，APEC 的成立，既是二战以后东亚崛起的产物，又是在新的形势下亚太合作新发展的标志和需要。美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怀着极为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它们想以此形式控制和利用亚太国家，同时进一步孤立、排斥和遏制中国；另一方面它们又不能不正视中国作为高速发展的亚太大国的不可替代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严肃重大的国际关系的现实：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亚太的合作更是离不开中国。离开中国，排斥中国，世界的发展特别是亚太的合作就是残缺病态的合作，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亚太国家都是不利的。因此 APEC 成立之初，它们对中国的态度既不积极又不排斥。这是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不冷又不热的大蛋糕。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亚太合作问题的看法也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大、中、小三种观点。所谓小亚太，主要是日本和东盟国家的观点。把亚太合作限定在日本、

^① 《人民日报》，1993 年 11 月 20 日。

^② 《人民日报》，1995 年 11 月 19 日。

韩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既排除了美国和以它为代表的东太平洋经济带诸国，也踢开了南太平洋的大洋洲国家，同时又把中、俄等西太平洋经济带大国弃置一旁。这反映了二战后日本欲图称霸东亚和东盟国家的野心和在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两霸（美、苏）之间保持中立并谋求发展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心态。所谓大亚太的观点，是把合作的主体按地缘区划扩张膨胀至整个亚洲（或者把西亚排除在外）和环太平洋国家，是力求以扩大空间主体多元的方式反击美国霸权主义的区域操作。中国和南亚诸国不少政治家持此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邓小平。1988年12月21日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邓小平明确说道：“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 and 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这里讨论的重点当然是，“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①毫无疑问，邓小平的观点是要把南亚和整个亚洲纳入亚太合作和发展的范畴之中的。还有所谓中亚的观点，这就是以美国为代表最初成立 APEC 组织的国家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把环太平洋国家作为亚太合作的主体和空间。客观地讲，这是小亚太观点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它以小亚太观点为基础，同时又冲破了小亚太观点狭隘的圈子，最终不排除大亚太的观点。因为持中亚观点者同时又是倡导经济全球化观点之最卖力者，只是不愿意在现阶段过早地背上大亚洲的包袱。

面对上述情况，严格遵循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髓，从中国和亚洲及世界发展的大局出发，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亚太合作发展的现实出发，居高临下，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既坚决反对任何霸权主义的图谋，又以亚太合作的发展大局为重，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 APEC 采取积极肯定的态度，适时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这对中国与亚太的合作和整个国际关系的重大战略意义将随着时间的延伸而愈益充分地体现出来。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282页。

四、江泽民在邓小平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居高望远，以创造性的思维和实践，妥善处理、大力发展中国与周边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双边关系，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跨世纪发展进一步拓展空间，创造出更加安全祥和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

在现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获得真正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搞好全方位外交，必须制定面向整个世界的国际战略，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搞好与各个大国和重要地区的双边和多边关系，搞好自己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做出了崭新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推进中美、中俄、中日、中欧和中非关系全面发展，巩固和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始终着眼于大局和长远，立足于现实，统筹兼顾，张弛有度，化险为夷，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证统一，使中国对外关系的大骨架、大脉络和大关节始终处于健康有序的良好状态。

1. 关于中美关系

在坚持“三个公报”原则基础上，江泽民提出了走向新世纪的处理中美关系十六字方针，全力倡导两国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为中美之间跨世纪的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中国和美国，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不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事，也对世界影响至深至广。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中美关系的状况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是三个公报：“二二八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但美国并不总是按三个公报的原则办事。这是中美关系发展过程中动荡曲折的主要原因。冷战结束之初中美关系一度出现严重倒退，美国政府同样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政策抉择过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从一年一度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的争论，到戏剧性地实现人权与最惠国待遇的脱钩，从对华以压促变到推行全面接触战略。正是在 1993 年 11 月西雅图中美首脑的世纪性会晤中，双方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面向 21 世纪的崭新主张，使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1994 年 11 月，中美首脑再次在雅加达举行正式会晤，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了指导中美关系的五项原则。从西雅图到雅加达，中美关系再次实现了重大的历史性跨越。两国领导人不仅以战略的眼光勾画出中美关系的前景，而且表达了两国政府之间在全球性问题和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的愿望。江泽民在关键时刻提出对美奉行“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政策方针，从而使双边政治关系保持发展势头。中美关系在

经历近 5 个月的低潮后终于走出低谷，开始重新走向正常发展的轨道。

1997 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江泽民访美与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确立了两国之间“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双方没有就这一关系发表专门的公报，但是江泽民在有关的讲话和“中美联合声明”中已对建立这一关系的有利条件和存在的障碍做了明确的阐述：建立这一关系是两国的共同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双方都站得高、看得远，彻底摆脱和消除“冷战”思维，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和全局，深刻认识两国关系在走向新世纪的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在目的、动机和手段上以及实际效果的谋求上都应是积极的，都应以两国和世界人民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以推进 21 世纪和平与发展为宗旨。双方应尽快结束敌对或敌视状态，坚决排除所谓“中国威胁论”和“中美冲突论”等有害论调的干扰和影响，成为真正友好相处共谋两国和世界和平发展大计的稳定长远的伙伴。而这种伙伴关系决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为在世界范围内确立大国关系的“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的准则提供了借鉴和表率。

中美两国确立建设性伙伴关系决不仅仅是两国领导人和人民的善良愿望，而是以可靠的现实可行性为客观基础的，具有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对美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在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大局的地位和价值的认识重新进行定位，并不断接近客观和公正，以此为前提把对华政策做了重大的战略性调整。同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以大局为重，不断克服干扰，战胜曲折，始终坚持积极健康稳定的政策和态度。江泽民在关键时刻两次提出十六字对美关系方针，即 1994 年 10 月提出的“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和 1997 年 10 月提出的“增进了解、扩大共识、发展合作、共创未来”，使中国对美政策形成一个健康的有机整体。这既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又为双方处理若干棘手问题提供了便利。中美两国的“共同声明”正是确认这一关系的纲领性文件。虽然美国国内某些反华势力不断制造种种障碍（主要是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但是中美友好合作的大趋势终究难以改变。

2. 关于中俄关系

在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决策指导下，江泽民提出了“三不”、“三好”原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这是中俄关系的原则和目标，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

中俄关系和中日、中美关系不同，中俄间没有中国和美国、日本间的那些纠葛，而且在对日对美关系中有重大共同利益。俄国对北约东扩极为敏感。按北约东扩的设想，中亚一些国家，如哈萨克斯坦等，都包括在它的远期目标中。这自然引起俄罗斯

极大不安。因此，从世界格局看，俄罗斯倚重中国可和美、日、欧抗衡。同时，也需借助中国跻身于亚太事务。因此，俄政府强调，俄对外关系中，中国占优先地位。

江泽民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 1996 年 4 月 25 日在北京举行会谈后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决定“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双方共同做出的这种历史性的战略选择，标志着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已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中俄两国领导人都强调了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叶利钦总统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构成一个互补的自然地理、资源、经济和人文区域，两国的地理位置和传统友谊要求双方建立高效的互利合作关系，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符合俄中两国的共同利益。江泽民说，中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正在不断加强和深化。并强调，中俄两国地理上毗邻，经济上互补性强，进一步发展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这种新型的面向 21 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俄两国共同做出的正确的历史选择。两位领导人同意成立“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以推动两国长期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1991 年 12 月 25 日苏联解体，12 月 27 日中俄签署了《会谈纪要》，确定建立外交关系。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承诺履行以前中苏达成的协议。苏联解体以后近十年间，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受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影响，比较顺利地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确定了新形势下中俄关系的基本原则，相互把对方作为友好国家，并使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中俄关系连续上了四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迅速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保持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第二个台阶是以 1992 年底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为标志，两国关系开始由一般正常化关系上升为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的新关系。第三个台阶是 1994 年 9 月江泽民主席对莫斯科的成功访问，两国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和《核武器互不瞄准对方》的声明，确立了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新型国家关系。同时还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不久，中俄东段边界亦划定，基本解决了存在多年的边界争议，从而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四个台阶是 1996 年 4 月叶利钦总统访华，发表《中俄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关系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时，中俄和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五国签订边界地区加强军事信任的协定，这是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通过这四大台阶的攀升，中俄关系已经形成五大机制：其一，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既不对抗又不结盟，长期友好、互利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机制；其二，最高领导人之间的正常对话机制；其三，保障睦邻相处的安全机制；其四，经济科技合作机制；其五，重大国际问题磋商机制。这表明，新时期中俄关系基本上排除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对国家关系的不良影响；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已经成为新的国家关系的基本准

则；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共识和承诺已经成为两国关系和整个世界和平与发展积极稳定的因素；发展务实的经贸科技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和主要内容。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俄已奠定了良好关系的基础，并已进入稳步发展的新阶段。

3. 关于中日关系

在坚持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江泽民恪守邓小平关于发展对日友好是中国长期国策，要从长远战略来考虑中日关系的发展的基本思想，积极推进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任和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基本准则，在不断克服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领土问题、防卫问题和经贸问题等重大摩擦的过程中把中日友好合作不断推向前进。

此外，在发展中欧关系、中非关系和周边关系上，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全方位外交的重大胜利，使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周边环境 and 国际大环境不断改善和优化。

五、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全面地创造性地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而且在外事——国际活动中的工作作风、处事风格、行为艺术和人格魅力、精神风貌上都对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前辈领导人有所秉承和弘扬。将鲜明的中国民族风格和崭新的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新一代中国外交战略家和国际政治家的独特人格魅力和精神风采，给走向新世纪的国际大舞台增添浓重的中国和东方所特有的文明色彩

人格魅力，对于任何个人来讲，都是宝贵的人生财富，是实现其人生价值和使命的重要保证和条件。对于领袖人物而言，其人格魅力的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其个人的天地。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领袖的人格魅力，更是党和国家的瑰宝，对整个党、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都会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反复阐明和社会实践已经充分验证了的重要结论。作为中国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不仅深受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而且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杰出国际政治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外交和国际事务中所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从根本上讲应当归功于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其国际战略思想的科学指导，归功于党和人民的集体努力和共同奋斗。同时，中外有识之士无不认为，这也深深得益于江泽民作为新一代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人格魅力。

1. 江泽民在国际舞台上的人格魅力向全世界展现了新一代中国领导集体继承邓小平遗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坚持改革开放的鲜明形象

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生前最关心的就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关于确立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标准和宗旨，邓小平认为，“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象”，^①一定要用改革开放的形象，要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事实取信于人民，取信于国际社会。他将此视为自己的政治交待。邓小平逝世后，全世界对中国观察的焦点也集中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当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和结论，关键要看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否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同时，见微知著，以小见大的观察方式和思维惯性又很容易使人们特别留意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举止风貌，国际社会又往往注意从最高领导的形象来观察和确认其国家的形象。当人们看到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江泽民，一个充满改革开放意识的新型现代领袖形象尽显眼前。江泽民以他令人倾倒的人格魅力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形象描绘得更加鲜明夺目。周恩来生前反复叮嘱：外交无小事。此论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外交经典名言。因为任何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影响和联结着关乎国家利益和荣誉的大事，某些小事在特殊条件下就是大事，或演化成大事。如上所述，作为新一代国家元首，江泽民在外事活动中的着装、举止、语言和行动方式、表情和风度，从正常的眼光看这无疑是小事，但是，当国际社会要从这些细枝末节中来观察和判断邓小平之后的中国的方向和形象时，这些小事就是事关全局的大事。

2. 江泽民以他的人格魅力体现了中国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和变革的深切关注和崇高的使命感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世界大国，坚决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但是面对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新旧转换，面对和平和发展两大世界主题的庄严呼唤，又决不放弃自己作为世界一极的神圣国际责任和义务。邓小平明确指出，世界格局的变化，由原来的两极不论变成三极、四极，还是五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②这不仅体现在中国政府一系列重要的声明和文献之中，同时还通过江泽民在重大的国际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泱泱大国领导人的风范昭示天下。新一代中国最高领导人在阐述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时的高瞻远瞩、深思远虑、博学多才和创新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316页。

^② 同上，第353页。

思维给整个国际社会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江泽民先后在日本、美国和 APEC 领导人论坛上论述的世界多样性观点,不仅让美国总统克林顿折服,而且为解决亚太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为解决中日、中美、中俄、中欧和中非关系,为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发展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首次 APEC 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带到 21 世纪”的重大问题,把全世界一切负责任的国际政治家关于人类命运和前途的思考提高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在与国际社会各方面,其中包括长期敌视中国的势力的代表人物接触和交往时,都始终面带微笑和自信,真诚友善、恢弘大度、落落大方、机敏睿智、宽厚包容,这些现代人类最受欢迎的品质和风格,在江泽民身上始终保持着和谐的统一。所到之处,不需刻意营造和渲染,又无不充溢着和平、友好、谅解和欢快的气氛。新一代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不知不觉之间就透露出一种不可抗拒的亲和力和凝聚力。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江泽民既是一位富有魅力“笑容满面的国际政治家”,又是一位举重若轻、气度恢弘的“重量级外交家”,是当代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象征,又是代表中国促进世界跨世纪大变革大发展的重大动力和保证。

3. 江泽民的人格魅力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传统美德与现代风范的有机统一

人类文明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体。东西方文明向来各有特点和专长,互补性互动性极强,都为人类文明大厦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各国之间,各种文明之间可以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而外交和国际活动正是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展示各自特点、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最好机会。改革开放的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果,如何对待现代西方文明,进而如何建设自己走向世界的新文明,这正是国际社会关注和观察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江泽民访美时专程前往费城拜访他五十多年前的老师顾毓琇先生,当他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代经典名言表述自己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见解的时候,当他认真地引用到访国的古今名人的佳句格言表达自己对异国文化的理解和敬意时,当他在参观学习国外高科技和先进企业自然流露出聚精会神、虚怀若谷和如饥似渴的神情时,当他在海外华侨欢迎宴会上即席为同胞演唱国粹京剧时,当他与夫人王冶萍女士手拉手站在机舱口向迎送的人群挥手致意,搀扶着夫人上下飞机的时候,国际社会从这位新一代中国领导人身上,不仅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尊师重道、敬祖奉典、珍惜亲情和夫妻恩爱等传统文明和美德,而且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中国人博采广纳、学贯中西、尊重科学、走向世界的现代风范。正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使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现代文明增长和发展的希望与未来。

4. 江泽民的人格魅力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的国格魅力

作为新一代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国际舞台上的人格魅力的最高价值就是其与中国国格魅力的高度统一。国格相对于人格而言，是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利益和荣誉的综合，是国家的信誉和形象的标志，是主权国家的国际地位和作用的体现。国格及其魅力，从根本上讲主要是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来实现，同时也可以借助国家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人格魅力得以反映。邓小平特别强调人格与国格的统一。在江泽民身上则体现着在国际活动中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的原则立场和表现艺术的高度统一。以微笑和友善赢得亲和力，是一种人格魅力，以睿智和美德换来感召力，也是一种人格魅力。而以奇妙的语言艺术和高雅的幽默感来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同样称得上是一种人格魅力。这集中表现在江泽民访美过程中对西方所谓“人权”和“西藏问题”的绝妙回答。当记者提出释放被捕的所谓中国“异见分子”时，江泽民并未从正面予以严厉的批驳，而是心平气和地回答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而不是中国高等法院的院长，因此涉及到中国的刑法问题，会由法院按照法律程序来解决。”^①这种答问艺术，本身就是一种中西合璧的高级政治智慧，赢得一片喝彩声。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当主持人说：“您以前说过，如果谈独立的话，您不会和达赖见面，那么现在达赖说，他愿意同您见面而不谈独立，您为什么仍拒绝与他会面？”江泽民回答道：“我想我们对达赖十四世方针是非常明确的。他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公开宣布放弃西藏独立，同时停止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我感到非常遗憾，实际上达赖十四世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分裂活动。”^②在这场问答中，问者自认为提出了一个具有严密逻辑性可令答者难堪的尖锐问题，而江泽民的回答只是摆出一个基本事实，使对方的提问失去了一个基本前提，结果一个自认为尖锐的问题瞬间失去了提问的价值。冷静的逻辑思考，高超的答辩技巧，使江泽民在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从容不迫、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信心和主动性。一直对新中国抱有成见的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也确实由此领略了一番中国领导人的非凡智慧和现代风范。新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人格魅力和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国格魅力同时得到了美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嘉许。

江泽民在国际舞台上所表现出的以开放、广博、宽容、睿智、亲和、达观为特征的人格魅力赢得了人心，赢得了世界。对于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迈入新世纪的中国来讲，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正是邓小平外交、国际战略思想跨世纪发展的一个缩影。国际社会在欢迎它，研究它，作为中国人更应当研究它，珍惜它，发扬它。江泽民国际战略新思维和新风格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之

^{①②} 转引自《作家文摘报》，1998年4月15日。

一，它既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又必然伴随世界历史的发展而与时俱进。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社所）

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建设

郑贵斌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发展进程中长期艰苦探索的理论成果，也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反映了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深刻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加强对发展理论的研究与建设，对深化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认识，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向前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确立，就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重大成果，它围绕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发展问题，科学地回答了我国社会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的继承与创新。

从继承性来看，科学发展观有其深厚的思想源泉，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马克思在他创立的唯物史观中，对社会发展的主体、本质和目的进行了阐述：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的进步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未来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任何具体的社会形态都是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一直把依靠全国人民，尽快改变经济文化的落后面貌，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作为重大的执政课题积极深入探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对此有重要论述。1956年，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观点，初步探索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邓小平

坚持改革开放，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中央制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实施了“三步走”现代化建设战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明确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关系，提出了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和现实需要，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把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这些论述，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深刻阐明了我国的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道路、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及由此确立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这些理论和观念的自然逻辑延伸。

从创新性来看，科学发展观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奠定的坚实的理论上，从我国国情出发，依据我国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实践，结合当代世界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内涵、主体、本质和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富、体系完整的理论，回应了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经济、政治和社会挑战，是与时俱进的全新的发展观。重大创新表现在：一是对发展主体与发展目的的新阐述。强调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凸显出价值性原则。二是对发展内涵的新界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体现了发展的全面性。三是发展规律的新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非常重视整体协调发展。四是在发展道路上有新揭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充分反映了可持续理念。五是对发展战略和目标做出新部署。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建设现代化，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步入新阶段。总之，科学发展观，总结了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取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赋予发展以崭新的时代内涵和意义，具有系统性、科学性、价值性的特点，发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概念变化和结论概括，而是一套清晰、完整而成熟的发展思路 and 理念体系。这是发展理论范畴和体系的一次突破，是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大的飞跃，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大贡献

科学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深化和与时俱进，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设与创新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众所周知，在贫穷落后的国家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路在于发展，希望在于发展，前途命运系于发展。发展是中华民族振兴的必由之路，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然而，怎样发展才符合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和要求，是几代人不断思考和探索的课题。我们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既有加快发展的经验，又有发展受挫的教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走了不少弯路。这一切都与发展观的指导有着密切的联系。科学发展观的确立，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上的深化。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到十六届四中全会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进一步总结了建国 55 周年和改革开放 26 年的实践经验，把科学发展观上升为党执政兴国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崭新理论，使之成为包括发展指导思想、方向与目标、实现途径与评价标准在内的一整套发展理论，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上的重大创新。这一创新，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走向新的文明发展时代。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升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更好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本质要求和崇高使命。为履行使命，必须要有执政理念的提升，这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迫切需要。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到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理念。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这一理念，极大地丰富了党的执政理论体系，体现了执政使命与执政手段的辩证统一，借鉴历史经验与解决现实问题的辩证统一，执政价值观与方法论的辩证统一。树立科学发展观，同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以及各级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对科学发展的认识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将促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大大提高党驾驭发展的能力。所以，科学发展观也是对提升党的执政为民理念做出的理论贡献。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有益探索。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

发展。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展中出现了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危机，人们开始对发展进行多维度、多视野的探索，发展观也就出现了从经济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提出的发展观，发展的内涵越来越充实，发展的表述越来越合乎社会发展的目的性和规律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着眼于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解决发展危机，破解发展难题提出来的，是发展观的薪新发展和科学概括。它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系统整体协调发展，它涵盖了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方面，强调尊重自然、经济和社会的客观规律，是最系统的社会发展观。它不仅是对我国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而且是对人类社会发 展经验的总结，它的意义超出了对我国社会发展的指导。从目前世界各国都在探索人类社会的发展思路、模式的实际情况来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探索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对世界发 展和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它对世界的和平与发 展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四，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丰富和拓展。马克思主义在其长期发展中逐步形成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人民本体的科学价值观，构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和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发展观是必不可少的。随着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的发 展和进步以及发 展制约因素的增大，发 展观的地位凸显，发 展观的现实针对性和影响越来越大。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完善，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 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完善，又是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在发 展问题上的拓展和延伸，它对指导当今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可见，发 展观的丰富与发 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丰富与发 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境界、新视野。因此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发 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理论建设。

三、立足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不断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向前进

当前，我国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事前无古人的伟大建设事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应当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探索，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推向前进。这是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与发 展的新任务。

首先，要抓好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研究，使全党同志更好地掌握它。科学发展观，是当今经济社会发 展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成果，在回答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分体现了它的实践价值和理论力量。因此，我们应当以时代的要求高度审视科学发 展的理论和观念，以创新的精神进一步推动这一理论的丰富与发 展。党的理论发 展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每一次理论创新，都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成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生命工程，推动着人们以新的理论武装从事新的建设事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党的理论与思想指导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要立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从我国当代的实践来看，理论建设是根本的建设，它不仅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可谓是当前治党治国的根本。因此，要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建设当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利益所在。要通过理论研究与建设，把经验和理念进一步转化为系统的理论认识，以进一步深化对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好地完善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体系。只有这样，党的理论建设才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和富于创造性，增强理论的实践价值。

其次，要把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指导，真正贯彻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去。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来源于我国的伟大实践，指明了我国要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为解决新问题、新矛盾提供了指导方针和工作思路，是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对指导我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又是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从前一阶段的落实情况来看，虽然取得了重要成效，但仍需付出巨大的努力。我国目前的改革发展处在一个关键阶段，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发展面临着不少的矛盾，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事业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被判断为是一个既有巨大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时期，是一个既有难得的机遇，又有严峻挑战的时期。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能不能抓住新机遇、解决新问题、实现新发展，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继续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正确把握时代要求，深刻认识我国国情，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进一步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和各个方面，注重把树立科学发展观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结合起来，把积极进取精神同科学求实的态度结合起来，适应新阶段新任务的要求，更新发展观念，尊重发展规律，创新发展思

路，转变发展方式，做到统筹兼顾，使践行“三个代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到实处。

第三，立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与实践，促进马克思主义重点学科的理论建设。实践是理论的源泉，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理论发展的规律。理论发展的规律表明，不能用本本去框实践，而是用实践去发展本本。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应当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随着发展条件的变化和发展实践的不断拓展，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与建设也就没有止境。从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推动我国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需要来看，不断丰富发展内涵、开拓学科理论，促进学术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一方面，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一个发展的问题；另一方面，各领域的发展问题必然存在理论建设问题。因此，要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延伸、扩展到与“发展”有关的各个领域，贯彻到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管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重点学科的理论建设中去，以丰富、充实相关的学科理论。社会科学界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的这一崭新任务，做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

秦庆武

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均 GDP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300 美元提高到 2003 年的 1000 美元。这说明,我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登上了第一个台阶。根据国际经验,人均 GDP1000 美元是一个转折点。从 1000 美元到 3000 美元,是一个加速增长的时期。我国经济增长至少还有 10 ~ 20 年的高速增长期。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国面临着一种现代化道路的艰难选择。

一、艰难的选择

现代化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决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要付出代价的。无论是英国、法国的经典现代化,还是日本、韩国等亚洲四小龙的后发现代化,以及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现代化,都走过不少弯路,有不少经验教训。尤其是拉美和东南亚国家至今还患有“现代化综合症”,掉在“现代化陷阱”里面难以走出来。

我国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下岗失业、农村萎缩、农民和产业工人等社会群体的边缘化等问题凸显出来。“现代化综合症”越来越突出,整个社会结构产生了严重的断裂,正像一位法国社会学家所指出的那样,现代化过程就像一场马拉松赛跑,一部分社会精英跑在最前面,而工人、农民大众则被远远甩在了后面,再怎么努力,也追不上了。社会结构由金字塔结构演变成马拉松结构。我们越来越走入了“现代化陷阱”,出现了“人才向城市集中,贫困向农村集中”,“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状况,这正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就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来看,一种是比较成功的西欧经典现代化模式和东亚(日韩)现代化模式;一种是“病态发展”或“低度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underdevelopment)的拉美现代化模式。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毫无疑问,我们应当选择城

乡差距、贫困差距不大、社会均衡发展的成功的东亚模式，而不是选择拉美模式。但事实上，我们则有走上拉美模式的危险。

当我国人均 GDP 达到 1000 美元这个关键转折点时，我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如何避免走向“现代化陷阱”的问题，如何从根本上医好“现代化综合症”的问题。中央关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五个统筹的提出，实际上是对我国现代化模式和道路的新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能否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也是我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

二、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如果从洋务运动算起已经有 100 多年的时间。但是，真正的经济起飞是近 20 多年的事情。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应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从 20 多年前的平均主义盛行到悬殊的贫富差距（有论者认为中国贫富差距已经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48 ~ 0.50）只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形成这种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是否有什么问题？这正是我们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西方学者（如弗兰克等）对现代化进程中的“低度发展”或“病态发展”有过准确的描述。“低度发展”这个概念最简单的解释就是“有经济增长而无发展。”或者说是“增长的指数很高而发展的效率很低。”它的“病态”症状主要是：发展集中在大城市；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农村经济衰败；大城市中一边是低收入阶层，一边是少数人的“特权消费社会”；腐败渗透到各个角落；社会道德水平下降；科技和教育进步缓慢等等。

不知道“依附论”背景的人，可能会误认为这些病态现象是对中国的描述，其实是对拉美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出现的病态现象的概括。以后，东南亚国家，中东国家和中国实际上也出现了这种病态现象。按照弗兰克的“大城市——卫星城”的理论，在国际不平等的分工体系中，大都市对中小城市、中小城市对农村，形成了一个“垂直性”抽取的经济结构。通过一个“传送带的装置”，把底层的剩余资源传送到大城市，从而造成落后国家的农村萎缩和广大下层人口的极端贫困，而且这种病态结构自身会不断发展。

早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中期，就有一些西方学者指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拉美模式极其相似。存在着经济增长数字高而发展效率低，发展集中在大城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急剧扩大、失业严重、农业与农村萎缩等现象。这种病态发展如果被无限期

的拖长，那么后果将不可设想。

为此，我们亟须反思我国现代化道路和发展模式选择上，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同是东亚小农国家，为什么日本、韩国能避免走拉美道路，而我国却越走越远，症结在哪里？其中文化因素是什么？制度因素是什么？外部环境有哪些影响？我们在发展战略选择上有没有失误？

抛开文化因素、制度因素不谈，单从战略选择上我们就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改革初期，我们曾经有一种理论，就是“只要把蛋糕做大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这种理论，在政治学上的表现是“实力论”。就是认为只有增长，才能增强国家实力，GDP 是最重要的发展指标和尺度。在经济学上，这种理论就演变为“效率优先”论。其基本看法是，生产优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要想发展经济，就难免牺牲社会公平。

在“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下，出现了许多政策上不正确的选择。主要有：在经济生活中，对 GDP 的努力追求下，对高速度的强烈攀比。追求高速度，必然带来高投资率，从而不顾消费的增长，不顾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以环境污染、高消耗、高浪费为代价。在收入分配领域，实行上层对基层的财力的过度汲取，过分强调国家和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资源配置能力，而不顾基层、农村、贫困地区的发展，造成城乡差别、贫困差别日益加剧。在政治生活领域，对强势集团优惠有加，对弱势集团的诉求不闻不问，使下层民众财产被强行剥夺，丧失尊严；而各种强势群体形成了分利集团，瓜分了改革成果，弱势群体则未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在具体的事例上，就有很多。如，1994 年的分税制，导致中央财政大幅增加，越到基层，财政越捉襟见肘，县乡财政极其困难。一方面，上面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则财权不断上收，事权不断下放，要求基层各种升级达标，甚至一票否决。一直到 2003 年，在县级财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新增财力的大半还要被中央分走。

再如，农村的义务教育，依照各国惯例，这是属于提高全民族素质的教育，是最基本的体现社会公平的公共产品，应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拨款。但现行的义务教育体制，中央对教育投资基本为零，农村教育全部由农民负担，仅此一项，就增加了多少农民负担？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困难，依靠“希望工程”的捐助。十多年捐助额为 18 亿元，但为办一所一流大学，一次性就可以为北大、清华各划拨 18 个亿。18 个亿是 360 万贫困小学生的学杂费。

又如，为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提出“减员增效”这个办法。造成企业可以随意裁减工人，造成工人下岗失业。就业是政府最大的职责，而政府却鼓励而不是限制企

业裁员，这就从根本上弄错了自己的位置。

近几年在“经营城市”的口号下，造成对农民土地、城市居民房产的大肆剥夺。十多年办开发区热从农民那里是低价征用土地，有专家估算至少有 20000 亿的资产，远超过前 30 年价格剪刀差对农民的剥夺。在城市，政府帮助开发商对居民住房强制拆迁，造成民怨沸腾。

说到底，这些都是由我们不能坚持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造成的，是片面地追求增长、追求效率，而不顾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造成的。如果长此以往，再不总结和接受这些教训，我们就将自食其果。社会关系的紧张所造成的社会动乱，可以使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成果丧失殆尽。

三、确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为克服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认为增长不等于发展。增长是片面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应以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环境、资源等条件为基础，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实现经济增长与政治民主的推进，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价值观的变迁，社会结构的转型，自然生态平衡相统一、相协调。罗马俱乐部为批判“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而提出的“增长极限论”，其深刻含义就是宣告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战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结束，为人类认识未来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视野。

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高瞻远瞩，充分认识到了传统的发展观的局限，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是基于对中国国情认识和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思路，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确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应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问题和理论问题：

1. 在全社会树立以人为本的，效率和公平并重的新的发展观

要避免我国重走拉美国家的弯路，就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牺牲社会发展和社会公平为代价的“效率优先”的经济增长战略。而确立新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效率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保持社会公平则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对于政府来说，保持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比提高经济效率、推进经济增长更为重要。政府应该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等手段，促进社会公平，防止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

2. 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使之向基层、向弱势群体、向“三农”倾斜

首先是现有的财政体制要进行调整。改变目前高端财政对低端财政过度汲取的现状，建立和完善政府公共财政体制，做到财权和事权统一。财政体制改革要与政府机构改革、精简冗员相结合。切实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的供

给问题。解决好乡村负债问题。

3. 培养新的经济增长周期，使经济持续快速、平衡发展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推动而不是消费拉动，这是不正常的。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在78%左右，其中低收入国家为81%，高收入国家为78%，我国仅有58%左右。因此，要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为重点，提高社会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和水平，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推动型向消费拉动型转变。

4. 确立“适度工业化”的发展目标，使经济发展走出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的误区

目前我国已进入重工业化时期，处于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出现了新的短缺经济，这就是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严重短缺，面临着资源瓶颈。2004年下半年世界石油市场的巨大波动，石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更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要走出资源短缺的瓶颈，就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使经济发展充分考虑经济承受力、生态承受力和社会承受力。

5. 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正确的政绩观是确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各级领导干部应把经济发展的宏观目标由紧盯GDP转向紧盯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来。目前的一个怪现象就是高投资率并未带来高就业率。如果就业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增加就无从谈起。因此，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创造尽量多的就业岗位，把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进来。就业应成为考核各级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目标。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农经所）

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

杨金卫

确立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进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对于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科学发展观是对人类社会发 展主题的深刻揭示和理论升华

科学发展观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又结合了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现代化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它既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又符合时代发展潮流；既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又包含着深刻的人文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中国实践中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

首先，全面发展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经济是一个社会生存、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力量。同时，他们也重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根据共产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的各方面的才能”，“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揭示了社会全面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一致性，指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②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 80 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9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32 页。

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① 十六届三中全会把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列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本质要求。发展是人类进步的永恒主题，科学发展观坚持了全面发展的观点。经济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进步也为经济的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和保障。科学发展观以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健全、科学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作为发展的总目标，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整体推进，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其次，协调发展观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明”一词有过多种解释。据有关专家研究统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仅从第1卷到第30卷，使用“文明”一词就达2600多次。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和吸收了摩尔根、傅立叶等先进思想家关于文明的思想，第一次把文明奠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科学预见。经过不断的探索，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文明的认识日益深化，逐步提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新范畴。其中，物质文明所体现的是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相依存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精神文明所体现的是科学、文化、宗教、艺术、道德、伦理、哲学、经济、政治、法律等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政治文明所体现的是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它是反映特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的标志。人类文明的进步主要体现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方面的协调发展。三个文明中的每个文明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作用、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提供物质基础，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可以推动政治制度的变革和思想道德及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政治文明决定精神文明的性质和物质文明发展的方向，进而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程；精神文明可以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提供思想引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了经济社会、三大文明协调发展的观点。协调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个统筹”发展的实质，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平衡与和谐。认真落实党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努力改变目前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人群之间存在较大发展差距的状况，不仅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有利于促进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

第三，可持续发展观是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社会

^①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页。

环境永续发展的智慧结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忙于战后的重建、恢复和发展；不少发展中国家启动了工业化进程。然而，与工业化相伴而来的一系列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人口爆炸、不可再生资源耗竭、生态环境恶化，等等。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水平低、资金匮乏、人口压力等原因，生态环境难以改善，出现了“贫穷→人口增长→环境退化→贫穷”的恶性循环。1972 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人类环境会议，与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一种共识：要在不妨碍发展的条件下保护环境，保护和改善环境已成为人类一个迫切的目标，也是关系到人类千秋万代的长远问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类认真总结了自己的发展历程，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活动与发展行为，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可持续生存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指标，缺一不可。科学发展观坚持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它强调在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必须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最终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人类社会在曲折中发展所取得的一条宝贵经验，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只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认真对待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才能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造福人民和子孙后代。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健康水平，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以人为本，从本质上说，就是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马克思说过，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把满足

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人本主义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 马克思主义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没有否认人的自然属性的存在。马克思指出，研究人的本性“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②。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要考虑人的自然本性和一般本性，而且要考虑社会主义制度和相应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等对人的本性的影响和打下的“烙印”。以人为本，不仅仅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的目的。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中强调以人为本，不仅仅是为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为了解放人、发展人，其中也包括对人的生活的关心和人格、权益等的尊重。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本观的实质。科学发展观坚持了以人为本的观点。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其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实现同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程度越高，越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有效改善；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就越能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分而必要的物质文化基础。因此，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需要通过经济的发展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另一方面还需要通过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使人民群众充分享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

第五，科学发展观是对国际发展经验和传统发展观的扬弃和超越。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到可持续发展再到确立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战略，这也是世界性的发展观的转变，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二战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和独立出来，他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尽快提高非常低下的生产能力，改善生活，削减贫困，增强国力。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发展中国家都确立了以 GDP 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战略。联合国第一个发展 10 年（1960—1970）规划报告和第二个发展 10 年（1970—1980）规划报告，也都有把 GDP 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的取向。但是，在只要是“经济的”就是“合理的”观念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资源浪费、贫富悬殊、产业畸形、生态环境恶化、债台高筑等问题，很多诸如平民教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69 页。

劳动保护、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城乡协调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进步因素，都被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代价牺牲掉了，造成所谓“拉美化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困境。传统的发展观，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而忽视人的全面发展，简单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的全面进步，相应地把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核心标尺而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单纯地把自然界看做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而忽视自然界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传统发展观的影响下，尽管人类曾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往往不能随着经济增长而相应提高，甚至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科学的发展观，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是协调的发展观，是开放的发展观，是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说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科学的发展观，就是要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地区协调发展，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与传统发展观不同的是，科学发展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不再是单纯和片面地强调用速度和数字说话，而是将发展放到一个更大的系统中来科学地衡量，强调经济、社会、人与自然等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突破了过去把发展单纯理解为经济增长、GDP增长的局限，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出发来思考和认识发展问题，使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更加深刻。

二、科学发展观解决了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第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深刻。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也是统筹兼顾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思想深刻，内容丰富。首先，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以人为本，就是要满足人的全面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什么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那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概念，没有条件做详尽的阐述。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原则，赋予人的全面发展以新的含义，这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取得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成

果。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新中国建设五十多年经验教训的正确总结。五十多年来，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成就是巨大的。但在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的关系上，也有过一些经验和教训。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生活的改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归宿，是对人类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在科学发展观中处于核心的地位。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要把人与自然的协调以及子孙后代的发展都作为发展观的问题来统筹考虑。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自己，又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分析各方面的问题和矛盾，找到协调、平衡各方面利益关系的正确政策。发展和统筹兼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要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

第二，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发展的实质和目的。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重要战略思想。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改革开放 25 年来，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我们之所以经得起国际国内各种风浪的考验，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之所以不断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取得很大进步，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今后，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要靠发展；要增强国防实力，维护国家安全，要靠发展；我们要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的责任，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中立于不败之地，也要靠发展。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发展，形势逼人，如果不加快发展，就会落后，甚至会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因此，必须始终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本世纪头 20 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从国际情况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间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加快，我们有可能利用有利的时机和条件加快发展。从国内情况来看，实现加快发展的有利条件也很多。我们必须十分珍惜和切实用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这里的关键在于，发展必须有新思路，必须把握和运用现代化建设规律。只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辩证地认识和处理与发展相联系的各方面重大关系，发展才能有新思

路，改革才能有新突破，开放才能有新局面，也才能紧紧抓住和充分用好战略机遇期，顺利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否则，现代化建设就难以顺利推进，甚至会走弯路。因此，我们必须站在能否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实现更快更好发展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

第三，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了我国发展的方向和目标是要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在本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并明确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目标和任务。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我们要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也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我国进入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面临的矛盾和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树立科学发展观至关重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主要是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和竞争力不强等。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必须逐步解决而不可任其发展。还要看到，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 1000 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和现行汇率计算，到 2020 年将达到 3000 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许多国家的发展进程表明，在这一阶段，有可能出现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得不好，往往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地区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这个重要阶段，一定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城乡发展、地区发展的关系，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处理好经济增长同资源、环境的关系，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处理好物质文明建设同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还要处理好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科学发展观为我们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矛盾和问题，顺利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指针。

第四，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发展的本质和核心。我们党的宗旨是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全部工作，只有顺民意、谋民利、得民心，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以人为本的思想，是我们党在不断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基础上提出来的。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 80 周年大会讲话中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人的全面发展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之中。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同时，鲜明地提出“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从此，以人为本成为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这个“人”，是人民群众，这个“本”，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是发展的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坚持以人为本，表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在坚持党的宗旨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是对党的执政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化和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妥善处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我们就能使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越来越充分地享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坚持以人为本，就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不仅要满足生存的需要，还要满足安全、享受和发展的需要，不仅要满足物质生活需要，还要满足精神文化需要；就要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障人民在教育、就业、收入、财产和发明创造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就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创造有利于人们平等竞争、全面发展的环境和条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良好社会氛围；就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建设学习型社会，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更加自觉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经验得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出的一个紧要课题，也是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必然要求。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表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在坚持党的宗旨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以人为本是我们制定发展战略和各项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要充分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有相应的物质基础和社

会条件，而且是一个漫长和不断进步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所以，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对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要带着深厚的感情帮助解决，切实把党和政府为他们脱贫解困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要注意处理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具体利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

第五，科学发展观深刻揭示了发展的总体要求和根本原则是统筹兼顾。在强调发展的基础上，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坚持统筹兼顾。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这一思想的要求，提出了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统筹兼顾是毛泽东在 1957 年提出来的。统筹兼顾就是执政党要对执政的国家中所有的人负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继续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 80 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提出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这五个统筹实质上就是统筹兼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如何统筹兼顾、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既是我们党需要认真总结和加以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关系到加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领导水平的重大政策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我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社会经济结构转变，将是今后几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统筹区域发展的实质，是实现地区共同发展。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关系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也关系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统筹区域发展，就是要继续发挥各个地区的优势和积极性，逐步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实现共同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经济发展

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精神文化、健康安全等方面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更加要求社会与经济发展。如果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经济也难以实现持续较快发展。社会发展包括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也包括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正、社会秩序、社会管理、社会和谐等，还包括社会结构、社会领域体制和机制完善等。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质，是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弱，这是基本国情。特别是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能源、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生态环境的形势十分严峻。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高度重视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也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与长远发展的根本大计。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实质，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实现中国经济的振兴。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正在发生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要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三、科学发展观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与时俱进，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发展观

第一，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继承和创新的统一。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继承也是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在创新条件下的继承。建国以后，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进行了不懈地探索。从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到党的八大提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三步走”战略的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制定；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提出，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蓝图的制定，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和升华。科学发展观既继承了这个探索过程所形成的思想的合理“内核”，又顺应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发展趋势，从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

物质文化需要出发，进行了大胆创新。尤其是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归宿，是对人类发展规律认识的一次飞跃，是一个崭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本身就是一个在结合中创新的范例，是把中国的发展问题放在世界范围的横向比较以及与中国自身发展的纵向比较中得出的科学结论。

第二，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重点发展与全面发展的统一。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贯彻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是重点发展与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重点论与全面论的辩证统一。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看，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大文明辩证统一的关系和协调发展规律要求我们，既要坚持重点论，经济发展、物质文明、国有经济是不可动摇的重点。同时，我们又要坚持全面论，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都要发展。从历史发展进程看，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当然有其不同的发展重点，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中，它必须追求一个综合的、协调的、全面的动态平衡。从区域发展看，改革开放以来，提出和实施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共同富裕政策；以后又提出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等等。这既反映了我们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重点，也说明我们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追求全面发展的思想。

第三，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统一。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坚持以人为本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内在统一的，以人为本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价值取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和途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又体现了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为正确处理以人为本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本上是一致的。以人为本表明人是根本目的，实现这个根本目的关键要靠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始终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根本目的，而坚持以人为本，则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需要两个前提：一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二是人的素质的极大提高。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目的。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应该围绕人的需要和自由全面发展来选择发展的内容和道路，并推动人类赖以生存的社会趋向于更公平，更合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以人为本。我们搞好生产、促进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群众，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强调以人为本，这个“人”，就是人民群众，这个“本”，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第四，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的统一。科学发展观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发展的主体是“人”，发展的客体是指自然和社会环境。马克思指出，实践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具体而现实的双向对象化的过程。科学发展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主客体的辩证统一思想，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又强调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这些都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的辩证统一应从三方面加以理解：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变；三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不断深化。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要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的关系。一方面，要充分考虑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十分注意考虑自然的发展。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牢固树立保护环境观念，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观念，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牢固树立“绿色 GDP”的观念，建立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目标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第五，科学发展观体现了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发展理论的统一。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点来自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深入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以邓小平的发展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的。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还强调两个文明，讲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主张的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而抓好经济建设才有社会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科学发展观实质上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完全一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体现，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贯彻落实，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的意义上来实现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今天党中央提出和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深刻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发展的要求，深刻体

现了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因此，科学发展观结合时代的新变化和实践的新发展，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出了与时俱进的丰富和发展。

（作者：山东社会科学院办公室）

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袁红英

不同的发展观对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导向作用，会对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发展观有问题，社会也就不可能和谐发展。正确的发展观，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和谐社会的建设。因此，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保证。

一、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 以人为本的内涵和实质

以人为本是在总结我国长期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思想，对于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人为本的实质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以人为本中的“人”，首先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本”指的是发展之本，即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切发展之根本。我们党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首先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我们党取得政权靠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巩固执政地位同样靠广大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靠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创造性活动。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科学回答了发展的目的问题，即发展说到底是为了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无论发展生产力还是发展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无论发展政治文明还是发展精神文明，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离不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

的根本利益。

以人为本为科学发展观指明了基本的价值导向。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社会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核心的社会历史观，强调尊重人的存在价值、需求价值和发展价值，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唯物史观在科学阐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同时，也指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服务的对象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把自己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始终把自己的根本利益与全人类的根本利益特别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自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价值取向。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实践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开辟了现实空间。科学发展观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这一基本原则，强调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明确论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宗旨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这是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突出表现，是以人为本的历史原则与党的宗旨高度结合的必然结论。

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生产力中最能动、最活跃的一种要素就是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的创造者，也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我们过去也讲过，人民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又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及改革和发展的主体。只有把人民的主体地位确立起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人越全面发展，就越能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人们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有效的改善，就越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反之，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生活水平越高，就越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中，我们始终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三个有利于”标准仍然是我们推进改革的重要原则。同时，改革还要有利于大多数人利益的整体实现，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重要原则和内在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让人民群众从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利益，就会最大程度地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不竭的动力。

2. 在实践中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确立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本，要求树立以人为价值的核心和社会的本位，把人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人的解

放，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通过激励机制来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既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主体和动力，是创造财富的主体，又是其成果的主要所有者和享用者。因此，必须围绕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需求，提供充足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围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第二，把实现和维护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利益决定人心，人心决定成败，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总是由各方面的具体利益构成的。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为此就要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问题，就要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这个道理。从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问题入手，通过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事业不断让人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第三，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爱护人。在尊重和保障人权中，最重要的是扩大基层民主，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为人民创造平等发展的权利和社会环境。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没能实现当家作主，也就没有全面发展可言。

第四，加快人力资源开发，不断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使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力资源尤为丰富，但劳动者素质低下不能满足现代生产要求的矛盾相当突出。发展的实践表明，制约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决定性因素，不只是物质资本的不足，也不仅是科学技术的落后，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为此，一定要把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作为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来看待。

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五个统筹”，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这样才能促进“三个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

1.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坚实的物质基础

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发展，首先要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要长期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并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这样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能放松。

(1)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在现有基础上继续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没有经济持续的快速增长，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句空话。虽然我们不能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一定的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建成了。但是，没有这些经济总量目标的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可能有实现的物质基础。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贫困人口和城镇生活困难人口，要解决他们的困难，没有较快地经济增长，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1998～2004年的7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7.7%，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2%。从国际经济环境看，世界经济逐步回升和结构调整加快，国际经济形势整体好转，总体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从国内看，我国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宏观调控经验进一步丰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对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全面部署，新一轮经济改革必将为经济增长增添新的动力，这都为我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宏观环境和强大的支撑力量。我们必须切实增强机遇和忧患意识，把握和用好机遇期，趋利避害，发挥优势，既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要更加重视总量调控和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发展。

(2)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税费改革步伐，增加农民收入。要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第一，继续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基本农田保护，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第二，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第三，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大治理“三乱”力度，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第四，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产品市场体系。加强农技推广队伍建设，鼓励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中专院校等开展农技服务，推进科研、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一体化，发展农机服务业。第五，加大对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提高财政支农比重，增强信贷支农力度，积极促进农业利

用外资，逐步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第六，改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环境。进一步完善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政策、投资政策、土地政策和户籍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技能培训，搞好中介服务，促进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

(3) 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高新技术产业关系我国的长远发展，我们要大力培植新兴产业，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集中突破。尤其要加快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等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着力改造重点行业和骨干企业尤其是装备工业，创造更多的名牌产品，形成和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工业的整体素质和效益。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促进自主科技创新的政策体系，加强产学研结合，加快建设以高校、科研院所为依托的知识创新体系和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把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引导企业加大 R&D（研究开发经费）投入，提高持续创新能力。

(4) 提高经济的外向度，促进外经外贸的大发展。要调整外贸发展战略思路，从对总量规模扩张的追求转向出口效益、竞争能力的提升，以外贸出口的高水平、高质量为主要目标，在认真分析国内外市场状况、我国出口产品竞争能力、比较优势和潜力的基础上，明确目标，集中力量扶持具有较大拉动能力的支柱行业和拳头产品，培育名牌，追求以质取胜，在质量与效益的提升上下功夫。要加快吸收跨国公司战略性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

2. 坚持“五个统筹”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选择

“五个统筹”是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提出来的，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是我们新世纪新阶段确定改革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选择。

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点不是在城市而是在农村。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 9 亿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实现全面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的和谐，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的和谐。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应当采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相应措施，以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我们党历来就重视“三农”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仍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因此，必须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注。统筹城乡发展，重要的就是要突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

统筹区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难点不是在东部而是在中西部，特别是

在西部经济落后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原有基础、客观条件以及改革开放步伐和力度的不同，地区差距目前仍呈继续扩大之势。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必然影响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国防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地区差距问题要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得到解决，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扫清体制上的障碍，提高市场化的程度，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同时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加大中部地区结构调整的力度，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支持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和改造，支持以资源开采为主的城市和地区发展接续产业，支持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我们讲的发展，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当前的问题在于，随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和改革的不断深入，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在产生，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因此，只有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切实地关注和解决失业、贫困、教育、医疗、公共卫生以及社会公正和反腐败等社会问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协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达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实质，是人口适度增长、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我国是人均资源比较少的国家，资源约束是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全过程的大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技术政策的选择，乃至社会生活方式的选择，都必须考虑资源约束和环境承载能力。人口总量继续增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中必须高度关注和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此必须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坚决摒弃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同时大力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追求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最大化和废弃物最小化，努力使人口发展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

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的实质，是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通过深化改革，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能力，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趋利避害，大力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

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使得我们发展的竞争半径更加扩大，国际关联度和参与度更加密切和深刻。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要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适应国际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订立、修订和完善进程，努力争取使它们符合我国发展的利益。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1. 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

可持续发展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资源和生态的承受能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

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是 20 世纪 70 年代后在西方国家首先展开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在 1798 年发表的《人口论》，是最早对人口、经济与自然资源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经济学著作。《人口论》在抨击西方社会当时流行的乐观主义人口观点的基础上，创立了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但同时又存在种种争议的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理论和经济理论。马尔萨斯关于大自然生产能力有限性的思想、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必须与自然生产力相适应的思想以及积极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进入 20 世纪后，美国和欧洲的许多学者从不同领域对人口、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1972 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麦多斯（Dennis. L. Meadows）领导下完成的《增长的极限》，该报告认为，由于空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消化吸收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而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几何级数增长的性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经济增长在今后 100 年内将达到极限。这个预言虽然过于悲观，但它向人类敲响了警钟：经济增长必须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协调。1974 年，罗马俱乐部又发表了题为《人类处于转折点》的第二份研究报告，这两份罗马俱乐部报告，对于唤起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72 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人们对发展有了新的认识。1992 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00 多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聚集巴西里约热内卢，做出关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庄严承诺。《里约宣言》和《21 世纪行动议程》呼吁各国摒弃传统的以大量能源和资源消耗、以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发展，而代之以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已成为人们的共识。1981 年，著作《熵：一种新的世界观》问世，在西方学术界引起震惊。该书作者霍华德认为，工业化国家把自然资源转化成经济产品的速度越快，使其他国家及后代人从自然宝库中得到的资源就会越少。技术进步至多能加速资

源的转化，却使自然资源贮存枯竭。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制造出更多的垃圾和更大的混乱。事实上，熵值不断增长，已接近一个非常危险的水平，因此，我们必须从以非再生资源为基础的工业时代，过渡到一个新型的、重新以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时代。1987年，前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集中分析了全球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的情况，并在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明确提出了三个观点：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地球的资源 and 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深刻指出，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而现在我们正迫切地感到环境资源的压力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这一鲜明、创新的科学观点，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资源保护，引导到把环境资源保护与人类经济发展切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资源与经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在巴西召开，发表了包括《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在内的5个文件和条约，高度凝聚了当代人类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结晶，将人类对环境资源与经济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顺应当代人类发展进步的趋势，我国积极地参加到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中，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并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和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年7月，由原国家计委和原国家科委牵头，52个部门和300余名专家共同参与编制的《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促进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以及人口、教育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和政策措施方案。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讨论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003年11月，在我国珠海举办的世界经济发展宣言大会通过了《世界经济发展宣言》（珠海宣言），提出“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为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保持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观的一个基本内容，并把“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

2.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资源大规模、高强度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创造了灿烂的工业文明。但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成倍增长，导致了全球性的资源危机，引起了一系列相关的全球问题。特别是进入21世纪

以来,自然资源迅速耗减,生物多样性锐减,气候变化异常,各类灾害加剧,经济发展缺乏持续的后劲。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忧虑地球还能否容得下人类不断扩大的资源消费需求,企盼和寻求改善人类生态环境,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我国经济一方面保持着令世界惊慕的持续高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模式,造成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资源需求呈迅速递增的态势,资源“瓶颈”日益凸显,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昂贵,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形势。

一方面,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极为贫乏。(1)水资源:我国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名列第121位。按照联合国水资源安全标准,中国目前有10个省市处于极度和重度缺水状态,我国已经成为一个缺水国家。(2)土地资源: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很少,2003年人均耕地只有1.43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华北和东南地区的耕地面积已接近甚至低于人均0.8亩的耕地警戒线。全国宜耕土地资源为800万公顷,按照60%的垦殖率计算,可开发耕地480万公顷,仅为现有耕地面积的3.7%,且60%以上分布在水资源不足、水土流失、沙化和盐碱化严重的西北地区。(3)石油资源:我国石油按2001年的数据只能开采15~20年,全国石油储采比为15左右,远低于世界上39.9的平均水平。在探明石油储量中,已动用储量占75%左右,而未动用储量中约有1/2属于难利用、低渗透资源。1993年我国开始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0年石油进口量已超过了7000万吨。预计石油供需缺口2020年增加到2.1亿吨左右,对国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将由目前的30%上升到2020年的50%左右。(4)矿产资源:我国的矿产资源随着近几十年的开发也逐渐枯竭。我国主要金属矿产绝大多数国际竞争力不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保证程度不高。在已探明资源储量中,铝土矿和钨矿可供经济开发利用的资源量不到10%,其他矿产仅为10%~30%。大部分优势金属矿产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不能满足国内消费需求。由于国内重要矿产资源可供利用的储量不足,我国矿产品进出口贸易处于逆差状态,进口大于出口将成为我国矿产品贸易的长期趋势。

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粗放型模式,造成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与资源的短缺相反,我国的单位产值的广义能耗是发达国家的5~6倍,水资源消耗是8~10倍,比世界平均水平也高出不少。大量的能源消耗更带来了许多环境污染问题:(1)水环境污染问题。2003年我国的Ⅰ类水质河长占5.7%,而劣Ⅴ类水质河长却占到了20.7%。全国52个主要湖泊中优于Ⅲ类水质的湖

泊有 21 个, 26 个湖泊水质污染严重。(2) 水土流失与土地退化。我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达 367 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 38.2%, 另外我国土地沙漠化和盐碱化现象也比较严重。(3) 矿产资源损失、破坏、浪费严重。我国矿产采选回收率、回收二次利用率等指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 海洋污染。海洋污染的主要污染物为石油、有机物、营养盐、农药以及重金属。(5) 森林锐减及草场退化。我国森林自鸦片战争以后遭到巨大的破坏, 到目前为止林业用地面积仅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27.43%; 草地面积中的 90% 已出现退化状况, 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草地面积已达 1.3 亿公顷。

所以, 我们正在以历史上最脆弱、最严峻的生态环境、供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 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 造成了最严重的环境资产损失和经济损失, 生态不安全、环境不安全因此成为人类不安全的重要方面, 也是中国 21 世纪最突出的问题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必须摒弃传统的发展模式, 转向追求以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为目标, 经济增长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此, 在工作重点上要做到以下几点: (1)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 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它以减量化 (Reduce)、再使用 (Reuse)、再循环 (Recycle) 为基本行为准则, 以生态产业链为发展载体, 以清洁生产为重要手段, 目的是实现物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从本质上讲是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兼而有之的一种“双赢”的生态经济。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 - 产品 - 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 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 以便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依据自然生态的有机循环原理, 一方面通过将不同的企业、不同类别的产业之间形成类似于自然生态链的产业生态链, 从而达到充分利用资源、减少废物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提高经济发展规模、质量的目的。另一方面它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生产体系之间的系统耦合, 使物质和能量多级利用、高效产出并持续利用。要使循环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流, 必须从技术和政策两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建立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体系, 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链接技术; 要建立限制、鼓励和惩罚等经济政策, 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规范绿色产品的标识和市场, 促进绿色消费的快速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的三个层次: 一是在企业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从生产的源头和全过程充分利用资

源，使每个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废物最小化、资源化、无害化；二是在工业集中地区、经济开发区积极发展生态工业，在企业清洁生产的基础上，使上游企业的废物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料，不断延长生产链条，实现区域或企业群的资源最有效利用，废物产生量最小，甚至零排放；三是在一定区域内，用生态链条把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区与郊区、行业与行业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实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全面提高资源利用率，逐步建成循环型社会。（2）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据统计，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全国累计少出生了3亿多人。1992年以来，特别是“九五”期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0以下，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我国已进入了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但是目前我国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人口数量仍将以每年1000万人以上的规模增长，人口总体素质不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劳动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矛盾依然尖锐。因此，未来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坚持发展这个主题，围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这个重点，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建立完善有利于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利益导向机制和社会保障制度、加快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建设、切实加强中西部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全面推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优质服务等。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

新工业化与马克思主义

韩民青

关于新工业化的研究，涉及到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文化学、未来学以及诸多自然科学技术部门等广泛的知识领域，具有很大的综合性。但是，新工业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在其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在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理论和人类解放学说等许多方面，新工业化理论既坚持又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一、新工业化与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活动和发展的具体研究都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展开的。这是由唯物史观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地位所决定的。新工业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致性，首先就表现在它与唯物史观的深刻联系上。

1. 唯物史观的根本精神和基本原理

唯物史观的根本精神是唯物主义精神，它把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认识进一步贯彻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中，其集中表现就是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有着内在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恩格斯也说过：“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通过发现现实的联系来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结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起作用的一般运动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页。

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① 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受内在规律支配的客观过程，是历史观上的一场伟大变革，它是唯物史观与其他历史观的最根本区别。

正是在坚持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客观发展过程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才进一步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形成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做过系统而又精彩的论述。他说：“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② 在这里，马克思深刻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社会矛盾的相互关系和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形态演进的一般规律。同时，马克思还对社会形态的演进历史时代做了划分。

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以及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深刻揭示，最关键之处就在于把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方式的演进看成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动力。对此，列宁曾做过深刻的分析。他说：“显而易见，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① 所以，唯物史观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以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解释社会的发展。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算把握住了唯物史观的根本；只有坚持了这一点，才算从根本上坚持了唯物史观。

2. 新工业化理论的历史观背景：文明演进论

新工业文明或新工业时代是工业文明之后的更高级人类新文明，新工业化理论就是关于建设新工业文明的理论。新工业化理论对新工业文明的历史定位，需要一个坚实的历史观背景，这个历史观背景就是文明演进论。顾名思义，文明演进论就是关于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理论。文明演进论的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两项内容。

第一，人类是大自然物质形态进化所形成的产物。大自然物质形态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步进化形成了由低到高的4个层次，即物理物质、化学物质、生命物质和人类，人类是生存在其他物质层次之上的最高级物质形态。

第二，人类文明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物质的产物，人类文明是循着由浅入深地认识和改造自然物质层次而向前发展的，不同的人类文明归根结底是不同层次的物质生产力和物质生产方式。由自然物质的层次所决定，人类文明的发展将经历3个大的历史阶段，这就是：对生命物质的认识与改造阶段→对化学物质的认识与改造阶段→对物理物质的认识与改造阶段。可以把它们简称为人类发展的生物文明阶段、化学文明阶段和物理文明阶段。每个阶段又可分为初级与高级两个小阶段：在初级阶段，人类活动主要是对天然存在的某类物质形态（层次）的采集和利用；而在高级阶段，人类则能够生产该类物质，这时人类活动主要是人工生产和利用该类物质形态。这样一来，3个大阶段又可分为6个小阶段或小时代，具体地说就是：天然生物时代与人工生物时代、天然化学时代与人工化学时代、天然物理时代与人工物理时代。

当我们把上述文明演进线索与通常讲的采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相对照时，就可发现：采猎时代实际上就是天然生物时代（采集渔猎天然存在的动植物），农业时代实际上就是人工生物时代（人工种植植物和养殖动物），工业文明则实际上就是天然化学时代（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理所当然的就是“人工化学时代”即“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时代（文明）”，由于从大时代的划分看它与工业文明都属于“化学文明”，因此，与工业文明相对应又可以称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第8~9页。

它为“新工业文明”或“新工业时代”（见表）。

表 人类文明及生产方式的演进

时代 内容	生物文明		化学文明	
	采猎时代	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新工业时代
主要特点	采集果实、捕鱼、狩猎	种植庄稼、养殖牲畜	采掘矿藏、制造机械	微制造、循环生产、太空开发
生产方式	劳动对象： 野果、野兽、水生物 劳动方式： 采集、渔猎 劳动产品： 果实、猎物	劳动对象： 土地 劳动方式： 种植、养殖、手工制作 劳动产品： 粮食、牲畜、手工器具	劳动对象： 自然矿藏 劳动方式： 采掘、冶炼、制造 劳动产品： 天然化学材料和能源及加工制造产品	劳动对象： 循环利用的原子小分子材料 劳动方式： 智能化的微制造、深层循环生产、太空活动 劳动产品： 人工化学材料和物理能源及加工制造产品、开发的太空
工具与能源	石器、骨器；人力	金属工具；畜力、薪柴	普通机械；矿物能源	智能化机械；物理能源

3. 新工业化理论完全是以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事实表明，文明演进论和唯物史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第一，文明演进论和唯物史观一样都坚持了唯物主义。例如，文明演进论关于大自然物质形态进化的观点、关于人类文明演进方向的观点以及人类文明演进的物质生产力本质的观点，都贯穿了唯物主义精神。第二，文明演进论和唯物史观是重合的，这主要表现在它们都把物质生产力的发展看做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演进论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不同的只是，文明演进论着眼于文明形态或生产力形态，唯物史观则着眼于生产关系，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只是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已，没有本质的区别。由此可见，文明演进论和唯物史观完全是一致的，以文明演进论为历史观背景的新工业化理论完全是沿着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建立起来的。

二、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

从本质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当然，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且是一种运动，一种社会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定义，作为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处在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在这里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为其奋斗目标的。我们要探讨新工业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不能不深入考察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的

内在联系。

1.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自身的基本特征，这主要表现在生产力的发展形态和经济政治制度这两个层面上。为了清楚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我们需要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①显然，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是：（1）以大工业化生产为其生产力形态，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工业文明；（2）以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统治为其基本制度，即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和政治上的资产阶级专政；（3）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促进了工业化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新飞跃和新发展，“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②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矛盾，被概括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于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成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③随着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改变，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统治地位都将失去，随之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即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社会主义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页、第277页。

② 同上，第278页。

③ 同上，第286页、第287页。

会的基本特征是：（1）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生产力，这是最重要的特征；（2）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经济体制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体制；（3）社会主义制度将更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特征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发展中。从理论上讲，被认为已经认识清楚的主要是制度层面的内容。例如，社会主义公有制和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一直是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被确立的。但是，生产力层面的特征一直未被认识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当年阐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时，只是谈到了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不再适应已社会化了的生产力的发展，但“社会化”只是生产活动的组织特征，而不是技术如劳动对象（包括原材料和主导能源等）、劳动工具、劳动产品等生产力的特殊特征，这就无法把握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形态。说得更明白一点，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没有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从形态上区别开来，似乎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形态上没有质的区别。这等于说，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发展形态上都属于工业文明。

2. 新工业化：比工业化更高级的文明形态

新工业化作为一种“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文明”，是比工业文明更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从物质生产的角度看，新工业化是一种比工业化更高级更深层次物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它具有7个突出特征。（1）劳动对象（生产原材料）的微观元素化。新工业化生产是从小分子、原子乃至亚原子层次入手进行的生产，是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生产。新工业化生产既可以从微观层次上把各种生产生活废弃物用于再生产，又可以人工设计、生产出自然界所不能提供的无比丰富的物质新材料，并进而加工制造出日益复杂的各类生产生活用品，甚至可以创造出各种难以想像的奇迹。也只有在这种科技和生产能力的条件下，才能最终实现人造生命。（2）主导能源的物理化。新工业化的主导能源从化学层面推进到物理层面，主要是核能、太阳能等，而开发热核聚变能、太阳能的最理想地是建立月球能源基地，这些能源几乎是无限的，既干净又不会枯竭。（3）生产手段的高度智能化。信息化发展到智能化，不论微观层次的生产还是太空中的生产，都不再是简单的直接的人工生产，而是依赖高度智能化手段进行的生产。（4）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循环化，包括深层循环利用和高层循环生产。在新工业化生产中，生产和生活中的废弃物质都可从微观深层次上作为资源进入再生产，从而把工业化生产的“资源-产品-废物”的单向生产方式转变成“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深层次循环式生产方式。（5）生产和生活环境的生态化。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的深层循环化，必然造成环境的生态化，这也是真正的可持续生产和可持续发展。（6）生产和活动空间的太空化。人类活动不再局限在

地球上，将在大尺度的太空中展开。（7）最后是新工业化对工业化的替代化。这如同农业对采猎业具有替代作用是一样的，这是因为，采猎业和农业同属生物文明而农业又是其高级阶段，工业化和新工业化则同属化学文明而新工业化又是其高级阶段，所以，新工业化的兴起必然同时造成工业化的衰落。

除了生产力形态的特征之外，新工业文明还有经济政治体制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诸多特征。

在经济体制方面，主要的变化有3个。其一，经济全球化，形成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市场与计划从来并不矛盾，只是要依赖于生产和经济的发展水平而处于经济体的不同位置来发挥作用。例如，对现代企业而言，计划在企业内部发生作用而市场在企业外部发生作用，如果企业内部没有计划而是运用市场机制，企业就会马上瓦解。计划的本质是社会有机体内部的统一性组合，而市场的本质则是不同有机体的群体组合，是尚未走向统一的以不同经济主体为单位的外部联系，具有自发性、分散性、竞争性、无序性。在新工业化中，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得到空前加强，计划性的作用将逐步突出出来。所以，社会经济体制更需要坚持市场与计划的有机统一。其二，社会经济体制的分层制。这不再是城乡、工业农业的二元分割，而是生活经济与科教经济的分层。新工业化将推动经济从生活主导型向科教主导型转变，但还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生活型经济与科教型经济会有一个分化和并列的较长时期。应该积极推动科教活动的产业化、经济化，以利于它们逐渐演进成社会的主导活动，但同时仍需保持生活型经济（以物质生活的享受为目的的经济）的发展。最终，要形成生活型经济有限、科教型经济无限的双层经济结构，人类文明离开动物式生活更远了一步。其三，生产资料占有制的变化。占有制的生成，缘由于占有制对象的稀缺性。占有制在动物划分生存活动区域的行为中已开始孕育了，这也是因为生存空间及其食物的稀缺。新工业化把生产的触角延伸到了原子层次和地外太空的范围，使巨大范围的物质都可成为人类生产生活的资源，这使生产生活资源的稀缺性大大降低，同时这也将大大淡化物质占有制度。尤其是创造为本价值观对生活享受至上价值观的逐步取代，更会淡化人们的占有观念。此外，新工业化的生产将更注重共享性财富的创造，这也会削弱占有制的力量。占有制的衰退也可理解为占有制的社会化在加强。所以，新工业文明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文明。

在政治体制方面，主要的变化有两个。其一，高度的民主化。但民主化程序将由于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而得以更佳的集中统一，形成更有力的统一意志。所以，分层的代议制的民主会转变为网络化的民主，因而也是高度发达的民主。民主自身更加手段化而不是目的化，它将是形成社会统一意志、最佳决策的路径，更有利于形成社会

意志、类意志而不是孤守个体意志，这也是个体意志与社会意志的一体化。其二，高度的全球化。政治从国家社会层面走向国际社会层面并最终走向全球社会层面，建立全球政府是迟早的事。新工业文明从地球向太空的开拓，使全球人类走向融合，政治必须是整合全球人类意志的进步力量。

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创造为本、以类为本的观念体系。社会思想观念领域，包括宗教、哲学、科学、道德、艺术等，它们体现为宇宙观、人类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等。宇宙观、人类观是基础，而价值观是核心。新工业文明的科学更加深入地揭示了宇宙的秘密，使人类更加认清了自身的本质、历史地位与作用，因而形成了日益凸显的创造为本、以类为本价值观和包含人类进化在内的大自然（宇宙）演化观。可以说，新工业文明的思想观念更加重视宇宙演化与人类作用的类价值观，从个人的狭隘观念中走出来，从人类生活的小圈子走出来，走向更深层的物质探索与生产，走向“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马克思语）。

3. 新工业文明与社会主义的一致性

第一，新工业化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按唯物史观的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具有比资本主义社会更高级的生产力，这不是工业化生产力的量的发展，而应是比较工业化生产力更高级形态的生产力，这就是新工业化生产力。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还不可能描绘新工业化生产力，所以，马克思只是原则性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更高级生产力的产物，但尚未对这种更高级生产力做出具体论述。从这个原因也可看出，经济政治体制高度社会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迟早会在全球普及。

第二，真正的社会主义体制（如计划和市场相统一的全球化经济体制），就是新工业化时代的社会体制。新工业化时代的物质生产是利用物理能源和化学元素材料进行的深层次物质生产，因而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生产，这使人类不再为物质财富稀缺而欠缺经济利益的公正，共同拥有社会财富的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体制才能彻底建立起来。所以，真正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是全人类的共同所有制，而不是国家所有制。新工业化生产也是太空化生产，广阔的太空成为人类活动的新背景，地球成为人类的太空船，国家将逐步被全球化组织所代替，地球社会成为一个统一体，这就是全球化即最大社会化的人类群体，亦即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充分形态。

由此可见，建设新工业文明在社会体制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力层面上就是开拓和发展新工业化生产力。

三、新工业化与人类解放

1.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解放的追求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寻求人类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其一生都是为了寻求人类的解放。“人类的解放”，在马克思的学说中有着深邃的内涵。

在西方，“解放”和“自由”具有同样的含义，寻求人类的解放也就是寻求人类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自由自觉的活动正是人类的类特征。他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①劳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化”活动。“对象化”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人的活动总是指向一个对象如自然界，人在对自然的改造活动中，使之变成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二，是指人所创造的事物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本身，所以，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终点，不是创造外部对象而是创造自己。但是，正由于人的劳动具有对象化的特征，这就使人的活动进一步具有了不自由的特征。人类就是在这种自由与不自由的斗争中发展着变化着。人生活在两重关系中，一是生活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二是生活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中。因此，人的自由和解放也就必须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和人与自然的關係中寻求。但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处于关键或中介的位置。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存在的基础。”^②所以，在马克思看来，人的自由和人类的解放的关键环节是在人的社会关系中。

然而，人的社会关系并不尽如人意，在人类历史上人的自由受到了社会关系的严重制约，马克思提出异化劳动理论来描述社会关系对人的自由的这种制约。所谓异化劳动，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工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③异化劳动进一步造成了一系列异化结果：“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它使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异化劳动造成下面这一结果：（3）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4）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页。

② 同上，第78～79页。

③ 同上，第48页。

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① 人和人相异化，就是人与人的分离、对立和斗争，就是人与人分裂为等级、阶层、阶级。由于是异化劳动使人失去了人的类本质，失去了作为人所应有的自由，显然，人的类本质的重新回归，人的自由的获得，也只有等到人从异化劳动中获得解放。所以，马克思就把人类解放的理想放在了克服异化劳动上。而异化劳动本身与私有制之间互为因果，所以，克服异化劳动的途径也就是推翻私有制的途径。马克思说：“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也就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② 问题的原因找到了，问题的解决办法也就找到了。于是，马克思就把消除异化劳动、解放人类的使命确定为推翻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财产私有制：“从异化劳动同私有财产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的解放、从奴役制的解放，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这里不仅涉及工人的解放，因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③ 在马克思这里，人类解放与共产主义也获得了同样的含义。他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④

显然，马克思把人类解放的着重点放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把社会变革作为寻求人类解放的关键途径。当然，马克思并未忽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只是未有展开探讨。在下面关于新工业化的论述中，我们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2. 建立新工业化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不可逾越的途径

为了全面准确认识新工业化对于人类解放的重要性，我们仍然要深入研究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

人类的解放与人类的类本质有着深刻的联系。关于人类的类本质，马克思做过详尽的论述。他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54页。

② 同上，第59页。

③ 同上，第58页。

④ 同上，第77页。

直接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他自己的活动对他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显然，自由自觉的活动就是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又是一种创造性的生产活动。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也为自己的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① 对象化的世界虽然是人的创造物，但它同时具有异己的性质。尤其是当物质生产力发展处于较低的水平时，对象化的创造物给人的自由是有限的。直到工业化生产阶段，这种对象化或异化的性质还很突出。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通常的、物质的工业中……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② 所以，在工业化的生产力形态中，或者说在工业化时代，还难以克服异化劳动而实现人类的解放。仅仅具有社会关系的变革，人类的解放还不可能完全实现，其实，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关系的变革和发展也不可能充分实现人类内部的自由和平等。人类的解放不仅是社会关系中的事情，也是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事情。甚至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对于人类的解放处于更加基础的地位。

新工业化生产具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由于新工业化是“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文明”，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原则上不再存在物质贫乏现象，物质财富的差异在人与人之间不再具有意义。所以，在社会关系中，人的物质产物不再表现为人的异己力量。这正如恩格斯早就说过的那样：“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高度发展的阶段为前提的”。^③ 第二，物质产物的有用性满足人的需要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4页。

② 同上，第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6页。

之后，人的物质创造物不再主要表现为“有用物”（在采猎时代和农业时代，人的创造物主要是生命活动的“衣食物”），而是人的“欣赏物”。“衣食物”和“有用物”都是经由人的改造活动从环境自然向社会财富转变而来的，而“欣赏物”虽然也要经由人的改造活动而产生，但它不再从环境自然向社会财富转变，而是作为环境自然或人工自然独立存在着，人对它具有控制和改造作用，但不再作为物质消费品，人与环境创造物的关系成为一种审美关系。人类从物质生活中解放出来，亦即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解放出来。在审美关系中，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一种一体化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不再存在异己关系，人实现了彻底的自由和解放。所以，新工业化生产是真正消除异化的同化性生产。

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说的克服异化劳动的共产主义，从社会关系上看它是人与人之间高度平等的时代，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它则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亦即新工业化的时代。生产力从工业化发展到新工业化，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不可逾越的物质基础。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徐东礼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吸取了古今中外关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切积极思想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点和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而提出来的。它既是对我们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

一、明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时强调：“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① 还强调，要“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② 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提出来，这在我们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是第一次。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强调“要

^①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8 页。

^② 同上，第 205 页。

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公平”。^①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是第一次。胡锦涛指出，我们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就是要求全党同志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自觉地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全面发展。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是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它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从国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抓住和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2003 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已突破 1000 美元，现正向人均 3000 美元的新目标跨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000 ~ 3000 美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如果举措得当，就能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导致各种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综合起来看，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社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变革加快，我们正面临着并将长期面对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出现了一些必须认真把握的新趋势新特点，主要是：资源能源紧缺压力加大，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十分迫切；城乡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更加突出，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特别是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多方面的限制，各种利益群体的一些利益要求难以得到完全满足，统筹兼顾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4 页。

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劳动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加强，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新要求；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增多、程度明显加深，人们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上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严重犯罪活动等也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了严重影响，等等。我们要抓住和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正确应对这些矛盾和问题，花大力气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大力促进社会和谐。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从国际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把握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力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各种挑战和风险的必然要求。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形势继续处于深刻复杂的变化之中。世界格局处于向多极化过渡的重要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产业升级和转移速度加快，各国注重经济发展和国际技术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从总体上看，这些因素给我国的改革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只要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牢牢掌握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就能营造有利于我国的战略态势，为我国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今世界仍不安定，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由于世界力量失衡的局面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围绕多极还是单极的斗争将长期存在。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挑战和风险，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信息、军事等方面面临着严峻压力。由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恐怖主义活动依然猖獗，地区和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打“没有硝烟的战争”，企图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输出自己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通过扶持反对派、培养代理人、制造动乱等多种手段对别国内政进行干预，在一些国家扶持亲西方政权。西方敌对势力没有放弃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正在通过各种手段加紧进行渗透、破坏、颠覆活动。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在我国周边一些地区仍相当活跃。在这样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有力应对来自外部的各种

挑战和风险，必须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始终保持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局面。这是我们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

胡锦涛指出，我们党明确提出并积极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具备许多有利条件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既要立足国情，根据已经具备的条件，积极主动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又要着眼长远，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

二、明确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

我们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醒全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必须以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办法，不这样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在国家生活和各项事业中，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工作做得好坏，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并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江泽民指出，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党的领导要通过执政来体现，我们必须强化执政意识，提高执政本领，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列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执政条件和环境的深刻变化，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就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不断提高五个方面的能力：一是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二是不断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三是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四是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五是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始终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来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十六届一中全会上，胡锦涛就指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方面建设，最终都应该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上来，体现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上来。2004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

习，主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都要充分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坚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抓紧解决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纪念邓小平诞辰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把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全部问题归结为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 7 个大方面。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会议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从根本上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会议指出：“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①明确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与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一起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且明确提出了要从 5 个具体方面来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一是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不断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二是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三是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四是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五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在我们党的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也是第一次，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也反映了我们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升华。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从我们党肩负的使命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体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要求我们：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团结

^①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3 页。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把人民群众以及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充分发挥出来，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必须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不断在发展的基础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保证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必须解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夯实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人际环境，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只有把这些工作都更加自觉自愿、更加主动地做好了，我们党才能不断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才能更好地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

三、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构建途径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概括为：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他指出，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① 并指出：“民主法制，就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相帮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充满活力，就是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安定有序，就是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② 同时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这些特征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需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

^{①②}《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

程中全面把握和体现。”^①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条基本特征，既包括了社会关系的和谐，也包括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体现了民主与法制的统一、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活力与秩序的统一、科学与人文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是第一次。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做过科学的设想。他们设想的未来理想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 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社会公有，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劳动成了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消失，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这是一个高度和谐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追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努力方向。但关于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过多地论及。我们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不仅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特征，而且提出了为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重点做好的十个方面的工作，也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途径。

一是切实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创造更丰富的社会物质财富，使国家的整体实力不断增强，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只有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才能形成更完善的分配关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才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求。经济发展不仅要持续快速，而且要协调健康，这是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保证，也是人民群众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的重要保证。要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推动经济社会不断迈上新台阶。

① 《深刻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大力促进社会和谐团结》，《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二是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面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要切实加强和改进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履行职能，密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拓宽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形成能够全面表达社会利益、有效平衡社会利益、科学调整社会利益的利益协调机制。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作用和优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认真做好党的民族工作、宗教工作，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要进一步做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工作，努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要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进一步完善城乡基层政权、基层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努力实现广大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广泛密切地联系各方面群众，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三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充分发挥法治在促进、实现、保障社会和谐方面的重要作用。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制定和完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规范社会建设和管理、维护社会安定的法律。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坚持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建设法治政府，建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监督机制。要落实司法为民的要求，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作用，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要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形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觉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四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要切实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不断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要全面落实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战略任务，引导全体人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教育，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使全体人民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始终保持昂扬向上、开拓进取的精神状态。要积极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要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地位，保障教育公平，构建健全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全民族素质的提高。要积极推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大力提高基层特别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服务能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五是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只有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协调，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充分发挥出来。要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要妥善协调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和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的关系，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加大转移支付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切实保障各方面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政策上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从收入分配、利益调节、社会保障、公民权利保障、政府施政、执法司法等方面采取措施，逐步做到保证社会成员都能够接受教育，都能够进行劳动创造，都能够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参与社会生活，都能够依靠法律和制度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六是切实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

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的突破，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营造平等竞争、共谋发展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要全党全社会大力弘扬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大力营造鼓励创造、尊重创造、保护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支持人们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其他方面的创新，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始终充满蓬勃的创造活力。

七是切实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要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和政策法规，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要充分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八是切实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就是在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中不断前进的过程，就是不断消除不和谐因素、不断增加和谐因素的过程。要着力避免因决策失误和工作不当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加强矛盾纠纷的排查工作，及早发现可能发生的各种矛盾，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要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事件，坚持依法办事、按照政策办事，既依法维护群众正当权益，又依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九是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要科学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学会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更加科学地利用自然为人们的生活和社会发展服务，坚决禁止各种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引导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意识，以优化资源利用、提高资源产出率、降低环境污染为重点，加快推进清洁生产，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促进自然资源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要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抓紧解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保证人民群众在生态良性循环的环境中生产生活，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要增强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在全社会形成爱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风尚。

十是切实做好保持社会稳定的工作。没有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要进一步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要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认真抓好安全生产，坚决防止重大安全事故。要抓紧建立健全社会预警机制，建立健全突发应急机制和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同敌对势力的斗争。要始终警惕和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颠覆活动，始终警惕和反对各种分裂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和暴力恐怖活动，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四、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原则和指南。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为了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我国新世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特别是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做了全面阐发。他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

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一代地永续发展。”^① 2004年5月5日，胡锦涛在江苏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强调，要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推进各项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的社会；是一个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社会；是一个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社会；是一个能够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的社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是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而要构建这样一个社会，离开了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是根本不可能的。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主体地位的科学概括，其思想根植于人是社会主体这一客观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就是从现实的人出发，以现实的人为根据，以现实的人的发展为目的的社会发展理论。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称之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准则和根本目标。以人为本是与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使命完全一致的。它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大力倡导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要求。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是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统一进程的不同侧面。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本质上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仅要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更加广阔的道路，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要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创造物质和精神条件，提高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原则。它要求营造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和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环境，要求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与个人利

^①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

益的关系，要求实现人民群众作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与发展成果的享有者的统一。坚持以人为本，必须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胡锦涛指出：“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我们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必须体现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上，体现在做好关心群众生产生活的各项工作上，体现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上。”^①他特别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就业再就业作为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来抓，认真落实中央关于促进就业再就业的政策措施，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解决群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环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举措。要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并轨的工作，完善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体系。要推进医疗改革，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险制度，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要继续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做到应保尽保。要切实保障农村五保户基本生活，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要维护好群众的各项权益。一方面要通过发展来不断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另一方面要坚决克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侵害群众权益的现象。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坚持依法办事，坚持按政策办事，善于运用示范引导、提供服务等方法推动工作，运用说服教育、民主协商等方式来解决问题，特别是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征地拆迁、企业改制、职工工资福利待遇、农民工工资发放等方面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要制定有效措施，切实解决困难群众在子女上学、就医、住房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要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惩治各种犯罪活动，努力维护社会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问题，牢固树立“责任重于泰山”的观念，坚持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努力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更加注重发展。要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更加注重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既体现了科学发展的要求，又体现了社会和谐的要求。我们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落实科学发展观相

^① 胡锦涛：《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求是》2005年第1期，第7页。

统一的高度，把“五个统筹”体现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去。特别是要进一步统筹好城乡发展，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正确方针，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同步推进，以城乡的和谐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在这个过程中，要切实防止和克服片面追求城镇化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大量占用农田，造成大批农民丧失土地，而利益又得不到合理补偿的问题，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必须更加注重兼顾。统筹必须兼顾，兼顾才能和谐。只有不断提高统筹兼顾的能力，才能有力地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更加注重兼顾，就是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注重兼顾国家、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兼顾发展能力强的群体与发展能力弱的群体的利益，兼顾改革中受益较多的群体与受益较少的群体的利益，兼顾先富和后富群体的利益，兼顾不同行业群体之间的利益。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研处）

★马克思主义总论

谈谈马克思主义的特点

黄楠森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两个不可或缺的鲜明特点：一个是它的意识形态性，即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一个是它的科学性，即与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一致性。这两个特点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正是因为无产阶级的立场使这个理论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它才能成为科学理论；也正是因为这个理论的科学性，它才能真正代表和实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使他们有可能创立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意识形态性区分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性区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几百年的社会主义运动史告诉我们，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才取得了真正的持久的胜利；还告诉我们，在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只有在科学社会主义指导下对本国国情做出科学分析，制定科学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取得胜利。大量经验教训说明，社会主义理论是否正确，理论的应用是否正确，往往成为事业成败的关键，在客观形势变化迅速而且复杂的时候尤其如此。

20 世纪上半叶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为有利的时期，当时世界资本主义陷入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之中，出现了 30 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先后涌现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克服了错误理论的指导，不断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了新中国。但 20 世纪下半叶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从战争破坏中恢复过来，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日趋繁荣，逐渐形成了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优势。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东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这种形势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威胁和严峻的挑战。中国共产党正确总结了经验教训，坚定地走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制定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科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多年来不仅顶住了世界社会主义低谷对中国的压力，而且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这充分说明了科学理论的指导是多么重要。

有不同的看法是必然的、正常的，从理论的发展来讲，观点分歧是好现象，是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问题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理论是什么，是不是正确的观点、科学的理论？特别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内、在共产党内、在大多数干部中间，什么观点、什么理论占主导地位？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实践和认识领域中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还是不科学的理论？我国的实际情况怎样呢？从整体上看，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反对的观点也有，不同观点的争论也有。这种争论有的涉及我国根本社会制度和整个社会的指导思想。例如，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要不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在经济体制上要不要坚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政治制度上要不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文化上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在价值观上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等等。在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有的人不直接反对而采取模棱两可的实际是否定的态度。例如在经济制度上有人公开主张私有化，而有人主张不要管公有私有；在经济体制上，有人主张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路，而有人则主张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关；在政治制度上，有人主张多党竞选和三权分立，而有人则笼统主张自由民主；在文化上，有人主张西化，有人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价值观上，有人主张个人主义，认为社会利益要让位于个人利益；如此等等。

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其发展前景是危险的，它将不是社会主义的，而只能是资本主义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的思想和实践，如果有人自觉地推动，社会规律可能更快地实现；如果有人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阻挠，社会规律的实现会受到干扰。科学的理论就很难实现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更难以保证指导的正确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胡锦涛同志在2005年4月27日接见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一个政党只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为崇高的理想和目标而奋斗。”这是对中外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科学总结得出的正确结论，也是针对我国当前状况对党的理论建设提出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新解

——兼谈马克思主义教研体系改革问题

高 放

湖北大学法学院教授郭大俊同志在 2001 年 2 月《江汉论坛》曾经发表过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说”献疑》的文章，该文认为列宁 1913 年所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①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是对马恩文本思想的误解，“三个组成部分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就只有一个组成部分。《北京日报》2004 年 9 月 13 日又发表他写的《澄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的一个误解》。这篇文章对他的上述观点做了进一步阐发。他进而说长期流行的“三个组成部分”之说“游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②我认为他提出的这些看法是事出有因的，有值得我们反思与改正之处，然而从总体来看是有偏颇的，是难以成立的。本文先谈我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解，然后再谈今后应该如何改进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一、马克思主义确有三大组成部分，又不仅限于此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确实是列宁于 1913 年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中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而且我查阅过已经译为中文的列宁所有的著作，列宁也确实只有这一次斩钉截铁地做过这样的论

^① 从 1980 年以来，我一直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又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这样做至少有两好处：一是与其他学科相一致，“学”字放在学科名称之后，更鲜明地表明社会主义是一门科学，不是某几个经典作家制定的不可改动的神圣原则组成的原理汇编，它要求众多的学者进行研究和发

^② 载《北京日报》2004 年 9 月 13 日。

断。然而我认为列宁这样说并没有误解马恩的文本思想，也没有游离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而是他长期悉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独到体会和鲜明概括。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的原生形态和马恩著作的有关文章，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一问题。以下我想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

1. 马恩都是先学习哲学，再学习经济学，最后才完成社会主义学

马克思 1835 年进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1837 年就转而重点钻研黑格尔哲学和古希腊哲学，1841 年他的博士论文题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区别》，1841 年他得到哲学博士证书后，还研究了费尔巴哈哲学。1842 年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时感到对经济问题生疏，又转而研究经济学，随着研究的深入，进而研究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正如恩格斯于 1892 年 11 月撰写的《马克思，亨利希·卡尔》小传中所说的，在哲学问题上与卢格发生原则分歧之后，“马克思则热心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结果马克思转向了社会主义。”^①

恩格斯 1837 年中学毕业后在他父亲开设的公司当办事员，业余时间开始研究黑格尔哲学。1841 年他到柏林服兵役期间，又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并研究费尔巴哈哲学。1842 年底他奉父命到英国经商，利用业余时间深入工厂和工人住宅，有感于工人的贫困，也转而研究亚当·斯密等人的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献。他同时还参加工人运动、调查工人状况，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者。

通过马恩的学习成长和思想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对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三个内容做过系统研究的。因此他们的思想体系之中也势必包含这三方面的内容。

2. 马恩早期和一生的著作都涵盖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内容就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三个方面；有的论战性著作，包括 1845 年的《神圣家族》、1846 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 年的《哲学的贫困》等也都有这三方面的内容。马恩有的著作只分述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某一部分内容。如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主要讲述了哲学方面的内容，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着重阐述的是经济学，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共产主义者和海因岑》论述的则是社会主义学方面的内容。他们分述这三方面的内容，足见他们对这三门科学特别重视，因为这是他们一生研究的重点。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关于这三个方面的著述就更多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两部代表作都应该看做是包含这三个组成部分的论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第 393 页。

郭大俊同志认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都没有“三个组成部分”的体系。这要看我们如何理解原著。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从未写过全面论述自己思想体系的著作。然而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确实包含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容。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于1847年用法文写成并出版后，直到1885年才出版德文第一版，恩格斯专为德文版写了序言。其中指出：写成此书那时候，“马克思已经彻底明确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和经济观的基本点。当时刚刚出版的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一书，使他有机会发挥这些基本点，以同这个从那时起就要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居于最重要地位的人的见解对立”^①。这几句点评岂不是肯定了《哲学的贫困》包含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点？至于《共产党宣言》一书，恩格斯在该书1883年德文版和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所反复重申的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的那段名言，岂不是也肯定了《宣言》包含有“三个组成部分”的基本点？《资本论》这部鸿篇巨著，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学，但是恩格斯又指出：“任何人，不管他对社会主义采取什么态度，都不能不承认，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而且正是德国终于有机会也在这方面作出这种贡献。”^②我在上个世纪50年代还读过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著《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中译本。可见要说《资本论》包含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也是言之成理的。恩格斯还说过：“我们的这一世界观，首先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问世，经过足足二十年的潜伏期，到《资本论》出版以后，就越来越迅速地、为日益广泛的各界人士所接受。”^③看来要说《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这三本论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代表作，包含“三个组成部分”，也是顺理成章的。

3. 恩格斯对这三个组成部分有过较为系统和明确的表述

早在1859年，恩格斯为新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写的书评中就讲到：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内容是从研究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它一出现，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也就产生了。这种德国的经济学本质上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事实不仅对于理论，而且对于实践都是最革命的结论。”“只要进一步发挥我们的唯物主义论点，并且把它应用于现时代，一个伟大的、一切时代中最伟大的革命远景就会立即展现在我们面前。”^④这段话岂不是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这三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11～4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5～527页。

组成部分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

通常人们根据恩格斯在 1878 年写成的《反杜林论》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三编，以此说明这就表明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三个组成部分。郭大俊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的目的不是为了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是为了批判杜林的思想体系，并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所说的半句话：“本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①，来论证把马克思主义分成三个组成部分是误解了恩格斯原著思想。其实恩格斯这半句话的意思是表明写《反杜林论》一书并非为了确立一个与杜林的“体系”相对应的另外的体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早已有自己的体系的。千万不能只引这半句话。恩格斯紧接着上面那半句话之后写道：“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我现在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在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完全没有成效的”。^②可见恩格斯这篇文章也是一部立论之作。恩格斯在同一篇序言中又明确指出：“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③所谓“比较连贯的阐述”就是把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大组成部分连成整体，一以贯之。我们引用经典著作不能断章取义，而要前后呼应，全面而准确地领会经典作家的意思。这就是说，《反杜林论》虽然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但是并不表明恩格斯只破不立，有破无立，而是边破边立，破中有立，这部著作同样也是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一部经典权威著作。因此我认为根据恩格斯著述的本书三编内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不是没有根据的。

同样的，恩格斯在作为《反杜林论》一部分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还总结性地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④“这两个伟大发现”正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而“这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就正表明马克思主义是在这“两大发现”的基础上系统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明确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恰恰是可以细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的。同样的观点也在恩格斯的《马克思墓前演说》中进行了阐释。

总之，我认为列宁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的说法是列宁对马克思主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44 页。

③ 同上，第 347 页。

④ 同上，第 740 页。

义悉心研究和总结的结果，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生形态和文本思想的。这样鲜明的概括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有助于我们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只是后人机械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列宁的这一论断，认为马克思主义就只是这三个方面内容，就只有这三个组成部分，而且在高校教学中也按这三个组成部分开课，甚至研究机关也分成三个研究室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我认为郭教授正是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对这些问题有深刻体会才形成了该文的基本观点。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应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三个组成部分。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研究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问题，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这个主题，需要好多门科学为之论证和服务。除了形成系统科学的上述三个组成部分之外，马克思主义还应该包括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人类学等。所以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三个组成部分，而应是十几个组成部分。^① 判断某一门科学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我认为应该有两个标准：其一，其内容是不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这一中心服务；其二，其内容是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花费了大量精力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只有符合这两个标准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一个核心（社会主义学）、两个基础（哲学、政治经济学）、十几个周围部分（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等）”。在这么多的组成部分之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是最主要的三个组成部分，所以我们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而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中，核心是科学社会主义。郭大俊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离开了社会主义，也就失去了其本来意义。”这个看法完全正确。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正因为它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两大科学基础之上。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内入科学社会主义的体系内，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另外两门独立的科学来进行教学和研究也是必要的，只是不要再作为大学生的公共政治理论课，而要作为哲学和经济学专业的基础课或文科的选修课。郭大俊同志认为“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而他要另外建立一个包括社会主义革命

^① 我在1988年发表的《科学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吗》一文中就已提出马克思主义包括十几个组成部分的见解，本文收入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75～286页。

和社会主义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理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谈社会主义建设虽然不及后来列宁充分、系统，但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法德农民问题》等著作中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发展思路、根本任务、发展动力、战略步骤等等都已有原则性的论述。如果既肯定马克思主义确有互相紧密联系的三个组成部分，又明确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门科学，那么科学社会主义课程和教材就能讲得、写得内容充实，而不至于空洞单薄。我多年来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由于敢讲真话、实话、新话、深话，一直是受学生欢迎的。我牵头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90年出版以来，1994年又出版增订本，2003年再出版第三版，先后发行几十万册，被众多学校采用作为教材，本书能够在社会主义文化市场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就是因为它体系新、内容新、观点新、材料新。本书最近还被评选为“北京市精品教材”，我们正在精益求精，进一步进行修订中。

二、就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

虽然我不同意郭大俊同志否认“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郭文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确实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其实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比郭文中提到的还要多，不只是存在重复问题，而且现有教学体系引不起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兴趣，甚至使得学生学完“三个组成”部分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为何物。因此这一教学体系上的弊端亟待克服。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教学和研究。那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虽然可以分为三个组成部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机械地按照这个体系来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机械照搬的结果就会出现郭文中所提到的不良现象：内容空洞、重复，马克思主义的各门学科片面发展等。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要只分为三个部分开课和研究，还应该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教学和研究，在大学本科开设一门“马克思主义基础”课。这门新的课程，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解释和定义，创建与现实联系紧密、符合当今时代特征的教学体系，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入和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

当前教学体系之所以会出现种种弊端，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有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这不是定义，而是结构形式。所以首先要明确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含义，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研究对象是什么，即马克思主义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的。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总共

22 个字；也可以更简明地概括为 5 个字，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定义，包含以下三个要点。

1. 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纯文本的理论，不是从书斋中空想得来的。它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为社会实践服务、并指导人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但又不是仅仅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因为只有整个社会摆脱了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主义其实就是一门为实现全人类解放的科学，即人的解放学。全人类解放最终要达到每一个人都解放。

2. 指明了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般的思想家的思想体系，而是有严密的逻辑体系的科学，这一体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发展规律，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可以分解为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这样三门科学，但是马克思主义并非这三门科学的简单综合。从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门宏观的综合性的科学，它不是刻板僵死的、教条的辑录，更不是劝人修心养性行善的宗教教义，而是开放的、鲜活的、与时俱进的指引全人类达到人的自由解放胜境的行动的科学。

3. 指明了这门科学的创始人是谁

这个定义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它使人们明白这一科学思想体系的最初开创者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既然马克思主义这一门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创立的，为什么不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而称为马克思主义呢？其实早在 19 世纪 70 年代西欧思想界就已出现“马克思主义”一词，但是马克思本人坚决反对这种说法，他生前多次对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者都是反对或者曲解他思想观点的人，而且马克思自认为他的理论也是继承了前贤的众多先进成果，不愿意突出他个人。到 1883 年马克思过世后，“马克思主义”才作为正面的褒义词逐步广为流传，恩格斯晚年也多次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恩格斯自认为他是“第二提琴手”，他于 1886 年初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写道：“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2 页。

其次，要弄清楚什么叫做人类的解放。从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人的解放包括6个进程，或6个层次。

1. 人的解放必须减轻体力劳动对人类的束缚

人类通过劳动从猿进化到人，一方面是历史的巨大进步，使得人类从此和其他动物分开，进入人类社会。但是另一方面劳动又使人受苦，从此人类开始了为生存而和自然界斗争的历史，人类不劳动便不能生存下去。人类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终日劳动却不能温饱，因此人类想尽各种办法来提高生产的效率。从石器、青铜器、铁器到机器的出现，从蒸汽、电气、原子能到电脑的发明创造，才逐步减轻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使人的解放程度不断提高。从而才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可以说只要人类仍然受劳动的束缚，人类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达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中明确提出要争取“消灭劳动”，人类才能彻底解放。首先要消灭艰险繁重的体力劳动，最终使劳动减少到接近于零。

2. 人类的解放必须减少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影响

人类自产生以来就深受自然灾害的侵害，人类面对大自然的压迫也在不断地寻找新的办法来保护自己。因此人类不断地探索各种自然奥秘来预防自然灾害。人类从顺应自然、利用自然到改造自然、开发自然，到学会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这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步骤。马克思主义早就提出了如何与自然界和谐共处、为何维护生态平衡的思想。

3. 人类的解放必须学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

人类自从产生以来就是群居的动物，人类的本质就在于它的社会性。因此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就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人类社会不断更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从古至今人们在不断探求一种组织形式能够使具有思想和利益差别的人们和谐融洽地在同一个社会体系中生活。所以去探寻一种能够使人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成为人类解放的重要课题和任务。马克思主义把自古以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追求，给予了科学的论证。

4. 人类的解放必须消灭剥削和压迫

人类在产生之初本来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人类逐渐进入了阶级社会。从此人和人之间就有了财富、地位和种种权利的差别，人们也因为地位的不同而逐渐分化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是剥削和被剥削、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人类社会也由于这一关系的确立产生出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可以说人类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消灭剥削和压迫。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生产力达到蒸汽化并且开始电气化的新阶段，论证了消灭一切

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人类解放之路。

5 人类的解放还必须明确人类消灭剥削压迫之后怎样取得全面的自由发展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社会的改造也日益深入。当生产力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的时候，人类社会是可以消灭存在了几千年的剥削和压迫现象的。但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只是人类解放的一个阶段，在这之后还面临着人类如何取得全面的自由发展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人类就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甚至还可能会使消灭了的剥削压迫现象死灰复燃，可见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共产党宣言》指明：人类解放的目标和标志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6. 最终结合成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社区的高度自治

当人类社会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同时又能够做到进一步的、全面的发展之后，人类的解放事业就进入了最后的一个阶段，那就是人们结合成为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国家和政党已经消亡，人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人的才能全面发展，人性善的方面得到充分弘扬，恶的方面被极大遏制，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弥漫人间，社会高度自治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时摆脱了动物状态、全面发展的人组建“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真正和谐的社会自治，人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当然各个社区之间以及社区内部还有种种矛盾，那将通过协商和协定有序解决。

再次，围绕人的解放构建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的新体系。

以人类的解放为中心构建的马克思主义的新体系，不再是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更不是十几个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要把原本分散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中的相关内容进行重新整合和增添。我认为这一新的体系当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要讲清楚“五个规律”和“五个解放”。

究竟是哪“五个规律”呢？

1. 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

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一直是人类研究的对象。人类研究自然发展规律的主要目的是既要从自然界之中获取对人类有益的资源，又要消除自然界对人类的侵害，同时还要避免人类活动给自然环境造成破坏。而人类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人自身造成的损害，进而达到人的解放。人类研究思维发展规律就是要使人类能够通过实践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使人类能够自觉地运用这些规律来造福人类，实现人的解放。这一规律是马克思主义最基础的内容。

2. 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结果，是在对资本主义

制度的批判中产生的。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成为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研究起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是系统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作了总结，最终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结论。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私有制使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发生异化；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要消灭劳动异化，使异化人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

3. 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指导思想，其主要作用就是指导工人阶级进行斗争，打破资产阶级的统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进而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所以马克思主义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专门论述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思想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等众多方面内容。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工人阶级通过暴力手段或和平手段夺取政权，而且包括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人际关系、国际关系等等社会各个领域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角度的根本变革。

4. 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作为系统的科学体系，在指明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发展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革命规律以后，又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进行了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著作中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政策。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积累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创造更高的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人与人关系、国与国关系建设等众多方面的内容。

5.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建设和执政的规律

我之所以单独列出这一规律，是因为无论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建设，都始终存在着党的领导的问题。党的正确和科学的领导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根本条件。以前虽然我们对党的领导比较重视，但更多停留在共产党一个党上，对其他类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设和执政规律的研究并不充分。而现今世界各国大多实行政党政治，各国还有社会党、社会民主党、托派共产党等，我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八个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党派，很多国家都不止有一个共产党。社会主义事业，从革命到建设，都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都需要加强各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合作。因此系统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的建设和执政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什么是“五个解放”呢？

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人类解放的科学，既要追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要达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研究人类的解放可以分解为五个方面的内容，那就是工人解放、农民解放、民族解放、妇女解放和其他群体的解放，其中包括中间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解放，以及知识分子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等等。这五个解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的主要内容。这五个解放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一百多年实践的经验以及当今国际和国内的实际，展开研究和论述。这里因为篇幅关系就不多写了。

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五个规律来讲五个解放，我想“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一定很有生命力和吸引力。人人生来都要求自由解放、全面发展，作为“人的解放学”的马克思主义怎么不是大有讲头？怎么不会大受欢迎呢？学好了“马克思主义基础”这一门课，就会明确应该如何去为“人的解放”奋斗终生。

最后，还要阐明人类的解放并非只有马克思主义一家在探寻，人类有史以来就一直有人在进行探索。人类解放学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人类解放学

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不同时期的人也都认识到了自然和社会的压迫以及种种人类社会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为了人类的解放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和设想。西方从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近代莫尔、欧文等等，东方的中国从先秦老子、孔子到后来陶渊明、洪秀全等等，都曾经提出人类解放的方案。但是由于当时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展，人们没有也不可能充分认识到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马克思主义之前的人类解放学还不是真正的科学，仅仅是一种设想，有的体现了人们盼望重新回到小国寡民甚至原始社会的朴素愿望。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政治家以为自由、民主战胜独裁、专制就是人类的解放。其实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依然使广大劳动者受压迫，只有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才能促使全人类真正解放。

2. 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

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人类的认识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系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并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学。从此人类解放学第一次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共产党，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由党依靠工农联盟、团结广大被压迫人民群众和被压迫民族，通过阶级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经过过渡时期逐步改造社会，增加生产力总量，逐步扬弃私有制、消除剥削阶级，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达到人类的解放。19世纪中叶以来，无产阶

级和广大被压迫民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击了种种反动势力，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解放。20 世纪的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学的新发展。

然而，必须承认当今以信息化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时代和马克思主义产生并取得胜利的那个蒸汽化和电气化的时代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都相应有了较大的变迁。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反对剥削反对压迫等等许多基本的观点都依然是正确的，但是也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些具体的想法和论断已经很难实现了，需要我们根据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新的评价和调整。这样的论断主要有以下两个：

一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尽快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论断。这一论断之所以在现时代条件下难以实现是因为当今近二百个民族国家仍然作为重要的载体活跃在世界历史舞台，19 世纪末民族国家才有四十几个。民族国家的利益超越工人的阶级利益，各国无产阶级很难进行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联合。而且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利益冲突。更重要的是当代资产阶级已经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借鉴了有益的成分，吸收劳动者参与管理，提高劳动者福利，缓解社会矛盾，因此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有社会主义因素在逐步增长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新阶段，当今资本主义没有达到将要灭亡的地步。现今资本主义仍然还有向前发展的广阔余地，而且它的发展也有助于人类的解放，减轻人类的体力劳动，缩小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普及中等以及高等教育，扩大国际交往，等等。这些都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到的。

二是认为必须由某国先进无产阶级带头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然后达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论断。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先是希望英国工人阶级带头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后来又指望法国，再后是指望德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但都没有实现。后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也有过由俄国和中国来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论断，并做过具体的工作予以推动，但是也都没有能够实现。可以看到无论是马恩、列宁，还是斯大林、毛泽东，他们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都没有能够实现。之所以不能实现是对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估计过高，急于求成。在当今时代条件下这一战略更加难以实现，必须根据当今时代世界特征，制定和平与发展已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主题的新世界社会主义战略。

3. 马克思主义以后人类解放学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针对 19 世纪欧洲和世界情况的人类解放学。

但是当今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主义运动主体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日益面临着一个更新内容以适应时代、适应各国运动需要的任务。这种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以后的人类解放学。邓小平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以后人类解放学的新起点。邓小平认为：当代国际共运不能再由某一国充当中心，各国通往社会主义之路要由各国党和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各国党要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改革开放，克服苏联模式的弊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实行党政分开，建设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各国要实行和平共处、互相协作、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而奋斗。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世界上有众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政党以及众多仁人志士都在探索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增长的态势下，人类解放的新道路、新步骤和新方案。马克思被公认为公元第二个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在第三个千年仍然在起作用。但是新世纪、新情况、新问题一定还会出现马克思式的伟大思想家，指引人类在解放大道上前进。

总之，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划分为三个组成部分的，在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外马克思主义还包括政治学、法学、军事学、社会学、文化学、教育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等十几个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教条和僵化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中造成了很多问题。加上时代的变迁，再机械地按照这三个组成部分来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了。本文提出以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解放的科学为中心来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就是力图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其中还有很多值得深化和探讨的问题，希望郭大俊同志和其他专家学者批评指正，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源

——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陈建坤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和推进理论创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①联系时局变化学习胡锦涛同志的讲话，笔者认为，今天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源，可以从规律层面上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认识，进一步提高全党结合时代发展、民族特点以及历史任务，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和推进理论创新的自觉性。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历久弥真

马克思主义又叫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它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思想。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至今已有150余年。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现在，创造了辉煌的业绩，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自从1844年，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建立合作关系之后，就不断遭到资产阶级学术界的歪曲、攻击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真理锋芒在敌人的反对和机会主义的阉割中，不仅没有萎缩和被打倒，反而越磨越锐、一往无前，从欧洲传遍了全世界。当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的科学体系和革命学说时，可以说，世界上最初只有两个人相信它、赞成它。此后十余年间，直到第一国际创立时，马克思的学说还只是众多的社会主义流派或思潮中的一个，并不占统治地位。由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能够掌握群众，令人信服，并不断被革命实践所验证，所以相信和赞成马克思主

^① 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4年单行本，第17页。

义的人，也就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80年代，从理论到运动，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践，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创造了辉煌的历史业绩，巨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和人类命运。今天，马克思主义已从人类文化园中的一株真理幼苗长成参天大树，犹如涓涓细流汇成的大河，尽管百遇曲折，依然奔腾不息，巨浪排空。

到了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10个社会主义国家先后丢掉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遇到的最严重的挫折，新的挑战和考验又摆在了世人面前。西方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声言，苏东剧变标志着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战胜了共产主义。布热津斯基也断言，共产主义气数已尽。英国右翼学者保罗·约翰逊宣称马克思主义将在20年内消亡。面对严峻的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部分人产生了迷惑和失望情绪。一些原来信仰过社会主义的人们也发生了所谓“信仰危机”。邓小平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则坚定地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①“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②“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③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过苏东巨变的风雨洗礼和考验，比以往更加成熟和向前发展了。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推进，以及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理论创新中取得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再一次向世人说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历久弥真。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苏东发生社会主义逆转的真实原因，正如日本学者东京大学教授伊藤诚所说，“遭到失败的是特殊的苏联式的社会体制，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本来的理论和思想，莫不如说，由此而产生了向新的社会主义作尝试的好时机。”^④苏东演变的苦难使其人民开始觉醒：资本主义并不是救世的福音。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进一步懂得了社会主义没有失败，资本主义也没有胜利，社会仍然在按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总规律总趋势在发展。据英报说，许多俄罗斯人已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如今的羡慕取代了昔日的嘲弄。英国《独立报》1992年11月30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

② 同上，第321页。

③ 同上，第382~383页。

④ 转引自李武林等著：《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2页。

日说，原戈尔巴乔夫改革班子的核心人物，“500天计划”的炮制者沙塔林，也转而赞扬中国的经济改革，他说：“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当有人问我喜欢什么样的改革样板时，我说，我喜欢中国样板。”^①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透过中国的成功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历经一个半世纪风霜雨雪的考验，始终充满活力，长盛不衰。当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英国广播公司在全球范围曾举行过一次“千年思想家”网上评选，结果得票高居榜首者是马克思。悠悠千载，茫茫人海，历史上可圈可点的思想大师灿若繁星，为什么马克思能够独占鳌头呢？就是因为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是科学的，打不倒的，有无限生命力的。这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深刻指出的：“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进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尽管现在世界上的情况有很多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越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②

二、马克思主义生命力探源

生命力，即生存和发展的活力。作为一种借喻，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也可以简单释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生存和发展的活力。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广义来说，还包括后人对它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实践性、科学性、阶级性、革命性、开放性、发展性和整体性等基本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旧学说的本质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产生巨大历史作用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秘之所在。

1. 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立足根基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崭新的思想理论，既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理论条件，更受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恩格斯1883年3月17日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在他的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但是，他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正是在这两大发现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经胜利的总趋势，在人类思想史上树起了一座前无古人的不朽丰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既反映在产生它的理论前提

^① 转引自李武林等著：《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326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上，又反映在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上，还反映在它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上。我们信仰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觉得它有什么神秘，而是因为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正确的，管用的。这正如邓小平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①

2.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源头活水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基本的观点。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1917年12月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一文中指出，“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②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研究，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从新的历史条件出发，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以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又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新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一再说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践发展无止境，理论创新也不能停步。不断发展着的丰富实践，就是促进马克思主义不断前进的生命源泉和活水。

3. 人民群众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行动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的《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中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③伦敦的海格特公墓马克思的墓碑上镌刻着他的这样一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④恩格斯还批判英美社会党领导人和德国党内的“青年派”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不能理解活的行动理论”。这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学说，是行动着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创立他们的学说，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② 杨春贵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100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

④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编：《干部群众关心的25个理论问题》，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不是为了把它束之高阁、藏之名山，而是为了指导社会实践，使之成为改造世界、推动历史前进的行动指南。“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群众性和科学性是相统一的，因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②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历史活动成功与否，取决于历史活动的目的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③ 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④ 人民群众作为创造世界历史的实践主体和认识主体，既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的物质力量，又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发展的智慧之源和力量之源。

4.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力的不竭动力

江泽民同志指出：“创新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⑤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⑥ “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是在于它在实践中能够不断创新。”^⑦ 这是对 150 多年马克思主义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对马克思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创新性的理论特性的科学概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又是马克思主义保持其科学性和生命力的真正奥秘之所在。社会实践是丰富多彩的，具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跟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就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理论发展新境界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总是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研究，补充、修正、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列宁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指导俄国革命实践过程中，创立了列宁主义思想，从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是理论创新的典范。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发展，实践无止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5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03 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031 页。

⑤ 杨春贵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 100 例》，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 页。

⑥ 同上，第 27 页。

⑦ 同上，第 26 页。

创新不停步。自然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社会也是不断发展的。作为反映客观规律的科学理论，也必然顺应实践变化和时代新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永远不能停止在一个水平上。理论创新活动一旦停止，它的生命也将终止。所以，创新是永葆马克思主义生机和活力的发动机。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探讨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源，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为了进一步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规律，不断加强理论武装和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以适应时代需要具有中国民族化形式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既有凯歌行进的成功经验，也有遭受挫折的失败教训，这两个方面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很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总结和记取。

1. 必须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按照党对理论工作的新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新论断，之后他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①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积累八十年历史经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认识的新概括新升华，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眼光和宽阔胸怀，同时也是对新世纪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与时俱进，就必须“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就是对21世纪理论工作的新要求。体现时代性，要求我们今天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紧跟时代发展的潮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创造新理论；把握规律性，要求我们深入探讨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富于创造性，要求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锐意进取，善于开拓，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永不满足，永不停步，不断创新，不断前进。这就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担当起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必须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

^① 杨春贵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100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这一条经验蕴含在我们党的全部历史发展中，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也包括因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而导致失败的沉痛教训。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①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二十八年斗争的胜利充分说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应该说，现在我们党对如何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不论从理论认识、经验内含，还是科学态度、科学方法上，都大大前进了。

3. 必须正确把握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进程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正、补充和发展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们对于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的。至于马克思之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有一个酝酿、产生、补充、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也有一个一脉相承和创新发展的过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依存和辩证发展，是人们认识真理和发展理论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样要遵循这一共同规律。经验说明：遵循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从错误观念或过时的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科学理论的教条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第801页。

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使思想合乎客观实际，特别是合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思想僵化、教条化、自由化等错误思想，经常阻碍人们按照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推进理论创新。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①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每实现一次理论飞跃，都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引导社会前进和理论发展的强大力量。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应不断前进，应勇于和善于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理论创新。创新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要自觉地用正确的认识取代原来的错误认识；自觉地用全面的认识补充原来不够全面的认识；自觉地用更深入的认识丰富原来的一般认识；自觉地用新的认识反映新的事物、解决新的问题。

4. 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和特殊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不断探索马克思中国化的新形式和新道路

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究竟各国何时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走向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大道，俄国不同于英国，中国也不同于俄国。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特殊道路，从而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化特色，其表述形式和语言为全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其揭示的特殊规律为中国革命实践完全证实。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战后资本主义获得了稳定发展，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内乱，苏联和东欧先后发生了社会主义逆转，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临危不惧、沉着应对，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拨乱反正，实行了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在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中，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依据当代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继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与时俱进，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又提出并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邓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在处理和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尤其在鲜明的特殊性中如何体现普遍性、在鲜明的民族性中体现时代性方面创造了新的经验。这些经验启示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如何辩证地处理好普遍性和特殊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是一个永恒主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新的形式和新的道路。

5. 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能力建设，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

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全面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着重研究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治党治国治军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能否成功执政，首先取决于指导思想的正确和指导思想能否与时俱进。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重视和加强理论创新能力的建设。《决定》在总结十五年来党执政的主要经验时，第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新的实践和新的的发展，着眼于对重大问题的理论思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①《决议》对党执政经验的这一精辟总结、概括和阐述，为我党不断加强理论创新能力建设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加强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建设，首先要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在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教育”，进一步提高全党进行理论武装和理论创新的历史责任感和自觉性。其次，“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再次，“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增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提高全党的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水平。”^②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①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 决定 学习辅导百问》，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 同上，第25页。

重读马克思

——读什么 为什么读 怎样读

卢培琪

“回到马克思”或“重读马克思”是20世纪20—5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题，90年代传入中国，成为学术界追逐的热点。对这个命题，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在赞成者中间，其理解、阐释也各不相同。我个人的观点是，赞同在“回到马克思文本”的意义上重读马克思。理由是：我国的文革动乱和苏东剧变都有过误读以至歪曲马克思的沉痛教训；改革开放以来，在一段时间里曾出现过严重的“信仰危机”，许多人不读、不懂马克思主义；党的十六大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四中全会又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如何在一脉相承的意义上深刻理解党的指导思想，如何结合新的实践，与时俱进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已成为当前理论界的头等大事。在这种背景下，重读马克思的文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绝对必须的。从理论上讲，它是正本清源，坚定信仰，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需要，是与时俱进，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从实践上看，它是走自己的路，继续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

—

重读马克思，就是要重读老祖宗，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①在这方面，已有的文本有马恩全集和选集，还有各种单行本等。值得高兴的是，中央编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局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将为我们提供阅读的范本。该“全集”计划出近70卷,2020年出齐前三部分的60卷,考虑到新版本卷帙浩繁,出版周期长,为了适应目前的急需,拟于2007年先出版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所选著作都将依据原文种进行直译,以准确表达著作的原意。

强调重读马恩原著具有特殊的、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第一,马恩原著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载体,是第一手材料,最能直接反映出马恩的原初思想观点。这里,包括马恩在世时公开发表的著作、论文(这是主体),也包括马恩的手稿、笔记,还包括通信等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强调重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目的在于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源的地位和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第二,马恩原著是纠正多年来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背离的根本理论依据。无可讳言,马克思主义被疏远、被误读以至背离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不是一时一地或偶尔的,而是如影随形一样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前进过程中的伴生物,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在中国,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背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导演下,曾发生长达十年的全面动乱和浩劫,使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前苏联,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背离,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毁于一旦,并连锁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发生剧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谷。于是,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一时欣喜若狂,公然宣布:“列宁主义已经死亡,马克思主义正在死亡”。一些半马克思主义者则怀疑、动摇,冷漠马克思主义,采取“尊马如马在”的态度。恩格斯曾经说过,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那些真诚尊崇马克思主义的人,面对沉痛的历史教训,在痛定思痛之后,提出了“重读马克思”、“找回马克思”的问题,表现了碰壁之后的觉醒,也昭示了理论研究正确道路的复归。因为,只有重读马克思、找回马克思,才能真正弄明白:过去我们在哪些问题上误读和背离了马克思?为什么会误读和背离?如何去纠正误读,返本归真?毫无疑问,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依据只能是马克思的原著。第三,马恩原著是鉴别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促进对话、交流的根本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方面,欧洲的一切旧势把它视为“幽灵”,并为驱逐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直到今天,马克思主义仍然被那些资产阶级政要、右翼思想家视为洪水猛兽,拼命干着“和平演变”的勾当。另一方面,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则成为解放的法宝,指路的明灯。此外,还有一大批有识之士或进步的知识分子因被马克思的理论说服力和实践批判力所征服,纷纷著书立说,研究马克思,解读马克思。但由于解读者所处的客观环境,所背对的文化传统,所持有的立场、态度、情感的不同,因而对马克思的选

择意向和理解、阐释也就各不相同，于是出现了各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面对这种纷纭复杂的现实，首先，应当依据马克思的原著去鉴别各种思潮，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依据马克思的原著去研究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疏通对话交流的渠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过历史教训。那时，由于我们的理论研究一直被禁锢在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没能对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引起重视，进行研究。今天，面对世界多样化发展的趋势，面对各国各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强的现实，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已成为无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江泽民同志在谈到世界多样性发展态势时曾深刻指出，我们主张兼容而不歧视，交流而不排斥，对话而不对抗，共处而不冲突，在彼此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挥各种文明的积极作用，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共同进步。对待各种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应当作如是观。应当看到，各流派对马克思的解读都有自己的长处、特点和独具慧眼的地方，当然也有各自的短处、缺欠和错误。鉴于各种理论观点都是源于对马克思的解读，换句话说，大家都“姓马”，因此不应当互相歧视，互相排斥，更不能互相对抗。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彼此尊重，对话交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那种“坐井观天，唯我独马”、“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狭隘观点和宗派主义是万万要不得的。例如，如何看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确有过失误，在那个我们曾经误读马克思，把马克思的某些原理（例如阶级斗争学说）推向错误极端的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曾被视为异端而大加贬斥。然而，当我们自己遭受挫折而进行理论反思时，再去读一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感觉大不一样。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无论在领域的拓展，亦或理论的阐释方面，有好多东西是很有启迪、值得借鉴的。为什么对同一个东西的认识前后的反差如此之大呢？除了政治需要外，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千万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性的基本原理（正像我们曾经丢掉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样），试想，既然东方人有权根据东方的实际去阐释、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曾被视为正传），那么西方人不是同样有权根据西方的实际去阐释、运用马克思主义吗？如果大家都保持这样一种科学的态度去重读马克思，研究马克思，必然就能回到马克思，并在此基础上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马恩原著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依据。众所周知，我们信仰的主义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内的一条流动着的真理的长河，这条长河的源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在实践上的突破，理论上的辉煌，皆源于马克思主义真

理的导引。只有从源头上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在实践中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源与流、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是一切郑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原则问题。老祖宗不能丢，否则就会丧失根本；同样，思想也不能僵化，僵化了，马克思主义就会失去生机和活力。在中国，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三次历史性飞跃所产生的理论成果，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完整科学理论体系。因此，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只能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而坚持和发展都离不开结合新的实践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进行全面、正确的理解。

二

怎样读马恩原著？这里的关键不是读书的具体方法问题，而是读书的指导原则问题。作为具体的方法往往因人而异，可以有多种选择，凡是正确的方法都是有效的。但是作为读马恩原著的指导原则必须是统一的，应当高于具体方法，并具有指导性作用。

重读马恩原著的第一个指导原则就是读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列宁曾明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① 列宁的这个论断向人们昭示了一个根本原则问题，即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是把它看作是论断、观点的块块堆积或者是诸多原理的条条罗列呢，还是把它看作是一个由观点和原说组成的有机统一体呢？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和态度，必然决定着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和运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唯鉴于此，在上个世纪 70 年代初期，邓小平同志针对林彪、“四人帮”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郑重地指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理论体系来看待，一定要学习好、运用好毛泽东思想的体系，用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决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拿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②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从指导思想的高度，深刻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内涵丰富，意义重大，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必须遵循的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既然是一个完整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8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2 页、第 43 页。

的科学理论体系，就必然要求我们要把它当作理论体系来看待，读他的体系，学他的体系，用他的体系。读马克思体系的绝对要求就是坚持联系、发展的观点，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就是说，一定要用联系、发展的观点去理解、把握原著中的每个论断、每条原理，切忌孤立性、片面性、静止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只是（a）历史地（B）只是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Y）只是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①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读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时曾具体分析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②今天，我们重读马克思，就要遵循列宁和邓小平同志的教导，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切以马克思的体系来统领，多一些辩证法，少一点形而上学。只有这样，才能把握马恩原著的真谛。

重读马恩原著重在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众所周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列宁有一系列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马克思认为他的理论的全部价值在于这个理论‘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后一性质的确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因为这个理论公开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揭露现代社会的一切对抗和剥削形式，考察它们的演变，证明它们的暂时性和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必然性，因而也就帮助无产阶级尽可能迅速地、尽可能容易地消灭任何剥削。”^③马克思曾被奉为“批判大师”、“破坏大师”，这是不无道理的。马克思的批判精神，首先表现为理论的批判，凡是人类思想所树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探讨、审查，并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加以检验。这种理论的批判为自己创立新理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实践的、现实的批判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此前提下，马克思的批判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是机智的、深刻的、无情的，至今也没有那一个人能够超越。一位当今并非共产党人的美国学者也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强点在于它的无情的否定，在于它对现状的彻底批判。就这一点而言，它至今仍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凡是希望了解自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3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页。

己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人都离不开这位‘批判大师’。”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是想解放那些在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的因素”。马克思在这里讲的需要解放的“新社会的因素”，包括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管理方式以及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力的首要的决定性因素人。人的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则是批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关键。所以列宁在上述引文中，强调革命品质“是马克思主义完全地和无条件地所固有的”。因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性揭露和批判，对一些资产阶级的有识之士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也是能够做到的，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在于，并未止步于无情的批判，而是通过批判旧世界，而进一步论证旧制度灭亡和新社会诞生的必然性，从而引导无产阶级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革命性变革，尽可能更快更顺利地消灭一切剥削，建立没有阶级对抗和剥削压迫的崭新社会制度。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由此我们可以作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解放的学说，而革命和解放最终都聚焦在人的解放，使人人都成为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在回答“你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什么”的提问时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作答。不难看出，自由人联合体和人的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追求，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正是为了最终实现这一理想目标而展开的。弄清了这一点，我们就会自觉地意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中国它还处于初级阶段），充其量是刚刚踏进“人的自由发展”的门槛，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新一届党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并向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此，重读马克思就要牢牢把握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重大理论问题，抓住不放，全面理解，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了理论支撑。

重读马恩原著重在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实践证明，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会一通百通、运用自如；反之，就会走向歧途、到处碰壁。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这些原理不过是现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① 实事求是又是马克思主义的作用之源。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能否转化为现实，关键在于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使理论同客观实际相结合。再好的理论若不结合新的实际加以运用，就会变为空洞的教条。实事求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之源。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根源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离开实事求是就谈不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就停止了。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是长青的，理论若不落后于实际，就必须与时俱进，根据发展变化了的新的实际来修正、补充和发展自己。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理论“从公式的世界导入现实的世界，使它有血有肉，使它具体化，从而使它变了样”。^② 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活的灵魂，这是经典作家从哲学思维的层面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概括，为我们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所在。重读马恩原著就要在抓“精髓”上下功夫，把真经学到手，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坚持到底，使之永放光芒。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① 同上，第28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 马克思主义哲学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

李景源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全党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深入研究和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是一项极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哲学工作者要不辱使命，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理论，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探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理论探索，就是总结实践探索的经验，加以理性升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和理性自觉。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理论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哲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形态。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了几代领导集体的心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新的实践成果的概括，全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实际，

又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按照十六大的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继续丰富和发展。从哲学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哲学息息相关。社会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哲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马克思曾指出：“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①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是社会主义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前提、理论根据和方法论工具。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从空想变成科学；没有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支持实践标准的讨论、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以来，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发展历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哲学上的是非对错往往十分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不仅如此，哲学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精髓和核心。邓小平反复强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从整个体系上获得正确的理解，要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邓小平高度评价毛泽东用“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概括，并进一步将“实事求是”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有掌握这个精髓，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才能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换言之，一个理论只有达到哲学层面的自觉，它的完整性、体系性才能得以确立。我们同样可以说，只有在哲学层面上达到了理论的成熟，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一句话，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完整地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是深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以及表明该理论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自觉运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实践的重要前提。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同样是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哲学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和社会功能，就必须立足时代、立足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7页。

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向前的推进一步。研究时代提出的问题，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这是哲学家的重要职责。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我们所面对的时代主题，也是哲学研究所面对的中国最大实际。时代的发展推动哲学理论的发展，时代提出的问题需要哲学的研究和回答。立足时代、立足中国，是实现哲学与现实接触和结合的关键。解决哲学脱离现实的问题，必须找到作为结合载体和结合途径的课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既是实现哲学与现实结合的主要载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举措。

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目标及难点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这是我们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主要依据。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这是我们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主要依据。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作为该理论的奠基人，他多次强调，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要形成“准确的表述语言”^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多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科学概括和总体性表述，不断深化了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认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善于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提出并解决问题。他的著作充满了哲学智慧和辩证法。邓小平关于反对“两个凡是”的论述，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论述，关于实践标准的论述，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述，关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论述，等等，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也表明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哲学系统。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再到科学发展观，更加彰显了邓小平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哲学理念。把这一哲学理念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

具体化为一个由哲学概念和范畴构成的有内在联系和开放结构的哲学体系，就是摆在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应该承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还存在若干困难。首要的一点，这项研究不单单是一项文本梳理的案头上的工作，不是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的起点，理论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的哲学观念。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① 列宁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们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本国的实际中找到了革命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坚持要冷静地总结经验，要研究新的实践。他说：“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其间经历过多次失误和挫折，通过艰辛的探索，才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史无前例的，哲学研究要无愧于时代，就要研究这一探索过程本身所蕴涵的哲学精神、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精髓。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还要克服两个困难，即如何把哲学的实质和哲学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金岳霖先生在审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报告中指出：“有哲学的实质而无哲学的形式，或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思想，都给哲学史家一种困难。”冯友兰在该书“绪论”中指出，中国哲学虽然没有“形式上的系统”，但有“实质上的系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套用金、冯两位先生的说法，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目标和任务，也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的哲学思考和论述中，梳理出有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找出其实质性的系统，然后再由实质性的系统上升为形式上的系统，形成由哲学概念、范畴和原理所构成的逻辑系统。就目前研究现状而言，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虽然不少，但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现象大量存在，真正有哲学实质的精品之作尚属凤毛麟角。哲学的实质和哲学的形式的关系，实际上是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原理应体现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有机统一。所谓“哲学的实质”，指的是这个原理的特殊性，是能够真实反映“中国特色”的概念和原理。所谓“哲学的形式”，指的是这个原理的普遍性，即表达“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语词应达到哲学的层次或符合哲学学科规范。这是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普遍，是一种具体的共相，而不再是以往那样永远正确、大而无当、毫无具体内容的抽象普遍的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经历近半个世纪改革和建设艰辛探索所取得的思想结晶，要将这一重大成果上升到哲学层面，形成科学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哲学体系，还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

三、关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几点思考

第一，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转变为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它与旧哲学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即申明自己的理论是一种“发展的学说”，始终坚持辩证的历史的发展原则，用发展的观点对待理论，具体地历史地把握科学的原理和结论。用发展的观点对待理论，最紧要的是立足于本国的实践，贯彻马克思所说的从实践出发解释观念、而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从观念出发的现代形态是本本主义。毛泽东一贯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不仅会导致思想僵化，还会危及党和国家的命运。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们不能单靠本本来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也不是靠改良传统教科书体系、围绕旧体系兜圈子产生的，而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孕育形成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过程中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转化为研究范式，就要立足于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实践过程为基础，从中发掘重大的哲学问题及其解决的核心哲学理念。把书本的哲学变为实践的哲学，其根本途径是坚持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邓小平指出：“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①他认为，离开本国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从而提出了扎根中国实际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原理，要遵循邓小平的嘱托，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为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而进行的一项极其困难而又极有意义的哲学探索。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第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马克思在谈到他的研究方法时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① 他所说的占有材料、分析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形式的方法，就是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的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毛泽东和邓小平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即实质上是如何把思维一般上升到思维具体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② 实事求是既是科学研究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方法，也是保证思维一般上升到思维具体的科学方法，因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化的根本保证。实事求是方法之所以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方法，还在于它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所谓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一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公式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抽象不变的公式，硬套在事物上。这种原理加例子的做法，把实际事物的完整性割碎，分门别类地塞到旧的框架中去，其结果是把活生生的东西变成了僵死的东西。二是要处理好实事求是方法与解释学方法的关系。解释学方法是研究经典文献的重要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不是不要本本，也不是否定解释学的方法。问题在于，仅有本本是不够的，还要将本本与实际结合起来。所以，不应把解释学这种研究文本的方法视之为哲学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

第三，开展跨学科研究，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创造条件。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要妥善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问题，即怎样植根于现实（特殊性）又超越现实（普遍性）的问题。换言之，是既面对现实又能保持哲学学科的高度。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搞好中、西、马之间的对话，是实现学术性与现实性有机结合的重要条件。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重大的现实问题，是当代中国向哲学各学科提出的时代性课题。任何时代性问题都不是主观意识的产物，而是在中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

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涌现的。科学的理论总是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为前提，从而促进了自身的发展，不断地拓展其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任务，也是哲学各分支学科的共同使命。要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形态，必须走会通中西、综合创新的理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同样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西方传统哲学、现代西方哲学关系的专题研究，只有在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对话和理解中，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从中获得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精神是内在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形态。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形态，必须走古今贯通、史论并进的哲学理路。要破除传统与现代简单对峙的观念，自觉开发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深入把握其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智慧，以之作为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料。总之，要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局面，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就要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这是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葆生机和活力的根本保证。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赵剑英

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一个前提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是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应当着眼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总体性特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体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立场，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必须凸现民族性，必须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根。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应当认真批判地吸收西方哲学，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准确捕捉时代性问题并予以新的哲学阐释和回答。这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根本途径。

一、当前中国哲学研究的新动向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总趋势，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会通的努力，探讨建构中国哲学的新形态。概括地讲表现为三种研究路向：一是厘清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观点，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方法；二是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三是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哲学中的合理成分，把它们有机地融入到当代中国哲学形态中去。这一哲学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实现“中西马哲学”“综合创新”的形态。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哲学形态的建构”主要表现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当代中国哲学发展这一趋势的实质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意识、民族精神的觉醒和自觉建构。由于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和平发展都是不可阻挡的，全球化与民族性的矛盾必将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这就深层次地决定了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即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背景下中华民族哲学的新建构）是 21 世纪中国哲学

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

为什么世纪之交以来会通“中西马”、探索建构当代中国哲学新形态成为中国哲学界持续升温的话题，这既有来自于哲学学科内在的要求（长期以来的“中西马”分立），又是应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是应对全球化、应对西方文化的强势状态的客观要求，是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确立其固有的文化形象，实现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客观要求，反映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追求，反映了我们对民族文化在未来命运的关切和期待。

长期以来，在中国，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学科间缺乏交流、对话，甚至相互轻视，作为爱智的哲学被肢解和分裂成为各“分支学科哲学”，哲学家也成为片面化的、“专业化”的“哲学工作者”。学科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以及教学方式的不尽科学合理更强化了这种不正常现象。这样的哲学显然无法回应时代的问题，更遑论肩负起指导人们改变世界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现代化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尤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下创造出了中国现代化的独特经验。如何深入研究“三大理论成果”，从哲学的角度提升“中国经验”，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话语，是中国哲学界面临的一个十分迫切的重大课题。

方兴未艾的全球化趋势，使不同民族文化出现冲突与交融的态势，世界文化存在同质化的可能性，凸现出世界文化多元性的重要性；资本主义发展到跨国资本主义和消费资本主义，在资本输出的同时，客观上伴随着西方文化的扩张和霸权的现实。在当代，文化力量在民族国家的发展中越来越起到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弥足珍贵的根本性资源。中国的和平发展最终是需要文化的支持并以全球华人对其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复兴为表征的。可以说，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全球化进程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一张身份证，而哲学是这张身份证的基因和灵魂。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要既立足当代又继承传统，既立足本国又学习外国，大力推进学术观点创新、学科体系创新和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①，胡锦涛同志的这一精辟论述也为我们

^① 《人民日报》，2004年5月29日。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思考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有四大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和研究。

二、如何体现“真精神”

对一种理论的解读总是与一定主体的现实需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解读也是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状况和与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目标紧密相联的。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主要理解为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把唯物辩证法主要理解为对现实秩序的合理性的变革,把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思想主要理解为矛盾的斗争性;从理论来源上也主要是以斯大林《联共(布)党史》四章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体系^①。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的这种传统模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历史局限性。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以这个教科书体系为蓝本和“正宗”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确存在着简单化倾向,主要是忽视了实践观之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意义,忽视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价值和价值观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忽视了当代科技革命的新变化、新成果、新问题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的新挑战。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不够全面和整体的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的把握不够深刻。在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要体现“经典性”或“真精神”,根本的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特征”,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而这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有机联系和马克思主义与其时代和历史实践的内在联系得以实现。

1. 应当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论的联系中解读,才能达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更真确的把握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或者说从三个方面去阐述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它是关于历史生成和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科学,也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特殊科学。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服从于其社会批判理论的。马克思由最初为寻求对“物质利益的苦恼”的解答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其间对他们的哲学信仰进行了清算与批判(主要表现为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发现了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与人类历史的密切联系,用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去解释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创立了实践史观——唯物史观这样一种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的新哲

^① 吴元梁:《关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及若干理论问题的分析》,《东岳论丛》2004年第5期。

学，然而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发展机制（主要表现为对资本统治逻辑的揭示与分析）进行深入系统的艰苦研究，最后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展示出未来社会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可见，马克思思想是哲学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批判）、资本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统一，并在对资本的批判分析中，达到了理论上的融合。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构成了有机的思想整体。因此，仅从哲学出发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无法真正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位子”，也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整体面貌和实质。

2. 应当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高度以及理论特征的角度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高度看：

（1）马克思主义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规律的揭示，是一种关于历史生成机制的科学、关于社会发展机制的科学，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结构和运行发展机制的揭示在当代依然是有解释力的伟大认识工具，对分析和把握当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意义。

（2）马克思对商品社会“资本统治人的逻辑”、商品拜物教现象、人的独立性通过对物的依赖表现出来的揭示和批判，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因而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深刻思想，对于分析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和启示意义。

（3）从人的发展尺度这一价值观维度来定义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的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扬弃了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消灭了阶级的统治，公众的权力失去政治的性质。人受异己力量的统治的历史结束了。在那里，“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恩格斯称之为“解放世界的事业”。^② 恩格斯认为此前的人类历史都是“史前史”，而其理论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页、第760页。

态就是“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4) 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具有一般性和普适性，对人类社会的运行发展的解释至今是有效的。这方面可以举出好多例子证明（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实践的观点、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阶级分析方法等等）。

(5)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思维方法。

以上五个方面，无论其思想的科学性，还是其价值立场，无论是对当今世界的发展，还是当代中国的发展都具有批判性和建构性意义，甚至可以说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从理论特征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性和理想性、科学性和价值性、理论性和实践性有机结合，有着严密逻辑的思想体系（其理论逻辑深刻地反映和透彻地揭示了当时的实践逻辑），是一种奠定在历史科学基础上的理想建构，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同时也是人的解放的理想建构，是一种关于人的解放的科学的思维体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统一。正是马克思的科学批判使我们洞察到人类自身存在的秘密；正是马克思提出的人从自然的统治和人类社会关系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以及个人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展现了人类生活的光明前景。马克思正是“人间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主义就像一把“圣火”，使人类社会超越了对自身的无知和处于异化、非自由的黑暗状态，照亮了人类前进的目标，给人类以生的希望和奋斗的巨大动力。批判精神、理想精神一并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涵，对此我们应予张扬而不是缺失。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 150 多年前的社会，为什么至今对世界发生着重大的影响，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以“铁”一般的理论逻辑反映了当时的实践逻辑，显示出严密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以其深刻的科学性和彻底的批判性，深刻而巨大地影响和改变了资本主义存在发展方式以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所展现的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为人类不断超越种种异化等“黑暗”状态指明了方向；马克思宣告他批判和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但从没有一个私敌的科学求真的精神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伟大的人格力量，让后人以至于他们思想的反对者都对他们产生由衷的敬意！无论是马克思被评为千年思想家还是最近被评为古代以来最伟大的哲学家，无论是萨特提出马克思是一座不可被超越的思想高峰，还是德里达在新世纪之初发出“向马克思致敬”的口号，都证明了马克思思想的巨大力量和魅力。

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当代价值，并不意味马克思主义不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是

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阶段的产物，当代资本主义已发展到跨国资本阶段，科学技术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形态也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尽一致。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流派从不同角度和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丰富和补充。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即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具体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尤其要探讨“中国道路”，总结“中国经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以此指导中国的现代化。

三、如何体现民族性

当今中国哲学不可能离开两大实践背景，这就是：方兴未艾的全球化 and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全球性和民族性的矛盾将是贯串中国特色现代化发展之路中的一个基本矛盾。

当今世界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而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弱势民族的边缘化倾向。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发展，正在“创造流动的空间、电子空间，没有中心的空间，可以渗透疆界和世界的空间”^①。特别是信息技术和全球媒介的发展，使文化传播突破了传统的领土疆域，制造着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全球意识和全球文化。尽管我们不同意“文化全球化”这样的说法，但是，经济全球化和媒介全球化与领土的联系确实明显断裂，民族文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的民族国家）的认同危机正越来越成为一种严重的问题。在当代中国，中国人的文化认同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力增强而有所增强，同时又遭到新的挑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带来利益主体的多样化，必然要承认并促使人们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进而社会文化必然呈现多元化和差异性趋势。

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经，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而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能脱离中华民族五千多年历史的文化传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是“中国的”，是“中华民族的”的哲学，即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哲学。

1. 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予以吸收和新的阐发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主导意识形

^① [英]戴维·莫利等：《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页。

态，是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工具。同时，它还是这个社会上知识分子制约专制王权的理论资源，也是普通民众的道德原则。它不仅是这个社会的哲学、政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文学艺术、社会心理以及民风民俗等有相当强劲、持久的渗透。古典儒学中那些强化神权、君权、父权、夫权的“天命”理论与“三纲”伦理，已不适合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而理所当然地属于扬弃、淘汰之列。但儒学价值系统的一些基本观念，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等，是经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益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不但没有过时，还具有普世性。如能正确引导，并赋予时代精神，不但将使全民同心同德，产生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和持久不竭文化源泉，也可以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①。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儒家根据天生人和天人被伦理化了的关系，认为世界的整体价值高于人的价值，因此希望在天人之间保持一种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传统的儒者都有“为天地立心”和“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和人生理想，这种情怀和理想，在精神上把人引向宇宙的心灵化，并产生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生命感受和精神境界。儒者正是要从人参与到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生命流行中来感悟、体知和求证至上的天道。《中庸》有所谓“参赞化育”的说法。“参赞”指人在天地自然中的参与作用与调节作用，“化育”指自然万物本身的变化与发育。通过人的“参赞”作用，让自然万物按照天道、物理自己“化育”，人类和自然界自然会建立一种协调关系，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系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化平衡的状态。这是古代东方民族所特有的一种生态哲学与生态伦理。这种生态理想以农业社会和自然经济为基础，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的基本观念具有恒久的普遍的意义，至今仍能给我们提供极有价值的启示。

在处理群体、社会乃至国家关系方面，儒家主张“仁者爱人”，以“和为贵”作为价值导向和处世原则，奉行中庸之道，讲求“和而不同”，求大同、存小异，反对因过度竞争和恶性对立与对抗而导致两败俱伤或者一方吃掉另一方。在当代，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与信息一体化，世界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交流、对话、互渗、融合的大趋势，同时，所谓“文明冲突论”也甚为喧嚣尘上。儒家“和而不同”与“立己立人”的观念和“协和万邦”、“天下和平”的理想目标，对于正确处理国际关系和实现世界和平，显然具有极为现实的意义。

在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方面，儒家希望二者是一种健康的互动关系。儒家从

^① 吴光：《儒学价值观及其“普世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6月17日。

“仁者爱人”的思想基点出发,把人类视为群体,从同类共处来看人际关系,以“人我和合”、道德和谐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具体又展开为忠、恕、诚、信等许多方面。忠恕分别从正面和反面对“仁者爱人”加以引伸和发挥,“忠”是一种为人着想的正直之心和成人之美的精神,“恕”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将心比心和宽以待人的精神。诚信分别从内在和外在说明交际中的真实无妄或诚实无欺。其目的就是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使上下左右的人我之际实现心理上的互相沟通、思想上的互相理解、感情上的互相体谅,从而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

儒家又特别注重礼乐教化的作用。儒家认为礼乐是人类社会文明最突出的标志。“礼”的功能是确定人的社会身份与规范人的正当行为,“乐”的功能是陶冶人的心性与沟通人的感情。礼乐教化旨在国家组织和社会关系达到一种有序和谐的状态,有助于缓和君主等级制度之下的种种对立与冲突,从而有助于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

在个人的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方面,儒家把“做人”、“成人”放在第一位。“做人”就是做一个有修养的文明人,“成人”就是造就文明人应有的完美人格。儒家文化以其切于人伦日用、培植人性善、导人性入精微致广大、善养浩然之气等特性,对传统中国社会的道德人伦规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使儒家文化成为传统中国士人的精神命脉之所寄与普通民众行为规范的道德依据。对于这些优秀的道德资源进行现代转化,充实新的内容,将非常有益于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传统美德、培养民族文化精神。

儒家文化中所蕴涵的上述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包括佛家、道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资源都应当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2. 研究“三大理论成果”蕴涵的哲学思想,总结和提升“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次历史性飞跃的“三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也代表中华民族理论思维的创造性成果。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绝不应该无视和撇开这“三大理论成果”,而是应予深入研究,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三大理论成果”中存在和隐含的哲学思想,提升为哲学话语。

毛泽东思想不仅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为基础,而且毛泽东的许多其他著作和他的革命实践中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如《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改造我们的学习》、《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等著作。毛泽东思想所创立的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

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中华民族文化相结合的伟大思想创造，它以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为指导，立足中国文化之根，正确反映中国实际和指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独立和解放之路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其中的关于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张，不但在政治上探索着中华民族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解放之路”，而且也探索着中华民族精神世界、意义世界秩序的重建，这对于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发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加强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有着极为宝贵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从语言形式到思想内容都体现了很强的民族特色，它主张批判地吸收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它吸取了传统的“大同”社会理想，树立了道德人格的楷模，展现了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承继性。毛泽东思想对于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而对于科学理性精神（主客观相统一）的追求则延续了启蒙的精神。而“大众”则意味着民主意识。因而，只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依据。为此，我们可以理解毛泽东思想为何具有无穷的思想魅力，为何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伟大精神支柱之一。

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思想，特别是对以实践为基础和源泉的认识根本规律（认识总路线）的阐发，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论述，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的思想；关于矛盾的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论的创造性思考；关于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关于诸如“一般与个别相结合”、“解剖麻雀”、“学会弹钢琴”、“波浪式前进”、“胸中有数”、“留有余地”和“多谋善断”、“当机立断”等一系列辨证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关于政策和策略的一系列辩证思想，等等，都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的独创性发展，这些哲学思想理应在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建构中得到体现。

邓小平虽然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但邓小平理论关于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的强调，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关于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的思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关于“台阶式”和以重点带动全局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等等都是具有独创性的,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认识论、辩证法思想的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同样蕴涵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对“人民群众利益”的进一步强调,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的新阐发,更加凸现了价值和价值观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关于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的阐发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推进,关于建设先进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对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理论的重要创新,关于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则是对人类现代化文明发展模式的新探索,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新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放眼世界文明潮流,重视本族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中国实践”,创造着“中国经验”,把现代化道路的“中国模式”推向前进。

近来一些国际人士提出并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进行正面肯定。^①这些国际人士所提出的问题和探讨是有意义的,但尚不够深刻,不够切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更未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和提炼。“中国发展模式”简要地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或者通常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把外域的优秀文明成果与中国的国情、实际结合起来,高度注重理论、方案与现实可能性和实践操作性的有机统一。放眼中外历史,这的确是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为什么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总结了“十条基本经验”,非常精辟、“到位”。以下主要从哲学上总结“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取得成功的原因和经验。

(1) 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中国发展和所处的环境的实际出发,不照搬任何外国发展的模式,不迷信任何既有的理论教条,不断进行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高度重视理论创新,逐渐形成符合中国实际、指导中国成功发展的正确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出一条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坚持和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

(2)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牢牢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致力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坚持和运用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和社会发展基本动力的基本观点。

(3)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共同富裕而幸福,国家富强而文明,民族伟

^① 刘桂山:《综述:“北京共识”——当代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新华网2004年5月25日。

大复兴作为发展的最高价值追求，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这就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使执政和发展得到最伟大力量——人民群众的支持，使发展有了强大的支撑和源源不竭的活力。

（4）坚持把握发展的“度”的原则，走渐进式改革发展道路。在“培育”、丰富事物的新质的过程中实现事物的跃迁和发展；坚持“稳态发展”、“渐进发展”，即在把握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推进事物的发展，而不是无视或忽略事物矛盾的另一面，搞“断裂式发展”，“突变式发展”。这就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5）坚持协调发展。一是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协调关系，维护事物的“系统质”。“发展”是基础和根本，“改革”是动力和手段，“稳定”是前提和目标。三者要兼顾，否则，现代化大船就会出现“缺口”；二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者的协调发展；三是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四是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总起来讲，就是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关于这一点，经过20多年的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我们已有清醒的认识和新的理论升华。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中国传统哲学中“和”的思想、“中庸”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6）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进程中，既是中国历史经验的运用，也符合中国的实际，又创造性地运用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原理。这既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也是“中国发展模式”取得巨大成效的一条主要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已经明确，但是这一道路及据此产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架构还需要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继续给予学理上的挖掘和“合法性论证”，同时对在实践这一道路中所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矛盾需要做出科学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回答，从而指导新的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充分研究中国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

四、如何体现开放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启示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进到国内学术界以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从过去的引进、经过重思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把握的自觉意识。学者们已经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建构来说，已经构成了一个无法忽视的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探索打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反思，并力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在当代的历史语境中得到发展，使马克思主义

哲学成为一个开放的理论。在当前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出现的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另一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关系、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合理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这一视角着眼，在认真鉴别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与错解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具有借鉴意义：

1. 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为主导，透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研究方法，对于打破我国哲学研究中学科之间的界限，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文本，我们看到，他们积极吸收当代哲学思想文化的成果，力图在马克思哲学批判精神的基础上，实现跨学科之间的融合贯通。如在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卢卡奇将马克思哲学、德国古典哲学、韦伯的政治学与社会学、古典经济学等，通过“物化”这个概念为入口，整合为面对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虽然在这个整合过程中，卢卡奇已经与马克思具有不同的理论指向（我们甚至可以说，卢卡奇背离了马克思），但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却被他深入了。再如法兰克福学派，其中的许多学者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马克思的哲学批判与精神分析理论相结合，对法西斯主义人格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马克思哲学中的人学思想进行了当代发挥；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启蒙精神的重新探讨，对西方文化之根进行了深层的理论剖析。

2.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的理解和把握，对我们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以至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内在机制，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随着福特主义在工业生产中地位的确立，资本主义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即组织化资本主义阶段，这不仅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导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改变，并使文化与意识形态问题呈现出来。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变化，葛兰西对马克思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意识形态与领导权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将自己的革命战略自觉地奠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上。“晚期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指称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哲学理念的基础。而当阿多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表《否定的辩证法》时，资本主义经过大众媒介的中介，所造成的幻象统治已经构成了他的重要论述主题，这也构成了《否定的辩证法》的现实前提。这也给我们提出了问题：要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同时进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同样，今天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个任务也需要同时展开，这

才能使我们真正地回到现实之中。

3. 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理论的研究尤其值得重视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文化理论的思考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文化哲学的层面，这也是哲学思想中的形而上学内容，阿多诺等对启蒙的思考就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个层面的文化研究已经得到了学界的认可；还有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大众文化研究层面，本雅明对机械复制技术的讨论、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这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非常缺乏、甚至还没有真正引起重视的问题。而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建构就缺乏一块鲜活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对于今天人们的意识建构来说，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4. 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后期的“建构性后现代主义”和“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科学技术的负面功能及其意识形态本质的揭示，进而实现对“现代性”的批判，虽有过度偏颇之处，但也不乏深刻和合理的价值，尤其对我们在发展中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统一，促进人们对公正、平等、正义等问题的反思具有警示作用，在建构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中应充分吸收其中合理的有价值的思想。

总之，虽然我们并不直接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关键性结论，但深入地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和最新进展，注意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哲学逻辑上提出的问题，注意他们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成果，并将这些问题转化为我们正面研究的课题，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五、如何体现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既来源于西方文明，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和吸收，更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时代重大问题的回答和解决，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历来是一种伟大的思想体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唯一的源头活水，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 21 世纪发展的根本途径。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问题。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由于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浪潮所导致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如何认识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给当代社会的组织结构及运作机制带来的新变化，如何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如有学者提出，全球化给我们提出的最大而最直接的问题是“全球社会”作为社会历史哲学的分析单位是否可能？“全球社

会”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社会”而提出来的。有学者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全球化必然导致全球社会的出现。“全球社会”概念和分析单位的出现正是这种客观趋势的反映。如果我们能够像研究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社会”那样深入研究“全球社会”,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将会有新的发展。^①“信息时代三部曲”的作者曼纽·卡斯特在其《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指出,“当今世界,以及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全球化与认同的冲突性趋势所塑造。信息技术革命与资本主义的重新构建,已经诱发了社会的新形式——网络社会。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其普遍的全球性扩散至整个世界。

究竟如何理解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是否使社会形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如何评价西方各种社会形态理论(后工业社会论、信息社会论、知识社会论、全球社会论、消费社会论等)?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跨国资本主义),呈现出新的特点的情势下,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社会形态的关系;当代社会的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趋势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社会主义形态是什么关系?或者说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②如何在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形态理论和把握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对当代社会形态的性质、特征有新的概括,形成对人类生存与发展新的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实现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发展,无疑是一项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不仅如此,通过对当代社会形态的分析研究,正确认识社会形态的演变及发展趋势,可进一步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体系,科学地预测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为后发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将有利于我们研究把握社会存在及运动机制的复杂性和新特点,为科学合理有效解决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发展,使我们的思维方式、实践方式和决策方式反映社会形态的新发展提供理论基础的支持。

——马克思生产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问题。面对20世纪末以来科学技术革命的新特点,科技社会化、社会科技化已成为当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事实和态势,以知识生产和知识劳动为重要内容的知识实践已成为人类实践的主导形态。知识实践是人类实践发展中新分化出来的重要形态,是科学技术不断革新及广泛渗透和运用于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而形成的结果,它反映了知识成为人的生存生活方式这一当今的“时代精神”。知识实践已成为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那么,究竟如何认识这一实践形态在人类实践活动体系中的地位,如何认识这一实践形态与物

^{①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课题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几个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9月26日。

质生产、精神生产形态的关系，这实际已涉及到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在当代的坚持和发展问题。

——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坚持和发展问题。“一定形态的政治和经济是首先决定那一定形态的文化”，“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①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关系的基本观点。面对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综合国力剧烈竞争，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文化在国家综合国力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越来越成为各国关系的重要内容，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冲突的一个方面。当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之间的竞争，根本的是民族素质和人才之间，实际上是民族文化之间的竞争。文化产业已经被公认为经济领域中最有活力、最具有创新意义且能获得丰厚收益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地位越来越突出。那么，如何从唯物史观的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高度，深刻认识文化在当代和未来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无疑是一个涉及唯物史观基础理论的重要问题。

——构建价值共识和普世伦理问题。在全球化和技术化社会条件下，人类的创造性空前增强，人类的活动范围和效应大大扩展，这固然是人类本质力量增长的表征，也凸现了人类空前重大的责任。在科技高度发达和风险增长的社会，人类比任何时期更需要对话、需要沟通、协商，形成共识。不仅要求人与自然关系有新的理念和规范，也要求人的活动有新的规范，不同文明、知识体系之间如何在相互开放中相互尊重、和谐相处、相融，而不是相互歧视或吃掉对方。不同文明主体、利益群体如何共同一致地与自然和谐相处，不同文明文化价值体系如何由分歧、冲突到寻求对话和共识，制定共同遵循的规范，成为维护人类正常、和谐的生活秩序的基本方式。特别是在当今社会，人类面临许多危及生存和发展的全球性问题，迫切呼唤着生态伦理、生物伦理、网络伦理、科学技术家的伦理道德以及体现社会公正的政治哲学和人文精神的建构。如何适应时代要求，建立新的道德哲学体系显然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现代性及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问题。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种族冲突、地区战争、恐怖主义、热核威胁、文化矛盾、贫富差距等给21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蒙上了深厚的阴影。这些困境，反映了既有人类文明发展的理念和道路的危机，本质上就是所谓的“现代性”危机。现代性问题吁求人们对现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页、第664页。

代性进行反思和重构。尤其需要哲学家重新认识人类及其价值理念,重新认识人类的实践原则,重新认识人类与社会、世界、宇宙的关系,并根据这种总体性和根本性的哲学思考和探索来加以研究解决。^①而同时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国深入发展不断暴露和积累着许多深层次矛盾,中国的发展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论是资源的、环境的方面,还是社会公正、社会稳定方面。以上两大背景,在不断拷问中国的学者:中国应建构什么样的现代性?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之路?这迫切需要从学理上做出探索和论证。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和立场,立足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探索和中国独有的“经验”,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规划中国的未来,对中华民族的命运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意义。由此可见,现代性问题不仅是世界发展也是中国发展面临的中心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现代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四个密切相关的实践命题和理论命题。中国现代化过程反映在理论形态上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不断发展的过程,反映在哲学形态上就表现为“中西马哲学”的会通、融合的努力追求,从内涵上讲,就是中国现代性之建构、丰富的过程。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包括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内在逻辑。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哲学问题。信息社会的发展以及“信息圈”(infosphere)的出现,已经使信息上升为一个基本概念,与诸如“存在”、“知识”、“意义”等基本概念同等重要。生物科学和网络的发展对传统的伦理观念产生了挑战。有专家认为,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对基本哲学观念产生很大影响,如虚拟实在、人工生命、网络结构以及基因工程中的计算机建模以及引起的一系列伦理问题等。^②

其他诸如由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导致的社会形态的深刻巨大的变化,马克思的阶级阶层理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主权、职能和关系问题,全球化和技术化社会条件下的民族发展道路问题,全球化趋势和民族文化的发展,等等。

上述诸多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哲学课题,都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和正确回答的。唯此,新的哲学形态才会有新的内涵,才能表征我们的哲学思维上新的台阶。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仅应有“文本学派”,还应当有“问题学派”、“(中国)经验学派”,以及“传统学派”(会通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关系)。这几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课题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几种学术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4月22日。

^② 刘钢:《信息哲学:哲学探索的新前沿》,《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3月4日。

种趋向的研究都不应忘记这样的目标，这就是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时代特征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放眼世界，立足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代化实践，不断总结“中国经验”，进行综合创新，在变化着的实践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方向。

参考文献：

1. [英] 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2. 汤一介：《和而不同》，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3. 刘文英：《儒家文明论纲》，《孔子研究》2000 年第 4 期。
4. 方克立：《张岱年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
5. 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 年第 2 期。
6. 李景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 年第 3 期。
7. 李德顺：《面向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哲学动态》2000 年第 2 期。
8. 张一兵等：《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6 期。
9. 衣俊卿等：《20 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年版。
10. 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年版。
11. [美]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12. [美] John B. Cobb：《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孔明安等译，《求是学刊》2003 年第 1 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

郝立忠

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日起，就产生了对它的不同理解。有 19 世纪 80 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青年派”“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理解，有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的理解，有斯大林及以后的“苏联教科书”式的理解，有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目前国内学术界一些人从“现当代西方哲学”角度的理解等等。这些理解中，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西方古典哲学的彻底革命的，也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形而上学、是本体论哲学的，甚至有人从根本上否认马克思有哲学，而只承认马克思是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或革命家。这些问题归结起来，根源就在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精确概括，从而没能划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界限。

一、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就目前而言，准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十分必要，也是非常紧迫的。主要表现在：

1. 指导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的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时，往往是注重于概念和体系的研究，而忽视了基本精神的阐释。特别是近些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上，产生了本体论与反本体论、现实性与学术性、功利性与科学性、实践性与超验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等诸多方面的激烈争论。一些人更是主张用黑格尔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这样做，主要依据有两点：一是 1873 年，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谈到黑格尔辩证法时说：“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

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① 二是恩格斯 1870 在《德国农民战争 序言》中说：“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② 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也说：“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③ 列宁在《黑格尔 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则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 1 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④

但是，这些学者也一定会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接下来的一段话：“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⑤ “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批判杜林“犯了错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等同起来”^⑦，强调马克思是依靠“历史的和经济的证明”^⑧，而非黑格尔“否定的否定”来证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列宁在《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中，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观点，并指出：“恩格斯在反驳攻击马克思辩证法的杜林时说：马克思从未打算用黑格尔的三段式来‘证明’任何事物，马克思只是研究和探讨现实过程，马克思认为理论符合现实是理论的唯一标准。假使说，有时某种社会现象的发展符合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个黑格尔公式，那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这在自然界中根本不是罕见的现象。”^⑨ 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⑩ 揭示了马克思的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至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不依靠黑格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2 页。

② 同上，第 635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59 页。

④ 《列宁全集》第 55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1 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1 ~ 112 页。

⑥ 同上，第 112 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65 页。

⑧ 同上，第 476 页。

⑨ 《列宁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0 ~ 31 页。

⑩ 同上，第 32 页。

的否定的否定，就无法证明社会革命的必然性，证明建立土地公有制和劳动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的必然性”^① 则完全是对杜林的话的解释，恩格斯在后面的论述中明确指出：“这些论断又都是杜林先生的纯粹的捏造”^②，是“按照黑格尔来纠正马克思”^③。

从经典作家的论述中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绝不仅仅是“本体”或逻辑出发点的区别，而是在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关系上的根本颠倒。产生以上争论的原因，正是由于没能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以致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划分标准，认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的根本区别。

由于不能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一些人甚至主张用现当代西方哲学或者儒家哲学来“改造”马克思，甚至像列宁所批判的：“不是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是假装承认它，却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④。这对于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极其不利的。

2. 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

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根本利益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在实践中，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和发展，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基本精神的指引下，对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历史现实进行分析研究，解决现实中遇到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能保持自己的理论特色，实现原理的多元性与基本精神一元性的统一。

因此，我们在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发展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和时代条件，不断开拓党和人民事业前进的道路的同时，必须首先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并以此来规范执政党的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与执政党的实际行动统一起来。执政党全体党员不仅要认真学习经济、政治、文化、法律、科技、管理、历史、军事等方面的知识，更要把这方面的学习同加深领会和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来规范自己的具体实践，用自己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具体行动，来实践马克思主义。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实现好、维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② 同上，第477页。

③ 同上，第473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

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最广泛地动员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深入人心，才能获得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在实践中，一些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帜的党政领导干部却并不是这样做，他们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词句，停留在口头上，而不是贯彻到实践中，整天忙于搞形式、走过场，割裂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使如何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问题成了一个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3. 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普及的需要

搞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普及，必须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与基本原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理论，不断发展的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发展变化着的不仅仅是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时代条件，还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认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主张抛弃“永恒的原理”和“不变规律”。^①就是说，基本原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并进一步认清基本精神与基本原理的联系与区别，处理好二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所在。而马克思在分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时形成的一些基本原理，是在研究当时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有一些已经发生了变化，并不能硬搬过来，用于指导目前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就要求我们在基本精神的指导下，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本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绝不能满足于词句的创新和追求表达体系的完美，更不能把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形成的一些理论或原理硬搬到当今社会。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一元化与多元化的关系，使我们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把握。否则，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看成是永恒的，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在改革开放初期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剥削与非剥削的争论中，一些人就犯了这种错误。即使在目前的国内哲学界，也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弊端，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与普及中，仍然把“基本原理”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生搬硬套。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格格不入的，也很难回答当代西方哲学家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诘难，亟需予以纠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147页。

二、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原则与方法

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既不能脱离对马克思哲学著作的研读，也不能脱离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更不能局限于马克思所反对的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否则，不仅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反而会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的说来，应掌握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 坚持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地位

马克思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必须从解读马克思哲学文本开始。同时，还必须把马克思哲学放到其所在社会的具体社会环境来考察。同一语句，在不同的语境下会有不同的意义。我们今天理解马克思，也必须把马克思的文本放到其原始语境来考察，而不能用今天的社会现实来苛责它。恩格斯在1890年9月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在谈到唯物史观时指出：“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是根据第二手材料来进行研究”^①，指出仅仅强调“主要原则”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给其他产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因为，“只要问题一关系到描述某个历史时期，即关系到实际的应用，那情况就不同了”，责备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并由此造成了“惊人的混乱”^②。目前，国内外的一些学者，撇开马克思哲学原著和其所在社会的具体社会环境，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黑格尔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甚至是中国哲学来解读马克思哲学，是很难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

2. 坚持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一脉相承

马克思主义哲学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之后，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决俄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形成了列宁主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状况，经过艰苦的实践和探索，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动力，提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的实际和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

^② 同上，第698页。

代特征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系统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更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发展和深化。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不断进行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够不断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但是，发展离不开坚持，是坚持基础上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历经的各个发展阶段都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但同时又是一脉相承的，有着共同的发展主线，共同的基本精神。只有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并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进行深入的考察，找出贯穿于其中的主线，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它的基本精神，更好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3. 全面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认为，哲学是具有党性和阶级性的理论。所谓哲学的党性，是指哲学总是划分为不同的派别，其中主要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个基本派别；所谓哲学的阶级性，是指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总是用于一定阶级的观点体系，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哲学。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彻底的唯物主义，它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内在地、有机地统一起来，并贯彻到了社会历史领域，使哲学获得了科学的形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都基本上是正确的。

但由于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按照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四大块（唯物主义理论、辩证法理论、认识论学说、唯物史观理论）来安排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把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和历史观变成几个虽有联系但基本上是相互独立和并列的组成部分，从而在内容的结构上既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互割裂开来。根据这种安排，脱离辩证法的具体内容去论述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脱离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去论述辩证法范畴和规律，虽然能够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界线，但很难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不同的哲学形态，它是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高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并不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简单相加，用哲学上的“两个对子”，并不能反映它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这一理论特征。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的理论概括，必须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理论特征及其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否则，必然是南辕北辙，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

同时，根据以上原则，我们在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方法上，必须注意做到：在语言上，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尽可能地使用人民群众能够理解的大众化语言来进行表达，切忌生搬硬套现当代西方哲学的词句；在原著研读上，要坚持文本考据与语境的把握相结合，把握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持与发展上，要在认真研究现当代西方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评与借鉴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进行新的概括与总结，结合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现实，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理论概括

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参见拙文《形而上学批判》，《文史哲》1999年第6期）。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参见拙著《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第四章，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

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在认识事物阶段要从具体事物出发，坚持“具体—抽象—具体”的认识路线，还要求在整个的认识—实践过程中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实现“实践—认识—实践”或“实际—理论—实际”的发展过程，完成理论和现实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统一。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①——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局限于“纯粹思想的领域”^②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③哲学家必须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页。

2. 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①，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②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康德把……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③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④。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特征，可以概括为“人民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阶级性”的描述，显然是对“人民性”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片面描述。如果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并且认为是根本性的标志，“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掌握”，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了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世界性的哲学，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这不仅无法解释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肯定，而且也无法否定“资产阶级哲学”为自己阶级服务的不合理性。

3. 面向发展，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3页。

④ 同上，第215页。

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谁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四、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现实意义

1. 有利于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什么是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二者的判定标准是什么？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力图攻克的理论难题。之所以说它困难，并不在于没有答案，而是在于答案太多，却没有一个能够共同认可的答案。我们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多元化中保持统一性，使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对于防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教条化、贵族化和“纯哲学”化，特别是对于鉴别实践中的假马克思主义，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2.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奠定基础

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必须在精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不仅要防止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教条主义，更要坚决反对生搬硬套现当代西方哲学词句的教条主义。只有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才能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遇到的现实性与学术性、功利性与科学性、实践性与超验性、理论体系与基本精神等方面的关系，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3. 有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哲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是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不同的哲学形态，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哲学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对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把握其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区别，提供理论基石。使得我们不再局限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能够以全新的视觉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形态的高度回答现当代西方哲学对其进行的诘难，使其在同一切错误思潮的斗争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4. 有利于回答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诘难

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如杜林和海德格尔等，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坚持用黑格尔哲学来解释马克思哲学。而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美国几位著名的全球化专家，则不把马克思当作哲学家来看待，或者仅仅视为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如，约翰·卡西迪认为“马克思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学者”^①，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②，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根本不是一种哲学，它的自我定位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④，“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⑤。阿里夫·德里克认为：“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继续存在，马克思主义就还有意义，无论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学者。”^⑥等等。对于这两种诘难，我们只有在精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上，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区别，才能做出正确的回答。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①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② 同上，第29页。

③ 同上，第69页。

④ 同上，第70页。

⑤ 同上，第73页。

⑥ 同上，第216页。

体系和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二题议

鲁 鹏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过程中，以下两方面的问题是无法回避必须有所突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问题；联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着眼于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观点的深化拓展问题。每一个问题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联系在一起，因而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或突破都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向前推进一步，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正是我们当前的任务。

—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是一个人们关注已久，但现在还处于僵滞状态，尚未形成统一认识的问题，因而它也成为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创新首先要面对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在中国，集中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故而又常被称作教科书体系。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科书体系源自苏联，虽然在其具体内容方面有所改动，增加了一些中国化和时代性的话语，总体说来，它的理论框架、逻辑关系和思维范式，是由《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而来的苏联教科书的中国版。很长一段时期里，这一体系被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化身，甚至被直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理论模式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世界物质性统一性的逻辑基础 + 辩证法”。^① 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发现，传统教科书体系存在严重不足，主要是，（1）忽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

^① 这一模式包含丰富的内容，限于篇幅，并且也由于学术界对这些内容非常熟悉，在此不予展开。

地位和作用，不能从理论逻辑上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特别是旧唯物主义区别开来。(2)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两块”“四部分”的做法割裂了一个完整理论的内在联系，既违背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又不合马克思思想的逻辑。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下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当说，这是一个合理的诉求，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但在沿着这一思路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过程中，学者们遇到一些理论方面的认识路障。一是作为哲学不可或缺的内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二是是否应当以及如何将实践范畴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理论体系中，特别是贯彻到辩证法和自然观中？三是如何从人的世界的角度将自然、社会、思维统一起来，既能够坚持和体现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原则，又能够吸纳传统哲学的思想精华。在这些问题上学者们众说纷纭，分歧极大，难以统一。结果，传统体系虽然被普遍认为是合理的，但却依然存在；新的体系虽然已显雏形，但却远不能令人满意。不仅如此，自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一些学者还开始拒斥“体系建构”，或者与“体系建构”保持距离，将自己的重点转向对具体问题特别是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研究。

体系是理论系统化的标志，反映一个理论的完备程度和理论研究的水平。两种体系并存的局面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在当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却不能满足于这一现状，而应当由分散到统一，由模糊到澄明，由不完善到完善，把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目标之一。因此，拒斥“体系建构”或者与“体系建构”保持距离，一般来说是不当的。但对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拒斥，对与“体系建构”保持距离的做法，也要做具体分析，因为它们从另一种角度提供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有价值的意见。不可否认，的确有学者处于某种原因，否认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意义。例如，认为马克思彻底抛弃了任何“体系哲学”的构想，坚持采取一种能动地面向生活实践、面向未来的开放的思维方式，反对并力图超越任何封闭僵化的哲学，因而我们今天也不应当再去建构那种易于导致封闭僵化的“严密完整的体系”。但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之所以拒斥“体系建构”或者与“体系建构”保持距离，并不是因为他们压根反对体系，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就体系谈体系没有出路，只有在相关具体问题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建立体系。因此，他们其实并不拒斥体系建构，只是拒斥那种没有研究基础的体系建构；他们不是认为不应建构体系，而是认为建构体系的条件目前尚不具备。他们之所以转向具体问题的研究，正是为了奠定“体系建构”的基础，创造“体系建构”的条件。不消说，彻底拒斥“体系建构”的观点误读了马克思，是我们不能同意的；新体系应建立在对各相关问题深入研究基础上的观点无疑是合理的，应当成为建构马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过程中遵守的原则。为建立体系而建立体系，比没有体系更糟糕。

在体系建构问题上还有必要强调一点，这一点绝不是不重要的：新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当是一个开放系统。强调这一点表面看来着眼点在于新体系诞生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特性，其实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本身也有范导作用。这就是说，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我们就应当持守如下理念：它不是绝对真理的体系，不是裁判一切的尺度，不具有至高无上性和唯一性，它永远向未来敞开着，其理论本身即应当含有容纳未来的本性和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教科书体系存在局限并不可怕，每一时代人们的认识都有局限，这种局限性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认识。可怕的是，过去一段时间里，人们把它当作绝对真理的体系。绝对真理的体系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恰恰与“问题意识”联系在一起，因而，一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绝对化，也就封闭障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所以，今天我们在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就要做好后人从事诸如我们今天正在做着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类事情的逻辑准备，为他们的活动创造良好的理论条件。

二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与问题意识联系在一起，而问题意识不过是思维对实践或存在的反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归根结底植根于生活实践。生活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生长创新的土壤。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我们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另一方面我们也遭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无论成就的取得还是困难的出现，都从各自角度留下许多问题，要求我们给予理论反思或阐释，这些值得反思或阐释的问题许多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以下几个问题即是笔者有限能力所见诸多问题的一部分，对它们的理论反思有助于深化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

1. 生产力 - 生产关系问题

1953 ~ 1956 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进行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实践；1978 年开始的中国改革，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进行的变革生产关系的伟大实践。前者建立起“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后者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目的十分明确，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社会生产力；改革开放的目的也十分明确，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两种变革生产关系的活动有一个共同的或相似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之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极其落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同样落后，不仅如此，“文化大革命”在把“左”的一切推向极端以后，还使中国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但两种变革生产关系的活动导致的结果却迥然不同：前者不仅没有促进所欲达到的目标的实现，反而成为它的严重障碍；后者的结果众所周知，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并且后者正是通过变革前者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体制才有了今天这样的局面。由此提出三个问题：（1）为什么同是遵循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所进行的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却截然不同？（2）与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怎样形成的？或者说，怎样变革生产关系才最有可能适合生产力的发展？（3）中国改革不是因为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原有的生产关系已不能满足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因而需要变革，而是因为我们一直想使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却总不能达到目的，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不能不进行改革。那么，除了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存在发展外，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还有什么内在联系？生产关系是否也可以产生生产力？探讨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我们深化拓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认识，也有助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

2. 上层建筑问题

发展是人的自我创造。人的活动分为不同种类。在迄今为止的一切时代一切社会中，经济活动始终是社会运行的中轴；而人作为社会的人，社会作为有组织的存在或有组织的活动共同体，政府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经济活动把生产力问题凸显出来，政府的作用把上层建筑问题凸显出来，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表明，政府在生产力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对这种作用人们有不同看法甚或激烈的争论，但争论本身以及争论所涉及的正反两方面大量的事实已经使哲学的反思成为必要。（1）以往我们常从社会结构角度看待社会生产生活的各种要素，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看作一对范畴，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看作另一对范畴，这无疑是必要的合理的。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其他角度？例如，是否可以从实践论角度看待政府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关系？如果是，则观察视角的转变将会使我们对一些问题产生新的认识和看法。（2）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有什么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政府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影响经济发展？如果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已是一个事实，那么现在需要

考虑的是,这种作用是发展者(经济发展)本身具有的还是外在于它的?我们可否将政府作用定位于为经济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或者,借用马克思的话,将政府行为视为生产者从事自己活动的“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哲学界20世纪80年代初对此问题曾有过一些讨论,存在不同的观点和意见,^①今天有必要结合发展实践重新予以审视。(3)政府面临两项任务,既要促进经济发展,又要协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关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或上层建筑的旨趣何在?如果我们把经济发展简约为“效率”,把协调各种关系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简约为“公平”,那么显然,所谓政府或上层建筑的旨趣何在即是指,在现实中,在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当“真”与“善”或者说效率与公平不能统一,时有龃龉,致使人们不得不在诸多矛盾中选择一个主要矛盾或者在矛盾双方中选择一方为主要矛盾方面时,政府应当选择什么?是求“真”还是求“善”?从世界各国发展实践中,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政府总是先解决经济问题,再解决社会问题,有时为了某种经济的目的,政府容忍甚至直接采取“恶”的行动。但这样一种现象的存在是否可以否定政府的“求善”为旨趣?抑或是它从反面证明,对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说,特别是对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更应当强调以“求善”为旨趣?

3. 内外因关系问题

提出内外因关系问题,目的在于深化对它的认识。所以要深化对内外因关系的认识,基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一个重大实践问题,这就是精神文明建设或思想道德建设问题。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就把思想道德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颁发了一系列决定、意见、文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毫无疑问,这些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当看到,我们的努力距离我们的初衷、距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距离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于是不能不反思,为什么我们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付出那么大的努力,结果却不理想,某些行业、某些地方、某些方面的问题不仅继续存在,甚至还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向?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显然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与如下理念有关:思想道德问题属人的品质、修养、意识问题,亦即人的内在心性问题,内在心性问题的培养教育只能通过思想道德文化的培养教育来解决。所以,二十多年来,我们把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功夫用在宣传引导上,用在强化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上,用在思想道德教育上。而这一理念和做法的一个重要理论根据,就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① 黎生:《上层建筑归属问题》,载《哲学争论》(1980—1982年初),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思想道德问题确是人的内在心性问题，但内在心性问题产生的根源却不在思想道德问题本身，而在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马克思早就说过：“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 一个人腐败可以由其思想道德解释，一批人腐败，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腐败，甚至在同样的岗位、面对同样的问题、“前赴后继”地犯同样的错误，致使腐败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时，继续从思想道德方面予以解释就过于简单了，一定有比它更为深刻的原因，这个原因作为外因影响着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但这样一来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对于人来说，思想道德是内因，社会存在是外因，外因只有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观点仿佛存在冲突，我们应当怎么看？

4. 社会矛盾问题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已无需多说，它早已作为一个事实矗立在那里，受到世人的广泛赞誉。然而，我们不应陶醉于已取得的成就中，某种意义上，我们更应当关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分析它们，研究它们，在实践中解决它们。一则因为这些矛盾是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原有的一些深层矛盾尚未根本解决，新的矛盾又不断涌现出来，若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处理或解决，势必极大地影响和制约今后的发展。二则因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即是以往矛盾问题得以解决的结果，要抓住现在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实现新一轮发展目标，就得解决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有许多问题等待我们研究和探讨，以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着重研究和解决的：（1）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态是什么？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马克思所揭示的这一社会基本矛盾是一种“普照的光”，不仅适用于当代中国，而且适用于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中的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社会。因此，如果我们仅停留在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论述上，我们就只是在简单地重复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既没有在理论上增添新的内容，也无助于现实问题的解决；不仅如此，这种做法还会使原本充满活力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沦为空洞的抽象。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又与时俱进的正确做法，是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表现形态，发见其在当代社会中特殊性。如是，则不仅能为解决当前我们所面对的社会矛盾提供理论依据，理论本身也有可能在此过程中得以创新。其实，这也是马克思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2）对待矛盾的态度？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然人们在口头上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但在实践中却常常不能正确加以对待。一方面，改革开放伊始，“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另一方面，一些人又以矛盾是发展过程中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为理由，对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矛盾掉以轻心，认为矛盾随着发展的提升自然而然可以得到解决，却没有看到，发展的过程正是人克服困难、解决矛盾的努力过程、创造过程，从而放弃了自己应有的责任和义务。那么，对待矛盾的正确态度是什么？（3）解决矛盾的方式？一般说来，解决矛盾有四种方式。矛盾双方并存；矛盾双方中一方克服、“吃掉”另一方；矛盾双方“同归于尽”；矛盾双方在相互博弈过程中融合成一个新事物。不是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同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因此，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选择何种解决矛盾的方式？矛盾解决方式的选择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分析把握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问题。既然不是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同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具体地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矛盾，把握住它们不同于一般的特殊规定性，就是完全必要的，这个问题解决了，矛盾解决方式的选择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那么，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特殊规定性是什么？（4）矛盾解决方式的对象化形式是什么？如果我们选择了我们认为恰当的矛盾解决方式，比如“矛盾双方并存”或“矛盾双方在相互博弈过程中融合成一个新事物”，它的对象化形式是什么？人的活动是对象化活动，人的本质力量在对象化过程中以及借助于对象化的结果才能确证。当我们说“矛盾双方并存”或“矛盾双方在相互博弈过程中融合成一个新事物”是解决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的合理方式时，我们还停留在哲学一般的范围内。虽然哲学一般性认识的获得是必要的，但仅仅哲学一般性认识对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是不够的。因此，在获得哲学一般性认识的基础上，还应找到它们的对象化形式。笔者初步的看法是，“矛盾双方并存”或“矛盾双方在相互博弈过程中融合成一个新事物”的对象化形式是民主和法治。说到民主和法治，大家知道，它们不仅是政治范畴，而且是政治哲学范畴。自“民主”和“法治”诞生以来，人们对它们有许多认识成果和实践经验，汲取这些认识成果和实践经验中的精华，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理论融合在一起，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显然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还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相联系的问题，它们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强调的基本观点，现在需要结合新的实践新的发展做出前面的阐释，如人的本质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科学技术问题，改造世界的问题；或者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充分展开的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之后在长期发展实践中凝炼出的观点，如历史视野中的时间空间问题，交往问题，网络社会问题，等等，都是关系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从而值得深入研究的。

三

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内在地联系在一起。体系建立在观点的基础上，是观点的集合或观点按照某种逻辑关系的排列组合；观点体现、分有体系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与体系的立场、方法相一致。体系因为观点而富有内涵，观点因为体系而彰显意义。没有手臂的身体是残缺的，脱离身体的手臂不再是它自身。

有鉴于此，今天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应当将其牢牢建立在观点或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知道问题是什么、问题在哪里才谈得上创新，也才有必要创新；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乃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存在问题未必是件坏事，没有问题就没有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动力，自然也就没有发展和创新。只有进入到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创新才是一种现实的行动，才能结出实实在在的果实；就此而言，存在问题本身不等于发展和创新，发展和创新是问题的解决，问题的价值在于，它把自己凸显在研究者面前，从而创造了自我发展的前提。事实上，研究者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有了深入透彻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也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成这样一种观点：内容重于形式，观点先于体系。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的提出正是建立在以往问题研究的基础上，而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中遇到的困难也恰恰因为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难题，显然，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有新的突破，必须继续分析解决这些难题。

强调观点先于体系，不仅因为观点是体系的组成部分，还因为观点上的创新本身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一个方面。总结过去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研究的经验，今天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进行反思时，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加以新的认识、做出新的阐释时，首先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则、基本立场和方法贯彻到各个观点、各个问题的研究中，具体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的实践观贯彻到各个观点、各个问题的研究中。实践观的贯彻在这里有两重含义：其一，从当代发展实际出发，以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科技发展、社会发展为背景，以中国改革开放或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事求是地分析梳理，从中找出本质性的东西并给予理论上的升华。其二，研究的起点、思维的过程、研究所得到的理论成果须得符合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不从当代发展实际出发，有违实践的思维路线和实践

的思维方法，理论因此会失去生命的活水源头，自然也谈不上观点创新。不符合实践唯物主义的逻辑，得到的理论成果中就会像以往一样夹杂某些其他理论学派的思想成分，虽然其他理论学派的思想并非都是糟粕，也有精华和值得汲取的东西，因而在这个意义上把它们吸收到对当代发展的解释中是有价值的，也可以说是一种理论创新，但它们毕竟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故而还是应当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有所区别。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吸取人类历史上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但这种吸取是把它们作为“资源”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框架中，而不是以它们为逻辑框架，或者将另一种逻辑穿插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以，必须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不排斥其他理论的思想观点，只排斥其他理论的逻辑；而“排斥”不是说其他理论的逻辑没有价值、没有意义，只是说它们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只是排斥那种将它们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说法。其次，今天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创新时，要把握好认识的界限和阐释的分寸。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哲学反思当代发展和现实，有它独特的视角和方式，并因此产生其独特的社会功能。它可以用于观察说明任何问题，但不能以为任何问题都可以用它作出一览无余的解释。它可以给人们以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但不能期盼乃至强求它开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药方。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说明一切问题的期盼是不现实的。对于不太了解哲学的人们来说，有这种想法和期盼可以理解，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工作者则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否则，当人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解决、说明一切问题时，自己的努力就会走向反面——哲学无用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信任。因此，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当“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许多问题交由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自然科学等去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保留自己的领域。成为一切科学的科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不是好事，在自己的领域内活动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凸显出自己的价值。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论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问题

孟庆仁

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对这个问题学术界至今还缺乏系统的研究。社会革命是社会发 展一定阶段上的特有现象。马克思说过：“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是政治革命”。^① 这就是说，只要是阶级社会和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革命就是必然要发生的。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即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几个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革命所占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它所起的作用是无可替代、非常巨大的。社会革命又是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不同社会形态下的社会革命，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不同的特点。我们的任务，不是研究社会革命的具体的特点，而是找出其带有共性的东西。

一、社会革命的实质

社会发展过程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这个阶段，各个社会形态中的革命都有共同的实质、根源和规律，这是社会革命共同的特征。

纵观社会发展的这段历史，在它的各个关节点上，都发生过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社会革命。毛泽东曾对社会革命做过这样精彩的、激动人心的描绘：“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② 这里说的，实际上是革命阶级夺取政权的社会大革命。社会革命的内容，除去这种社会大革命以外，还有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和进步阶级的社会改革。就是说，社会革命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分这样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根本变化，即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质的飞跃；第二个层次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的群众革命行动；第三个层次是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重大改革。

社会革命这三个不同的层次，其实质都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变革，只是变革的程度不同而已。第一个层次是先进阶级推翻、取代反动统治阶级，进步的生产关系战胜落后的生产关系，新的社会经济形态代替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实现社会形态的飞跃。这个层次的典型形态是社会大革命。像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人民大革命，都是这样的社会革命。第二个层次是人民群众反对统治阶级和阻碍社会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的革命斗争。这种革命斗争虽然不是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质变，但它导致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发生重大改变，推动社会迅速地向前发展。这个层次的社会革命，在社会发展中是相当广泛的。像奴隶社会的奴隶起义，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革命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运动，等等。第三个层次不是指所有的社会改革，只是指这样一种改革，即在一种社会形态的初期，取得政治统治地位的进步的阶级或阶层，为了维护、推行和发展进步的政治经济制度，进一步扫除和肃清旧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进行的社会改革。这也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和处于没落时期的统治阶级为了保持它的反对统治地位所进行的改良，有本质的区别。

社会革命的这三个层次，通常是在不同的条件下分别进行的，但在社会大革命时期，它们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每次社会大革命，都是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开始的；大革命基本胜利之后，总要有各种社会改革作为补充，以完成大革命没有彻底完成的任务；而不论是社会大革命还是社会改革，都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为基础，否则都不会取得胜利。

在社会革命的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认为改良和改革、革命是“同一系列”的概念。这是一种错误观念。它片面地理解了列宁关于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的观点，片面强调改良同革命、改革一样是人类社会前进运动的形式，片面强调在革命胜利前，改良是革命的前提和准备，是革命的预兆和先声，在革命胜利后，改良往往是革命的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是继续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的重要形式。这种错误观念混淆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改良的界限。一种是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改良，即列宁所说的“改良是统治阶级的让步”，另一种是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改良。这两种改良的阶级主体不同，目的也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二、社会革命的根源

社会革命的共同特点，还在于任何社会革命都有统一的根源。这种根源，是社会基本矛盾，主要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直接的则是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的创始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① 这里的“交往形式”，就是后来的生产关系范畴。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革命的根源。后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革命的根源又作了如下表述：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② 显然，这两处表述的思想是有差异的。第一种表述泛指一切社会革命的根源，第二种表述实际上是指社会革命的第一个层次即社会大革命的根源。生产关系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对抗发展到了顶点。生产力要继续发展，必须完全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而社会革命的其他层次，不一定等到这种时候，即不一定等到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的桎梏，而只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尖锐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有可能发生。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直接表现为阶级矛盾，主要地通过阶级斗争来解决。当生产力的发展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尖锐化到一定的程度，生产力发展的代表先进阶级与生产力的主体广大劳动群众，和落后的生产关系的体现者反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必然向尖锐化发展。社会革命直接地是阶级矛盾激化和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结果。社会革命的根源，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它在哪一个层次上发生，直接地决定于阶级矛盾激化的程度；社会革命进行得是否彻底，也决定于革命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得是否彻底。所以，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社会革命的直接根源。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集中表现为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先进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化。旧的上层建筑为了保护旧的经济基础，既破坏新的生产关系的形成，也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关于这一点，最突出的表现是欧洲中世纪后期国家和宗教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科学的态度。所以，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和旧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就成为社会革命的根源的集中表现。而当社会革命发生时，革命的矛头往往直接指向旧的上层建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我们说社会革命的根源是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并不意味着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内部矛盾。对于某一个国家来说，外部矛盾及其向内部矛盾的转化，也是社会革命的重要根源。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谈到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一定非要等到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某一国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这个国家才发生社会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①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劳动群众在胜利了的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可以发生革命，建立苏维埃制度。

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某一个国家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社会革命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如果古罗马奴隶制被起源于日耳曼军事制度的封建主义取代可以算做社会革命的话，这可能是最早的一例。英国征服印度，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带入印度并在那里发展起来，被马克思誉为“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②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一个主要根源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产生的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

如果说，外部矛盾成为某个国家社会革命的重要根源，在以前还是特殊现象，那么，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条件下，它成为各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则成了普遍规律。所以，树立外部矛盾及其向内部矛盾的转化是社会革命的重要根源的思想，是特别有意义的。

三、社会革命的基本规律

社会革命的共同特点，还在于任何社会革命都有相同的规律，即社会革命的基本规律。社会革命是阶级斗争的直接结果，所以从本质上讲，阶级斗争的规律也就是社会革命的规律。但社会革命又不直接等同于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的规律在社会革命中又有其特殊的表现。社会革命的基本规律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条：

第一，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这是由社会革命的实质和任务所决定的。社会革命的实质是改变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其任务是摧毁旧的腐朽的上层建筑，建立新的进步的上层建筑，以保护和促进新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任何一个革命的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116页。

^② 同上，第765页。

级，只有首先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任务，实现社会革命的实质。社会革命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基本的是社会形态由旧向新的过渡。只有解决了国家政权问题，才能说最终完成了这个过渡，因此，国家政权问题又是革命成功的标志。

作为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国家政权问题，又包括紧密相连的这样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社会革命归根到底是两个敌对阶级的斗争。当革命阶级获得政权，反动统治阶级丧失政权以后，它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总要利用各方面的条件夺回自己丢失了的政权。掌握了政权的新的统治阶级，也总是要进行巩固已经到手的政权的斗争。这种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根本问题也是国家政权问题，总是围绕国家政权问题反复进行，有时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最后得到解决。

第二，革命的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曾经做过精辟的阐述：“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①对于革命的这条规律，列宁也有过明确的论述，指出武装起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方式。只不过列宁讲的是武装斗争的一种形式——起义，而毛泽东则作出了概括程度更高、更系统的论述。为什么武装夺取政权是社会革命的最高形式呢？这是由革命阶级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基本情况所决定的。和革命阶级比较起来，反对统治阶级总是少数，它只有靠武装，统治和压迫革命阶级、广大劳动群众。当革命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它总是首先把武装镇压提上日程。所以，革命阶级是被迫地必须进行武装斗争，并且只有用武装斗争才能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夺取国家政权。

第三，革命的“荡板”规律。

上节所述阶级斗争的“荡板”规律，对社会革命也是完全适用的。恩格斯所说阶级斗争中的两种“动荡”，即革命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斗争中的动荡，和革命势力内部不同派别间的动荡，一是主要指革命斗争时期的动荡，二是围绕着国家政权进行的。在恩格斯看来，这条规律是任何社会革命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要遵循的。

社会革命的这种规律性，是由社会发展的合力动力系统所决定的。合力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条件的交互作用及其所产生的许多不同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形成的。这个合力直接决定着社会革命的最终结果。而在社会革命的过程中，较温和的一派是各种不同的意志都比较能够接受的，往往容易充当这个合力的代表。看来，人类社会在进入自由王国之前，社会变革都要遵循这条规律。以往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社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会革命理论的研究和阐发，都忽略了这条规律。这是一条往往不被革命者所欢迎，但又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四、社会革命的类型

社会革命的共同特征，通过社会革命的不同特点表现出来。社会革命的实质首先通过革命的不同类型表现出来。

社会革命的实质是变革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种革命又分为两大类型。一个类型是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另一个类型是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革命。这两种革命类型既有质的区别，又有内在的联系。第一种革命类型虽然也有广大群众的参加，但本质上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的革命，第二种革命类型是多数人参加、为了多数人的利益的革命；第一种革命是新的剥削阶级有意识地用体现本阶级利益的剥削制度去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第二种革命一般地是反对阶级剥削的；第一种革命是剥削阶级充当革命的领导力量，第二种革命是被剥削阶级自己掌握领导权；第一种革命是把国家政权从一个剥削阶级的手中转移到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手中，第二种革命是要推翻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第一种革命的结局往往是新旧剥削阶级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以后又结合在一起，第二种革命的结局一般地说被剥削阶级不会和剥削阶级妥协和结合。

这两种革命类型的内在联系是：第一种革命总是有不同规模的被剥削劳动群众参加，第二种革命也总是有剥削阶级的个别阶层参加；第一种革命的领导阶层往往要吸收被剥削阶级的个别人物参加，第二种革命的领导阶层也要吸收剥削阶级的个别人物参加；第一种革命胜利后被剥削阶级中的个别人物甚至个别阶层往往能够挤入新的剥削阶级之中，第二种革命胜利后领导阶层中的某些人甚至整个阶层可能蜕化为剥削和压迫劳动群众的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第二种革命甚至可以转化成第一种革命。

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别，每种革命类型又有几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革命起码可以包括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奴隶主革命以及封建制度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关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有的哲学教科书认为这是在生产力发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产生的基础之上自发的进行的，奴隶主和奴隶阶级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没有经过激烈的斗争和社会革命。这种看法只有片面的道理。诚然，私有制代替公有制是自发地进行的，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也是自发地形成的。但是，奴隶制的社会形态，都是经过了奴隶主革命才最后确立起来的。这一革命的典型事例是公元前6世纪初古希腊的梭伦改革。恩格斯认为它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

的”“政治革命”。^① 所以，不论从哪个意义上讲，这都是社会革命。在奴隶社会这样的革命发生过多次。这种革命，形式上是奴隶主制度代替氏族制度的革命，实质上这时的氏族制度，已经变成了腐朽的氏族贵族剥削制度。所以，它实质上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私有制推翻另一种腐朽的私有制度，而不是私有制代替公有制的革命。

西欧封建制度代替奴隶主占有制的革命，是第一种革命类型的又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有着显明的特点。在奴隶社会中，强大的奴隶起义都没有推翻奴隶占有制，而是蛮族部落从外部进攻，在奴隶社会内部下层居民的支持下，摧毁奴隶占有制，建立封建制度。

资产阶级革命是第一种革命类型的最典型的形式。其特点是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要求推翻封建制度的上层建筑，建立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以适应和保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一般地说是以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结束。

第二种革命类型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革命，另一种是无产阶级革命。在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革命中，因为这些阶级都不是先进生产关系的代表，所以最后都失败了，或者成为新的剥削阶级进行的社会革命的基础。但是，它们都推动了旧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无产阶级革命是第二种革命类型的典型形式。无产阶级不但通过革命夺取政权，推翻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且要消灭一切私有制，最终消灭阶级，引导人类社会从一个大社会形态——阶级社会，过渡到另一个大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

五、社会革命的内容和方式

社会革命的内容和方式也都表现着革命的不同特点。社会革命的两种类别的典型形式，革命的内容和方式最为丰富多样。

社会革命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经济革命、政治革命、思想文化革命。两种革命类型的典型形式，都完全包括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他非典型形式，不一定完全包括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就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者的关系来说，经济是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文化是经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思想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它们的成功，又是经济更迅速地发展的前提。

在革命过程中，三者的排列顺序是思想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任何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命都必须有广大群众参加。为了发动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斗争，就应当使群众意识到推翻旧制度的必要性。因此，在革命时期，反映已经成熟的历史任务的新的革命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思想帮助动员群众，帮助群众组织成一支革命大军，去打倒反动的统治阶级。因此，在发生政治变革之前，通常先发生思想变革，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领导者能不能制定出一个完整系统的革命思想，是一个社会革命是否成熟的表现。思想革命之后，是政治革命，即革命的领导阶级带领广大革命群众去推翻旧的国家政权，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扫清道路。在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以后，在新的国家政权的保护、支持和推动下，经济革命才能够大规模地、彻底地开展起来。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在旧社会内自发地形成，由此所决定，无产阶级只有在完成政治革命之后，才能开展经济革命，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当然，在经济革命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国家，经济革命完成之后，又要求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的顺利进行。

由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当人类社会发展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经济革命又发生了分化。即不仅仅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而且产生了包括技术革命在内的产业革命。由于产业革命的出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以加速度步伐向前迈进。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能够快速提高的奥秘。在现代，技术革命又从产业革命中分离出来，并引起了科学革命，从而使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又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层级。如果说由产业革命引起的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为低级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物质基础，那么，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引起的以智能机器为特征的产业革命的发展，必将为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

哲学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不把技术革命看作社会革命的内容。这种观点是孤立地看问题的突出表现。唯物史观把社会革命看作一个不断发展和丰富的过程，看作一个时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革命的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革命作为产业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内容。在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并存的时代，现代技术革命也必然是新的高级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

和社会革命的内容比较起来，革命的方式更是丰富多彩。有暴力方式，有和平方式，还有暴力与和平相结合的方式；有自下而上的，有自上而下的，还有上下结合的；有秘密的、公开的，非法的、合法的，等等。在这些革命方式中，基本方式是暴力方式与和平方式两种，而社会革命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要触及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它首先会遇到反动统治阶级的暴力镇压和反抗，因此也必须用暴力手段打破反动统治阶级的镇压和反抗。唯物史观创始人特别强调暴力革命的重要

性，认为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在欧洲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杠杆。暴力方式是社会革命的最基本的方式，这是被革命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

但是，唯物史观并没有排除社会革命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可能性。不但一个剥削阶级反对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也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进行。马克思认为，在无产者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将用和平方式去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恩格斯认为，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在临逝世以前不久，他总结了工人阶级利用普选权和议会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提出了利用和平斗争方式启发、训练、教育、组织工人群众，长期积蓄力量，在革命时机成熟的时候进行最后决战的主张。列宁也提出过，在武装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的条件下，整个革命有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当然，这些都是有条件的，都以阶级力量对比和政治条件是否成熟为转移，并且一般地说要以无产阶级手中掌握着武装为后盾。虽然直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出现过无产阶级和平取得政权的先例，但在理论上也不能完全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革命的特点还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是唯物史观应该多加注意、加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今年是二战胜利 60 周年，全世界都在隆重纪念这一胜利。二战胜利给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了希望，创造了条件。但是，从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的局部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发展都遇到了重重阻力，步履蹒跚。当今世界，仍然处在阶级社会阶段，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和平与发展这两个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原因何在？根本原因仍然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占据主导地位，其现实表现是帝国主义和霸权政治统治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进步——包括和平与发展，仍然要通过社会革命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因此，研究社会革命理论仍然是必要的，有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2.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

郭淑英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新的思想和战略任务。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研讨班上的讲话，为我们在新世纪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堪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崭新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同时又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本文试从哲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

一、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思想

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始终是全人类同共追求的理想。“和谐”不仅仅是一种境界，从哲学角度看，它还是一个哲学范畴，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古代诸多的哲学家，对和谐社会曾有过许多论述。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这些哲学思想却为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许多朴素的哲学思想的营养。

1. 中国古代哲学中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哲学家对于人与自然和谐重要性的认识，早在 2000 多年前就已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庄子在《天道》这篇著作中讲，“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认为人只有明白了自然界规律，才能把握根本，体现人对自然的尊重，成为与自然和谐的人。唯有如此，才能“均调天下”，达到与人的和谐，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的社会。

在道家代表人物老子的著作中，对和谐社会的论述更为生动、形象。《老子·道德经》《天地》篇，为人们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老百姓生活幸福、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的田园风光：“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虽有甲兵，无所陈之。”虽然在老子思想中“无为

而治”居于主导地位，但是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预测到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将会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一认识非常深刻，颇具远见。可见，我们老祖宗的环境保护意识要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出 2000 多年。

上述哲学思想对于今天我们深刻认识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2. 中国古代哲学中人与人和谐的思想

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关人与人之间和谐的思想，比较多地反映在儒家的著作中。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和为贵”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人几千年所信奉的人生哲学。在《论语·雍也》中，孔子提出了通过“中庸”的处世哲学以达到“和谐”的境界，并把这一境界作为自己终生所追求的目标。孔子说：“中庸为德，……民鲜久矣。”在《中庸》中，孔子对和谐思想的论述更为具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孔子看来，“和”是实现目标最好的途径，实现人际间的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备条件。道家老子讲的“不争之德”，也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人教导晚辈的古训。这些思想现在看来，虽然有悖于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原则，但这些以“和为贵”的思想，对于调解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提供重要的思想借鉴。

3. 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实现不同阶层利益人群和谐的思想

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儒家的和谐观念中，集中表现为儒家倡导用“礼乐”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论语·颜渊》中，孔子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概括政治、社会的和谐，主张在等级社会里，人们只有各安其位，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在论述不同利益群体的和谐时，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在这里，孔子强调社会利益的分配，要坚持公正、公平，并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儒家的这些哲学思想，在今天看来，虽然缺少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积极思想理念，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这在当时，在规范社会秩序、调整人们心理平衡上起到了某些积极的作用。以至于这些思想，至今还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之中，也能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市经济条件下，构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解决某些不合协问题提供有参考价值的思想火花。

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认识和谐社会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实践和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体系。她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表达了共产党人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并依据

这一科学世界观提出了一整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和途径。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都提倡“社会和谐”。这是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比较早地提到“和谐社会”的概念。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还进一步地论述了“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既辩证地论述了社会是由人组成的；又透彻地阐明人的社会属性。进而论证了人际关系和谐了，社会才可能实现和谐的道理。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看，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不仅要重视社会诸多矛盾的斗争性，也要十分关注矛盾的同一性。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斗争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斗争，只有把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相结合才能推动事物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和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上任何制度下的社会一样，都充满了社会矛盾。在这些诸多矛盾中，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使矛盾着方面不断实现既对、立又同一，并共居一个统一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只有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既对立又统一，才能不断地最大程度地解放生产力，最大程度地促进经济的腾飞和科学技术的跨越发展，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与全面进步。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是极为正确的。实践证明，只有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才能最广泛、最深入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他们为建设富强、民主和文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为建设小康社会献计献策。

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特征之一，只有用不断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也是不断地解决社会矛盾，缓解社会矛盾，从而使诸多社会矛盾实现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某一和谐目标实现后，在一个相对和谐阶段过后，还会出现新的社会矛盾，还要不断地解决新的问题，再努力实现新的高层次的对立统一，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层次。从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得人才者得“天下”，要充分重视和发挥全社会各阶层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要尊重人权，尊重人才，关爱弱势群体。努力创造社会公正、公平，诚实守

信，主持正义，健全法制，保持社会稳定。使社会在稳定与和谐中不断发展。

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思想的重大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重要的发展和完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体现。

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她就以与世界上其他哲学流派所无法比拟的，在实践基础上的彻底的革命性、科学性、批判性、斗争性而著称于世。马克思主义是以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她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拥戴，同时也遭到一切腐朽的、没落的剥削阶级所咒骂并为之而恐惧。过去，有些人只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的革命性和斗争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她科学、完整、无片面性的一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具有彻底的革命性和斗争性，才会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革命的胜利及世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才会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时，马克思主义又具有科学性、完整性和无片面性理论，她才触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武器。

列宁再三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在重视革命性、斗争性的同时，也高度重视革命的政策性和策略性，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为了全局和整体的胜利，在特定的条件下，也采取退让和妥协。在对待布列斯特和约及“左派幼稚病”的态度上；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两次“国共合作”；目前为反对“台独”，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上，对中日关系问题的妥善处理，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伟大胸襟和以全国人民利益为重的豪迈气魄及高超的战略眼光和斗争艺术。

今天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全面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党中央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分地体现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是代表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斗争性并不相悖。当年，共产党人打破旧世界的目的就是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建设和发展一个美好新世界的的一个重要阶段。

现在，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要随之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不仅仅适用于革命战争年代，同样，她也适用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坚持与时俱进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中国医科大学社科部）

人的全面发展与构建和谐社会

杨春花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充满创造活动的社会，是全体人民各得其所和利益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社会，其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是一种辩证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广阔的社会历史舞台，在一个畸形的充满矛盾的社会里人不可能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标志。人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社会关系的价值体现者，人不能全面发展的社会一定不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基础、一切社会关系皆和谐的社会。

—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最终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①。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把自然和社会长期所赋予人的一切潜能都充分地全面地展示出来，就是每个社会成员全部力量和才能的全面展示，即人的本质和人性的全面生成、丰富和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丰富的内涵，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的实践活动和能力的全面发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本质就是自由的自觉的实践。实践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方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直观和确证。所以，人的全面发展也应包括人的实践活动的全面发展。实践活动的全面发展表现为活动形式和内容的极大丰富完整。人不再受狭隘的社会分工的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3页。

好和特长从事各种实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人的各种能力得以发挥和提高，特别是人的创造能力得以展现和提高，人的情感得以尽情的释放和真实的表达。

其次，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和社会交往的普遍性。社会关系是人的群体本质。人不是抽象的孤立的人，而是处于社会关系中具体的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格的健全、能力的提高、视野的开阔、思想的交流等，都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就必须有社会交往的普遍性和社会关系的全面丰富，个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达到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①

最后，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的全面发展集中表现为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人的能力和精神境界的综合的外在表现，是一个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基本品质，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个人身上的统一。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具体表现为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各种素质之间的综合协调发展。

二

目前，党把构建和谐社会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体现了我们党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体现了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和谐社会是一个全面系统的目标：既包括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由此可见，和谐社会的最本质的内容就是“人的和谐发展”，即“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说人的全面发展是和谐社会的最终目标。因此，我们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但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还面临着许多社会问题，如生产力水平不高，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政治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垃圾文化与人的发展不相符合等等，这些都是构建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绊脚石，同时也是二者的现实基础，所以，这就需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努力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不仅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也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条件。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同样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我国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基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95页、第515页。

问题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依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力发展达到较高的水平,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才能在此基础上构建和谐社会、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离开物质基础,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就成为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然而,我们不能以牺牲自然换取一时的发展,不能过度地向自然索取,不能人为地使自然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集约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第二,健全政治法律制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真正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社会环境。制度性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当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时就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反之则阻碍其发展。因此,作为上层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法律制度对于经济基础也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反作用,从而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良好的政治制度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进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反之则束缚人的个性,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而我国现阶段政治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市场经济不够规范,腐败现象屡屡出现,社会公平遭人质疑,特别是教育的不公平引起人们的极大不满,加上社会转型期贫富差距有增无减,导致人民内部矛盾复杂化,这些因素阻碍着构建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积极稳妥地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坚决反对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其次,健全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及时恰当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合理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

第三,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人的全面发展不仅需要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和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还需要精神文明来塑造完善人格。通过道德建设、素质教育、心里调节等来提高人的素质,推进

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清除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思想，营造一种平等、活跃，具有创造性的和谐发展的文化氛围，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集体主义精神和历史责任感。要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调节人的心理，提高人的素质，避免个体与社会的冲突，避免社会对个体的压抑，实现人的真正的全面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都是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过程，只要我们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现阶段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找到正确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要我们对构建和谐社会、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充满信心，牢记构建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自觉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努力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构建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 吴向东：《对人的全面内涵的解释》，《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
2. 朱丽霞、辛波：《建设小康社会与人的全面发展》，《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4年第4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马克思对西方近代人权理论的扬弃

杨巧蓉

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关于人权的观点多种多样，但基本上可归结为两种：一种是立足于西方自然权利学说的西方资产阶级人权观，一种是由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人权观。探究这两种人权观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如何看待人的本质属性以及由此生发的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关系、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应然权利与实然权利的关系等问题上。从本质上看，人权对于马克思而言，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物，是一种不断发展中的权利，是一种有待消解的历史性权利，他的社会理想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非“人权理想国”。人权由于受到一个国家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任何国家的人权都是具体的，有其鲜明的阶级性，而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由此出发，马克思以科学的唯物史观深刻地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以“自然权利”为基础的人权观，从而揭露了西方人权观的虚伪性和阶级本质。那么，西方人权观是否就因此而毫无价值呢？当然不是，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家都曾对以“自然权利”学说为要义的西方人权观的历史进步意义给予了肯定。

一、西方近代人权理论的演进及其本质

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自然科学兴起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神学、神权的地盘逐渐缩小，人的地位被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人的权利取得了相对独立的解释，渊源于古代自然法学派的西方自然权利学说迅速发展起来，涌现出了诸如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康德等许多著名的哲学家。这些哲学家都持一种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内容的人权观，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一些主张被运用到了实践中，促进了近代资产阶级的革命。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统治地位的普遍确立，以自然权利为主旨的西方人权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并在西方世界中造成了一种长久的影响力。

荷兰法学家雨果·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中首次明确使用了“自然权利”这一概念。他把“自然权利”和“自然法”的概念等量齐观，把理性作为自

然权利的源泉，对“自然权利”进行了阐发。由于雨果·格劳秀斯认为理性是神的创造物，因而在他那里自然权利实际上源于上帝。但又由于他肯定理性高于一切，即使神也要服从理性的命令，因而在他的思想中实际上包含着“人权是不变的”这样一种意蕴。总之，在雨果·格劳秀斯那里，西方近代人权思想还是不全面的，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

托马斯·霍布斯基本上确立了近代自然权利人权观的理论范式，即以人性假说和人生而自由平等（身心两方面的能力）为理论逻辑前提，进而描绘出一幅自然人生活的“自然状态”和这种状态下的人的权利。认为由于“自然状态”对人自然权利实现的限制，为了保护人的根本的自然权利，人们便甘愿放弃（交出）自然权利的一大部分而进入国家之中，在国家状态中人们失去一部分自然权利又获得了另一些新的权利保障。霍布斯指出，人性自然是“恶”的，自然人性的最根本、决定一切的特性就在于自我保全的利己动机，这种动机是解释人整个意志活动简单和自明的法则。霍布斯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人天生就具有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说法以及人天生有高贵和低贱的等级区分，他认定利己的人本真的状态是个体的存在，利己的每一个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基于能力上的平等，“竞争、猜疑、荣誉”是自然人陷入战争状态的三大原因。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有一份平等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有一份享用、占有一切物品的权利。在霍布斯看来，自然权利“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①而“自由这一语词，按照其确切的意义说来，就是外界障碍不存在的状态”，就是“人们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②由此可见，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完全从一种个人意志出发，以每个人享有保全自己生命自由的天性为行动的唯一准则。霍布斯对个人意志、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彰显，使他与西方古典政治哲学中的人权传统——集体主义——决裂了。在国家状态下，霍布斯认为除了“自然权利”中最基本的一项，即人们对自己性命的安全权之外，“臣民的自由只有在主权者未对其行为加以规定的事物中才存在，如买卖或其他契约行为的自由，选择自己的住所、饮食、生业，以及按自己认为适宜的方式教育子女的自由等等”。^③因为在霍布斯看来，畏惧与自由是相容的，臣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只有以对君主法律的服从为大前提，他的性命安全才有保障。

① [英] 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97 页。

② 同上，第 166 页。

③ 同上，第 169 页。

洛克是继霍布斯之后全面阐发自然权利人权观的第一人。像霍布斯一样，他主张在法律产生之前人类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中，但他否认人本性“恶”说，而主张人性本“善”说。自然人受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法支配，因此“自然状态”并不是一种放任状态。洛克还将“自由”与“自律”融为一体，把自由理解为人们运用理性的“自律”能力，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行为上的随心所欲，自由也并不一定造成祸乱。洛克扩大了自然法规定的人的自然权利的内容，认为平等、自由、生命、保护、惩罚和财产权是人的“既不能变更，更无从否认”的自然权利。在基本的自然权利中，洛克极力强调人们对于财产的私有权利，他认为是人的劳动确认了人对土地以及其他物品的私有权。

关于国家状态下人的权利，洛克的政治主张也不同于霍布斯。他认为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和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依循这一思路，洛克主张建立一种分权制的政府，他想通过分权来保障人权，认为通过由不同的权力机关来担负不同的职能，就可以从不同方面来实现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

卢梭和洛克一样，也不赞同霍布斯的人性“恶”论，但他也不接受洛克的人性“善”说。他认为，自然的人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阻止他们作恶的，不是智慧的发展，也非法律的约束，而是情感的平静和对邪恶的无知。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特质就在于人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正是这种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使人具有向“善”和“恶”的发展的可能。卢梭虽然没有接受霍布斯的人性“恶”论，但他却接受了霍布斯理论的前提：人天生不具有社会性，并且他也主张一种天赋人权观，认为“每个人对于一切东西都具有一种天赋的权利”，自由乃是人性的产物，是人的最高的标志，平等为自然人不言自明的特征。在这里，卢梭所说的人性是指人的自爱心。卢梭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们具有自爱心和怜悯心这两种天赋感情，也就是人性，那时还缺乏理性。自由和平等源于人的自爱心。到了社会状态，理性代替了本能的人性，成为权利的基础。卢梭有一句名言：“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①这句话正是对人类进入社会状态后悲惨处境的描述。他指出，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由于人类技巧与智慧的进步以及私有制的产生，就出现了社会的不平等、奴役和贫困。为了使人们重新获得平等和自由，卢梭提出，通过“社会契约”建立行使“公意”的政府，由人民统一制定法律来确认和保护人的各种民主权利。这里，卢梭明确提出并发挥了人民主权的学说。他认为，立法权力是属于人民的，而且只能属于人民，政府只是主权者也就是人民根据法律建立的机构和主权者的

^① [法] 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页。

执行人。人民有权推翻违背人民目的的暴君和政府。这说明，人民对暴君具有革命权。

潘恩是卢梭之后，对天赋人权思想作了进一步论述的美国启蒙思想家。他在《人权论》一书中，热情地赞颂了法国大革命，系统地阐述了天赋人权的思想。他指出，从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着人权，人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具有权利，这种权利是由造物主赋予人类的；即使政府的法律，也不得不沿用人的意志性或平等的原则，在社会中，人权既不可分割或转让，也不能被消灭。潘恩还进一步阐述了天赋权利与公民权利的关系，认为天赋权利是公民权利的基础，二者具有不同的性质，天赋权利来自上帝人人享有，而公民权利要靠国家法律的保障并非人人具有。

19世纪以后，西方人权理论中出现了一种实证主义法学派。此派不同意自然权利论者的自然法、自然状态的假设，从而否认权利的先验来源，认为人权是有法律规定的。例如，其代表人物边沁指出：“权利是法律的孩子，从真实的法律中产生真实的权利，从想象的法律或‘自然法’中产生想象的权力……自然权利只不过是一句蠢话，自然和绝对的权利乃是修辞上的胡闹。”^①可见，实证主义法学派虽然承认法律对权利的保障作用具有一定合理性，但他们往往把“应然”与“实然”的权利截然分开，排除了人权中的应然成分，从而否定了未被纳入法律中的社会其他权利形态。而且他们所谓的“实然”权利，仅仅是国家法律所确认的行为自由。而在私有制下，法律是资产阶级的王牌，法律所确认的也是资产阶级的特权，是资产阶级对私有财产的合法占有权。

综上所述，近代西方人权理论是以自然权利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它宣称人的权利是“天赋的”，是不可剥夺的。这种天赋人权论把人权从神权的依附地位中解放出来，给资产阶级革命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量，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然而，当这样的理论最终被运用到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以后，它又演变成了一种以抽象的人性论和权利形式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成为处于被统治阶级人们求取解放的沉重枷锁，因为它披着人人自由、平等的漂亮外衣。

二、马克思对西方近代人权理论的扬弃

马克思的人权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和借鉴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权思想的基础上产生和创立的。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考察人权问题，对资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权思想和人权理论进行了详尽深入的研究，并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形

^①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20卷，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714页。

成了自己独特的科学的人权理论。

（一）马克思的人权理论

马克思的人权理论诞生于 19 世纪 40 年代，它决非“横空出世”之作。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西方近代人权思想的批判继承和超越。

马克思的人权思想，主要有两大来源，即西方近代英法人权理论和德国唯心主义人权学说。前者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主要代表，他们共同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早期权利（自然权利学说）理论的系统表述，其思想成果在《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后者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他们把近代自然权利人权观提升为以自由为核心和最高原则的法权哲学。其中黑格尔对个人主义权利观的批判，给马克思以极大的影响，可以说，马克思对西方（资产阶级）权利观的批判正是沿着黑格尔开辟的道路前进的。马克思曾援引黑格尔的话：“‘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批判’关于人权是不可能说出什么比黑格尔更有批判性的言论的。”^①

马克思的人权理论有一个不断发展成熟、完善的过程。马克思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关于人权问题的看法，是在《莱茵报》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的人权理论刚刚起步，他对自由权利的看法还没有能够超出启蒙时代以来的意识形态的轨迹，主要还是对近代人权思想的一种继承。此时期的马克思受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影响，强调超阶段的理性国家及其法律制度在保障人的自由上的主导作用，认为，理想的国家应建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之上，在国家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伦理的、政治的自由，而法律则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人权的重要内容“自由”作了反复的颂扬，把自由看作是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 1844 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中马克思这样写道：德国惟一的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

在 1845 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的思想有了新的进展。他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 马克思的这一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明确指明了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并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在此基础之上，马克思认为，依照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很自然地推导出人权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更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4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56 页。

是上帝赐予的。人权是在社会发展中产生的需要和愿望，是人们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包括各种斗争），逐步被法律肯定的或公众认可的权利。人权的产生与法律的产生大体上是同步的，只是“人们往往忘记他们的法权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了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①

《德法年鉴》时期是马克思人权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对自己以前曾经相信的“天赋人权”进行了批判。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出生只是赋予人以个人的存在，首先只是赋予他以生命，使他成为自然的个人；而国家的规定，如立法权等等，则是社会产物，是社会的产儿，而不是自然的个人的产物，正因为这样，所以个人的出生和作为特定的社会地位、特定的社会职能等等的个体化的个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同一，直接的吻合，就是一件怪事，一个奇迹。”^② 在这里，马克思显然已经否定了他先前所持的“自由是人所固有的东西”的观点，开始批判、否定“天赋人权”论。在马克思看来，人权不是“抽象的”、“超阶级的”、“无国界的”，而是具体的、有阶级性的、有社会性的和有国界的。人生活 在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人权作为一个社会范畴，也必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阶级社会中，没有所谓超阶级的人，也就不可能有所谓超阶级的人权存在，人权在阶级社会中必然只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权利，因此，不论是资产阶级的人权还是无产阶级的人权都是具体的，并非抽象的、普适的。处于国家统治地位的阶级无论喊着多么动听的“全人类、全世界”的人权号子，它最终都是为本国本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人权“无国界”纯属荒谬之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权观以抽象的“人”代替了阶级的人，以权利的“抽象性”代替了权利的具体性，以人权的“无国界性”代替了人权的主权性，这充分暴露了它的不科学性和虚伪性。

马克思指出，人权的产生既有其理论基础，又有其物质基础，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物质基础，都不能从人性中寻找，而只能从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中去寻找。人权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关系，“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③ 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西方近代天赋人权观，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07页。

根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文化发展需要的一个结果。人权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之一，它必然决定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并且它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它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又随着社会关系、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它绝不是“永恒的”、“固定不变的”。人的社会实践也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此人权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形式来说，也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完善的。

人权是权利的一般形式，认识和研究人权不能不涉及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认识到了私有制下权利与义务的分离造成的人的异化。他明确提出，人权不仅仅是单纯的权利，它还包括义务，它是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一个社会的权利总量一定要等于义务的总量，因为权利本来的意义是利己，利己的权利一般表现为获取；义务的本来意义是利人，利人的义务则表现为贡献。私有制条件下的人权就是以一种获取与贡献主体的分离造成了有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有产者的巨大权利对无产者的巨大义务的严重后果，使无产者在无尽的义务中处境越来越艰难。针对私有制这种不合理的人权状况，马克思创造性地提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①

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人的类本质，从人的社会性出发分析了人权的一般特征；他还看到了人的个体特殊性，从有个性的个人出发分析人权，认为人权还包括每个人作为个人而应享有的个别权利。这里的“个性”，在马克思看来，既指个人不能被社会取代的独立自主性或主体性，也指不能被他人取代的唯一性、独特性和自我性。这正是人作为有个性的个人应享有其个人权利的根据。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私有制的存在，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其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找到自己本身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人权不但没有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反而为有产的个人的利己主义活动提供了方便，从而加剧了个人权利间的不平等状态。基于上述原因，马克思认为个人的权利的实现、政治解放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够的，只有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才能克服权利的异化，才能实现人性的复归和人类的解放。在实践中，马克思正是以自己的人权理论，指导无产阶级在争取权利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二）马克思对西方近代人权理论的批判

马克思在创立人权理论的过程中，充分肯定了西方近代人权思想在人类思想解决中，在反封建、反专制、反特权的斗争中，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深刻地揭示了其产生的经济根源、思想根源和政治根源。马克思认为，从经济上看，西方近代人权理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页。

是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需要。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平等、自由，这种要求反映到实然层面就表现为人权，这样，资产阶级法律上的平等就掩盖了资本的不平等。其次从思想方面看，西方近代人权理论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的需要。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①第三，从政治方面看，西方人权理论是资产阶级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通过普遍人权来承认了自己的出生与基础。

马克思人权理论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是同他透彻地剖析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人权制度的欺骗性和虚伪性，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从未孤立地就人权谈人权，他总是将人权置于具体的历史条件下予以考察。正是从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出发，他超越了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狭隘眼界，从而对资产阶级人权观念作了坚决的批判。总括起来，马克思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资产阶级思想家多谈论人权的一般内容规定和形式，忽视人权的现实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而马克思则从人的社会关系，尤其是从社会经济关系出发分析人权。指出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虽然标榜“普遍的人权”，把自由、平等说成是人人共有的权利，但事实上，由于资产阶级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享有特权，无产阶级一无所有。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就决定了无产阶级事实上不能享有同资产阶级对等的平等和自由权利。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人权观以私有制为基础，以承认剥削为前提，因而它具有狭隘性和虚伪性，不可能是彻底真实的。资产阶级打着“天赋人权（自然权利）”和人人拥有平等权利的旗帜，但实质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特权，而无视无产阶级的人权：“至于谈到权利，我们和其他许多人都曾强调指出了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以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对立立场……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②资产阶级思想家在谈论人权时所指的“人”，不是别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成员。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

第二，马克思批判西方近代的资产阶级人权，把它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从而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所谓平等权利的本质及其虚伪性。在《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8～229页。

论》中，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产阶级“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① 所以商品交换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②

第三，马克思强烈反对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合理的利己主义”。他指出，个人主义是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核心，这种人权观把宣扬个性解放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他认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指称的普遍人权，本质上乃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权利；它处处渗透着商品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时代气息。因此，所谓“合理的利己主义”无非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关系的一般表现形式，它与人类自由本质所需求的真正人权大相径庭。

马克思反对离开阶级、离开人民群众、离开社会追求个人权利，而主张把阶级的、集体的、社会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在人权观上更强调集体人权，认为集体人权是一切个人人权的基础，是个人享有一切权利和自由的先决条件。根据人类自由本质的要求，人权的实现在现实性上只能借助于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因此人权的要求就在于，打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关系上的狭隘、封闭和对抗，确立社会关系的道德化与合理化，造就所有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

第四，马克思认为《人权宣言》所规定的自由，“是作为孤立的、封闭在自身的单子里的那种人的自由。……自由这项人权并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结合起来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分离的基础上。这项权利就是这种分离的权利，是狭隘的、封闭在自身的个人的权利。”^③ 一旦自由、人权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发生冲突，就不再是权利，而为赤裸裸的镇压所代替。这在巴黎起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无产阶级敢于起来捍卫自己的权利时，统治阶级的疯狂暴戾能达到何种程度。后来，当发觉不可能把一切人杀尽的时候，就开始了大批的逮捕，并从俘虏群中任意拉出一些牺牲品来枪毙，其余的人则赶到大营房里去，让他们在那里等待军事法庭的审判。”^④

马克思指出，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权观为人的自由和平等呼喊，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⑤ 人的活动对个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8页。

必然产生异化，而且人的社会关系、生产条件、产品、他人、国家和集体等都同个人发生了异化关系。个人自由和平等只能是一种偶然的、非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更多的、更现实的是一些利己主义者个人的自由和平等。因此说，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权观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是狭隘的自由，是对无产阶级实现真正自由的现实障碍。

第五，马克思深刻揭露西方近代人权理论中的所谓“安全”的本质。马克思说：“安全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是警察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而“市民社会并没有借助安全这一概念而超越自己的利己主义。相反地，安全却是这种利己主义的保障。”^①在马克思看来，“安全”本是个人对国家的要求，即国家对个人的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就是国家保证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这样，“安全”的概念就被资产阶级赋予了防范性的意蕴，安全这一人权则称为“利己主义的保障”。由此，马克思指出，以往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又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人权理论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是崭新的科学的人权理论。马克思把人权的产生和发展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用辩证统一的观点来阐明人权同经济、文化、权利和义务、人权内部的各种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克服了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和非科学性。他还阐明了人权产生的原因与发展规律；指出了无产阶级人权和资产阶级人权要求的根本区别，并把理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从而有力地克服了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脱离实际的局限、弊端。通过对西方人权理论的历史和现状分析，马克思批判和揭露了西方近代人权理论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并明确指出人权具有历史特性、社会属性和阶级本性，从而把人权理论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马克思人权论的产生是人权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真正的革命。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9页。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处理好的几大关系

张友谊

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建设先进文化，能否站在世界科学文化的前沿，有没有强大的文化实力，关系到我们党是否具有时代精神和创造精神，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能否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此，针对我国文化建设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处理好以下几大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多样化与指导思想一元化之间的关系

文化多样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在中国文化发展中也有充分的表现。文化多样化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文化上的多样性，既有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又有不同历史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还有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精神相结合，在中国民主革命实践中创造的革命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文化现象等等。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文化因素交织一起，相互作用，共同形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系统。其中，社会主义的文化应该是中国的主导文化。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承认文化多样化，同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以先进文化统领目前的文化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我们立党立国之本，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本。任何一种文化建设都离不开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不例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当代最先进的思想文化成果，是被实践反复证明了的普遍真理，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

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文化建设中，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否则，就必然会失去凝聚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前进的政治思想基础，就必然会导致思想上的混乱，就必然会失去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轨道，甚至遭受挫折和失败。当今世界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问题，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这种情况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进一步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建设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关系

在世界全球化发展进程中，文化的民族性和国际性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突出。每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都有守护的责任，都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己民族文化的独立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融合，又会使文化面向世界，带有普遍意义，从而具有国际性的特征。于是，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矛盾也就表现出来。

一定的文化总是在一定的民族区域产生、演变的，因此，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不同的民族即使处在同一个时代，它们的文化也会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由于文化的发源、演变和条件不同，文化的民族性就表现出来，不同民族的文化有了差异。文化的民族性来自于人类文明发源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明所走过的历程的不同。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是以汉族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当然，它也融合、吸收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文化既具有民族性的特征，还具有世界性特征。所谓文化的世界性，是指文化的开放性、普遍性，即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同时也是面向世界的文化，在整个人类文明进程中具有共性。文化的世界性，即人类文化的共同性，是由人类的一般性所决定的。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因为具有共同的本质和内在的统一性。世界上各个国家、民族的人都具有劳动、需要、交往、意识这四个基本要素。虽然他们在劳动、交往的方式上各有不同，他们的需要和意识各有特征，但其实质是共同的。文化通常是渗透在这四种要素之中的，虽然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表现出差

异，但却有共性。

文化的世界性还表现在文化的开放性和可交流性上。既然人类的文化具有共同性，那么，世界的文化就是可交流的，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就是开放的。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可以面向整个世界，可以与其他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为其他国家、民族的人们所理解、接受。不论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形式如何，不论它们的语言如何不同，但它们互相之间却可以互相理解对方的文化内容。这就充分说明文化具有共性、普遍性。

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世界性是辩证的统一。文化的民族性中包含着世界性，世界性中也包含着民族性。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点，同时，又是开放的文化，面向世界的文化，具有世界性的特点。当然，在对文化的世界性理解上，也有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世界文化发展总趋势是文化一体化，途径是强势文化吞噬弱势文化。这种对文化世界性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世界文化的发展并非最后达到一体化，强势文化同化弱势文化的同时，也会受到弱势文化抵制、反抗。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都力求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强行地将它们统一起来是行不通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文化应当把民族性和世界性统一起来。首先，中国文化应当走民族化的道路，这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完全可能。因为只有民族的文化才是世界的文化。其次，中国文化还应该走世界化的道路，中国文化应当面向世界，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文化交流，吸收、融合它们的长处，这样才能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文化。因此，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文化的民族化和世界化的矛盾始终存在着，应当辩证地理解这一矛盾，不能把中国文化的民族化和世界化割裂开来。总之，中国文化既是民族的文化，又是世界的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各国家、民族文化的交流中保持、发扬了自己的民族特色；中国文化也只有更具有民族特色，才能成为世界的文化，为世界各国、民族所接受。

三、文化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的关系

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通常理解的现代化是指以工业化发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精神等方方面面的整体性的社会变迁，它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现代化的发源地虽然在西方，但现代化决不等同于“西化”。它是社会向着文明发展的一个特殊进程，各个国家在这个进程中有自己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途径和特征。现代性也是与工业化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它是现代化的一种特性，是在现代化过程的基础上概括和抽象

出来的一种东西。当然，西方学者对这种现代性的概括与我们的概括是不一样的。因为在西方学者看来，现代化就是“西化”，因而现代性也就是对西化特征的概括。由于受到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一些学者在研究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问题时，也把西方现代化的标准作为唯一的标准，在认识这个问题时产生了偏颇。

对于现代性，可以从两个不同方面进行理解。首先，从对于后发性进行现代化国家来说，现代性代表着一种国富民强的社会理想，尽管这种理想在被接受和实践的过程中会受到本土传统性的抵制，但它仍然以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社会变迁，影响着它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观念。在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矛盾始终存在着，并且在一定时期非常激烈。其次，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的社会发展现状来看，现代性更接近于现代化过程的调整和延续。如果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算起的话，现代化过程也有300多年的历史；如果再往前追溯，寻求现代性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大概要上溯到15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这一时期开创了新兴的自然科学，奠定了科学和理性的基础。马克思曾经说过，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一时代的繁荣为欧洲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后，现代性在现代化过程中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在西方社会备受推崇。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的剧烈变化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现代性开始受到了怀疑，人们开始对现代性从各个方面进行反思。在这些国家中，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矛盾是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其中还掺杂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

与现代性对立的是传统性。它是指事物世代相传、继承延续下来的一种特性。就文化来说，传统性就是指文化的继承性、延续性。传统性是文化的基本特性。文化具有一种世代相传、继承延续的特性。因为文化本身就是积淀，这种积淀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是世代积累下来的。文化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辩证的统一。文化的传统性中包含着现代性，文化的现代性中也包含着传统性。把文化的传统性和文化的现代性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做法，是对待文化问题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在一个既定文化中，既有传统性的特点，又有现代性的特点。传统性和现代性作为文化的两个基本特点，融会在文化当中。

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的现代性和传统性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现代性要求中国文化在发展中要现代化，要体现时代精神，而传统性要求中国文化在发展中要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传统，体现民族文化的特点。当然，现代性与传统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者有相互贯通的方面。然而，由于这两种特性的要求不一样，因而在当代文化

的发展中就呈现出一定的矛盾。于是，在解决这些矛盾时便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必须用辩证的观点认识和处理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中存在着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关系，既要继承、借鉴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又要积极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才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正确途径。

应该指出的是，在中国当代文化发展过程中，除了有具有文化现代性和传统性的矛盾之外，还掺杂着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后现代性是与现代性相对的概念，是对“现代性”的“解构”。从我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实际来看，由于我国社会发展复杂性和不平衡性，目前我国既存在着文化的现代性和传统性的矛盾，也存在着文化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只不过后者目前在中国社会中表现得还很不充分，因而我们讲文化的现代性和传统性乃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突出矛盾。

四、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吸收借鉴外国文化精华之间的关系

文化的发展有其继承性，任何社会的文化，既是对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的反应，又是对该社会历史文化传统的继承。五千年多年来，中华民族在自身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形成了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作为中华文明集中体现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不仅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也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我们必须予以继承和发扬。否则，如果丢掉了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没有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进步。进入新世纪，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更加密切，文化的交流已成为必然趋势，无视和违背这种趋势，在文化建设中闭关锁国，只能落后于世界，落后于其他民族。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善于在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要以开放的眼光、广博的胸怀，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博采各国文化之长，积极研究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一切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精神境界的文化成果，一切有利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管理方式。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是指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上，主张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本位，吸收、融合西方文化，在此基础上发扬光大中国的民族文化。中国近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萌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20世纪的20年代，至今仍有较大影响

力。它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为出发点，主张在吸收西方文化、巩固“道统”的基础上，重塑中国文化传统的“文化观念”，促进中国的文化发展。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系统化、理论化和体系化是由新儒学来完成的。

所谓文化激进主义，是指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上，主张全盘西化，激烈地抨击中国文化传统，全盘否定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激进主义的构成也很复杂，其中包含着不尽相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在否定中国文化传统，夸大西方文化的优点方面却是一致的。其中，有的观点主张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封闭系统，应该借用外来的力量来打破这种超稳定结构；有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全盘西化；还有的观点认为，应该“以反传统继承传统”。总之，主张文化激进主义观点的人们，对于中国的落后带着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他们急切地希望中国尽快地摆脱落后的现实，认为影响人们心理意识、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传统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因而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采取一种激烈抨击、否定的态度。文化激进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中国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表现出文化激进主义倾向。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问题上的偏颇态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那种对中国文化传统全盘否定的态度和做法是不足可取的。30年代的“西化论”贬低中国文化传统，竭力抬高西方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激进主义。60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否定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是一种极端的文化激进主义。80年代“文化大讨论”中，“全盘西化论”就是一种新的文化激进主义。从90年代至今，文化激进主义一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着，成为中国文化争论中的一个流派。

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中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斗争一直很激烈，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文化激进主义主张摒弃中国文化传统，以西方文化为主体；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本位，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化传统。实际上，这两种对待文化问题上的思潮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它们在对待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问题上采取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没有超越中西、体用的两极思维的模式。

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摒弃这两种错误的倾向，既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吸收借鉴西方文化发展的精华，在继承和吸取中外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所谓综合创新，就是要根据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所面临国际国内环境，充分吸收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在综合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形成一种新型品格的中国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既吸收、融合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吸收、融合了外来文化的积极因素，使民族性和世界性在这种新型文化中统一起来。“综合创新论”超越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激进主义

的对立，克服了这两种思潮的片面性，对于中国文化走健康发展的道路，具有积极意义。

五、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

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和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这种区分，在学术界没有太大的分歧，然而对两种文化进行界定，却面临着相当的困难。人们在研究中发现，很难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找到合适的定义。一般来说，大众文化就是大众所创造和欣赏的、为大众所接受的一种带有普及性的文化；而精英文化则是代表正统的、由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知识阶层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也有人称之为“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然具有不同的性质，然而它们又被整合为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此，简单的划分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很难揭示出复杂的文化内涵。因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并没有绝对的界限，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换，两者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变化。比如，20世纪初，中国的报刊杂志和其他大众传播工具都被视为精英文化，然而现在却被看作是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被视为精英文化，然而在意大利本土，却被看作是大众文化。此外，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创造者也在不断变换着各自的角色，“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也无绝对界限，呈相互融合之势。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是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两者是从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上对文化的表现。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也不存在孰对孰错、孰好孰坏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也在不断地相互转化。精英文化为了寻求更多的欣赏者，趋向于普及化、大众化，大众文化为了提高自身的层次，也在不断地艺术化。当然，以市场为指向的大众文化和以欣赏为指向的精英文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也会不断地发生冲突。大众文化的世俗化特征和精英文化的高雅性特征使得两者的追求、指向都会不同。此外，大众文化自身的弊端也使人们的心态上带上了浓重的享乐主义、纵欲主义色彩。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对精英文化的严肃性、高雅性和欣赏性造成冲击。而精英文化的自身的缺点也使得它不易普及，和者盖寡。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在于，大众文化是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成果是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出现的；精英文化则与之不同，它的成果是以艺术作品的形式出现的。前者遵循的是一种市场运作机制，后者遵循艺术运行机制。大众文化关注娱乐和消费性文化活动，而精英文化则偏重于艺术和审美活动。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在我国迅速崛起，对精英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应该看到，大众文化在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但也应该看到,由于并非人的所有需求都是合理的,大众文化的利益趋向会对文化的教育功能产生一定的消解作用。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矛盾,导致了人们审美意识的多元化和欣赏水平的分化,改变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定位。正视我国文化生活中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矛盾,正确解决文化的高雅和通俗之间的矛盾,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文化艺术,对于繁荣我国的文化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六、文化开放与文化安全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文化开放和文化安全的矛盾也是始终存在着的。开放性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特征。扩大和发展与国外的文化交流,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战略选择。我们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使我国的文化园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我们还要吸取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与现代社会相联系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国的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在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交流中,要建立先进文化体系,就必须注意维护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是维系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点。没有文化安全,就谈不上先进文化的建设和创造。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走向和总体发展趋势的基本保证。因此,我们在文化现代化过程中,必须把文化安全问题列入议事日程,摆在重要地位上来看。我们在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同时,应确保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建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文化发展战略,在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市场管理体制的改革、文化投资主体的确立等一系列政策选择上,都要体现出以国家的利益为重原则。其次,要建立先进的、积极的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实行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的适度准入原则,减少盲目性,防止一哄而上,无计划的发展,增强预测性和计划性。再次,要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大力提高我国文化创新能力,建立科学的文化安全保障系统。第四,要建立和完善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综合管理机构,及时发现和处理对我国文化安全构成威胁的各种因素、各种问题,提高文化安全方面的综合处理能力和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家的文化安全已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文化产品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双重属性,使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市场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模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应当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做到既能有力地抵御外来不良文化的侵蚀,保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在努力抓住和利用文

化开放的良好机遇的同时，使我国的文化安全得以保障。加入“WTO”后，我国文化市场的对外开放，不仅关系着我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涉及到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西方国家的文化产品会通过各种形式的包装进入我国文化市场，西方国家一些消极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也会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等种种渠道对消费者的思想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这种作用将不断地反映到我们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来，并直接影响到国家的文化安全。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文化安全意识，从战略高度制定我国文化安全的长远目标。

文化开放和文化安全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机械地、绝对地把它们对立起来。不能因为害怕我国的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就固步自封，停止我们的文化开放进程。与此同时，推进我国的文化开放进程，不能忽视文化安全问题。总之，我们必须正确处理文化开放和文化安全的矛盾，在我国的文化开放中加强我国的文化安全保障，在保证我国文化安全的同时大力推进我国的文化开放。只有正确地处理好文化开放和文化安全的问题，我们才能在加入“WTO”以后，有效地抵制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确保我国的文化安全。

七、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联系十分紧密。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现代化，而文化现代化的实质就是民族素质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民族素质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在这一连串的因果链条中，它们互为因果，互相作用。在现代化的演进中，一般进程是从物质层面到制度和体制层面，又从制度和体制层面到民族精神层面。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是表层的现代化，制度和体制层面的现代化是中间层次的现代化，民族精神层面的现代化才是核心层的现代化。民族精神的现代化是文化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实质内容，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通过民族精神的现代化联系在一起。

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历经百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虽然我们今天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要走的路仍然很长，在前进的道路上仍然存在着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和最艰巨的任务，就是人的现代化。反思我国的社会转型历程，就不难发现，人的现代化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而人是社会的主体，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最终都是通过人的现代化来完成的。从根本意义上说，社会转型必然表现在人的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的中心内容是文化的发展，文化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意识形态，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方面，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征。文化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条

件之一，其根本目的是人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并不能完全相提并论，前者是条件，后者是目的，文化现代化从根本意义上讲，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社会向着更高层次发展。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另外一个方面的区别在于，文化现代化所强调的是整个国民精神的变革，它虽然体现在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信仰、伦理道德、人格品性等方面，但所强调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重塑，是国民性的变革；而人的现代化人的素质的提高、公民意识的增强，更侧重于个体。由此可见，人的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虽然在内容上有相同的方面，但所强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文化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就是在继承中外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树立一种新的、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文化精神。

（作者单位：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室）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资本论》中的循环经济思想

马传栋

现在学术界一谈到循环经济,就把循环经济思想的提出加到 20 世纪 60 年代提出“宇宙飞船式经济”的美国学者鲍尔丁身上,但我国学者在 20 多年前研究生态经济学的过程中,就挖掘出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所著的《资本论》中的大量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思想。

一、马克思对废弃物循环利用再资源化的生态经济含义的论述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时,就专题论述过“生产排泄物利用”问题。他指出:“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扩大。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铁的生产的铁屑等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①“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②“几乎所有消费品本身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废料重新加入生产过程。”^③从马克思的上述论述上可以看出,废弃资源是一种同自然资源有区别的特殊的社会经济资源。它是指人类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已经失去原有使用价值或未认识其使用价值而废弃的各种社会产品或其排泄品的总称,包括各种固体、液体和气体的废弃物。如果把各种废弃物资加以回收、加工和利用,将实现废弃物的再资源化,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国际上习惯于把自然资源称为第一资源,而把废弃资源称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16~117 页。

② 同上,第 11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239 页。

第二资源。由于社会生产和消费不断进行,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不断更新,作为其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废弃资源就会不断产生,这是物质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而生产发展带来的自然资源紧缺,就会使原料的价格越来越昂贵,加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类越来越认识到很多废弃物质的使用价值,环境保护的压力又越来越迫使人类将废料再资源化,这就必然要刺激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实现废弃资源的合理循环利用。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论述了废料循环利用再资源化是将粗放经营的生态经济系统变成集约经营的生态经济系统的过程的含义。马克思指出,应“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高到最高限度”。^①用生态经济学的观点来理解,要达到马克思的这一要求,人们在设计工业或农业的生产流程时只有自觉地运用生态经济规律,按照使生态经济系统的物质合理循环和能量合理流动的原理,注意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废料资源并且在工艺上有内在联系的生产环节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不但使上一个生产环节能产出产品和不断增殖其价值;而且能使上一个生产环节产出的生产排泄物加以处理后再成为下一个生产环节的原料,生产出新的对人类有用的产品。所以,只有将粗放经营、单一利用资源的生态经济系统变为集约经营、综合利用资源(包括废料资源)的生态经济系统,才能使整个系统既能生产出品种较多的人类需要的物质产品,又能产出最少的废弃物质,甚至无废料产出,使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减少到最低程度。目前国内外正在兴起的循环经济园区、生态工业园和生态企业、生态农业等,正是运用这一理论的结果。

二、马克思对废弃物质循环使用能不断提高其利润率的论述

废弃物质的再资源化能通过使生产条件节约的途径促进工农业生产部门不断提高其利润率和经济效益。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关于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大类,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的循环中。……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这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料,即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8页。

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中。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的费用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① 目前在国内外，这种利用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大批量废料，使其再回到生产进而消费的循环经济发展中去，从而能大大提高其利润率和经济效益的领域已越来越广。

在农业领域，人类对作为农作物种植业中产出的大批量废弃物——作物秸秆等废料的利用正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例如将部分富含营养物质的秸秆（如玉米、小麦、稻谷等秸秆）加以处理后，作为大规模饲养畜禽的饲料；将部分富含纤维的作物（如小麦、水稻等）秸秆作为造纸业原料或合成纤维板的原料（如用棉花秸秆生产合成板等）；将部分富含化工原料的农作物废料（如棉仔、棉仔皮、棉短绒等）作为多种精细化工业的原料等等。

在农林牧渔业产品的加工业领域，人类对其加工后所产生的有机废料资源的利用也正在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例如在酒类企业生产中所产生的酒糟已被越来越多地利用作生产沼气和饲料的原料；林业木材初加工业中所产生的各种边角废料正在成为合成板工业的原料；畜禽产品在大规模饲养和屠宰中所产出的骨头、下水等废料作为骨胶、骨粉和饮料的加工原料；渔产品加工所产出的废料则大量作为配合饲料加工业的原料，等等。

在能源电力工业领域，人类对其大批量产生的煤矸石和粉煤灰等废物的开发利用正逐步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主要用于煤矸石发电、制造水泥和作建筑材料，用粉煤灰作建筑砌块和基建用填料等。现在一些大型煤矿综合利用其煤炭和煤矸石资源而形成的生态工业园形成了采煤——洗煤——煤矸石热电厂——粉煤灰制水泥——水泥厂余热再发电的生态工业链条，更深入地利用这些批量极大的废料。

在冶金工业领域，人类几乎利用了所有高炉炉渣和部分铝厂赤泥作为烧制水泥的原料；并从回收利用烧结尘、瓦斯灰、瓦斯泥、平炉灰、转炉灰及轧钢皮等含铁尘泥中增加炼铁原料，提高烧结厂的利润率。对炉渣中所含的多种稀有金属和稀土元素，也重视深入提取。对于在烧结和炼铁中产生的大量煤气和余热，现在先进的钢铁企业都进行利用煤气和余热发电的再循环，从而进一步提高了资源能源利率和企业利润率。

在化学工业领域，人类正利用不断发展的科学技术，对该行业批量产出的液体的、气体的和固体的化工废料进行深度加工和利用，努力利用各个生产环节上产生的废料，生产尽量多的化工产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5页。

总之，实现废弃物质的再资源化和再利用，是人类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表现。它促进了各行各业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对集约利用资源，提高利润率和经济效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马克思对废弃物质循环使用所需的生态经济条件的论述

要实现废弃物质循环利用再资源化，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这些条件也进行了深刻论述。

（一）马克思论述了实现废弃物质循环利用再资源化的过程是对自然资源和废料资源的认识和利用方面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过程。马克思曾指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包括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在内的各种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新能源、新材料及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等方面出现的革命，对使“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的循环中去”，提供了越来越多的科学技术依据。例如过去被作为废渣大量排放到环境中去的很多共生矿金属和非金属、炉渣和稀土元素等，现在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都被投入到再生产的循环（即生态经济系统的物质循环和价值增殖）中去了，并生产出了大量的有色金属、合金钢、稀土新材料和水泥等，这不仅促进了自然资源和废料资源的合理利用，而且大大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二）马克思论述了实现废弃物质的循环利用再资源化的过程是三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多种生态经济条件相互匹配的系统工程。马克思曾指出：“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指废物——引者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①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废物循环再利用的三个条件（即废料产出或回收的批量条件，机器性能的改良条件和对废物有用性的科技进步条件等）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缺一不可的。只有努力使这三方面条件相互配合，协同配套，才有利于废物循环利用再资源化的循环经济的蓬勃发展。这正是当代国内外环境产业在废料材料中集中大量提取、环保机械研制、环保科技发展的三大重点领域。

马克思早在 100 多年前就指出的“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7页。

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的理论,说明马克思十分重视用于循环经济的环保型劳动资料的发展。由于“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①而用于循环经济的环保型劳动资料是把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废料性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废料性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所以其发展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例如在发展煤炭采掘业中,煤矸石这种废料的用途研究及其批量条件往往都是具备的,因此,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却是一个难点。中国70年代以来对燃用煤矸石的沸腾炉的研制和推广,就对其废料利用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很多煤矿的矿用电厂实现沸腾炉化,很多已实现不烧原煤而用矸石和煤泥作燃料,实现煤矸石发电和供气,既大大降低了成本,又改善了矿区生态环境。另外,近十几年来,国内外又先后研发了全部用煤矸石为原料烧制空心砖的成套新设备,使大量煤矸石进入了代替粘土烧制建筑用砖的经济循环。

总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描述出了一个区别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新的循环经济的理论雏形。此外,《资本论》还从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关系这一本质特征论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动需要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适应的问题。换句话说,“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物质流动方式与“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方式的区别是循环经济区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特征,循环经济要求经济学将资源环境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来研究。另外,从技术经济可行性来看,现阶段不可能完全将所有的废物进行成本有效再利用,甚至也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总会有废物要最终排向生态系统。循环经济使废物排放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达到最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对这些技术经济条件进行了深入研究。

四、中国要按照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

中国要按照马克思的上述思想转变现有的发展模式,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的路子,最主要的一项举措就是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遵循无废料工艺论原则,使物质和能源在循环体系中得到持久和合理利用,使经济增长方式从循环再生中得到提高,实现人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3页。

“增产、减污、节能、增效”的发展。从人类发展意义上讲，循环经济是经济、社会、生态整合的经济，是经济和环境的双赢，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路径。

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经济活动，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3R（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式。其核心是资源的循环利用和节约，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与传统的经济模式相比，循环经济能够充分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能够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使社会生产从数量型的物质增长转变为质量型的服务增长；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纳入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中，推动环保产业和其他新型产业的发展。

工业领域循环经济发展三原则（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中的次序是：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减量化是重点，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核心，最终处置针对的是利用不了的废弃物。

工业领域循环经济要围绕清洁生产、生态工业、绿色消费、废物处置等方面展开，使物质和能量在企业内部、生产环节乃至整个社会循环流动，达到平衡。

微观层面，表现在企业内部的循环，其目的是投入最小化，排出最小化，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资源等。主要途径和举措是推行清洁生产，创建循环型企业。

中观层面，表现在生产间的循环，把不同厂商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上游企业的废弃物成为下游企业的资源与能源，逐步建立起企业间的物质能源的相互转换与供求体系。其有效载体是工业园区和区域产业链。主要途径和举措是进行生态化改造，构建区域内的资源流、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等高效耦合，创建循环型生态工业园区。

宏观层面，是社会整体的循环，即发展绿色消费市场和资源回收利用市场，让所有能源和资源在这个循环中得到最为合理的利用。主要举措是强化节约意识，倡导绿色消费，盯住国内和国际市场，建立和完善各类固体废弃物分类回收网络体系，做大做强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实现固体废弃物再利用和再资源化，缓解要素瓶颈制约，建设生态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循环经济要求产业间要增加关联和互动，使物质、能量实现最大限度的循环。产业及产品结构的不合理，是造成资源浪费大、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的重要原因，因此，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关键因素。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经济所）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

董建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由马克思所创立、并由后人依据其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社会实践的需要不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揭示现代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规律为目的，以指导无产阶级争取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为己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实践性和开放性，将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发展。

从上世纪 70 年代末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成果中的经济理论部分，即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比较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已经被实践证明和被广泛认同的、正在用以指导实践的科学的经济理论。它们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也包含着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的艰辛探索和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建设的任务，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定含义而言，就是要以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实践为依据，以世界上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得失、矛盾与态势为参照，以当今世界知识经济发展、产业革命与结构演进、经济全球化为大背景，着重将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认识和创新性理论观点引入学科体系中来，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西方经济学适合我国应用的部分加以整合和疏理。一方面使其由意识形态理论转化为学术理论，获得稳定的科学形式；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中吸取理论营养和时代精神。做到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既立足中国实践，又勇于学习借鉴，实现理论观点和学科体系的全面创新，充分发挥教育人民，指导实践的作用。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建设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应该以

这样的思想为指导加以认识和处理。

下面仅就其中的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研究对象的扩展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做了明确阐述的。他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还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 统观《资本论》的理论逻辑，他是对生产的物质技术内容与社会形式并重而以对社会形式的研究为主的。他曾做过专门解释：“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财富的材料，不论是主体的，如劳动，还是客体的，如满足自然需要或历史需要的对象……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提。这种前提定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而只有当这种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列入考察的范围。”^②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做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后继者的列宁、斯大林都突出强调要以生产关系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列宁指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决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是‘物质的生产’（这是工艺学的对象），而是人们在生产中的社会关系。”^③ 斯大林明确论断：“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④ 并相应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生产关系“三分法”。斯大林的观点，借助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传播广泛，影响深远，在一个较长时间里曾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当时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理论界普遍接受。

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经济建设的展开，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和矛盾逐步显露出来，我国学者像其他社会主义各国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一样，开始独立思考问题，围绕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学术争论随即展开。争论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迄今40余年犹未停止。争论主要涉及：1.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否应该包括生产力。从50年代末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应当包括生产力之后，此主张一直有不少经济学人赞同。即使仍坚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同志，大多数也同意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应联系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还有的主张政治经济学应把生产力研究放在首位，并由此催生出了一门独立的“生产力经济学”。2. 生产方式是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对生产方式概念的理解。长期以来，我国理论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66页。

④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94页。

界一直有一部分同志主张应将生产方式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对生产方式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认为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有的认为是介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一个范畴即劳动方式,还有的认为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的特殊方式。3. 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对斯大林的生产关系“三分法”持批评意见者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把原本是生产关系法律用语的财产关系即所有制形式从生产、交换、分配诸关系中独立出来,不过是“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反对者则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狭义的所有制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突出出来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还有许多同志认为,斯大林生产关系定义中没有把交换关系单列出来是一种理论上的后退;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环节,理应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4. 资源配置可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主要的研究内容。将资源配置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这是90年代初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西方经济学广泛引进之后在一部分同志中兴起的新主张,并由此引发出一场政治经济学是否应更名为经济学的争论以及西方经济学将资源配置限定为资源配置的得失评论。

上述争鸣发生于我国经济建设出现重大曲折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展于1980年前后我国改革开放路线确立、思想理论大解放大发展之际,深化于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之时。看似纯学术争鸣,实则是理论对于实践的积极回应。观点虽未能实现一致,但认识则大为深化了。那种孤立封闭地研究生产关系的空气较为彻底地被消除了,经济发展、经济体制、流通、消费已经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视域。

总结多年来理论争鸣的成果,并以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基本观点、特别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观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其一,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论断虽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始人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理论精神,但从其引致的脱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流弊和将交换关系排除在外等情况看,确有重大缺陷,已被证明不能满足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需要,失去了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力。

其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适当扩展。扩展的方向就是将生产力列入研究范围,突出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建立和完善的决定、带动作用和生产关系的完善进步对生产力的解放、促进作用,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中,动态、发展和开放性地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

其三,研究对象扩展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应以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为目的,为解放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进社会财富服务,为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服务,为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至于扩展后的政治经济学对象如何表述,则是可以进一步斟酌商量的。近年来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和在教材编写中实际贯彻的理论主张大体有以下几种:1. 恢复使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提法,即以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为研究对象。^①2. “以社会生产关系、社会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经济活动是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活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②3.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生产关系以及作为其表现形式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也要研究生产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③。4. 政治经济学在坚持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同时,也要把生产力的社会属性即“生产力的社会结合方面”列入研究对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促进生产力发展放在中心地位,“研究生产关系如何通过不断的改革去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④5. “政治经济学是以生产方式,即在一定生产力及其基础上产生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⑤等等。

我认为:在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扩展与界定问题上,对恩格斯关于广义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论述须给以应有的重视。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⑥还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⑦与《资本论》对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界定不同,恩格斯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界定,是对“人类各种社会”而言的,一般地说,也应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我们理应从中汲取科学营养。遵循这个思路,我们不防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界定为“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条件和形式,为促进社会财富增长、满足人的需要服务的科学”。这个定义既强调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生产过程展开的“条件”即社会经济关系,也强调研究社会生产的“形式”即一定社会关系条件下的资源配置或社会生产的组织、机制和运行,并主张将研究结合生产、

① 吴易风:《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② 刘诗白:《走向21世纪的新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之我见》,《学术月刊》1999年第3期

③ 卫兴华、林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8页。

④ 吴振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

⑤ 王元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页。

⑦ 同上,第186~187页。

流通、分配、消费的过程来进行,从而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一致性,突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致用性和价值观,有利于克服传统政治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弊端。这个看法可以同以上几种主张一道研究参考。

二、理论适用性的定位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反映。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个包含若干阶段的漫长进程,社会主义也不是一国现象而是多国现象,并且与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阶段性规律还是总过程的规律?是重点揭示一国的经济运动规律还是社会主义各国的普遍规律?抑或是无任何制度差异的一般性规律?这就不能不涉及到理论适用性的历史区间定位和空间范围定位问题。这两个定位,都是关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与建设方向的大问题。

正是基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就政治经济学建设的诸问题展开争鸣以来,它就一直是争鸣的焦点之一。在理论适用的历史区间定位上,不少同志主张经济研究要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着重于初级阶段”^①;认为“我们所要重建的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学”,“能管30年、50年就可以了”^②;“从实际出发,就是要从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根本的实际出发,来解决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各种问题。”^③也有的从社会主义经济学教材应有逻辑的统一性、相对稳定性和独立性出发提出疑问:“如果定位于成熟的社会主义……就会出现脱离目前实际的问题。而如果定位于现实社会主义,其研究内容又会与现行的方针、路线、政策绞在一起,削弱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④在理论适用的空间范围问题上,有的人侧重于强调理论的一般性和通用性,主张“全世界的经济学应该共建一座大厦”,“惟有提出对所有人都有利的方案才能为人类服务”,“通过对全球的关怀而使经济学真正具有一般性和世界性”;^⑤强调“21世纪中国理论经济学发展的着力点应是进入主流经济学”、“尽快融入主流经济学发展之中”。^⑥另一些人则

① 沈立人:《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当代经济科学》1999年第4期。

② 晓亮:《困惑中的思考》,于光远、董辅初:《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③ 袁文平:《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财经科学》1998年第1期。

④ 卫兴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评论》1998年第2期。

⑤ 盛洪:《会有一个中国经济学派吗》,于光远、董辅初:《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1~295页。

⑥ 杨旭东、孙平:《“走向21世纪的中国经济学:回顾与展望”理论研讨会综述》,《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侧重于强调经济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认为“现在我们讲经济学发展，就是要建立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①“中国经济学的优势在特色，跟在别人后面亦争亦趋，充其量是个转述者”^②。可见在理论适用性定位问题上，理论界的认识很不一致。要使意见由分歧乃至对立变为相对一致，一个可供选择的途径，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的大前提下，从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观察认识问题的基本理论方法中寻求启示，把握解决问题的原则与方向。

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理论方法归结起来就是始终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认识和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道路和战略问题。其要点，一是立足中国国情，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看问题、做事情；二是既不丢老祖宗，又不搞本本主义，大胆探索，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大胆借鉴，敢于继承，决不照搬。由此得出的启示是：理论不能脱离实际，而要积极地反映实际，能动地指导实际；理论上的吸收借鉴，必须服务于自主发展；理论研究贵在创新。

遵循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方法及其启迪，可以得出如下看法：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以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为己任。也就是说，在理论适用的历史区间上要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着重揭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建设规律，而非社会主义未来发展阶段或全过程的经济规律；在理论适用的空间范围上定位于着重反映中国经济建设规律，而非“世界性”通用规律。这是一种在展示理论的具体性、特殊性的过程中展示其所蕴含的理论抽象性和一般性的研究路径。这样一种路径比较符合马克思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的要求。

从经济学的理论特质及发展史的角度看，上述理论适用性定位的主张是有着充分的科学依据的。

首先，是由经济学的历史性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交换的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个世代是不同的。因此政治经济学就必然具有鲜明的历史性特征，不可能在一切国家、一切时代都一样。对此，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

① 洪远朋：《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② 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① 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善于从特定社会的特定经济条件出发，把握经济运动规律。这些规律是特殊的、具体的，但对于具有大体相同的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则具有一般性。就我国来说，广大的经济理论工作者应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集中力量研究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但这些特殊的规律性中，关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的结合、体制转型、后发展经济大国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变路径等，又必然具有不可预计的世界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搞研究，才会有光明的前途和伟大的价值。

其次，是由经济学的致用性决定的。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经邦治国之学，从来都是为特定国家、地区的特定人群服务的。其理论内容、特色乃至其创新点必定会反映或受制于它所服务的国家、地区的经济水平、经济结构、制度特点和族群利益。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后发展国家，还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由以上特点所决定，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能不带有“中国特色”。反映在理论定位上，就不能不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着力于揭示蕴含以上诸多特殊规定性的经济运动规律。

第三，已为经济理论发展的史实所证明。经济理论史的大量事实证明，那些有作为的经济学家无不是从其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最为紧迫、最急需解决的重大经济问题出发去搞研究的。那些名垂青史的名家名著，都是因为较好地回答和解决了一两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为社会造了福，历史才牢牢记住他们。一位经济学家曾坦言：有历史价值的著作、学说大多扎根本土。并指出：威廉·配弟的《政治算术》之所以成为世界名著，是因为这本小册子解决了当时与海上霸主荷兰、比利时相比还是小国、弱国的英国的大问题，影响了当时英国的政策，促使英国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世界霸主。德国李斯特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在其中建立的广义生产力理论很好地研究了如何发展德国生产力的问题，使当时落后的德国赶上了先进的工业国。^② 事实上，一部经济学说史，就是一部在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的历史。古典经济学是为解决英国工业化进程中产品的生产和市场问题产生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为解决垄断出现后竞争的均衡问题形成的，凯恩斯经济学是为应对大危机后有效需求不足而产生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490页。

② 熊应梧：《中国经济学之根在本土》，于光远、董辅初：《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1页。

货币主义、供应学派则是为解决发达国家一度出现的经济滞胀而产生的。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马克思的《资本论》之所以被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所以使人们至今不忘,也都是因为它们能够立足所处的时代,研究和回答了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

总之,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唯物辩证法要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方法,还是经济科学的性质、特征及经济理论史实看,“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以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为己任”的理论定位都是科学的、正确的。

三、理论的引进、借鉴与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离不开对国外经济理论的引进、借鉴,更离不开创新。正确处理引进、借鉴与创新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从引进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开始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引进与借鉴的重点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虽然从1957年起中国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的独立探索,在1960年前后由毛泽东带头,初步纠正了对苏联教科书全盘接受、生吞活剥的学习方式,但在整个五六十年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观点仍是苏联教科书那一套。其结果,一方面是把苏联的经验传播到中国,使我国能够迅速恢复经济,较快地建立起了工业基础,并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培养经济理论队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把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引了进来,使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指令性计划、商品经济消亡论和半商品经济论等传统经济观念扎下了深根,消极影响是巨大的。

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借鉴乃至应用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以引进借鉴新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经济理论和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为主,80年代下半期以对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借鉴为主,进入90年代以后则以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的引进借鉴为主。20多年来可以说是热点不断,持续升温。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借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促进市场化改革、加强宏观调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改进经济学研究教学也有不小的作用。但也出了一些消极面。主要是不顾国情,照抄照搬,不适当地夸大对改革开放的指导作用;有意无意地排斥、贬抑和削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过分追求理论的通用

化、数学化和学理化，文风晦涩，冲淡了同我国改革发展实践的亲和性。

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对外国经济理论的引进和借鉴，其经验教训归结起来就是：对外国经济理论的积极引进和借鉴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脱离国情，盲目照搬，则不利于经济理论的健康成长；引进、借鉴的目的是服务于创新，基于实践的自主创新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完善的立足点和原动力。

从党的第十五大、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再强调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学风。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个精神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与建设也适用，即：必须在积极吸收、借鉴国外科学的经济理论条件下，立足当代中国实际，独立自主创新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能够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规律，从而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经济理论的创新，一般而言主要体现于：1. 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新的领域，以扩大其适用范围；2. 在经济理论的某些方面已被证明与事实不符时，或者设定新的前提，或者做出新的逻辑证明和论证；3. 当原有理论对相应的社会现象已经无法解释时，做出全新的理论界说；4. 进行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创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是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需要提出来的一项理论任务，目的是把握规律，指导实践。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既要对原有理论进行新的阐释，又要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既要讲求科学性，又要注重适用性。需要从理论观点到方法、对象、体系结构进行全面性、整体性创新。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必须坚持邓小平经济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经济理论观点的指导，突出把握好以下几点：

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作为理论前提。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精辟回答，包含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基本规律的认识。要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指导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体系创新，使经济学能够系统地回答如何发展生产力，如何适应生产力要求完善和变革经济制度和体制、以更好地解放生产力，如何运用发展生产、完善制度、调节分配等手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还要按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要求对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基本经济规律做出全新的概括和阐释。

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历史观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基于国情特点的理论概括，是观察认识我国现实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制定战略策略，选择发展道路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理应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观基础。要以这个理论为指

导认识和观察社会主义的劳动形式、所有制结构、企业制度、生产组织、就业方式等问题，从而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形态、进程、方式有一个清醒的和科学的判断。

以经济发展论作为主题。“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的必要条件和前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把这个“硬道理”作为主题突出出来，弄清为什么要发展，发展的路径与方法，发展的目的性及内涵的全面性。要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统一起来，突出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

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贯穿始终的红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最为重大的成果之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以此为主线，使之体现于经济发展、运行、体制设计、经济调节等各方面。在理论上要搞清市场经济的内涵、特征，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依据及其与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异同等。

以改革开放作为鲜明的特征。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特征。作为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实践上的新突破、新发展，反映时代的新进步、新特征，反映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新关系和进行往来、交换的新机制、新形式。总之要体现时代性、具有开放性，要有世界眼光。

四、研究思路和框架

厘清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适用的历史区间和空间范围以及引进借鉴与创新的关系，进一步的问题就是研究些什么、怎样进行了。这里仅粗略地提出一些看法。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特定的对象、方法的经济学，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在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争鸣中持续发展着的经济学。它在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创者和奠基人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提出的许多基本的理论观点，特别是关于未来社会的科学预测，并没有因历史的变迁或反对者的攻击而失去其价值，至今仍是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态必须因时而变，其内容也要与时俱进。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性质、特点、地位和发展的道理是在研究之初首先要讲清楚的。

接下来就要转入对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主题——社会生产的研究。首先要研究的是生产的价值形式、生产力和经济增长与发展等非制度层面的问题。从社会生产的基础层面开始，而不是先从研究“经济本质”开始，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和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原则。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是价值生产而非实物生产，因而首先就要研究劳动和劳动价值论，讲清楚社会主义生产的社会属性、价值创造、劳动方式与劳动关系等问题。其次要研究财富的生产即生产力问

题,如生产的要素、结构、组合、形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经济效率和效益问题。第三是研究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

随后展开对社会生产的另一面——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是研究所有制关系、分配关系及其具体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则主要研究基本经济制度,同时,也应讲清具体制度、经济体制与基本经济制度的联系、区别及其形态和构建。

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对流通过程及生产总过程的研究得以展开。研究的重点是资源配置的方式、经济运行的形式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问题。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必然性及实现的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规律,国家职能的转变,宏观调控的体系、目标、任务等,是需要考察研究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命题。这一命题以生产、消费的内在联系为客观基础,突现了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和人本价值观,今天看来仍应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中西方学术界对需求研究的新认识、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人的全面发展论和现实生活中的休闲经济、假日经济,都是理论的闪光点和创新点。

社会主义经济是一个动态循环的生产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还是一个处于特定的发展阶段并向特定社会发展目标逐渐逼近的历史过程。因此,要在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再生产过程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因素引进来加以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真正反映出中国经济的开放性、阶段性和历史性。在这一部分,社会主义最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进程、条件等问题也要给以恰当说明。

上述内容,就是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六层次思路。把这个思路所涉及的问题进一步疏理,则可以细分为十个问题即“十论”:

(一) 导论。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科学价值与历史地位及其与时俱进、发展创新。

(二) 劳动价值论。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劳动本位”的经济学理念,劳动价值论的原创意义及当今面临的挑战,当代劳动发展的新趋势及创造价值的劳动在内涵外延上的发展变化,服务劳动、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及其价值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等。

(三) 生产力论。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论证生产力发展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关系,说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研究“三个代表”与先进生产力,生产力的结构——要素及其组合、要素组合规律及生产力经济,生产力形态

——自然生产力、劳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当代先进生产力发展趋势与科教兴国等。

（四）经济发展论。介绍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研究制约经济增长的因素及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性、历史条件，经济增长与发展，不同国家发展路径的选择及得失，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道路，科学发展观。

（五）经济制度论。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结构分析法与经济制度研究；厘清基本经济制度、具体经济制度、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联系与区别；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按要素分配；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制度设计与体制重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

（六）市场经济论。介绍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和他关于未来社会商品关系消亡预言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邓小平“计划与市场都是手段”的革命性论断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定。研究社会主义与公有制结合的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结构、特征、在我国的生成，市场经济的规律、机制、市场体系、市场秩序、中介组织、法律体系完善。

（七）宏观调控及国家职能论。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与国家职能理论，社会主义国家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的转型，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社会主义宏观调控体系及金融、财税、投资等项体制改革，经济运行、经济利益、收入和分配的调控及相关的理论、政策。

（八）生产目的论。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邓小平“本质论”对生产目的的新阐释，先富后富与共同富裕，需求、人的需求的全面性及其满足，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还要研究休闲经济、自由时间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九）经济开放论。介绍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理论。研究世界市场的形成扩大与当代经济的开放性，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区域化，世界经济组织与规则，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策略、过程与成效，国际分工、国际价值、国际竞争力，提高中国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战略与对策。

（十）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与趋势论。重点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及现实趋势，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中国国情，“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及前景。研究分析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物质技术基础的生成，实现过程的漫长性与确定性。

这个“十论”的研究框架试图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统的基础上，将反映时代发展、社会进步和中国特色的一些新认识、新结论包括进来，力求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一个新面貌。故不揣浅陋，提出来供同行参考。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研处）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几个基本理论的再认识

赵海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一样，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因此，政治经济学中几个重大基本理论需要重新认识。

一、关于劳动价值理论

1. 劳动价值理论涵盖的内容

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物品的有用性便是物品的使用价值。一种物品要成为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必须是供别人、供社会消费的。而不是供生产者自己消费。因此，它的使用价值必须通过买卖形式的交换而进入消费领域。同时，“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① 使用价值只有在商品经济中，它才是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商品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量的比例。显然，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它反映着商品生产者与自然界的联系。商品价值是指人类劳动的凝结物，或者说，凝结了的（或物化了的）人类劳动。价值乃是交换价值的基础，是商品的内在属性。而交换价值不过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总之，一切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它们在质上是不相同的。但作为价值，它们在质上却是相同的。因此，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比较。

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指商品生产者根据劳动的目的、对象、所用的工具和操作方法所生产商品的劳动。每一种具体形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一种特定品种的产品。每一种特定品种的产品，能够满足人们一种特定的需要，因而是一个特定的使用价值。可见，具体形式的劳动能够生产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是指人类劳动力（包括脑力和体力）在生产上的一种消耗或支出。在商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页。

社会里，把每一种用来交换的产品，都只看作是一定量的物化的抽象劳动。很显然，价值是由商品生产者的抽象劳动形成的，它是凝结状态的抽象劳动。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即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马克思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①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越多，则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便越小，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便越小。反之亦然。显然，劳动生产率是和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成正比例，而和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例。总之，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商品的交换则依据商品价值来进行。这是贯彻在商品经济中的一种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即规律调节着社会的生产和流通。

2. 劳动二重性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劳动二重性理论彻底地划清了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界限，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二篇结构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创立了商品二因素理论，但很不彻底。马克思首次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理论，才彻底地从理论上阐明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个理论说明了价值是由抽象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只与具体劳动有关系。价值只有一个源泉——抽象劳动。使用价值有两个源泉——具体劳动和自然界。显然，只有抽象掉具体劳动，才能抽象掉使用价值，抽象掉人与自然的关系，纯粹地建立价值的社会本质，价值范畴才能成为经过逻辑加工的科学范畴。同时，区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就能区分劳动生产率（力）和一般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间的界限。劳动生产率（力）属于具体劳动范畴，同抽象劳动无关系。因此，只有抽象掉具体劳动，才能抽象掉劳动生产率（力），从而纯粹地确立价值的科学范畴。最后，区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就能说清楚商品内在的矛盾。说清楚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对立统一关系，商品与货币的对立统一关系。说清楚商品拜物教的性质以及劳动力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关系。可见，劳动二重性理论对建立《资本论》第一卷第一、二篇结构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第二，劳动二重性理论彻底划清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界限，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四、五篇结构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劳动二重性理论区分了劳动生产率（力）和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属于抽象劳动范畴，它形成商品价值。因此，它的必要部分时间形成的价值补偿了劳动力价值；它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页。

的剩余部分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在一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直接作用下形成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而在劳动生产率（力）提高的间接影响下，由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而引起相对增加的剩余劳动时间形成的剩余价值却是相对剩余价值。

第三，劳动二重性理论彻底地划清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界限，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结构的建立起了关键作用。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那里，混同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界限，从而也混同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之间的界限。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抽象掉具体劳动和使用价值，从而来纯粹说明价值。抽象掉不变资本，来纯粹说明剩余价值。因为从具体劳动来看，资本主义生产有两个因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若从抽象劳动来看，只有一个因素——劳动力。因此，剩余价值率只能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工作日只是剩余劳动时间与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而和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无关系。

总之，劳动二重性理论的发现，使马克思的价值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成为科学的学说。正是这样，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点。

3. 坚持劳动价值论，辨析生产劳动范畴

在当前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资料的投入不断增加，引起不变资本量的不断扩大。同时，使用工人数量在减少，引起可变资本量相对缩小。这样，使生产资料的价值在产品价格中的比重增大。这种现象给人们造成生产要素决定价值的误解。实际上，自动化也好，机器人也好，仍然都是生产资料。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要求，这些生产资料只是转移价值，并不能创造价值。况且，生产资料价值归根到底还是劳动创造的。

至于科教文卫等第三产业部门的劳动能否创造价值，始终存在着不同看法。按照传统观点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言下之意，科教文卫等第三产业部门的劳动不是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不创造价值。实际上，生产劳动有两种涵义。一种是指能生产某种物质产品的劳动，即物质生产劳动。一种是指能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后者除物质生产劳动外，还应包括生产、劳务（或服务）与精神产品的劳动。这些劳动也能创造价值，而且这种劳动多为复杂劳动与脑力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因此，在同样时间创造的价值要大于物质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对生产劳务（或服务）与精神产品的劳动如何创造价值问题，众说纷纭。在实际生活中，李江帆同志在《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一文中，根据马克思将使用价值分为实物的和非实物的两种形式的原理，分析作为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的

特点,指出它的非实物性、不能贮藏性以及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等。显然,这就决定了服务消费品价值的形成与物质生产部门生产产品价值的形成,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它并非物化在一个物质产品中;二是它的生产、交换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三是它具有流动性与凝结性相结合的特点;四是它有时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阶段随着最终产品的复杂程度而延长,因此这一阶段创造的价值也就增大,例如科教文卫等部门的劳动及其创造的价值过程就是如此。总之,随着第三产业概念的引入,把科教文卫等部门的劳动看作是生产劳动,也创造价值,这是符合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要求,也符合社会不断前进的事实。

二、关于剩余价值理论

1. 剩余价值理论涵盖的内容

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但是,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显然,当作货币的货币和当作资本的货币,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前者,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作为后者,货币是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马克思把这个能带来价值增值的货币叫做资本。一句话,资本就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是,资本的价值增值不能发生在作为资本的货币本身,只能发生在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为劳动力商品在使用价值上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因它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它在消费过程中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可见,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劳动过程三要素,即人们有目的活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有其两个特点:一是劳动者是为资本家进行劳动,同时,他们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在资本家监督下进行。二是劳动成果归资本家所有,而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二是价值和价值增值过程。价值增值过程不过是超过一定点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因为资本家把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为补偿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以上,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就会超过劳动力价值,资本家就能够从雇佣工人身上榨取到剩余价值。显然,剩余价值就是由雇佣工人所创造而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可见,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资本的唯一生命冲动,就是增值价值,榨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在雇佣工人“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①时,它是绝不会放手的。资本是死的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4~335页。

动，象吸血鬼一样，它必须吸收活的劳动，才有生命，而吸收的愈多，它的生命就愈活跃。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根据资本的各个因素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作用，把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由于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生产资料这一部分资本价值只是转移自己的存在的物质形态，而不发生任何量的变化，不发生增值，所以马克思把这一部分资本称为不变资本。对于资本家投在劳动力上面的那一部分资本，马克思称之为可变资本。因为劳动力价值不是被转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同时，工人还生产出剩余价值。显然，这一部分资本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可变的量。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方法概括起来不外两种：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过劳动日的绝对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马克思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而用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马克思称之为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般基础。因为，只有把劳动日绝对地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上，资本家才可能占有剩余劳动，获得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又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出发点。同时，若从这两种方法对于劳动日的最一般的关系上来看，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好象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好象又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但从资本家实际如何提高剩余价值率方面看，这两种方法的区别就是非常清楚的。总之，从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方法来看，资本的本质就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2.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本质特征是剩余价值生产。而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剩余价值产生的来源是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使用。显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同时，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分析，进一步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所在，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论证，又验证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程度。显然，在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即资本是历史上一定的生产关系。

在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创立了工资理论。马克思通过区分劳动和劳动力之间的区别，揭示了工资的实质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因为劳动不是商品，没有价值，不能出卖。显然，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态，这就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

在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创立了资本积累理论。马克思说：“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① 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乃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再生产按其规模来说，可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简单再生产就是在原有规模上进行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则是大于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资本主义再生产特点是扩大再生产，而不是简单再生产。但从简单再生产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即支付给劳动者的劳动基金，是劳动者自己创造的；二是资本家手中的全部资本，不管它最初是怎么来的，经过一定时期以后，都会变成剩余价值的积累物，变成由剩余价值积累起来的资本；三是雇佣工人的个人消费，也是完全从属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需要的。显然，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叫资本积累。资本家不断地利用无偿占有的别人劳动的成果，来继续无偿占有别人更多的劳动，以增值资本价值，扩大资本规模，这就是被等价交换的外交所掩盖着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本质，也就是资本积累的本质。一句话，资本积累理论是在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又服务于剩余价值学说。

在剩余价值学说基础上，又创立了利润、利息和地租理论。当人们不把剩余价值看作是可变资本的产物，而是把它看成为全部垫付资本的产物或增加额时，剩余价值便取得了另一个形态，即利润形态。利润和剩余价值本来是一个东西，所不同的只是，剩余价值是对可变资本而言的，而利润则是对全部垫付资本而言的。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则是剩余价值的现象形态。正因为利润本质上是剩余价值，只是在外观上表现为整个垫付资本的产儿，所以马克思便把利润称之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各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使得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率转化为平均利润率。这样，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进一步被掩盖和被歪曲了。同时，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价值便同时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所构成的。生产价格出现以后，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更进一步被掩盖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正常情况下，利息只能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利息则不过是剩余价值的特殊的转化形态，是借贷资本家凭借资本所有权，通过贷出资本收取代价的形式而获得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地租和封建地租有着不同的特点：一是封建地租以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前提，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要和经济外的强制，即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相联系。而资本主义地租则以资本主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1页。

义土地所有制为前提，它体现着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地主对于租佃资本家或租佃资本家对于农业工人，都没有经济外的强制关系。二是封建地租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它在量上一般总要包括农民的全部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但资本主义地租只能是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以上的那一部分，即超额利润或额外利润。这样，地租的出现更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

可见，只有依据剩余价值学说，才能说明剩余价值如何转化为利润、利润如何转化为平均利润，最后说明商品价值如何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的分割问题，即产业资本家获得平均利润，商业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家获得利息，资本主义土地所有者获得资本主义地租。这样，科学的利润、利息和地租理论才得到确立，资本主义种种现象、假象才得以解释和拆穿，从而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剩余价值生产。

总之，把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揭露出来，这是马克思的划时代的贡献。对此，恩格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马克思著作的划时代的功绩。它使社会主义者早先象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样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经济领域，得到了明亮的阳光的照耀。科学的社会主义就是从此开始，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的。”^①列宁在评价剩余价值学说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地位时也指出，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3. 坚持剩余价值学说，面对多种经济并存的现实

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以开放的、社会化大生产为条件，研究了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化为资本。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从而找到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建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那么，在我国现阶段，劳动力能否成为商品，剩余价值是否还存在等等，是否还存在于今天社会里。对此，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在我国现阶段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三、关于资本积累理论

1. 资本积累理论涵盖的内容

资本的有机构成：任何一个产业资本家，都必须将他的资本投放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上。因此，从自然形式上来考察，资本总是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的。并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总的来说，取决于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01页。

生产技术的发展水平。显然,这种由生产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就是资本的技术构成。但从价值形式上来考察,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这两部分资本价值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比例。这种比例,就是资本的价值构成。在资本的技术构成和资本的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资本的价值构成是以技术构成为基础的,技术构成的变化通常会引起价值构成的相应变化,而价值构成的变化则通常反映着技术构成的变化。很显然,由资本技术构成所决定并反映着它的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就叫着资本的有机构成。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个别资本的增大,是通过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这两种形式实现的。资本积聚是指个别资本依靠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来增大资本的总额。显然,资本的积聚不外是资本积累的直接结果。资本积累的规模愈大,资本就积聚得愈多,从而个别资本的总额也就愈大。资本集中是指由几个资本合成一个较大的资本而引起的个别资本的增大。马克思说:资本集中“是已经形成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别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①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资本的积聚为资本集中提供条件,资本集中通过竞争使积聚起来的资本形成一个大资本。资本积聚和集中是资本主义制度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灭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资本原始积累,就是指直接生产者遭受强制剥夺而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社会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所谓“原始的”积累,是因为这种积累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前,而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资本积累。通常的资本积累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成之后,资本家把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转化为积累的过程。资本的原始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出发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剥夺过程并没有停止。过去是资本家剥夺个体劳动者,而现在则出现了资本家之间的相互剥夺。这种相互剥夺乃是资本积累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现象,它是通过资本集中来实现的。资本集中,无论是采取强力吞并的形式,还是采取组织股份公司的形式,其实质都是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剥夺,这是一种趋势。如果说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家对小生产者的剥夺,结果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迅速确立的话,那么,资本的积累、资本积聚和集中,则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准备了条件。只是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6页。

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

2.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作用

资本有机构成理论是马克思首先提出来的，是根据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区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个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马克思的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理论提供理论依据。因为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理论都是以资本有机构成为理论基础的。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各个生产部门由于有机构成不同，所获得的利润也不同。因此，通过竞争使资本发生转移，出现平均利润，最终实现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由于平均利润率出现，使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同时，这个理论对再生产理论也起重大作用。再生产中的第Ⅰ部类和第Ⅱ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如何，取决于再生产中两大部类的有机构成的情况。在积累和扩大的再生产中需要追加多少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是以资本有机构成的情况而决定的。总之，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结构安排和理论分析都是非常重要的。

3. 如何理解“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在以往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把马克思这个预见性结论理解为“建立起与生产的社会性质相适合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革开放以后，有不同观点见诸刊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王珏同志提出的“劳动者个人股份所有制”是有道理的。按照王珏同志的理解，劳动者个人股份所有制是指，“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根据现实的生产力条件，通过劳动为主的手段获取收益，组成个人为主体的股份制形式，使劳动者的利益与社会财产联为利益与风险对称的经济共同体，实现其政治上做主人，经济上做主体的所有制形式。”^②显然，这种所有形式，是通过股份所有，使劳动者既可以通过劳动获取报酬，又可以通过股本取得收益，由此使劳动者与财产变成直接的利害关系。在这里，财产采取股份所有，有利于产权明晰。劳动采取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分工发展，提高效率。一句话，劳动者个人股份所有制既不同于以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个体所有，也不同于国有制的个人所有制。总之，这个问题还可以展开充分讨论，以达到正确理解之目的。

综上所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等对马克思经济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2页。

^② 张问敏等编：《中国经济大论战》，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15页。

学说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这些理论对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乃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财富，有着重大的意义。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科学价值及现实意义

蔺栋华 陶震安

建国以来的经济建设实践证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实际工作中都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在我国进入了工业化中期并融入世界经济发展轨道的今天，仍有必要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不仅是对社会再生产各环节有机衔接的阐述，而且包涵着西方经济学社会总供求均衡理论远不能比的深刻内涵和广泛内容。所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并与我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要义

在商品经济社会，人们为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不断生产。通过市场交换，生产者实现商品的价值，消费者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在市场交换关系当中，社会总产品的物质形态千差万别。从价值形态看，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可分为不变资本（ c ）、可变资本（ v ）和剩余价值（ m ）三个组成部分。产品的价值由 c 、 v 、 m 三部分构成，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是考察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前提。

与社会总产品的实际用途相适应，社会生产还划分为两大部类：一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类，简称为第一部类；另一类是消费资料的部类，简称为第二部类。在每个部类的内部，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生产部门，例如第一部类中有采矿、冶金、燃料、动力、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和为重工业提供原材料的农业部门；第二部类中有纺织、食品等轻工业部门和农业中的大部分粮食生产等等。区分这两个部类产品，并不是看产品出产于何处，而是看产品的最终用途，即要看该产品究竟是用于生产过程当中还是用于最终的消费。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使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范畴，但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

以国民经济总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总产品为出发点，来研究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的，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总量均衡问题。两大部类的等式推导，就是对其总量平衡思想的阐释。

1. 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I(v+m) = IIc$$

即第一部类向第二部类提供的生产资料，同第二部类向第一部类提供的生活资料，二者在价值上必须相等。

从这个公式可以引申出以下两个公式：

$$\text{第一， } I(c+v+m) = Ic + IIc$$

即第一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应该等于两大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总和。

$$\text{第二， } II(c+v+m) = I(v+m) + II(v+m)$$

即第二部类的总产品的价值，应该等于两大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总和。

从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即 $I(V+M) = IIc$ 来看，它表明，要使简单再生产顺利进行，第 I 部类生产资料的供给必须等于第 II 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第 II 部类对第 I 部类生活资料的供给必须等于第 I 部类对生活资料的需求，两个部类相互供给和需求必须保持均衡。进而还可以推算出，第 I 部类生产的全部生产资料的数量和品种必须与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适应，第 II 部类生产的生活资料数量同样要与两部类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保持平衡，从而得出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实际就是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

2.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I(v + \Delta v + m/x) = II(c + \Delta c)$$

即第一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再加上本部类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三者之和应当等于第二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价值和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

从这个实现条件可以引出另外两个实现条件：

$$\text{一是： } I(c+v+m) = I(c + \Delta c) + II(c + \Delta c)$$

即第一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两大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价值和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

$$\text{二是： } II(c+v+m) = I(v + \Delta v + m/x) + II(v + \Delta v + m/x)$$

即第二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两大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以及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之和。

从扩大再生产角度看，以上述再生产的平衡公式为基础，该公式同样可以推算出

在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均衡的结果。可见，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已经包含着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思想。

3. 技术进步对再生产的影响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必然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列宁把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因素引入马克思的公式，揭示了技术进步条件下社会扩大再生产必须满足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条件。

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社会扩大再生产运动表现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在积累起来的资本价值中，转变为不变资本的部分要比可变资本大。这样，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对于生产资料的需求比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增加得更快，从而，生产资料的生产比消费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增长得更快。

生产资料的生产优先增长不可以脱离消费资料生产而孤立的发展，因为生产资料的生产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正如列宁指出的：“生产消费（生产资料的消费）归根到底总是同个人消费联系着，总是以个人消费为转移的。”^①第一部类生产的发展，需要追加劳动力，就必须依靠第二部类提供消费资料。没有第二部类生产的扩大和发展，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迟早会遇到产品实现的困难，而不能够持续扩大和发展。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商品经济社会，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发展是自发形成的，通过经济周期波动来实现。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②马克思揭示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的再生产理论，是研究经济发展理论的基础。

4.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与当代西方经济发展思想的比较

经济发展的问题始终是经济学界密切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最早的关于经济发展的思想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自由竞争必然可以实现均衡稳定的发展。其代表人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萨伊认为，经济社会的任何供给都会自发的创作出适当的需求，通过自由竞争，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社会经济总量总是可以保持均衡的发展趋势。这就是著名的“萨伊定率”。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一

^① 《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中），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62页。

度追求速度的高增长，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合理性，虽然也曾取得过快速增长的成果，最终却出现了祸及整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

面对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探索经济增长的规律性，从而也就产生了至今仍占据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主义发展思想。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有非自愿失业而未能实现充分就业，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主要是因为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是由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利息率变化的最低限度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是因为人们收入增长之后消费并不以相同比率增长，而且边际消费有递减的趋势，一部分社会产品不能实现，从而影响了国民收入增长，不能实现充分就业。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单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实行国家调节。他主张要由国家进行需求管理，设法刺激和扩大总需求，重点是投资需求。因为按照他的乘数原理，投资增加可使国民收入成倍增长。收入增长，消费需求就增加，从而又会引起投资增加，进而又会导致国民收入进一步增长。这样，就可实现经济稳定发展，以他的这一套主张为基础，二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

凯恩斯的认识无疑比新古典经济学家前进了一步，但是他对市场调节局限性的认识还是浅层次表面的。市场调节的局限性是市场机制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因此这些局限性早已有之。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表现得如此充分，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造成的。生产社会化要求社会生产的各个产业和部门之间要保持一定的对比关系。从宏观上看，社会总需求要与社会总供给相适应，只有社会总产品在物质上和价值上都得到补偿，社会再生产才能正常、顺利进行。然而，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决定了社会生产必然呈现无政府状态。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

其一，各个厂商为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更高的利润率，进行着激烈的部门内竞争和部门间竞争。在竞争中，生产者由于掌握的信息不足，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因而往往供给已经过多而仍拼命投资扩大生产，有时供给已经短缺而仍继续收缩，表现出社会生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

其二，资本主义的分配关系具有阶级对抗性，使作为社会总需求中个人消费需求的主要组成部分的广大工人和其他劳动群众的个人消费需求建立在这种分配关系的基础上，具有局限性和狭隘性。一方面，生产有无限扩大的趋势，社会总产品也即社会总供给不断增长；而另一方面，社会个人消费需求有相对不足的趋势。生产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矛盾。

其三，社会总产品扣除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和工人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以后的

余额，即社会的总储蓄。由于种种原因，例如资本有机构成、产业构成、利润率和利息率及其对比关系等的变化，总储蓄不会等于总投资，从而这部分总供给（总储蓄）与这部分总需求（总投资）也总是处于不协调和矛盾之中。

其四，个别企业和个别部门资本周转速度是不同的。一类是资本周转快的，另一类是资本周转慢的。周转快的，不仅在一年间不断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周转慢的，则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期内不提供任何有用产品。为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必须处理好这两大类的社会生产，否则，必然会引起物资紧张和货币市场的混乱。

其五，社会总产品的实现，即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在价值上和实物上都得到补偿。其中，固定资本的价值补偿是多次性的，实物补偿是一次性的。因此，每年社会固定资本需要实物补偿的数量不会是均衡的。为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就需要建立一种物资储备，控制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在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不可能进行这种控制，而且还往往造成祸害。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第一次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显露的结构均衡思想。马克思是以社会总产品为出发点，研究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问题的。因此，马克思的总供求均衡理论，既包括总量均衡，各种价值形式的供求均衡，也包括结构均衡，各种物质产品的供求均衡，即各个社会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马克思认为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结构均衡实际上是总量均衡的基础。因为价值是无差别的，而使用价值则是有性能差别的，一定量的供给或需求，总是特定使用价值的供求，只有满足了对特定使用价值的需求，价值才能实现。因此，马克思才把不同产品，按照最终用途归类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大类，又把消费资料分为必要消费资料和奢侈消费资料两个分类，推论出不同部类之间或部类内部都必须保持一定的生产比例，从而论证了结构均衡是总量均衡的基础。

二、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在我国的实践

纵观我国自建国以来所走过的路程，不难发现，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甚至可以说，马克思提出的学说与理论有些在他国没有进行实践的在我国也进行了实践。正如有的专家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以 1978 年召开的“三中全会”为分界，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两个时期三个阶段。在第一个时期（1949 年～1978 年），我国按照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构想，积极建设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借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设经

验,逐步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为主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领域实施“工业为主导,农业是基础”的发展模式,同时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多、快、好、省的步伐赶超世界经济发达国家——英美,尽快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一时期我国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和再生产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实践。在第二个时期(1978年以来),以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根据“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我国又开始从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过渡。这一时期的重点在于调整和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以寻求健康、稳定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以说,5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充分验证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结构均衡思想的科学性,在经历了一系列“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 1949~1957年的经济发展

从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和制度变化最快的时期,在短短的七年里,一方面结束了百年动乱,仅用三年的时间,就奇迹般地在战争废墟上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工业发展水平的距离。

从1953年开始,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我国同时走上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过渡的道路。其结果,一是在经济落后、资金和人才短缺的条件下,为加快工业化步伐,被迫选择了一条实行进口替代和压缩消费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二是为保障上述战略的实施和“一五”计划的完成,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即通过实行单一公有制,排除市场调节对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妨碍,将资源配置控制在政府手中。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制度的变革,虽然在当时保证了“一五”计划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但并没有像理论推导那样,实现社会产品总量平衡的结果,进而导致了許多消极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一方面这种发展造成全面“短缺”和经济紧运行,使工业化缺乏后劲和引发周期性的波动;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2. 1958~1978 经济发展

1958年是我国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也是毛泽东摆脱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走中国自己经济建设道路的开始。就经济建设来说,这20年我国取得了很大成就,在西方封锁、中苏关系紧张的国际环境中,基本建立起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在国防工业、尖端科学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外,还在改善基础设施、缩小沿海与内

地差距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是这种增长，是靠增加投入和牺牲消费来维持的。

从就业结构来看：农业剩余人口问题变得更为严重。人民收入增长很慢，生活水平没有多大改善。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尽管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算慢，但是经济建设是付出大于所得，挫折的痛苦多于成功的欢乐，失败的教训多于成功的经验。鉴于同期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我国在此前后两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3. 1979 以来的经济发展

1978 年 12 月至 1998 年底，是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为目标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这个时期是从前 28 年奠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上起步发展的，虽然前进的起点比较高，但继续受着传统的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的束缚，又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因此，1984 年以前，我国经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首先纠正和清算了前 20 年“左”的错误，根据我国国情，重新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其次，在经济发展方面，着手调整整顿国民经济，理顺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的关系，制订以翻两番为目标的新的发展战略；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以原有体制最薄弱、受压抑最重的农村经济为突破口，并取得巨大成效，产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改革示范效应；与此同时，还在沿海设立经济特区，率先实行对外开放。

经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迅速发展，到 90 年代初，我国已进入由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经过治理整顿，社会供求比较平衡，客观上为加快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的召开，统一了全党关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方面的认识，制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方向，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正确决策，调动了全国人民的积极性。1992 年到 1997 年的 6 年间，由于及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大力推进改革，积极平衡总量，切实调整结构，使“八五”计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波动最小的时期。到 1997 年，我国国民经济已经提前实现了原定于 2000 年才实现的翻两番任务，基本上改变了我国长期存在的供给主导型的短缺经济。可以说，经过 20 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基本上实现了党和政府长期追求的“高增长，低通胀”目标，国民经济已经走上良性循环道路。据资料，我国 2002 年综合国力世界排名居第六位。2004 年我国人均 GDP 已突破 1000 美元大关，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这些成绩的取得，如果说我国经济发展第一时期（1949—1978 年）是以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中的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指导思想的话，那么，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时期（1978 年至今），在宏观调控上是以供需总量平衡为指导的。这种指导上的变化，并没有完全超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

内涵,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延伸和完善。

三、经验总结与前景展望

从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经济五十多年的发展,既有辉煌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探索,甚至曾遭受严重的挫折。回顾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取得的伟大成就,反思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展望新世纪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景,可以使人们更牢固地坚持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从而坚定振兴民族经济实现小康社会的信心,进而建立起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1. 经验教训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只是用两大部类描述了社会总产品的生产程序上的均衡,其前提条件没有将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等因素的交织影响纳入其中进行推理。虽然马克思也将生产关系理解为人的关系,但事实比想象的更为复杂。所以我国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的“超英赶美”,60 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80 年代前期,以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为中心等,既有它的现实性,也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认识的不全面,进而在实践上出现了偏差。

(1) 在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领导的关系时,往往过分突出强调政治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将经济发展提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就是重视经济,片面将政治经济的关系割裂开来。经济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遵循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而最根本的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不可违背社会再生产必须保持均衡发展的原则,扩大再生产必须以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物质产品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第一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再加上从事本部类生产的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三者之和应当等于第二部类原有的不变资本价值和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这一深刻的理论指导。

(2) 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保证经济发展与人民群众生活同步提高。前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正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这个关系,结果经济发展的同时,没有兼顾人民生活的改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最终导致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关于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均衡的理论,指导我们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兼顾生活资料的再生产,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使得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3) 在处理速度和效益、公平与效率关系上明显出现过几次大的反复。片面追求经济的超高速增长、追求工业产值的翻番、追求铺摊子外延式的粗放式经营,导致

经济过热、效益下滑，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多年来普遍低迷。将经济稳定和发展对立起来的高速度肯定不能持久，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将是有害的。关于公平与效率，既是阶段性的有所侧重，也有二者兼顾的正确关系处理。但多年来不是长期执行“平均主义”式的所谓公平优先原则，就是片面强调效率、显失公平，理论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实践中“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巨大反差，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4）树立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明确指出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以及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水平。邓小平明确指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及时地制定并实施了科教兴国的发展战略，全社会提高了对知识工作者的尊重，明确了知识工作者的价值，近来的经济实践中还出现了以知识作为资本投资入股的新尝试，所有的这些举措都对我们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5）在经济建设过程当中必须保持经济总量的均衡，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五个统筹”的要求，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这是在指导经济建设和引导经济发展工作上的理论创新。按照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的要求，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要为子孙着想，要为国家、世界的长期繁荣稳定着想，必须努力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规模空前扩大，开发手段日益发达，为人类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但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应有度，过分甚至掠夺性地开发利用将造成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后果。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较少，环境承载力弱，对于那些严重耗费资源的企业要坚决“关、停”，对于那些只注重眼前经济利益而污染环境的企业和个人要坚决治理、查处。只有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爱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才能走上健康的、可持续性的、文明的发展道路。

（6）对待我国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应持的态度。这些经验包括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大力发展生产力是党的工作中心；创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分配方式、多种经营方式和多种管理方式并存的经济结构；以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将发展建立在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注重综合平衡，加强宏观管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等方面。这

些经过艰苦努力和付出很多“学费”而获得的宝贵经验，我们决不能遗忘，应十分珍惜，并且要根据新情况妥善加以充实、完善、运用。

2. 未来展望

我国的长期发展目标是到 2050 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近期发展目标是 21 世纪的前 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今天所追求的和谐社会，就是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社会的和谐，既包含稳定、协调，又高于稳定、协调；既体现公平，又促进效率，是公平和效率的统一；既包含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又包含社会发展的平衡机制，它是社会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统一；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它是价值目标和社会历史过程的统一。这样来认识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整体性思考问题的观点，也是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应用的扩展以及对过去应用错误的修正。为此，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以及其他学说，将改变过去死搬硬套、本本主义的应用僵化模式，而是根据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用活，进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其在继承的基础上得到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3. 《列宁全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4.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1993 年版。
5. 赵德馨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6. 安格斯·麦迪森：《中国经济的长远未来》，楚序平、吴湘松译，新华出版社 1999 年版。
7. 《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5 期
8. 谷源祥主编：《发展中国家跨世纪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9. 张杰：《渐进改革中的金融支持》，《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0 期

（作者单位：山东社科院经济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学社会主义

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与阶段性

宋士昌

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根本内容，就是要深入研究和总结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在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中，社会主义作为理论、运动、制度的综合体，自有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自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因而表现为一个完整且又相对独立的动态过程。但在时代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义与时代特点的结合，使其发展过程在不同的时间坐标系统中呈现着不同特点，因而又具有了鲜明的阶段性。以发展过程与阶段统一的思维视角深入把握社会主义，凸现出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品格与特点。

一、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与阶段的统一

“过程”通常是指事物在空间上的扩展和时间上的推移，也即是事物产生、发展、转化及其灭亡的历史。它是一个社会发展进化的概念。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从总体方面来说，包括两层意思：首先，从社会发展方面考察，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由于它自身所包含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日益进步，它必然要发展到更高的阶段上去。从辩证发展角度来看，社会主义体现着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轨线，因而是一个过程。其次，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考察，社会主义有一个由理论到实践，以及在实践发展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革和自我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性，体现着它与社会发展规律的呼应，折射出它在历史行程中存在与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左右着它自身发展进步的连续性。

所谓社会主义发展阶段论，可以作广义与狭义，也可以说是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的理解。从宏观上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阐明了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两个发展阶段的学说，分析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基本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马克思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过渡时期；共产主

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主义阶段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就此意义而言，社会主义阶段也即上述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完整过程。微观理解即社会主义制度在与某些具体国家国情的结合中，所对社会主义发展水平的客观把握。邓小平在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时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① 严格来说，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还不完善、发展还不充分的阶段。对于社会主义阶段，还有一个中观方面的理解，即从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以来，作为理论、运动、制度的结合体，社会主义在世界发展进程中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因社会主义与时代有一个结合问题，因而使社会主义在世界发展的不同时期呈现出新的面貌和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人类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解中，体现在这一理论指导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更体现在社会主义现实制度的实践运行中。社会主义本身是一个“世界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发展阶段，因而，以世界眼光审视全球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现实马克思主义者的一项使命。

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四次历史性飞跃

自 19 世纪 40 年代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理论、运动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社会主义学说实现了巨大的飞跃，社会主义运动得以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转化为现实之后也在逐步的巩固和完善。

科学社会主义第一次理论飞跃完成的标志，是 1848 年 2 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第一次完整的阐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通过这一纲领性文件及其他科学社会主义著作，不仅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作了明确的回答和完整的表述，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的矛盾冲突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践，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基本原理，构成了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有力地指导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9 世纪 40 年代之后，欧洲工人阶级从自发的阶级转化为自为的阶级，在批判资本主义、追求社会主义过程中掀起了一次次革命风暴。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在 19 世纪没有出现，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理论中提出许多设想，这为以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奠定了一个科学的前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52 页。

提。科学社会主义犹如一道思想闪电，撕裂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乌云，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这就预示着，世界再也不会原有轨道上推进了，人类社会展开了最生动壮观的丰富历史。

社会主义发生第二次飞跃的代表人物即列宁，其标志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伟大贡献，就在于他把这一科学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揭示了俄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规律，率先创建了科学社会主义实体，使科学社会主义获得了崭新的内容，得到了巨大发展。从此，开始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主义制度在俄国出现之后，即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构想和探索。从1917年到1921年，俄共实行的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路线，是用“强攻”战术领导苏维埃国家。1921年后，列宁在不断总结“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形成了新的构想，探索实行“新经济政策”。在俄国社会主义理论与制度建设形成巨大飞跃的同时，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亦开展的如火如荼。20世纪上半叶，世界各地共产党组织如雨后春笋，并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开展着多种形式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在为“自己政权”的形成探索着各种社会主义道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则为了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而进行着解放斗争。同时，共产国际对世界性社会主义也曾发挥过指导作用。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第三次飞跃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相连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发生在20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找到了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这一条件下，它成功地解决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关于党的建设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发展为多国实践，并形成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时期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历经坎坷，但却在世界更为广阔的领域中取得了历史性进步。

二战之后所建立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艰难的环境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发展。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影响，一些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通过不同的斗争方式，证明和扩展着社会主义的影响。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形成了空前的高涨。资本主

义国家共产党在新的环境中寻求自身存在合法性的根据，开始选择不同于传统的斗争形式。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参与，在反殖民主义斗争中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虽然由于社会主义体系的破裂，共产党之间发生了争论，产生了消极影响，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事实是不容否定的。

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第四次飞跃，发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开始，相对世界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中走了弯路，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面临着当代资本主义的严峻挑战。在这一现实面前，很多国家先后认识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纷纷进行改革。至 70 年代后期，正当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寻求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飞跃而苦苦探索的时候，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当代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大潮中，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迎着风浪前进的典型代表。在实践中，邓小平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保证、依靠力量和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基本问题形成了全新意义的答案，并在这一探索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一探索的成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实现了现实社会主义由单一模式向模式多样化过渡时期的新的历史性飞跃。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改旗易帜，使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遭受重大挫折。但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在这一复杂局面中沉沦。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使社会主义制度在完善中迸发出无穷生机，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捍卫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等方面的重大创新性认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出了新的路子。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也随着形势的变化，探索斗争形式，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积极态势。

社会主义发展的四个阶段，四次飞跃，四个高潮，说明社会主义虽然面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却迎难而上，在世界发展中开拓出自身的新境界、新天地。这既证实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又充分显示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

三、科学社会主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点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凝固不变的，同样，以其所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也不是静止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点。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运动或制度，是“世界历史”推动中所孕育、产生的新生事物，它必须深刻反映世界发展的特点，总结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新鲜经验，跟随世界的发展而进步。

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一百五十年的历史行程看，在不同的阶段，无论理论、运动还是制度，都围绕一个主题来进行，这一主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环境始终处于变化之中。世界发生重大变化，各国的实际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无产阶级政党本身也发生着重大变化。人类社会发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期待新的理论创新，社会主义运动实践有赖于在新条件下对新道路的开辟。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基本问题，不可能形成一劳永逸的答案。对这一问题的求索，是一个长期性课题，也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前提下而发现、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作了谨慎而科学的初步构想。列宁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和指导世界革命的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了新的回答，并在此基础上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形成了新的理解。如社会主义从“共同革命胜利论”向一国革命胜利论的转化，社会主义必须充分发挥商品经济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建立在国情基础上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是一个改革开放的社会，等等，这一系列的新思想、新判断，使科学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结合时代特色和中国国情，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中，形成了具有新时代特点和中国气派的答案。邓小平结合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特征，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了进一步的回答。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理解，无不具有全新意义，无不体现着 20 世纪末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实践水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立于 21 世纪的更高起点，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这两大历史性课题所形成的新的理论概括。

当代世界，已呈现出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特点。这一时代的变化，为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性理解和飞跃性发展，提供了前提与根据。当前社会

主义理论、运动、制度在世界上形成了多种探索形式、多种发展道路，无不说明了这个特点。面对当代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对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世界，面对社会主义运动提出的一系列新课题，社会主义只有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上不断进行开拓创新、与时俱进，才能奋发有为、前景灿烂。21 世纪，时代的主题仍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特征，为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和外部条件。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环境中，社会主义在应付错综复杂的内外条件下尚取得重大发展，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将使社会主义国家应用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社会全面发展的优越性吸引群众，并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论是最完善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运动是向最美好理想追求的环节与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走向美好未来的载体并为理想的实现开辟着道路。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制度在 21 世纪必定会赢得自己的光辉未来与伟大胜利，对此，我们应该充满信心。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和谐社会的科学社会主义解读

包心鉴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战略举措，从而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我国现代化发展一系列根本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和谐“四位一体”的总体战略格局。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结果，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贡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既不是我国传统文化关于和谐社会理想的简单复原，更不是19世纪欧洲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的简单照搬，而是基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要求而作出的科学抉择。和谐社会的内核是科学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因此，多方位地对和谐社会进行科学社会主义解读，无论是从理论层面来说还是从实践层面来说，都无疑是极其必要的。

一、社会主义本质：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前提

和谐思想，早已有之。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在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学派重要思想家都曾把和谐作为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们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孔子主张以“仁”待人，也主张以“仁”待物，即所谓“推己及人”、“成物成己”，强调天、地、人和谐发展。孟子提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追求“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宋代哲学家张载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认为天地万物是人的朋友，天与人、万物与人类在本质上是是一致的。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他们提倡宽和处世，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思想一贯主张的理想人格是宽厚处世、协和人我。孔子主张“和为贵”。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墨子提出

了“兼相爱”、“爱无差等”的理想社会方案。儒家思想的经典《礼记·礼运》中更是描绘了这样一种和谐社会的蓝图：“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19世纪初叶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更是把和谐社会理想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奋斗旗帜。1803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发表《全世界和谐》一文，指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是不合理的，必将被“和谐制度”所代替。1824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进行共产主义试验，也以“新和谐”命名。1842年，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中，把社会主义称为“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并指出新社会的“和谐”是“全体和谐”。古今中外如此等等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理论，凸现着在那些特定时代条件下进步人们的社会理想，彰显着人类社会正义一面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对美好社会的向往。然而这些和谐社会理想蓝图，都不过是一种美丽的海市蜃楼，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实现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发展的规律。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才赋予和谐社会以真正科学的内涵。而只有在真正搞清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之后，构建和谐社会才有可能由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变成进步的社会实践。

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是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是什么”的解读。这是社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主义思潮产生迄今为止300多年历史长河中，关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争论以至斗争，一直没有停息过。即使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创立以来150多年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仍然存在着众多看法乃至歧义。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犹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搞不清楚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就搞不清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当然也就搞不清楚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解读，是正确认识和实际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理论前提。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产生的偏颇、误解、犹疑和困惑，主要表现为三种倾向：一种是庸俗化地理解社会主义，把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绝对化，把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忽视以至排斥社会主义在思想道德层面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要求；另一种是表面化地界定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从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某些特征如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等当成社会主义本质，从而把公有制、按劳分配凝固化、绝对化，以为只要坚持这几条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以至脱离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发展要求盲目追求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水平；再一种是抽象化地谈论

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仅仅看成是一种思想道德的产物，游离生产力的现实状况和变革要求，把思想道德水平当成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准，从而使社会主义实践陷入某些空想的误区。防止和纠正这三种倾向，尤其是后两种倾向，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历史进程，顺利地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本质，我们党进行了长期的不懈的探索。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精辟提炼，作出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这一理论概括，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获得的最重大理论成果之一，是对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和发展。这一重要理论概括，既突出地强调了生产力对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又突出地强调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指向，这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公平正义；同时突出地强调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这就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迄今为止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最完整、最科学的理论概括。

这一科学的理论概括，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前提意义。

首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坚实基础，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生产力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自觉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的根本体现。人是社会生产力的主体因素，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是要充分重视和发展社会主体力量的积极性、创造性，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地调动起来，形成人人各尽其能、人人各得其所、大家和谐相处的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局面。因此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基础，又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谐题中应有之义。游离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游离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构建和谐社会就有可能流于脱离实际的空谈。

其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逐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作为根本任务，维护公平正义，倡行诚信友爱。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逐步推进生产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改革，不断创造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激发社会机体活力的先进制度、体制和运作机制，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又一重要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保证。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但是这种消除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在短时期内就可以完全实现的，必须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制度不断健全的基础上才能逐步达到。这就要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中，必须坚持以改革为动力，通过经济市场化的改革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政治民主化的改革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体制，通过制度和体制的良好运行，调整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逐步抑制和消除分配不公和利益分化现象，创造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关系。离开生产力的不断解放和发展，离开体制、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把平等、公平、正义等等当成绝对化的目标去倡导、追求，不仅无助于和谐局面的形成，反而会诱导在其他层面上的矛盾和不公。这是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中曾经有过的严重教训。

最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价值目标，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全面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不断创造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是创造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适应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创造先进生产力，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物质前提。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创造民主、平等、公正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政治前提。三是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通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前提。以上三个方面，也就是围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最终目标而形成的社会主义全面本质。不断实现这三个方面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断实现的过程。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基础

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党对当代中国国情的科学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规律的最重要理论成果。这一基本理论，对于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当然同样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一切从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能从任何美好的主观愿望出发。胡锦涛同志强调：在充分认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利条件的时候，“我们也要认识到，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

化水平还不高，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任重道远。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要经历一个很长历史过程一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一个需要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不断推进的很长历史过程。我们既要立足国情，根据已具备的条件，积极主动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又要着眼长远，做好长期努力的准备，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①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基本特征和基本目标，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发达阶段，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方面还存在着薄弱环节，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还不够完善，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两个层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对于扎扎实实推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前进方向，必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

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者，作为迄今为止人类文明进程的最高成果，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可以消除一切剥削制度所固有的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现社会和谐进步。17、18 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欧美大陆迅速崛起，取代了封建主义自然经济，有力地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在客观上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内含的资本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由于为了榨取更多剩余价值这一资产阶级组织市场经济的狭隘目的性，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可遏制地导致了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关系物化、社会诚信退化、社会矛盾激化、人的本质异化等等接踵而至的严重社会问题和社会不和谐现象，从而使资本主义文明进程成为一种伴随着掠夺、奴役、盗窃、贪污、杀戮，浸透着血与泪的残酷进化过程。这就是资本主义文明所无法超越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狭隘性。资产阶级在创造着社会文明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阻碍着社会文明进程，这种自相矛盾和二律背反现象，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更高层次、更加和谐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的历史性的合乎逻辑的证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超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之处正在这里。社会主义制度不是人们观念形态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它是一个建立在社

^① 胡锦涛 2005 年 2 月 19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 年 6 月 27 日。

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公平、公正、有序和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在这样一种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必然形成和谐相处的崭新局面。构建和谐社会，既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文明进程的历史任务。

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与和谐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必然联系具体体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容纳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其他所有制经济成份，这就既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条件，又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从而可以使社会结构进入和谐发展的状态。第二，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制度，实行民主的国体与民主的政体相统一，同时不断推进民主的法制化和制度化，实行依法治国，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消除资本主义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狭隘性，使社会机体充满生机活力。第三，社会主义坚持以社会公平正义作为自己的价值目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是要消灭阶级、消除剥削，实现共同富裕，为社会成员自由、全面地发展提供有力的制度保证，这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不均和人的畸形发展的现象，使社会全面发展更加具有人的内在活力。第四，社会主义坚持社会全面发展的特性和战略，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不断提升社会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三大文明”协调发展将有力地促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完善，因此，社会主义有能力消除一切旧制度所特有的贪婪、腐败、堕落现象，在和谐的社会关系中推进社会不断前进。第五，社会主义坚持走统筹兼顾和协调发展的道路，在改造和利用自然、创造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倍加爱护自然、保护环境，不断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不断创造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人自身得到不断发展。

总之，社会主义社会是和谐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文明是高度和谐的文明。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文明进程的长期历史任务。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发展不能超越阶级，构建和谐社会只能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三分之二的人口从事农业，主要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城乡差距和“三农”问题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很远的工业，同时存在，工业化水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还存在相当大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

距；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地区差距和发展不平衡严重制约着社会全面发展；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人口较多的状况，同时存在，社会成员文明素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远远不相适应。生产力的落后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不仅存在着多种形式的公有制，而且存在着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并且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还需长足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所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不充分，封建主义残余和小生产习惯势力还有广泛的社会影响，资本主义腐朽思想也在不断侵入，由此诱发的权力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如此等等现象表明，我国今天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必须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假如把社会主义与初级阶段割裂开来，严重忽视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只看到社会主义“应该怎么样”而忽视了初级阶段“只能怎么样”，那么就有可能把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简单化甚至庸俗化，最终不仅难以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反而有可能引发新的不平衡而破坏社会和谐发展。

比如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现阶段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迫切任务，是广大社会成员的迫切期望。公平正义既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又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但是公平和正义是相对的、具体的，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一个长期奋斗的历史过程，必须同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必须同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必须同多元化的社会分配结构相适应，在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最大程度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确保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基础上逐步地谋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假如脱离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状况，把社会公平和正义简单化、绝对化，就有可能不切实际地吊高社会成员的胃口，进一步加大人们对公平正义的期望值与社会实际状况之间的差距，最终，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切方面的工作，都无不需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最大的实际。

三、社会主义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质内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本着力点是加强民主法治、维护公平正义、倡行诚信友爱、激发社会活力、促进安定秩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基本方面，贯穿一条主线，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社会理想，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无论是从理想目标来说还是从实践过程来说，都离不开人这个主体因

素，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其本质上说，就是一种人的主体价值得到充分尊重，人的主体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必须把坚持以人为本贯穿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个层面中去。

漫长的人类社会在经历了“以神为本”（神本主义）和“以物为本”（物本主义）之后，正步入以人为本的新阶段。以人为本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一种价值追求，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有识之士很早就提出了“民为邦本”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齐国著名政治家管仲最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概念，他在《管子·霸业》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中国古代大思想家孟子也曾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西方，以人为本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那时，一名叫普罗泰戈拉的智者就曾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为标志，把人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自身的崇尚。这种人文主义思潮，高扬人的意义和价值，反对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对于人的解放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以人为本概念虽然早已有之，但是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则是社会主义社会才具有的自觉的品格。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思潮，在本质上都是一种脱离社会关系、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人性论，“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一种宣言，仅仅停留在少数知识精英的书斋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赋予以人为本以真正科学的并具有可操作性的内涵，也才有可能真正地将以人为本融入和谐社会理想与实践之中。马克思主义对以人为本思想的伟大贡献在于，它科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的本质，为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历史进步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过程。基于这样一种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明确指出：未来的新社会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①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指明了以人为本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本质地位。

坚持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和价值，演化成为一种和谐发展过程，就是要通过社会机体自身的改革与完善，不断促进社会成员成为自由的人、自主的人、自觉的人，并将这种人的主体性的不断提升融化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之中。

——自由的人。

所谓人的自由发展，或人成为自由的人，从构建和谐社会角度考察有三层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49页。

一是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是在价值上人却应当是优先的。人类通过长期的社会劳动，认识自然，进而驾驭自然，成为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体。这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首要意义。人只有超脱自然界的束缚成为自由的人，并且不断提高驾驭自然的自由度，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才能全面地发展自己和提高自己，在更高层次的社会政治领域获得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领域更大自由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又自觉地保护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也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

二是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人要全面地发展自己，就必须争得自由权，这就是要改造社会，以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并且在广泛的社会领域确保人基本权利的实现。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分人向社会争取自由权的斗争史。“人权”问题所以成为现代民主进程中的热点话题而被广泛重视，所以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高度关注的重要范畴，其深层原因就是人要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广泛而真实的自由权。这是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是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人的全面发展，实质上是“个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意义上的“个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相互关联的两个层次内容：首先，社会必须保证个人的自由，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人的个性自由或自由的个人，是构成现代民主社会的基本元素。其次，个性的自由发展必须以不危及整个社会为基本前提，个人的自由发展是在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前提下的自由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利益关系对人与人之间政治利益关系的必然要求。平等是民主的灵魂，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发展个性自由、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自由和价值，更不能损害他人的自由权利和价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安定有序、和谐进步。

——自主的人。

超脱了自然界和社会的束缚，获得了对必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的自由的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必然表现为自主的人。“自主的人”是“自由的人”在政治上的必然延伸，是政治社会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人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奴隶，因而也就在广泛的社会领域消除了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依附状态，而“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因此，人能够自由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自由地支配和控制他周围的生活条件，“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8页。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自主的人，必须具备两大要素：首先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人格。独立的人格意味着：作为一个精神个体，他必须是思想独立的，在维护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代表着和体现着包括所有公民在内的人的利益和意志，因而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是一致的），对专门从事国家管理的政治代表作独立自主的选择，而不唯命是从，唯上是从，唯权是从；积极参与国家事务和社会的管理，在社会政治事务中努力实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作为一个行为个体，他必须是行动自主的，在不妨碍他人自由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道路，选择参与政治的途径和方式。因而自主的人，表现在个人，就是一个独特的个性；表现在社会，就是多元化人格组成的色彩斑斓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这样由无数个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组成的多元化人格的，然而又是有着统一目标和共同方向的色彩斑斓的社会形态。

其次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能力。自主的能力是独立人格的必然要求，是保持社会成员独立的主体价值的重要主观条件。假如一个人，没有自我作主的能力，更无作社会和国家的主人的能力，而习惯于奴隶般地听从别人的指挥或依附于他人，那么这样的人就很难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更难以成为自主的人。自主的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理智来理解、判断和参与他所遇到的一切政治现象和社会事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正是为社会成员这样的主体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实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参与政治和改革社会的实践中，社会成员不断地培养了自己的独立意识，强化了自主能力，提高了自主信心，体验着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价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高度民主法治的社会，其前提自然是要培养和提升公民独立自主的能力和價值。

——自觉的人。

在提升人的自由度、增强人的自主性的基础上，不断创造自觉的人，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境界，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高理想。

自觉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权利与责任的统一，是社会和谐的高级形态。自由、自主和自觉，是内在一致的，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过程。只有自觉，才能在社会意义上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自主。一个人如果没有自觉的社会义务观念，只要个人自由和自主而不管他人的自由和自主，甚至把对个人自由、自主的追求建立在对他人自由、自主的损害和对社会利益的危害上，那么这个人也就终将失去自由和自主的权利。正如孟德斯鸠所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能够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为其他的人也同样会有这个权利。”^①

^① 孟德斯鸠：《论法学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自觉的人，首先表现在对法律的自觉遵从。法律是规范化的民主，一个自由的和自主的人，必然表现为对法律的自觉遵从，在法律允许范围内自由地行使民主权利。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不仅是法律的对象，受法律带有强制性的约束，而且是法律的主人，法律集中体现着人民的意志，反映着人民的要求，遵从法律也就是维护自己的民主权利和利益。人们也只有自觉地遵从法律，才能获得充分的民主和自由。其次表现在有自律的道德。社会意义上的自由是一种行为规范，这种行为规范与道德规范密切相联系。在社会主义社会，道德的规范和法律的规范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你要享受人身自由，就不得侵犯他人的人身自由；你要享受言论自由的权利，就必须履行不诽谤他人、维护他人自由权利的义务；你要享受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就必须履行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全的义务。总之，一个自觉的人，其道德行为不是来自外在的强迫，也不是因为害怕受惩罚而克制自己不去违犯，而完全是来自于自觉的意识。这种道德意识和法律意识的一致性，既是人得以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最后表现在以平等精神对待他人。人要从社会关系中获得自由和自主，必然涉及与他人的关系。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发展，不仅要求社会成员充分实现个人的价值，履行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权利，而且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发展自己的个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必须尊重他人的个性和价值。唯如此，所有公民的价值才能实现，社会才能和谐进步。

自由的人、自主的人、自觉的人——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全面发展的人。实现这三个层面的人的发展的统一，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联合会）

“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 ——对列宁“社会主义公式”的思考 李爱华

列宁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创者，他留给后人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设想。苏联的演变解体，反证了继承和发展列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光辉思想的特别重要性。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创建了苏维埃政权，摧毁了剥削制度，很多人便认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了，苏维埃俄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针对这种认识，列宁提出了著名的分解社会主义的公式，即：“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 + 普鲁士的铁路秩序 + 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的总和 = 社会主义。”^①对列宁这一著名“社会主义公式”，虽然不少专家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曾多有提及，但还缺乏深入的阐释。根据列宁的相关论述，对此作进一步的解读，仍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分解为必须具备的两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权，这一基本条件经过布尔什维克党带领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浴血奋斗，已经取得。另一方面，就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最新先进技术、教育和现代科学管理。而这一条件，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来说，是不具备的，必须通过向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经过长期的努力进取，才能获得。列宁说：“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民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520页。

义就无从设想。”^① 列宁分解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就是要使人们能够完整准确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使人们熟悉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要建设社会主义还缺失什么要素，如何才能弥补这种缺失。这一公式的主旨就是强调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

列宁曾多次强调吸取德国的好东西的必要性。他指出：历史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② 这就是说，德国具有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先进的经济条件，但还不具备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条件；而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国家内已占统治地位，具备了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条件，但经济文化还很落后，尚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因此，苏维埃俄国必须向德国学习，把它在经济发展上一切先进的东西吸取过来。这样，苏俄才能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的条件。列宁强调说：“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历史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是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同时又体现了纪律、组织、在现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协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的原则。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结局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衰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③ 列宁甚至特别指出：“要不惜采用独裁的方法加紧仿效，甚于当年的彼得，他曾不惜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对付野蛮，以促使野蛮的俄罗斯加紧仿效西欧文化。”^④

列宁也曾多次强调学习、引进美国的先进文明成果的必要性。他曾说：“美国就人的联合劳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就应用机器和一切最新技术奇迹来说，都在自由文明的国家中间占第一位。”^⑤ 列宁认为，同美国这样的先进民族比较起来，俄国人是比较差的工作者，因此，“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⑥ 列宁以当时美国实行的“泰罗制”来说明这一问题。他在1918年4月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526页。

② 同上，第526页。

③ 同上，第473页。

④ 同上，第526页。

⑤ 同上，第557～558页。

⑥ 同上，第491页。

论述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时明确指出：泰罗制是资本主义进行生产管理的“最新成就”。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① 1921年10月，列宁曾会见了美国著名的“联合药品及化学制剂公司”的代表阿尔曼德·哈默，促成该公司与苏俄签定了第一个租让企业。后来，哈默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列宁对他说，我们认为美国是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我们邀请美国人到我们俄国，是为了请他们教给我们生产方法，把我们的工业提高到应有的高度。^②

列宁是立足于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来谈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的。基于这种状况，社会主义成功与否就在于能否把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学到手，以加快改变落后状态，实现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所以，他反复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③ “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④ 列宁还对那些自以为很革命而反对向资本主义学习的人提出严厉的批评。例如，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发言说：“向德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列宁抨击说：我们“要是认真听信这帮人的意见，革命早就会遭到无可挽救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失败了”。^⑤ 针对布哈林等“左派共产主义者”也一味陶醉于“鲜明的”革命性，脱离俄国的具体特点而空谈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错误，列宁又指出：“我们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不管什么英国或德国都要先进，但在组织象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⑥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不学习、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所以，“只有那些懂得不向托拉斯的组织者学习就不能建立或实施社会主义的人，才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2页。

② 同上，第492页。

③ 同上，第526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页。

⑥ 同上，第531页。

配称为共产主义者。”^① 列宁还指出：有人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②

列宁在分析论述苏维埃俄国要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吸取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先进东西的必要性的同时，也分析阐明了这种可能性。十月革命后，列宁意识到社会主义国家将同资本主义国家在一段时期内并存，这是他关于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胜利的理论在逻辑上的必然结论。如何处理这种并存关系呢？列宁提出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可以和平相处的思想。1919年12月，列宁在向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提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③ 那么，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愿意同社会主义的苏维埃俄国和平相处吗？列宁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认识，分析了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深刻矛盾，考察了世界共同经济关系的发展，指出：“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迫使它们走上这条同我们往来的道路。”^④ 资本主义国家要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要不断克服由其基本矛盾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的困扰，因而它们需要苏俄这样庞大的市场和它拥有的丰富资源；而苏俄要建设社会主义也需要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设备和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方法等。正是这种共同需要所形成的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奠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和平相处的基础。1920年2月18日，列宁在答美国世界新闻社记者问时说：苏维埃俄国同美国保持和平的基础是，“请美国资本家不要触犯我们。我们是不会触犯他们的。我们甚至准备用黄金向他们购买运输和生产用的机器、工具及其他东西。而且不仅用黄金买，还要用原料买。”^⑤ 和平相处思想的提出，为苏俄开展对外经济文化联系、吸取外国的好东西提供了现实依据。

二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外国的好东西，那么，基于苏维埃俄国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94页。

④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⑤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页。

的实际情况，怎样才能实施这一要求呢？列宁在不断的探索实践中，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吸取外国好东西的重要途径。

第一，同一切国家发展贸易关系。

争取同所有国家有生意来往，发展对外贸易，这是苏俄吸取外国的好东西的重要途径之一。对此，列宁明确指出：“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有生意往来。”^①“只要资本主义国家还照样存在，我们就必须同它们做生意。”^②

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是缓解苏俄国内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生活艰难状况的需要。十月革命后初期，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处境很不好，1919年国家预算收入仅及战前1913年的5.8%，收入为80亿，而支出却是280亿。尤其是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面临严重危机。工农群众忍饥挨饿，在前线作战的红军将士所需食品也得不到及时供应，全国最大城市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市民每天只能领到1/8磅面包，有时甚至根本得不到一点面包。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对外贸易，互通有无，从外国购进一些必需的食品和其他生活用品，以缓解苏俄国内的严重经济困难。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指出：在我们这个落后的国家里，工人和农民群众都处于极端疲惫状态，已经是接近于完全不能工作的状态，“必须帮助他们，必须动用我们的黄金储备去购买消费品。”他告诉人们：最近，我们已经购买了几十万普特的各种各样的食物，它们正迅速地从立陶宛、芬兰和拉脱维亚运来。在伦敦也签订了一项购买1850万普特煤的合同。他说，“人民已经疲惫不堪了，不喘息一下是不能工作的。”^③

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也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需要。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大工业的基础上，而俄国的大工业发展本来就比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落后得多，再加上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连年战争的破坏，俄国的工业企业已是千疮百孔，近乎瘫痪状态。所以，苏维埃俄国面临的一个极为迫切和繁重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而这项事业，单靠当时苏俄自己的努力是难以解决的，必须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购进先进的生产资料。列宁指出：“我们懂得进行商品交换的必要性，那么我们主要应该关心的是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等生产资料，没有这些生产资料，我们便不能稍许象样地恢复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复我们的工业”^④后来，列宁把对外贸易与苏俄经济发展的关系做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0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④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了这样一个总结：“贸易关系和对外关系 = 我国大工业的振兴。”^①

第二，学习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列宁认为：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基础。要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把我国经济，包括农业在内，转到新的技术基础上，转到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② 对于当时科技文化十分落后的俄国来说，要获得“现代大生产的技术”，就离不开向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列宁指出，因为我国的经济危机是这样的深重，没有外国的装备和技术帮助，我们单靠自己力量就无法恢复破坏了的经济。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拟定了发展电气化的任务，因为在当时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为了实现电气化，就必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列宁说：我们制定了俄罗斯电气化计划，但是“没有外国的资本和生产资料的帮助，我们就不能很快执行这个计划”。^③ 列宁在谈燃料工业的发展时指出：我们在燃料方面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采用了泥炭水力开采法。“应该在各地更多地采用机器，尽量广泛地采用机器技术”。列宁指出：我们制造了采用新方法所需的机器，但是这些机器造得不好。“我们已派人出国，虽然我们同国外的商品交换刚在作出安排，虽然我们的贸易往来是半公开的，但是派人出国仍然能帮助我们把这些由我国发明家设计的机器制造得很精良。”^④ 列宁强调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一定要结合苏维埃俄国的实际需要，要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去从事这项活动，他要求人们：应该及时地、合乎实际需要而不是例行公事地介绍欧美的技术。1920年2月，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曾略感欣慰地说：“我们同外界、同资本主义的欧洲已建立了联系，……给自己开了一扇窗户，我们希望这一切能使我们马上得到必需的技术援助。”^⑤

关于学习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除了前面讲到的列宁对于“泰罗制”的论述外，他还从其他方面强调过这一问题。列宁曾阐述过无产阶级先锋队去掌握和运用资本主义托拉斯生产的本领的必要性，他把否定这种必要性的观点称之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他说：“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去向资本主义的第一流专家学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③ 同上，第327页。

④ 同上，第359页。

⑤ 《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118页。

习组织托拉斯式的即像托拉斯一样的大生产的本领，那便无从获得这种本领。”^① 列宁也曾号召共产党员都应学会经商，要具备“做文明商人的本领”，而要能成为一个“文明商人”，“就得按欧洲方式做买卖”。^② 由此可见，在这方面也应该向欧洲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列宁晚年在讲到国家机关的改革时，也提出了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要求。他特别强调要提高国家机关的质量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因此就要组织关于国家机关问题的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学习、考试。要学习就要有这方面的书籍，列宁指出：“争取写出两本或更多的关于组织一般劳动、特别是管理方面的劳动的教科书”。他要求说：为了把这项工作做好，应当“派几个有学问的切实可靠的人到德国或英国去搜集图书和研究这个问题”。^③

第三，大力“培植”租让制。

在苏维埃俄国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联系的政策中，列宁把租让制看作是利用外国资本的最好形式，也是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最好的学习方法”。^④ 列宁认为：把一些苏俄国家当时无力经营或因条件限制而经营不好的企业、矿山、油田、森林等，根据一定的条件，以签订合同的形式，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这种租让制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通过这种租让制，既可以解决苏俄经济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又可以培养和训练自己的技术力量和管理人才，还可以增加产品的数量，提高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帮助苏俄克服面临的经济困难，并促进国民经济的尽快恢复和发展。列宁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实行租让政策，不能把外国资本吸收到租让企业中来，那就根本谈不上采取重大的、实际的措施来改善我们的经济状况。”^⑤ 列宁还把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看作是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基本途径。所以，他反复强调：苏维埃政权必须“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⑥

列宁曾设想在较广泛的范围内推行租让制，准备出租巴库的1/4，格罗兹内的1/4和俄国最好森林资源的1/4。把租让制企业当作示范和样板来学。列宁说：不实行租让，我们就得不到设备精良的现代化资本主义技术的帮助，就不能为我们的大工业发展打下技术基础。如果能够实现这个租让设想，“我们就能利用这种租让，……使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

③ 同上，第789页。

④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3页。

⑤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页。

⑥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

其余的四分之三赶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① 为了充分利用租让制企业来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列宁考虑把租让企业按棋盘式格局安排。“租让的地块、租让的方格一边将是我们的方格，接下去又是他们的方格；我们要挨着他们开办自己的企业，学习他们如何经营模范的企业。……按照现在最新的技术成就进行装备，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这需要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因为依靠任何学校、大学、训练班都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要按棋盘的格式设置租让企业：来吧，就在这里学习。”^②

第四，采取灵活措施打破经济封锁。

当时苏维埃俄国处于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当中，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外交上拒不承认苏俄，除了纠集起来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以外，还对其进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苏俄则一面坚决同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作军事斗争，一面又积极地利用各种机会和矛盾，千方百计打破孤立和封锁，努力加强对外经济联系。

到1920年下半年，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基本上被粉碎的情况下，列宁认为，苏俄取得了同资本主义列强并存的条件，有可能争取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的和平共处关系，发展平等互利的经济贸易往来。他指出：“我们在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强，而是因为我们虽然弱，却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敌对关系。现在，若不利用托拉斯之间的敌对关系，我们就不能适应资本主义的特点，就不能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生存下去。”^③ 还说：“要知道，资本主义列强近年来最迫切、最实际和表现得最突出的利益，要求发展、调整和扩大同俄国的贸易。既然存在这种利益，那么，尽管会有辩论、会有争执、分歧各方会有不同的组合——甚至很可能闹到决裂的地步，但这个基本的经济需要最终还是会发生作用的。”^④

为了彻底打破帝国主义对苏维埃俄国的孤立、封锁政策，1921年10月28日，苏俄政府根据列宁的指示，向英、法、意、日、美五国递交了一份照会，表示准备在偿还沙俄外债问题上对资本主义各国做出重大让步，以便同它们达成全面协议，并建议召开有关国际会议，研究建立欧洲和平和经济合作的一切问题。照会的发表震动了各国政府，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协约国资本主义国家经过激烈的议争、磋商，最终同意了苏俄的建议，决定于1922年4月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国际会议。列宁对此非常重视，做了充分的准备，周密地制定了苏俄出席会议的纲领和策略。列宁指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9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5页。

③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8页。

示苏俄代表团：我们不是以共产党人的身分，而是以商人的身分去热那亚的，没有必要在那里宣传共产主义的理论观点。“我们准备以商人的身分出席会议，因为我们绝对必需同资本主义国家（只要它们还没有完全垮台）进行贸易，我们到那里去，是为了最恰当、最有利地商定政治上合适的贸易条件”。^① 他还说：“我们到热那亚去的实际目的是：扩大贸易，为最广泛最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② 列宁要求要善于利用与会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种种矛盾，来瓦解资产阶级阵营，抵制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苏俄准备了一份备忘录，详细说明在3—5年内需要外国提供30多亿金卢布的贷款，作为购买农业机械、工业设备和交通器材之用。同时，把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苏俄保证外国投资者和技术专家正当权益的各种立法编印成册。另一方面，对苏俄在协约国武装干涉中遭受的损失数字做了专门统计，准备在谈判偿还债务问题时提出反要求。列宁非常重视这种准备，认为确凿的证据和资料就是在谈判桌上和敌人作战的武器。

由于协约国资本主义国家顽固地坚持无理要求，为期40天的热那亚正式会议没有签订一个协定而不了了之。但是，苏俄代表却根据列宁要在会外多做工作的指示，取得了重大突破，与德国通过单独会谈，签订了《拉巴洛条约》。这是苏俄利用德国与英、法、美等国的矛盾，突破资本主义反苏阵线，争取外交承认，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列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这一思想成功实践的重要表现。

三

对于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好东西，开始许多人并不能很好的理解，存在这样那样的疑虑。他们担心资本主义的东西进来，会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甚至认为这是向资本主义倒退、投降的行为。当时，也确实有些人鼓吹：苏维埃俄国应向资本主义国家作“实质性的让步”，苏维埃俄国已经开始向资本主义“路标转换”。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使“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这一重大举措能真正有效地开展起来，并正确地进行下去，防止出现不良的倾向，列宁还提出并阐明了所应遵循的一些原则性要求。

第一，要实行使外国资本家感到有利可图的政策。

社会主义国家要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联系，引进外资，学习利用资本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58页。

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必然要有相应的付出，做出一定的牺牲，要给外国资本家提供切实的优惠政策。外国资产阶级不是慈善家，特别对待社会主义国家本能地抱着一种敌视和不信任的态度，他们完全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来决定他们的经济行为的，只有使他们感到有利可图，才能吸引他们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交往关系。在这方面，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排除错误思想的干扰，大胆开拓。

在苏俄的对外贸易中，无疑，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主要是机器设备和工业制成品，而出口的则多是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必然会产生贸易逆差。对此，列宁认为：“只要能获得强大的先进资本主义的帮助，我们便不惜从我们的无限财富当中，从我们丰富的资源当中，拿出几亿以至几十亿的资财。花掉的这一切我们以后收回时是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的。”^① 他还说：“在理论上十分清楚：用几千万或几亿向欧洲资本赎买，这对我们是有利的，在这方面，我觉得大家的疑虑都已经打消了。而为了在最短期间增加用来恢复我们的大工业的装备、材料、原料和机器，这几千万或几亿我们还是拿得出来的。”^② “我们必须为我们的落后、我们的贫弱、我们正在学习和应当学习的东西付出代价。谁要学习，谁就得交学费。”^③

针对某些工人认为实行租让制就是“让外国资本家来剥削我们”的非议，列宁指出：要引进和利用外资，必须使外国资本家获得一定的利润和收益。这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从哪里取得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呢？要吸引美国人，就得付给他们代价，因为他们是做买卖的”。^④ 也有人认为租让制是“出卖我们的俄罗斯母亲”，列宁回答说：“这根本谈不到把俄国出卖给资本家，我们说的是租让，同时每一个租让合同都受到一定期限、一定协议的限制，并且有种种经过周密考虑的保证条件，……所以这些临时性的合同并不等于出卖。它们和出卖俄国毫无共同之处，但是，它们是对资本家作的某种经济上的让步，目的是使我们能够尽快地获得必需的机器和机车，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能恢复我们的经济。”^⑤

第二，要始终维护苏维埃俄国的根本利益。

列宁一方面强调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要为外国资本家提供有利可图的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坚决维护苏维埃俄国的根本利益。

在对外贸易上，鉴于苏俄当时所处的特殊国内局势和国际环境，列宁认为对外贸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0～61页。

② 同上，第301页。

③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④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⑤ 同上，第344～345页。

易应由国家统一控制和管理，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制，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到俄国来进行自由贸易。列宁把对外贸易垄断制看作苏维埃俄国在经济中的主要命脉之一。他认为，如果允许外商到苏俄来搞自由贸易，他们就会掠走大量贵重物品，会给虚弱的国内经济带来危害，使亟待恢复中的本国工业失去最有力的保护。但是，当时苏俄党和国家的某些领导人，却借口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而主张取消或放宽对外贸易垄断制。列宁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指出：“绝对不得破坏对外贸易垄断制”，对外商“我们不能搞自由贸易，这会葬送俄国的”。^①但由于一些人坚持错误主张，无视列宁的忠告，在1922年10月的一次列宁因病未能参加的中央全会上，通过了一项削弱对外贸易垄断制的决议。列宁知道后，认为这是对国家利益不能容许的侵犯，是一桩大错误，这将会在苏俄“制造一个完全混乱的局面，动摇那些刚刚开始加固的支柱”。^②在列宁的坚持和斗争下，中央委员会在12月举行的又一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原来的决定无效。

关于租让制，列宁也明确指出：“我们相信，即使在执行租让合同的时候，我们也一定会保护住我们的利益，决不让资本家政权复辟；我们一定能把这种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③当时，党内曾有人要求对私人资本做出更大的让步，甚至提出把苏维埃国家生命攸关的重要工业企业也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列宁斥责说：“如果苏维埃政权把自己的大部分工厂拿去租让，那是十分荒唐的，那就不是租让，而是复辟资本主义。”^④苏维埃政府在同英国的一个大资本家莱·厄克特进行租让谈判的过程中，厄克特企图通过讹诈迫使苏俄政府做出重大让步，英国政府也借此向苏俄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列宁指出：“这是奴役和掠夺”，我们必须“本着最符合俄国利益的精神来决定这个问题”。^⑤苏维埃政府毅然否决了这项租让合同。

第三，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列宁指出，“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是苏俄恢复和发展经济、取得社会主义成功的必要途径，但由此也会带来一些危险，这种危险不仅有经济上、政治上的挑战，也有思想上的冲击。克服这种危险，既要靠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制定正确的政策，保持严格的纪律，慎重地进行行动；也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东西也是一场特殊的斗争，保持思想上的警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0～46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1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346页。

④ 《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⑤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41页。

惕性。列宁指出：“租让企业在经济上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然，它们在建设一些工人村时，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这也是一场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军事较量。”^①

1921年10月，列宁在全俄政治教育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做《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在这方面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的关于政治自由的议论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在国外，各种政党出版几十种日报，用世上所有的曲调来赞美政治自由。这一切都是废话、空话。我必须善于抛弃这些东西。”^② 列宁提出了政治教育工作的三大任务：一是要教育党员消除因执政而产生的狂妄自大；二是要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三是要教育人们坚决地同贪污受贿行为做斗争。^③ 根据列宁的论述，我们可以体会到，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确保新经济政策的正确实施和对外经济联系的健康开展。

实践证明，列宁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分解而提出的要“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的思想是英明正确的。在列宁的领导下，苏维埃俄国努力冲破封锁，积极开展对外经济联系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1920年2月~10月，苏俄先后同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芬兰等临近的几个国家缔结了和约，相互给予贸易优惠，开始互通贸易。1921年3月16日，苏俄又与英国正式签订了通商协定，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事实上承认苏维埃俄国的开始。此后，苏俄又相继同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等13个国家签订了双方贸易协定，恢复和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1921年苏俄的对外贸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18年、1919年和1920年三年苏俄的进口量略高于1700万普特，而1921年已达5000万普特；前三年的出口量总共是250万普特，而1921年一年就达1500万普特。1922年11月，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已经争取到一个十分确定的外交局面，这就是为全世界所承认的外交局面……现在，我们不论在经济政策或贸易政策上都使敌人承认了我们的权利。贸易协定的签订就证明了这一点。”^④

在引进外资和技术方面，1920年11月，苏俄政府公布了《租让法令》。据统计，1921~1925年间，苏俄与外国签订了135项租让合同。1924~1925年度，国家收到租让制企业付款680万卢布。尽管这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但租让制作为利用外资和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②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8页。

③ 同上，第590~591页。

④ 同上，第732页。

引进先进技术的一项伟大尝试，对苏俄“吸取外国的好东西”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可以体会到，列宁分解社会主义的著名公式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认真研究这一公式所蕴含的丰富内容及开放精神，对于我们今天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列宁英灵永在！社会主义事业长兴！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

21 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模式创新、百态纷呈”

林建华

在 20 世纪兴起又在 20 世纪遭受重大挫折的社会主义制度，在 21 世纪的前景如何？对此，世人都在预测。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预言，社会主义制度在 21 世纪将会灭亡，并将作为最反常的政治与理性畸形物被载入史册。社会民主党人预言，21 世纪将是社会民主主义战胜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纪，社会民主党人将成为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唯一力量。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应不应该、能不能对 21 世纪社会主义做出前瞻性预测呢？完全应该，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把握社会主义发展必然性规律的基础上的预见能力，是站在时代前列引导人类社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备素质。在 21 世纪，社会主义不仅将继续存在，而且将迈过低谷，获得新的发展。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决不会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复活和翻版，而会呈现出“模式创新、百态纷呈”的新特点、新局面。

一、社会主义有模式，但无固定模式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在他们的著述中，曾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做过若干科学的、原则性的预测和设想。恩格斯曾经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既定的、制约着他们的环境中，在现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①“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②列宁也明确说过：“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③邓小平更是意味深长地说过：“绝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3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82 页。

③ 《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第 401 页。

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①这就是说，照搬马克思、等于马克思，照搬列宁、等于列宁，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有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突破马克思，发展列宁、突破列宁，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实行新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邓小平说，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比较好”，但可惜实施的时间不长，就被斯大林过早地结束了。斯大林在实践中迅速地形成了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这一模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问题是僵化了，并从总体上成了阻碍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毛泽东较早地看到了这一模式的弊端，提出要“以苏为戒”。他强调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并开始了中国自己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也开始探索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即斯大林模式。如南斯拉夫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进行工人自治的探索。尤其是在苏共“二十大”发起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之后，从苏联开始，东欧和中国都开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了改革的初步尝试。但是，由于传统模式积弊甚久，旧的习惯思想和保守势力根深蒂固，加上苏联仍然实行大国沙文主义，阻碍各国独立自主推进改革，到60年代前期，大多数国家的改革尝试都不同程度地遭到挫折，有的国家甚至恢复了原有的体制。其中，一个很大的思想障碍，就是对社会主义是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而不能多样化，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针对这种状况，从1976年到1985年，南斯拉夫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察夫塔特组织了10次国际性的社会主义圆桌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从事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的专家和南斯拉夫的学者一起，围绕着“当今世界的社会主义”（1976）、“社会主义和政治制度”（1977）、“社会主义与发展中国家”（1978）、“社会主义的主观力量”（1979）、“参与、自治、社会主义”（1980）、“社会主义、科学、技术和发展战略”（1981）、“今日马克思主义思想、目前的形势、争论和前景”（1982）、“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和今日世界”（1983）、“社会主义与和平”（1984）、“处在21世纪前夜的社会主义”（1985）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最后逐渐地集中到一个问题上，即：社会主义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在1983年的第8次圆桌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做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但也遭到了苏联的抨击，指责这是搞社会主义多元化。在第 10 次圆桌会议上，一些专家指出：“每个国家都有权以自己的特定方式去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不能按照或低或高的利率进行借贷和租用，但也不能把它封闭起来，排斥其他概念和思想。假若不实现这些前提，那么社会主义就会受到自身的危害”；“由于存在多种民族和多种文化，所以也将存在多元的社会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历史的进程仍然在不断地向前发展，但它显然正在脱离这个单一性和一元性的模式。”当然，也有的专家提出：“因此也存在一个相关的危险，社会主义可能变成什么？可能已经在变成什么？”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已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严肃讨论的理论家正在认真思考的问题。但是，这样把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多元性，弄得不好，会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20 世纪 80 年代在东欧和苏联曲折推进的新一轮改革的最终失败，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①

那么，什么是模式呢？所谓模式就是某种事物的标准样式，这是就机械学或工程学意义而言的。世界共运中的所谓的模式，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方针、政策、制度的总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或者说，它是按着一定路线、一种工作方法工作的最后结果，是一种工作、斗争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因此，可以说，模式是一种客观存在。社会主义模式既然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它就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种。早在 1918 年，罗莎·卢森堡就十分明确地指出过：社会主义模式在俄国和德国是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实现决不是一些只需要加以运用的现成处方的总和，它是从活的历史的发展中产生的。人们必须一步步探索才能找出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措施和机制。“布尔什维克自己也不打算否认他们不得不一步一步地摸索、尝试、试验，朝各个方向试验，他们的措施很大一部分并不高明。如果我们着手去干，我们大家也都会并且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② 她热情赞颂俄国布尔什维克在极其困难和险恶的条件下摸索、尝试、试验的不朽历史功绩，但同时又警告说不能把一种社会主义模式固定为大家仿效的唯一模式，如果这样，危险就开始了。可惜，历史发展的现实被她不幸而言中了。

世界历史是无法取消 1917 年在俄国发生的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这是一次“震撼世界”的革命。从全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开创全世界历史的新时代”。依照列宁的观点，这个新时代的内容是摧毁资本主义，同时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个新的社会奠定基础。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从俄国开始，然后扩

① 李君如：《为什么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2004 年第 3 期。

② 《卢森堡文选》（下），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01 页。

展到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事实也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先后在欧洲、亚洲和美洲的 15 个国家获得胜利。这是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以后取得的辉煌成就。但是，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的是在苏联红军的帮助下获得解放并建国的（如民主德国），有的是本国人民武装配合苏联红军的进军获得解放并建国的（如波兰、蒙古、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朝鲜），有的是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之下，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武装斗争获得解放并建国的（如南斯拉夫、越南、阿尔巴尼亚、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巴、越南），因此，在建国初期一般都仿效苏联的体制，把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对外关系体制等同于标准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斯大林也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视为唯一模式，并强行推广到东欧其他国家中去，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导致这种社会主义模式在这些国家的失败。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没有唯一的和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模式只能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每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会由于不同时期的历史和现实条件而发生变化。世界上不会有一个可以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唯一社会主义模式。世界上本来就存在过或存在着各种社会主义模式，如列宁的社会主义模式、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匈牙利社会主义模式、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模式、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等等。任何模式都不能自诩是可以取代其他模式的唯一模式。至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有无社会主义味道，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本质或原则，是否正确，正确程度多少，是否有缺陷，缺陷是什么，是成功还是失败，只能由实践和历史检验和回答。正确或比较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只能是那些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符合时代精神和本国国情，因而产生积极成果的模式。这样的模式也不可能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随着时代和条件的变化而发展的。这就要求人们随着时代和条件的发展不断摸索，朝不同的方向试验，不断地纠正错误并且开辟新的道路。

否定照搬任何社会主义模式，这并不意味着对其他社会主义模式采取一概排斥或敌视的态度。各种社会主义模式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根源，都会有其正面或负面效应。善于吸取他人的教训和善于借鉴他人的经验，是克服一切片面性和丰富自己的重要方向。

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僵化了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决不是社会主义的死亡。正如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决不是曾被宣称的那样一种毫无负面效应的唯一绝对正确的模式，它也决不是只有负面效应而毫无正面效应的模式。苏联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对立物和否定物，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譬如，迅速实现了工业化，使苏联成为抗击和战胜法西斯的最主要的力量等等），赢得过巨大的声誉，起

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尽管付出了种种巨大的代价。但是，历史已经表明，它已无可挽回地成为过去。无论是对它一概加以否定，把它视为只有错误，甚至只有罪恶；还是死抱着它，梦想恢复它，都是荒谬的。21 世纪的社会主义决不会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复活，而必将在全面地、科学地、理性地总结其正面经验、全面深刻地吸取其种种负面的教训特别是失败的教训、批判其错误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产生诸种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出现多彩多姿、百态纷呈的局面。

总之，社会主义有模式，但无固定模式。正如邓小平在 1989 年 5 月指出的：“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① 因为，“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②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只能“走自己的路”，同时，还应认识到，模式作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虽然有着相对固定的内容，但是，由于条件的发展、环境的变化，模式本身也应保持创新、发展的态势，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纠正失误，消除弊端，使之日趋完善。反之，如果阻遏这种创新和发展，将它凝固化为静止不变、僵死的教条，必然会窒息模式本身的生命力。

二、21 世纪将是社会主义“模式创新、百态纷呈”的世纪

社会主义有共同的本质特征，失去这些本质就不叫社会主义了，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需要通过具体形式来体现。社会主义的共性和特殊性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共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来具体体现。因此，社会主义应该有多种模式。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有过将社会主义模式单一化甚至建立一个中心、实行“老子党”统一指挥的做法。这种做法的失败证明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模式化是必然规律。寻找既符合本国具体情况，又不脱离社会主义目标的发展形式、方法和步骤，已成为摆在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面前的共同课题。

第一，人类社会不是整齐划一地发展的。

当今世界上仍然有许多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国家和民族。同时，各国的经济、文化不仅有各自的特殊性而且处于不同的发展水平上。社会主义在历史、经济、文化各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中生存、发展，必然带有与不同历史、经济、文化相适应的特殊性而呈现出多样化来，而社会主义也只有与时俱进、因地制宜才有生命力。换言之，社会主义只有在多样化中才能生存和发展。即使是在斯大林致力于实行单一模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2 页。

^② 同上，第 265 页。

势和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亚洲的社会主义仍不同于苏联，美洲的社会主义仍不同于欧洲和亚洲，甚至受苏联影响颇深的东欧一些国家也曾尝试着创造与苏联不同的模式。这说明各民族和各国家的特殊性决定了社会主义多模式化的必然趋向。

第二，多极化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总趋势。

两极对抗结束后，世界加快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欧洲趋于一体化和亚洲的崛起，已使世界新格局日渐明朗。世界形成几个政治中心和几个内部联系紧密的经济区域的进程对每个国家都将发生巨大影响。每个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关系、文化特征都将受其影响而处于变化之中。在这种动荡变化的国际环境下的社会主义实践，必然会出现许多适合于正在发生不同变化或已经出现不同变化的诸多社会因素的新模式。只有如此，社会主义才能在与人类现实变化着的社会生活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开辟自己前进的道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已经在适应本国、本地区特定条件的过程中产生出多种模式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些模式中较为成功的一种。

第三，在 21 世纪，随着新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与交往将更加密切，全球化的趋势锐不可挡。

多数马克思主义政党已经认识到，20 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自我封闭”状态已经明显不适合甚至阻碍社会主义的发展。21 世纪社会主义将在开放的环境中，在吸收全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中生长。它将具有更大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在抵制一切腐朽没落的东西的同时吸收一切对人类进步有益的东西。由于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及各种社会主义政治力量所处方位不同、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不同、对外开放的条件不同，在借鉴、合糅本国和周边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于人类进步有益的诸方面要素过程中，必然产生多种特殊模式。

第四，在 20 世纪，各国共产党都走过了自己独特的道路。

各国共产党在各自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已经产生了诸多不同点：经验不同、成就程度不同、组织结构不同、活动方式不同，等等。这些不同点在 21 世纪将继续存在，并在适应本民族和本国特殊性的过程中，在适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带来的诸多新变化中，在特定的开放环境中不断增加多模式化的因素，并最终形成许多共同信奉科学社会主义，但却在具体政治纲领、组织结构、活动方式、思想作风、斗争道路等方面各有特殊性的共产党。这些各具特性的共产党在各自特殊环境下从事社会主义实践，必将创造出许多各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来。

21 世纪社会主义的多模式化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前提下的多模式化。这种模式化不是背离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而是在各自特殊的环境下以各自特殊的道路和形式实践着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本国的具体实践和时代特

征、科学发展相结合。在造成社会主义低潮的众多教训中，那种“一个模式、一种方式、一条路线”的“统一指挥”是最深刻的教训之一。社会主义运动应该承认各国不同的经济、文化、历史传统，承认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独立自主地、因地制宜地走自己的路。社会主义仍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发展，在实践中前进。只有继续解放思想，艰辛探索，勇于实践，勇于总结，才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

在 19 世纪的大半个世纪和 20 世纪的整整一个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走过了辉煌与沉重并存、凯歌高奏与艰难挫折并行的风雨历程。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曲折前进，更是构成了 20 世纪历史画卷的主页。在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带着 19 世纪、20 世纪的丰厚遗产，在新的实践和探索中也一定能写下新的光辉篇章！尤其是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之成功实践，更是有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具体实际、时代特征和科学发展相结合这一普遍规律，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国的事情应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平等协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研究的方法论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曾经说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

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研究也是如此。但是，我们也同样有可能站在 21 世纪初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过去和现在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探寻它的发展规律，研究它的发展趋势，从而使我们在新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争取更多的自由和主动。

第一，在研究中，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仅仅关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而是要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众多流派和思潮及其前进与探索中的一切经验教训。譬如，各国社会主义思潮和流派的态势，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与探索，发达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现实和前景，苏东剧变后这一地区诸国社会主义力量的状况和走向，等等。当然，研究必须有重点，目前应着重研究现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问题与对策，尤其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世界意义；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和教训，以及这一地区诸国社会主义和左翼力量的活动情况；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力量的新动向、新理论、包括新“第三条道路”和社会民主党的新变化、新特点等问题。

第二，在研究中，要摆脱过去那种单纯在世界社会主义的狭窄范围内孤立地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状况，而应当把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放到整个世界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中来研究，特别是研究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科技、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从世界历史的方位上来总结和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目前，研究的领域和层面要尽可能的宽广，及时准确了解、潜心跟踪研究世界社会主义的新情况、新问题，包括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现状与未来，理论、方针与政策，事件、组织、人物与文献，以及与世界社会主义相关的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时代问题、文明问题、政党政治问题、世界科技发展、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发展、民族解放运动、和平运动、生态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等等。

第三，在研究中，还必须始终注意方法论。对于世界社会主义问题，必然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客观的、理性的分析与研究，必须考虑到具体的社会主义环境、历史传统，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也不能以一国的实践去评判别国的实践，要在错综复杂的现象中突出地反映和研究社会主义本质的、主流的东西，以及预示社会主义未来的东西。

世界社会主义的研究是如此，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更是如此。社会主义者始终不变的理念应该是，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继承物和发展物，社会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代表着人类的前进方向和未来。各国人民走自己的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者在求同存异、相互借鉴、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中，对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必将汇成真正具有无限活力和永恒魅力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光辉灿烂的未来。

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更是社会主义“模式创新、百态纷呈”的原由。我们的结论是：社会主义有模式，但没有固定的和唯一的模式；模式是一个静态的概念，但更是一种动态的实践；模式可以借鉴，但绝不可以照抄照搬。“模式创新、百态纷呈”应该是也必将将是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未来走势。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教务处）

丧失阶级性必然失去先进性

——由苏联衰亡的历史教训引发的一点思考

李建军

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工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与阶级性紧密联系在一起，阶级性是先进性的“物质”基础，先进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先进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但在原苏联和东欧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之间的关系，却发生了嬗变，从统一关系蜕变为异化关系，共产党最后被自己一直宣称代表的工人阶级所抛弃。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阶级性内在地蕴含着先进性。任何政党都把一定的社会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代表一定阶级的利益。因此，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首先要看它所代表的阶级是否具有先进性。工人阶级是人类社会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代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深刻研究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揭示了人类社会从阶级社会走向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工人阶级是实现这个伟大革命性变革的社会力量。这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具有高度的集体主义观念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富于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并与其他劳动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第一个建党大纲《共产党宣言》中，深刻阐明了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① 这是任何别的阶级都无法比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从产生的第一天起，就自觉地把工人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把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第283页。

己当成是完成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政治工具。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是工人运动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①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为党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先进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统一，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一个主要条件。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植根于阶级性之中，丧失阶级性必然失去先进性。这是苏共失败的沉痛教训给我们的一条重要启示。苏联共产党是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夺取政权上台执政的。1917年“二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员只有1万多人，而到十月革命后增加到了近30万人，8个多月时间增长了20多倍，绝大多数新党员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和士兵。但是，在执政74年后的苏联解体前不久，当时的苏联社会科学院做了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认为苏共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认为苏共代表党的官僚的、代表干部、代表机关工作人员的占85%。^② 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包括很大一部分党员，都认为这个拥有近2000万党员的执政党不再代表他们的利益了。这就是说，苏联共产党失去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丧失了自己的阶级性，先进性就不存在了。一个丧失了先进性和阶级性的党，失败或迟或早是不可避免的。

苏共严重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丧失阶级性，从而失去先进性，最终被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所抛弃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早在1935年，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就在访苏笔记中写下了他的担忧，担心在苏联会出现一个“由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上个世纪50年代，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雷蒙·阿隆也注意到，苏联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关系，“主要方面是专制的官僚阶层”、“少数特权者”。管理人民群众的，就是这个由国家任命、具有官僚性质的“领导阶级或特权阶级”，^③ 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的话说，就是在苏共党内形成了一个由苏联共产党、政府和其他重要官方组织中的高级官员所组成的“党—国精英集团”。^④ 事实上，这个“党—国精英集团”即苏联党内的特权阶层，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据俄罗斯学者估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②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③ [法]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第219页。

④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页。

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阶层已有 50 万至 70 万人，加上他们的家属，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1.5%，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特权阶层。

苏共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了自己特殊的经济政治利益。长期以来，苏共党内的特权阶层利用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聚敛了大量财富。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积累了一定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惟恐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和通过不正当手段聚敛的财产，这个特权阶层在意识形态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991 年 6 月，也就是发生剧变前的两个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调查采取特定小组讨论的方式，一般要同调查对象进行 4—5 小时的谈话，通过谈话以确定他们的思想观点。分析结果是：大约 9.6% 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 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民主化；76.7% 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调查结果连西方学者都感到了震惊，“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个在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为什么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因为苏共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支持改走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苏联解体后，很大一部分原苏联党政官员成了最大的受益群体。政治上，“苏联垮台以后两年，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中的 11 个，他们的首领都是前苏联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其中五人曾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委员。”经济上，据俄罗斯的社会主义者奥尔加·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对 1992—1993 年间兴起的 100 家最大私有企业创办情况的调查，其中 62% 的企业是由共青团、前国有企业的领导、银行家、精英分子家族控制的，只有 5% 的创办者是“靠自我奋斗出来的人”。我国学者黄苇町也引用了一组调查数据，“苏联时期的干部在总统班子中占 75%，在政府部门中占 74%，在地方政权中占 80%。国内企业家中，原来的共产党员占 85%，很多都是直接由国内企业经理转变为老板。”苏联剧变后，许多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 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 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他控制着全世界 40% 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黄苇町在《苏共亡党十年祭》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的私有化“实际上是将‘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有财产合法化’地

转移到自己名下，是为‘权力转化为资本’履行了法律手续。”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的的工作小组负责人弗兰克·希福德也说了一句让人寻味的话，（苏联）共产党是惟一个在他们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

苏共党内的既得利益集团严重侵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然遭到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的强烈反对。1989—1991年，苏联境内的库兹巴斯、顿巴斯和沃尔库塔等地的煤矿工人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罢工和游行，“其威力之猛，深刻地影响到了苏联政坛的风云变幻。”在1989年的罢工中，“有些组织甚至直接向共产党的统治提出了挑战”。1991年的罢工则“更加集中于政治要求，甚至要求苏联政府集体辞职”。矿工们认为，苏联共产党已经不再代表矿工的利益了，所以不再拥护苏联共产党，“而是乐意听从叶利钦——这位党中央的第一批评者。”而叶利钦则利用人们对于干部特权的不满情绪，提出了“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废除各级领导人享有的特殊利益的口号，赢得了人们的广泛支持，成了人们心目中“坚持社会公正”，“敢于抨击特权”，同各种特权作斗争的英雄。工人的罢工严重地冲击了苏联党和政府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虽然没有直接造成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解体，“但它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罢工事件深刻地表明，苏联共产党已经不再被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看成是自己的代表了，而是转化为他们的对立面了。

苏共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偶然的，而是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制度造成的恶果。在这种制度下，“权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干部由上级层层任免，民主成了摆设，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人民成了消极的受动者，而不是积极的参与者”。权力从根本上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各级干部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人民的主人，造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背离了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从而也葬送了党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对于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和危害也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反而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把党的一元化领导变成了个人领导，使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助长了家长制现象的滋生和发展。这也是能够发生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对此作了深刻的分析，指出权力过分集中，“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①

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会不会背离自己的阶级基础而发生蜕变，这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深入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1页。

的探索。他们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就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存在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的危险性，并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提出了防止这种危险性的措施和办法。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执政条件下党面临的新危险高度警惕。1922年他就提出，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他还明确指出，官僚主义者不仅在苏维埃机关有，而且在党的机关里也有。1992年，邓小平针对苏东剧变告诫全党：中国要出问题，也还是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共产党内部没搞好、要出事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党内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并进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严肃指出：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是和阶级性一致的，是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脱离阶级性孤立地讲先进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的先进性和阶级性的关系，使党的先进性牢牢地扎根在自己的阶级基础中，努力保持先进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统一。要做到一点，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努力促进党自身的改革，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个人高度集权的问题，严格防止党内产生严重的官僚主义，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防止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必须通过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切实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

党内生活实行民主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条重要组织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强调同盟“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党内生活贯彻民主的原则，“一切都按这样的民主制度进行。”此后，各国共产党都把民主制作为党内生活的根本原则。但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共产党却在党内民主这个关系党的生命的重大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失误。把党内民主仅仅写在纸面上，实践中却是另行一套，搞假民主、真集权。苏共在列宁时期，党内生活还是民主的，党内事务公开、透明，党员可以充分自由地进行讨论。斯大林上任后，特别是到了他的晚年，却改变了这一切，独断专行，从根本上破坏了民主集中制。虽然《苏联共产党章程》对党内民主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从下到上都由选举产生”；“在各个党组织内或在全党内自由而切实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是党员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党内民主的重要原则。”“在广泛辩论，特别是全苏联范

国内辩论党的政策问题的时候，应当保证党员自由地发表意见”，“违反党内民主的现象在党内是不能容忍的”。但是，实际上却是斯大林一人说了算。凡与斯大林意见相左者，往往都被打成“人民敌人”而受到彻底清洗和严酷镇压，仅1935—1941年，被清洗的党员就达到120万人。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哪里还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邓小平曾经转述过毛泽东的一句话，他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比较完备，制约机制比较健全，所以它们的领导人无法干出斯大林那样的事情。建国以后，毛泽东虽然对斯大林的问题有所认识，但是由于把党内民主仅仅当成是领导者个人的一种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没有从制度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忽视了党内民主的制度建设，“没有在实际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使党的建设遭到挫折，社会主义建设走了弯路，人民的利益受了损失。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针对斯大林、毛泽东所犯的错误，邓小平深刻指出，这些错误的发生，固然和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此，只有从制度上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真正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造成的一系列严重问题，铲除党内特权阶层产生的土壤，防止共产党脱离自己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丧失先进性和阶级性，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避免重蹈苏共的老路。

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实现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这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一条重要思路。党内民主，不是少数党员干部的民主，而是全体党员的民主，党员是党内民主的主体。离开党员民主权利的应用和保障，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发展党内民主，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就是一句空话。党员的民主权利集中体现为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和监督权。知情权和参与权是党员最基本的民主权利。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了解和参与。凡属党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应力求组织广大党员讨论，充分听取各种意见。”知情是参与的前提。如果党员对党内事务毫不知情，就根本不可能对党内事务充分发表意见，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除去国家安全机密外，包括党的领导人的活动，都应该是公开的、透明的。要建立和完善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党内所有事项都要通报党员或交给党员讨论，认真听取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以使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能够集思广益，不断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党的领导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党员不仅有权了解党内事务，而且有权参与党内事务，享有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

制定和实施问题的讨论，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提出批评，对党的工作提出建议和倡议等项权利。

选举权是党员最重要的民主权利。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规定“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马克思、恩格斯还总结了巴黎公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普选出来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他们把这一点作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一条重要措施。落实党员的选举权，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对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然，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必须循序渐进，从党的基层做起，搞好试点，逐步推广，不能一步到位。但是绝不能象原苏共那样，把选举变成自上而下的暗箱操作过程，假借选举的形式，实行内定任命制。

监督权也是党员的重要民主权利。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指出，“要加强党内监督，健全对领导干部自下而上、自上而下以及党委内部的监督制度”，要“加强民主监督，防止少数人说了算，更不允许个人专断。”加强党内监督，重点是加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监督，尤其要把对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放在突出地位。”因为，对于一个执政党而言，“干部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对他们运用权力的行为就越应当严格监督。”如果没有健全的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只有上级对下级的制约、监督，党的干部对普通党员的制约、监督，而没有普通党员对党员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制约、监督，下级机关对上级机关的监督，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异化。

参考书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2.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3.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4.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1993 年、1994 年版。
5.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干部监督》，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0 年版。
6.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7. [法] 雷蒙·阿隆：《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译林出版社 2003 年版。
8.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
9. 黄苇町：《苏共亡党十年祭》，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2 年版。
 10. 中央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读本》，党建读物出版社 2004 年版。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

邵景均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私有制以来，腐败与廉洁就是一个不衰的话题。如何认识腐败，怎样才能有效地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几千年来进步人类孜孜以求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科学地说明了产生腐败的社会根源和消除腐败的基本途径。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实践，对于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提供坚强保证，具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科学认识腐败与反腐败开启先河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腐败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甚至都没有正式使用过“腐败”的概念，但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包含了有关腐败与反腐败的完整思想：（1）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国家机器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经济根源和政治根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人类早期漫长的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产品没有剩余，没有私有制度和私有观念，氏族首领由人民选举产生并监督，因而不存在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到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产品有了剩余，私有制、私有观念出现了，氏族首领们逐渐利用手中的管理权和分配权，通过“贪污”等方式，一点点把公共财产据为己有，腐败由此而产生。“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①国家机器的存在是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掌握着国家权力的剥削阶级，在私有观念的推动下，总是违背公益原则，利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恩格斯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①而大多数人民没有制约公共权力滥用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所以腐败就成了难以治愈的社会痼疾。（2）防止腐败的根本途径是消灭私有制，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研究发现，腐败现象如同私有制、阶级、国家一样，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也不是与人类社会同终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只有通过社会生产的极大发展，实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人们觉悟极大提高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灭阶级对立，消灭与社会相背离的国家，也才能最终消灭腐败现象。这就是说，不能把反对和防止腐败同人类社会进步的大趋势、大目标相脱离，而必须把反腐败斗争纳入到共产主义事业中去。（3）“第一步”是争得民主，加强监督，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是实践论者，坚持从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考虑人类解放和反腐败问题。面对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存在的实际情况，他们的观点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②通过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执掌政权的人应该是“社会的负责的公仆”。为了防止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第一，由工人、农民当家作主，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第二，加强人民群众对一切公职人员的监督；第三，人民群众依法可以随时撤换不称职的公职人员；第四，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第五，取消高薪制，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一百多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思想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是人类反腐败思想史上质的飞跃。

列宁领导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后，发现在新的国家政权中依然存在着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这是为什么？列宁经过对实际情况的分析研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产生腐败的原因主要是：私欲较重的人掌握了权力；新的国家制度还不完善，还有一些国家机构是“半贵族老爷式的玩意儿”^③；人民文化素养不高。列宁关于解决腐败问题的基本思路是：（1）大力发展经济，这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根本。（2）废除一切专职的管理人员，让人民群众轮流承担管理工作。在社会主义初期一时做不到的情况下，要对专职管理人员进行必要的教育和监督，尽可能多地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管理。他提出：“应当使工人进入一切国家机关……学会自己管理国家。”^④（3）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② 同上，第293页。

③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4页。

④ 《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18页。

完善监督体制，加强对各级管理人员的监督。在党内，成立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在政府里，设立具有权威的工农检察院。“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① 列宁关于反腐败的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为反腐败斗争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庄严地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成为始终不变的立党方针。我们党 80 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争取中国人民全面解放和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同腐败进行斗争的历史。前 28 年，党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夺取政权的斗争中，主要是反对执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为了实现这一主要任务，也毫不留情地同自身的腐败现象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党执掌政权以后，反腐败的重点转到自身。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党所以能够牢牢掌握政权，而没有像其他一些共产党那样丧失政权，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了领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一个基本的经验，就是始终坚定不移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长期处于被围剿的境地。在险恶的环境中，党的任何腐败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因此，党在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浴血奋战的同时，始终对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把保持廉洁放在党的建设和根据地建设的突出地位。早在 1926 年 8 月 4 日，中共中央局就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腐败分子的通知》，严肃指出：“在这个革命潮流仍然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一个革命的党若容留这些分子在党内，必定会使他的党陷于腐化，不仅不能执行革命的工作，且为群众所厌弃。所以，应该很坚决地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以后，我们党比较自觉地防治腐败。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明确规定工农兵是国家的主人，由人民掌握选举权和对国家干部的任免权；推行供给制，实行经济民主，杜绝长官发财的恶习；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1933 年 12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颁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 26 号——关于惩治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10 页。

贪污浪费行为》，通过立法的形式来推行廉洁政治。

1935年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党的反腐败工作进入了更加自觉的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基础。主要是：（1）确立了党的宗旨和反腐倡廉的根本指导思想。毛泽东根据党的先进性质和历史使命，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概括为党的唯一宗旨。坚持党的宗旨，反腐倡廉就有了正确方向和可靠保证。（2）正确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实际上从政治层面规定了党必须清正廉洁，才能在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赢得人民的支持，取得革命的胜利。同时，党的反腐倡廉工作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3）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党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重要保证。（4）确立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是党的领导活动，包括对反腐倡廉的领导，取得成功的根本工作路线。（5）确立了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为反腐倡廉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6）形成了反腐倡廉的优良作风。我们党胜利地进行了延安整风，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有力地保证了党和革命根据地政府的纯洁。（7）提出了反腐倡廉的重要策略思想——民主与监督。毛泽东明确提出，跳出“执政——腐败——垮台”周期率的基本途径，就是民主。只要人人负起责任，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就不会人亡政息。正是在这些理论、路线和策略的指导下，我们党和党领导的军队、根据地政府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清廉风气，与国民党政府官吏那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行为形成了强烈对比。中国共产党以它廉洁为民的形象，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从而聚集了强大的力量，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腐败的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执政地位以及和平环境，增加了党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性，也增加了滋生腐败的危险性。对于这种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是有明确预见的。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谆谆告诫全党同志要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不做李自成。毛泽东对腐败的基本态度是严惩不贷，决不心慈手软、姑息养奸。建国之初，毛泽东亲自领导了“三反”斗争，领导了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这对20世纪50年代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起了很大的威慑作用。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1）在为什么反腐败方面，毛泽东认为腐败是剥削阶级思想在党内和政府内的反映，反腐败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腐败的范畴及其产生原因方面，他认为，政治思想上的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贪污受贿，生活上的挥霍享受，均属于腐败的范畴。产生腐

败除了阶级根源之外，还有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是贪污和浪费现象所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①。（3）在依靠谁反腐败方面，毛泽东始终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依靠最广大人民群众。（4）在怎样反腐败方面，毛泽东的主要方法是教育、惩治与监督相结合。毛泽东非常重视监督，提出党内监督的两条原则：一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他在1953年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

任何历史人物都会有其历史局限性，毛泽东也不例外。实践表明，在党执政的条件下，毛泽东对腐败过于强调阶级的原因，而对经济的、体制的原因注意不够；反腐败要依靠群众，但运用“大民主”和“群众运动”的方式，产生了许多负面效果。这些教训值得后人牢牢记取。但是，对这些“不足和缺陷”，也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具体的分析。历史记载了毛泽东反腐倡廉的伟大历史功绩。在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建构反腐倡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实践中，成功地压制了建国初期迅速出现的腐败倾向，创造了为世人称道的50年代那种清廉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这对于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年轻的共和国政权，顶住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成功地度过经济困难时期，夺取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反腐败斗争指明了胜利的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反腐败斗争也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新形势、新特点。总的情况是，腐败“这股风来得很猛”^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果断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党心民意的重大举措：恢复中央纪委和地方各级纪委，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集中力量处理“文革”及以前的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围绕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制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认真纠正群众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开展以打击走私、套汇、贪污受贿等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为重点的专项斗争，以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整顿。经过全党的努力，在不搞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情况下开展反腐倡廉，为贯彻党的基本路线提供了政治保证，也为开创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3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的新路子进行了探索，积累了经验。

邓小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地揭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必须反腐倡廉和怎样反腐倡廉这两个根本性问题，分析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地位、作用、特点和任务，阐明了党内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根源，指出了反腐败的方针、原则、途径和基本方法，形成了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其要点是：（1）执政党的党风和廉政问题，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①。因此，共产党反腐败必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2）开放、搞活的政策延续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就得干多久，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对腐败，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②。（3）反腐败不搞群众运动，但必须紧紧依靠群众。（4）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坚决制止和取缔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5）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要做全党的表率。“群众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③（6）反腐败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④。（7）坚持从严治党，严肃纪律，在法律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和违法乱纪的问题。”^⑤（8）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才能抗得住腐败。（9）党要接受监督，要加强党内监督，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监督检查。（10）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腐败，我们党和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腐败。邓小平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始终充满信心。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⑥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是指导新时期我们党深入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取得反腐败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有效开展反腐倡廉的新路子

从1989年到2002年，是我国反腐败形势严峻的13年，也是反腐败斗争实践与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页。

② 同上，第31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2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理论得到重大发展的13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从战略地位、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领导体制到工作格局，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举措，积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败的重要经验，形成了江泽民反腐倡廉思想。其要点可以概括为“八个坚持”，即坚持共产党领导，紧紧围绕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坚持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不正之风为主要内容的反腐败工作格局；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逐步加大治本力度，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坚持对人的处理持慎重态度，做到实事求是，区别对待；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从决策和执行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坚持加强廉政立法、遵纪守法教育和执法检查工作，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坚持全党一起抓，严格实行责任制，形成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合力。这八个坚持是毛泽东、邓小平反腐倡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

据统计，从1992年10月至2002年11月的10年时间里，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166万余件，结案158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59万余人。其中，县（处）级干部51917人、厅（局）级干部4274人、省（部）级干部（不含军队）123人。在这123名省（部）级干部中，因腐败问题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40人，其他多是因为失职、违反政治纪律、外事纪律等受到纪律处分。期间，查办了中央政治局原委员、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和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等重大违法犯罪案件；查办了湛江特大走私案、厦门特大走私案、无锡新兴实业总公司非法集资案等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大案要案。这些典型案件的查办和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进一步纯洁了党的队伍。

在查办违纪违法案件的同时，加强了源头治理工作，把预防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逐步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1998年，中央决定，军队、武警部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全国普遍推行了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继建立了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招标拍卖制度、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制度、产权交易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一些地方着手规范公务员工资外补贴，进行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试点。在实践中探索并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坚持全党一起抓。同时严格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强化了各级领导干部反腐败的政治责任。从1998年底

至2003年10月底,因反腐倡廉工作失职或不力而被追究责任的干部共有5.8万余人,其中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的4.4万余人,受到组织处理的1.4万余人。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势头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断开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局面

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胸怀全局,心系人民,求真务实,带领全国人民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好形势。与此同时,高度重视并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树立了“为民、务实、清廉”的形象。(1)更加注重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中央纪委严肃查处了王怀忠、刘方仁、刘长贵、王钟麓、刘克田、高严、张国光、程维高、麦崇楷、张宗海、田凤山、韩桂芝等省部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2)更加注重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重点抓了土地征用、城镇拆迁、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过程中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抓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截止到2004年8月底,全国共清理出拖欠农民征地补偿安置费147.7亿元,已偿还95.4亿元,清欠率为64.6%,大多数农户都拿到了补偿费。全国已经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280多亿元,占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的87%。医务人员一些收受“红包”和在医药购销中违纪违法问题得到查处。减轻学生家长经济负担48.4亿元;通过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和治理乱收费工作,减少农民负担880亿元,涉农负担恶性案(事)件大幅度下降。(3)更加注重强化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胡锦涛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代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郑重表示,在党风廉政方面一定以身作则,接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监督,弘扬了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的新风。中央制订颁发了党内监督条例,以强化监督制约,有效防止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组建并派出巡视组,对各省、区、市和国有商业银行进行巡视。各省、区、市也开展了巡视工作。(4)更加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投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四项改革整体推进,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四项制度逐步完善,政务、厂务、村务三公开不断深化。截至2004年8月,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占全部审批项目的50.12%,审批事项过多过滥的状况明显改变。中央批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约90%纳入了财政预算管理,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中央试点部门单位达到140个。政府采购的金额达到2000亿元,公开招标的比重达到65%以上。

(5) 更加注重发展党内民主, 保护党员权利。党的十六大以来,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的论断逐步深入党心民心, 党内民主建设进程加快。党中央正式颁布重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内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正在建立健全, 大多数省(区、市)实行了党委会全会无记名投票表决市(地)党政领导班子正职拟任人选和推荐人选的制度; 建立健全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 实行多种形式的谈话制度。同时, 进一步扩大基层民主,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 发挥特邀监察员作用。

六、高举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的旗帜, 坚定不移地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回顾自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反腐败的历史, 可以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 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的基本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是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科学。第二, 我们党从建党到执政, 从实行计划经济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从改革开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不论何时、何种情况下, 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的旗帜, 从不放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不断取得工作成效, 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党的成熟和巨大的执政能力。第三, 马克思主义反腐败思想所以能够在中国得到巨大发展, 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它的理论真谛, 坚持把它的实际紧密结合,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这三点结论, 需要我们牢牢汲取并始终坚持, 才能不断推动反腐败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

这些年来, 在全党的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 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逐步好转, 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逐步得到遏制, 诱发腐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程度不断提高。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 当前我国仍处在腐败现象易发多发时期, 涉及领导干部的重大违纪违法案件一再发生, 严重侵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还比较严重, 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比较严峻, 任务仍然繁重艰巨。当前腐败案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在作案手段上, 从直接受贿赂向曲线敛财转变, 违纪违法行为更具隐蔽性; 在作案目的上, 从生活资料的占有向资本积累发展, 体现了腐败分子更大的贪婪性; 在作案的领域上, 从传统的经济领域向新的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延伸, 腐败行为具有弥散性; 在案件规模上, 从个体腐败向群体性腐败发展, 腐败行为更具社会危害性; 在违纪违法性质上, 从单一罪错向多种罪错发展, 表现出腐败行为的多样性。近年来, 中纪委在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中发现有“五多”的现象, 即在“一把手”岗位上发生问题的多; 直接涉足微观经济领域的多, 如插手土地出让、建设工程等; 与不法商

人关系密切的多；顶风作案的多；利用配偶、子女和情人作案的多。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党中央和全党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为什么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一些腐败现象仍然屡禁不止？江泽民指出，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至今仍然存在；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隙而入，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客观上给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有些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讲了三条主要原因：一是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二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方面制度还不完善，还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是社会上还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从我们的工作方面看，胡锦涛指出：“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上述分析是非常深刻的。这表明，造成目前这种腐败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长时期的，而要清除这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也决不是一朝一夕或者打几个“反腐战役”就可以办得到的。现当代社会发展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亨廷顿）。当这个国家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往往是腐败的多发期、高发期。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中叶的新加坡，都出现过腐败高发的情况。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社会转型条件下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说明了，腐败可以搞垮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但不能搞垮人类社会。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是任何人、任何倒行逆施都阻挡不住的。我国的社会转型期一定会渡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一定要实现。承认这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要承认，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腐败“易发多发”现象具有历史特殊性。一旦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基本实现了现代化，那么这种腐败“易发多发”现象就必然会消退下去。因此，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说，当前的腐败不是不可治的“政治之癌”，而是可治之症；也不是“越反越严重”、“恶性蔓延”，而是在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受到有效围歼。一切明了中国社会基本走向的人，都应该对反腐败斗争的这种大趋势有一个清醒认识。至于说，腐败“易发多发”现象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消退下去，这个问题要看实践。只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才是最权威的回答。

顺应反腐败斗争的大趋势，十六大以来，党中央适时地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

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并于 2005 年初，颁布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判断形势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反腐倡廉工作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防治腐败的必由之路，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按照《实施纲要》的要求，必须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发挥整体效能；坚持依靠发展民主来防治腐败；坚持以改革统揽预防腐败的各项工作；坚持惩治和预防腐败相统一，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决贯彻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和《实施纲要》，就一定能够到 2010 年建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建立起思想道德教育的长效机制、反腐倡廉的制度体系、权力运行的监控机制，建成完善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进而有利于从根本上取得反腐败斗争的伟大胜利，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人消除腐败的伟大理想。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室）

从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出发理解党的 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

张志慧

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群众既是权力的主体，又是权力的客体，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权力的归宿、目的和宗旨。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各级领导干部来自广大人民群众，又是人民群众的公仆。共产党的权力必须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权力的运行和手段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为人民服务。从权力观的意义上讲，共产党员的领导权就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服务权。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的执政历史表明，谁遵循这个规律，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谁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谁违背了这个规律，就会遭到人民和历史的抛弃。在苏联、东欧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的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任务。站在全球化和当代政治学的角度，就会发现，党的执政能力不是一种孤立的、特殊的能力，而是与党的基本纲领、党的群众路线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内在统一，密不可分的。本文认为应当从如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与把握党的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

一、取得人民群众认可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政治基点

政党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方式与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政党是顺应民主政治的需要而产生的。代议制民主是孕育政党的母体。代议制民主作为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要求公民社会有相当的组织化，才能集中民众的意愿和要求，把能够正确表达这种意愿和要求的代表选出来。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体现为：（1）政党是民众参与政治的工具。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政党把民众组织起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民众通过政党来监督、影响政府的运作。在民主政治已经形成或正在形

成的条件下，政党积极参与和推进民主政治，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代议制民主使政党成为阶级、阶层或利益集团的代表，充当着代议制民主的主角。（2）政党是沟通民众与政府联系的桥梁。在民主政治中，国家作为民众授权的公共权力机关，其权力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分散的权力如何科学地变成集合在一起的有机的权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而且，公共权力大于个人力量，民众个人是无法控制它有可能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趋势的。政党一方面向社会作出反应；另一方面对社会进行控制。它一端连着民众，因为政党只有得到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才能够生存和发展；另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政党不同于民众，它是民众的组织化；政党也不同于政府，因为它代表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和控制。（3）政党是人民控制政府之手的延伸。政党以获取和掌握政权为基本目标，不只是一要维护自己那部分民众的利益不为国家权力所侵害，而且要通过掌权，利用国家机器来为本集团的民众服务。掌握了国家权力之后的执政党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解决一个重大的问题，即：如何才能在掌权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与民众的联系。权力在手，对推行这个党的主张十分有利，但同时党本身也由于靠近权力而有被权力腐蚀的危险。政党始终应当是人民控制政府的工具，而不应当变成政府和国家权力本身。

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政党既然是民众控制公共权力的工具，那么，政党必须首先要取得民众的授权。而要取得民众的授权，政党必须想方设法体现民众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这意味着在政党和民众之间建立一种相关的联系：民众通过选择政党来表达意愿，这将大大降低民主的运作成本；政党通过向民众提供满意的人选而获得他们的支持，这迫使政党要充分顾及选民的要求。为此，政党必须建立起一整套能联系民众和了解民众的有效机制。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执政党获得了控制公共权力的机会，对公共权力的构成和运作全面施加影响。对公共权力机关构成的控制，主要是对机构和官职的控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人权”的控制；对公共权力运作的控制，则主要是在公共权力的运作中，千方百计体现执政党的意图和政策主张，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对“事权”的控制。在这种政治关系中，民众与公共权力的关系是民主政治的内核：公共权力的所有权属于人民。执政党对公共权力实施控制只不过是民众对公共权力所有权的逻辑延伸。因此，这种控制的每一步都以是否反映民众的要求为准绳。也就是说，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执政党与公共权力关系的起点。没有这个起点，或者是忽略了这个起点，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就可能发生变形。

现代政治学中所说的政治合法性就反映了公共权力与民众的政治关系。政治合法

性是指政府基于被民众认可的原则基础上实施统治的正统性或正当性。也就是说政府实施统治在多大程度上被民众视为合理的和符合道义的。它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概念,与法律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法律的角度看是合法的东西,并不必然具有政治合法性。只有那些被民众内心所体认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中所说的合法性。取得和增大政治合法性的主要途径是尽可能增加民众的共识和政治认同感,使民众出于对政府行为的认可和服从义务来自觉遵守政府的管理规则。从理论上讲政治合法性资源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意识形态、合理有效的政治制度、政绩。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资源结构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体系及现实状态提供道义上的诠释。中国政党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功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其包容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成为指导思想的同时,也建构了人们服从政治权威的合法性理念。建立一套合理有效的政治制度、完善宪政是防止和避免合法性危机的根本途径。一种良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使政府享有足够的权威,同时使民众享有足够的自由。一个有足够权威的政府,是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基本条件之一,否则,就没有人民的安居乐业,就难以发展经济,社会的物质利益就不能正常增长,也难以保证社会利益的公正分配。合理有效的政治制度还能通过对社会价值的分配中所体现的合理性来营造政治合法性。这是政治合法性资源中产出最多从而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我国目前应当着重进行开发的部分。尽管我国政党制度在这方面提供的合法性尚有限,但是它已经表现出了充分发展的基础和趋向,近年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都是这种趋向的表征。政绩是中国政党制度政治合法性资源中最为重要性的方面,与前两者相比,政绩所提供的政治合法性由于表现在实体方面,其展现的说服力也是最充分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绩效在政绩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的业绩向人们传递着最具经验性的中共执政的合法性信息。

所谓政治合法性危机,就是政党正在失去人们的信任和认同。是对执政党地位的严重挑战。对执政党来说,政治合法性的下降意味着执政基础的松动和销蚀。

中国政党制度的政治合法性功能更直接地是通过党的群众路线产生的。中国的政党制度不具有通过竞选获得民众授权的现实方式。竞选其实不过是政党联系群众的方式之一,而政党联系群众的方式有许多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它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它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原则,已构成了传统的政治优势和政治合法性的源泉。目

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使党与社会的这种联系不断获得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形式。当代中国的政党政治即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它的上述诸功能或优势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应对中国超大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历史需求所形成的。但是这种优势的发挥在根本上依赖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党内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深刻体会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才能深刻体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历史使命的新觉醒，才能深刻体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思想的深刻之所在。它说明党真正认识到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和自身的特殊性，认识到了转变党的执政观念的必要性，从而为我们对执政党的地位和任务、包括对党的利益整合功能的正确认识提供了充分的可能。

二、治理国家与社会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核心内容

所谓党的执政能力，在我国应该主要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功能及其有效性问题。也就是“治国理政”的能力。通过行使国家权力治理国家与社会，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完成历史赋予的伟大任务，是执政党之执政的核心内容和主要任务。相对于党的执政能力来说，政府治理能力更加具体化，更加专业化，技术性也更强。政府的治理能力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主要任务，其实也是五大能力，即，按照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项任务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以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等各个方面。实质上是我们党长期执政必须坚持不懈地解决好的重大课题。

驾驭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是衡量执政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标志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问题。不断提高驾驭、管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首先要把经济增长置于优先地位，以此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先将“蛋糕”做大，然后才有可能谈公正分配，缩小差距。这为经济社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创造了有利条件。经济发展不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就会使群众失去信心和信任，党的执政基础就会发生动摇。有些国家执政党失去政权的根本原

因就是经济没有搞好。因此，发展经济是赢得民心、巩固政权的根本所在。但是如果只注意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公平，不在失业问题、弱势群体的保护方面发挥作用，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和经济倒退，也会出现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世界上一些国家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就经济体制改革来讲，目前正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进一步消除发展面临的诸多体制性障碍，推动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有效体制机制，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和解决。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的民主意识、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必然要求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以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全面进步。

确定了目前阶段党执政的主要任务与目标，那么采用何种手段或执政方式来达到目标？这是关系到能否实现既定目标的关键问题。当人民的权力通过法律形式转移到国家意志的执行——行政领域时，人民的作用如何发挥？长期以来，人们只是习惯性地依靠政治家对行政官僚的控制来间接地实现行政民主。因此，民主一直被囿于行政领域，民众在制度操作上的行政参与空间比较狭小，无法有效地渗透到行政过程之中，即使明显地存在着侵害公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民众也难以与之抗争。我们认为，政治民主只是给人民管理国家、保护权利设定了一种制度框架，提供了一种权力运行的政治基础。行政机关能否完全按照法律设定的目的和方式行使行政权，以良善的愿望执行法律，仍然是不确定的变数。可依之法并不等于是必依之法，良善的动机也可能产生不良的结果，形式的法制并不能代表实质的法治。不可否认，权力分立、制约与依法行政的原则对于实现人民权力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法是人民整体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具有普遍性，而行政活动则要把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具体化为一个个与民众利益攸关的具体行为，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专业性与技术性的操作过程，很难保证普遍正当的法律必然会产生特殊正当的法律效果；法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具有稳定性，但正是这一特点常使行政机关面临新的问题而无法依据既定的法律灵活应对；民众无论其主观愿望如何，都必须置身于行政活动之中，承受行政活动给自己带来的利益或者造成的损害。行政活动是否依据法律的精神实施，是否体现了自己的意志、保护了自己的利益，民众最有评判权，也最有可能从保护自身利益的角度成为行政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或消极对抗者，从而及时发现并参与矫正违法与不当行政行为。从实践上看，20世纪以后，议会大权旁落和行政权扩张在各国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权力重心已由议会转到了政府；民众依法控制议会，继而控制政府的民主政治理

论,已逐步被政府的权力膨胀甚至议会被控制的无情现实所代替。因而,作为国家权力主体的人民直接参与由政府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便是一种历史演进的必然逻辑。

民主地行使行政权力,是保证民主基本制度得以实现的具体环节与方法,是民主基本制度在社会各个领域的具体体现。行政民主是在政治民主的基础上衍展出来的治理意义上的民主。它是使行政活动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或维护民众的共同利益,公共行政机构及其公职人员能够切实向民众负责,民众具有参与行政活动的低成本通道,能够利用其自身的力量控制行政的过程。它既要限定行政的目的不偏离民众的共同利益,又要对公共行政的过程加以限定。行政民主的制度特征主要体现在行政公开与行政参与两大方面。行政公开是行政参与权实现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它是指行政活动的过程及行政机关所依据、制定或决定的文件、资料、信息情报,除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等法定不得公开的情形外,一律向社会公开和民众公开。行政过程的公开主要包括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行政监督等环节。行政参与是行政民主的具体体现和基本保证,决定着行政民主的实质和质量。它贯穿于行政权行使的全过程。从行政民主过程可以看出,行政民主不仅给政治民主的存活与成长提供了坚实的土壤,也为实现民主的原初价值——最大限度地保障民众权利进行了鲜活的制度尝试和路径探索,实现了从民主形式、民主内容到民主价值的全面复归。人们通过对民众在行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认知,来不断推进公共行政从理念范式到制度的变革。

如何实现从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的拓展,重构民众与政府的关系、提高政府的民主性、责任性与回应性,建立民众导向的、充分体现行政民主的行政价值体系,是当代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抉择和重要课题。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兴起的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政府应该尽可能地为社会提供满意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型政府就是以“管理就是服务”为根本理念,以提供私人或者社会不愿意提供、或者没有能力提供的公共产品为主要职能的政府。它是以民众为中心的政府而不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官僚机构,必须以民众的需求为中心,为其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服务;是职能有限的政府;是行为有效的政府;是法治的政府;是责任政府;是民主参与的政府。从以推动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以长期担当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为主要方式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不仅是政府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更是政府理念上的改革,它不仅具有行政学上的意义,更具有政治学的意义。这一转变的范围也超出了政府内部的行政体制,涉及到了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

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内容是:(1)在理念上,要从生产者导向向顾客导向转

化。以政府为社会的中心从事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的方式不可能也不需要考虑服务对象的个人偏好与满足程度，其结果必然导致政府的低效与民众的不满。顾客导向表现在起点、过程和终点整个流程中：民众需要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政府进行工作和流程设计的起点；民众是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全程参与者与识别者；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质量、数量如何，民众是最终的裁判者。在具体的行政过程中如何实现顾客导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提升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以无缝隙的方式追求零顾客成本；强化政府内部顾客也是上帝的观念；加强与顾客之间的交流与沟通。（2）在组织结构上，要压扁等级结构，让政府更加贴近民众，建立以地方为主的政府。传统的官僚等级制使高层决策者们听不到，也不必听从来自民众的声音，其决策反映的是官僚们的意志，与民众的需求相去甚远。面对世界的信息化、全球化，官僚等级制度便越来越感到无所适从。压扁组织结构，让政府更加贴近民众，建立以地方为主的政府，是促使政治民主向行政民主转化、提高行政民主的重要组织保障。（3）在权力关系上，逐步归还民众权利，扩大自治范围。行政权力在一定条件和一定范围内的膨胀具有合理性，然而，如果超出了特定范围和程度，便容易造成对公民权的侵害。从实践上看，各法制国家的行政改革大都从调整行政管辖的领域入手，把本不属于行政管辖，而又一直为行政把持的，却又注定管不好的事情交给民众或“非政府组织”、“准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第三部门”等社会组织行使；即便是属于自己职能范围的权力也不一定非要排他性地行使。政府在部分领域的退避不仅不会降低公共物品与服务的质量与品质，相反，它一方面可以使政府从许多领域和事务中“淡出”，专门把好宏观之“舵”，为公共物品供给提供制度和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从权力到权利的回归，给权利主体行使权利提供更多的施展空间和选择自由，最大限度地实现了权利的民有、民治、民享。（4）在机制上，要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增加民众“用脚选择”的机会。传统上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具有非选择性和非拒绝性，这种高度垄断的公共产品提供方式必然带来官僚主义和公共物品的高成本、低品质。改变这种局面的有效办法，一是改变对公共服务的垄断甚至独占的做法，允许和鼓励民间参与和提供公共服务，使公共机构与民营机构之间、公共机构相互之间、民营机构之间，彼此展开竞争，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二是把选择权交给民众，让民众对其所需公共物品和服务的品种、数量、质量及提供者享有充分的选择自由。（5）在方式上，积极探索新的运行手段，不断降低行政成本。增强政府的责任性与回应性，尽可能地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贡献率。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都在围绕政府自身管理与政府对社会的两个向度，进行行政手段的变革。（6）在政府自身管理上，强调非管制政府模式。即

通过取消公共部门过多的规章制度，取消过程取向的控制机制，相信依靠公务员的责任心、潜力和创造力，来提高政府的行动水平，让政府更具创新性和效率。在政府对社会的治理上，引入市场手段，有效弥补单一行政审批手段的不足。如：私有化、用户付费、招标投标、合同承包、委托代理、分散决策、产权交易与变更、内部市场等。在技术上大力推行电子政务，建立与民众相连的 E 政府。让电子手段为公民、法人、社会带来更多的方便和优质服务，降低行政成本，防止寻租现象的蔓延。它不仅大大推进行政民主化的进程，而且能够为民主提供技术手段，具有现代工具的意义。

在我国，“公共服务”已经被确定为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只有经过国家权力运行过程中的民主运作方式与程序，才能使制度上的人民权利转化为现实的人民权利。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种执政方式的转变，既符合政治民主的内在要求，也适应了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社会 and 科技发展的趋势。

三、党自身建设发展的能力是党的执政能力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而是在宪法的规定下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民主政治建设的全面领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各项社会事业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尤其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我国在政治制度上坚持走自己的路，为今天的经济建设成就的取得、综合国力的提升和社会的稳定提供了保证，也逐步成为党内外和国内外人们所认知的事实。因此，搞好党自身的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同时也要求党的各方面建设成效最终都要体现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完成党的执政使命上来。要紧密联系治国理政的实践，根据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目前主要应当抓好如下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要加强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决定了党的功能、目标、任务和活动方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现代化建设，党的政治功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作为执政党，必须尽可能地整合多方面的社会关系，凝聚现实的各种社会力量，努力使各个社会阶层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切实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样我们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利用行政权力手段实施领导的传统方式必须改变，代之以协调、沟通、服务的方式，来增强对整个社会的凝聚力，成为社会整合的领导者。在社会阶层多元化的基础上建

设和谐社会，是对执政能力最好的检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取决于党自身的领导力量。而一个团结、强大、有生命力的政党的形成关键就在于党内民主建设。党的力量来源不是依靠党的外部资源，而是依靠党的全体成员和党组织，依靠党内部的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中国共产党通过自身的组织来团结广大人民，从而领导整个社会。社会在党的组织和整合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党通过理想、信念、信仰以及巨大的影响力来对社会成员进行高度的整合和团结。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是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所谓政党的社会基础，是指那些认同政党政治纲领，拥护政党的政策主张，对政党具有向心力，凝聚在政党周围并支持政党的社会群体，是指政党所能代表其利益和要求的社会阶层。政党的社会基础作为政党的生存土壤，其范围的大小和力量的强弱，决定着政党的生命力与影响力的大小。作为执政党，总是要想方设法减少社会矛盾，协调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益，以便造成一个和谐的局面，求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不执政时，政党只要得到它所代表的那个群体的认可就行了；执政则需要得到社会多数的认可。争取尽可能多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的支持和拥护，是任何渴望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执政党必须首先考虑的。

其次，加强和扩大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建设带动人民民主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党在整个国家、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使其在民主政治建设中也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运用民主形式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本身就是党的奋斗目标之一。执政党的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具有很大的示范、带动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制约人民民主的发展程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内民主生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和影响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一方面，党内民主是党能够健康发展、正确决策的基本保证，直接决定着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从而对人民民主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党内民主的状况必然会产生示范效应，促使全社会学习和仿效，推动人民民主建设的发展。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核心和灵魂，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关键。因此，以党内民主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突破口，是历史理性的必然逻辑。除了制度民主需要依靠政党来实现以外，民主思想和民主观念，也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来传播，政党正是民主思想、观念传播的载体。没有政党作为承载体，任何民主思想、民主观念和民主运动，都不可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力量。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以党内民主的实现为前提。政治体制改革要实现民主的目标，必须以党内民主为基础，民主首先从党内做起。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直接关系国家的稳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场全面

的、深刻的政治体制改革运动，这就要求改革既要有高屋建瓴的总体规划，又要注意依时机、分轻重缓急逐项进行。从我国政治体制总体框架来看，中国共产党处于最高的政治领导地位，因此她本身的民主化建设正是人民民主事业的基本前提和政治保证。

第三，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历史任务。党执政以后，一方面使我们党有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同时也使党面临着被权力腐蚀的危险，容易滋生脱离群众的现象，滋生贪图享受和消极腐败的现象。党越是长期执政，拒腐防变的任务越是艰巨。腐败是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的“权力顽症”，是导致许多政党衰落乃至败亡的致命毒素。从世界范围来看，执政党如何防范和治理腐败，是一个特别棘手的重大课题。解决不好，就会丧失人心，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在我国腐败现象还比较严重。虽然这些年下大力气查处惩治，但尚未遏制住滋生蔓延的势头。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违法犯罪案件时有发生，在党内和社会上影响恶劣，为广大群众所深恶痛绝；一些窝案、串案，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只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党中央一再强调坚决惩治腐败，将思想教育、制约防范和查处打击三者有机地结合，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今后，还要注重健全制约防范机制，完善和落实各项制度规定，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不断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把我们党建设成清正廉洁、深受人民群众爱戴的执政党。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科社所）

★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异化理论探源：从卢梭到马克思

王晓红

异化问题作为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学说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创立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理论武器。马克思作为异化理论成熟形态的创立者，其异化理论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

一、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

（一）卢梭的异化概念

卢梭是异化理论的开创者。他在著作中多次使用 distance（间隔）、froid（疏离）、oppositionnel（异己）、objectivation（对象化）和 aliéner（疏离）等词，抗议人类脱离自然状态以来的全部文明的疾患。“aliéner”一词虽然还未正式译作“异化”，但卢梭的观点中已包含着较为丰富和深刻的异化思想。卢梭的异化思想是其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他有关政治、经济、教育、艺术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围绕着异化思想展开的。

卢梭首先假定了一种自然状态并将其描述为一种自由、平等和幸福的“黄金时代”，既而与充满奴役、邪恶和不幸的文明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使其“异化”概念具有了较为深刻的涵义：进步就是退步，文明社会的任何一次进步同时也是人类在道德方面的一次蜕化。也就是说，人越是社会化就离开自己的本性越远，人的自我完善化同自己本身相对立，即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社会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了它的反面，理性由最初作为使人类文明化的东西变成了一种新式神话。换言之，理性（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被局限在科技理性的层面，并被作无限的延伸，管辖着人类日常的所有事务，人被绝对化的理性所异化。

这种由最初的统一内在地分裂为与它对立的各个因素的自我背离现象，表现在多

个方面：第一，在文化生活中，文化完全缺乏道德动力，而只是建立在对权力、财产、野心和虚荣的追求的基础之上；“我们的灵魂正是随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艺术之臻于完美而越发腐败的。”^①换言之，科学和艺术的进步是以道德沦丧作为代价的。我们人类越是积累知识，就越失掉获得最重要的知识即认识自我的途径。第二，在政治生活中，异化的社会制度不仅剥除了个性平等的天赋权利，而且卑劣地侵吞了个性自由的天赋人权。正是文明社会中繁复、扭曲的种种制度及其所带来的一切偏见、权威和欲望，束缚了人们的自由天性，造成了人性的异化和社会的普遍堕落。第三，在伦理生活中，“我们的风尚流行着一种邪恶而虚伪的一致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都是在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②大部分人为了利益而失去了个性，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样子，却不得不显出另一种样子。这就妨碍和束缚了人的天性，只是一味地趋同，导致了人的个性、多样性的丧失，还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与疏离。我们的心再也不互相亲近了；相反，在虚伪一致的礼仪和文雅背后隐藏着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怀疑、猜忌、恐惧、冷酷、戒备、仇恨与背叛。

卢梭指出，私有制是奴役、不平等、贫困等种种社会异化现象产生的根源。正是由于人类具有一种特殊的自我完善能力，才导致了私有制和人类社会的产生。它是人类一切不幸的根源，也是异化得以产生的根由。这里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后来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就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思想。

在卢梭看来，社会的异化已经使人畸变为无人性与非道德的动物，并且他认定，要彻底地改变现存的社会和文明，其关键在于政治。经过长久思索和认真研究之后，卢梭提出了其理想的解决方案：建立在真正的社会契约基础上的、合乎道德、体现公意的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国。为了消除异化，使人成为无愧于“本然”价值的新人，卢梭还主张对人进行自然教育，即以感觉经验论为理论基础，以大自然和人的天然本性为良师，按照儿童身心发展阶段的不同特点，提出各种不同的教育方案，以期培养出人性各方面都较为完善的“新人”，即绝对自由、平等和幸福的善良人。

综上可知，卢梭的异化思想主要是对支配、强制、奴役、不自由等否定性价值的批判，是对人的解放与自由这些正面的积极价值的追求，较为充分地展现了自由与必然、理想与现实、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卢梭虽然看到了异化的根源与私有制有关，却并没有提出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结论。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和自然教育思想都具有一定的空想性和抽象性。

① [法]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1 页。

② 同上，第 11 页。

（二）黑格尔的异化概念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第一次明确引入异化和劳动的范畴，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异化理论，用以说明精神、意识以及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机制。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认识论、逻辑学、辩证法是一个东西，逻辑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是一致的；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走向自己的反面。主体由于自身矛盾的发展而产生自己的对立面，产生客体，而这个客体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凌驾于主体之上，转过来束缚主体，压制主体，这就是“异化”。实质上，黑格尔所理解的主体就是精神，他认为精神是唯一能动的、创造性的力量，整个宇宙的发展是精神的发展，而精神的本质是自由；精神的发展过程，就是实现自己的本质的过程，就是达到绝对自由的过程，这个自由是通过一系列曲折的、不断克服精神与客观世界的矛盾而取得的。所以说，一切异化在他那里都是精神的异化。黑格尔明确地描绘了异化的三种形式：

首先，绝对精神异化为自然界。黑格尔哲学的出发点是绝对精神（理念），绝对精神作为纯精神表现为逻辑学，当它发展到逻辑阶段中的“绝对理念”时，它已经不能以纯逻辑概念的形式继续发展下去，于是转化为自己的反面，过渡到自然，而自然又反过来束缚了理念，使理念陷入不自由的状态。这就是理念由“自在”变为“他在”，也就是理念的第一次异化。然而理念是主动的、创造性的，“神圣的理念恰恰在于自己决然将这种他物从自身置于自身之外，又使之回到自身之内，以便自己作为主观性和精神而存在”。^①也就是说，理念树立了自然界这个对立面，进而在人类身上摆脱了自然的桎梏，扬弃了自身的异化，重新回到了自身，作为自在自为的理念而出现，这就是精神。

其次，客观精神对象化为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社会活动的一般对象性产物。黑格尔指出，在精神领域，绝对理念在人类身上回到自身也要经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精神的这一发展过程按逻辑学概念中主观性、客观性和绝对性，划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主观精神就是精神处于它自身的主观性、观念性之中，精神的自由只是潜在的，还没有实现出来，实际上是讲个人精神及其形成过程。主观精神把自身投向外界，这就是客观精神。这样，主观精神也异化出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客观世界（国家制度和人们社会活动的一般对象性产物），这个世界和日月星辰、山河大地一样是外在的、客观的；但同时它又是精神的，因为它是心灵、理智、意志的表现。然而人在开始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只觉得社会是一个外在于自己的、束缚自己的东西，因而陷入一种不自由的状态。人类历史就是精神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精神扬

^① [德] 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0页。

弃自身的异化而回到自身，这就是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有三个发展阶段，即绝对精神认识自己的阶段：艺术——宗教——哲学。在最后的哲学阶段中，精神认识到了世界就是精神的表现，也就是它自己的表现，世界就是它自己。这样，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就达到了最后的同一，理念回到自身的过程就完成了，精神也就完全克服了异化，达到了绝对的自由。

最后，人的精神物化为他的劳动产品，即人的劳动的外化或异化。谈到奴隶劳动，黑格尔认为，奴隶通过劳动改变了物，就是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异化”、“外在化”到物上面。劳动、行为、实践虽然是人的现实性，是人的自我实现过程，但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异化的，“在这种外在的东西里，个体不再保持它的内在于其自身，而毋宁是让内在完全走出自身以外，使之委身于外物”。^①实际上，黑格尔所讲的奴隶劳动的“异化”，即是对象化，因此这种劳动还是体现对象化的一般劳动，是可以肯定自己本质力量的活动。只有在马克思那里，“对象化”和“异化”、一般的对象化的劳动与异化的劳动才真正区分开来。

异化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是神秘的、唯心的。他所谓绝对理念异化出自然界，只不过是宗教创世说的改装罢了；为了体系的需要，黑格尔还认为异化有可能完全克服，达到绝对的自由，在这里他背叛了辩证法，而硬给永恒的世界发展过程规定一个终点。黑格尔所说的自由纯粹是精神的自由，他所说的异化的扬弃也是在纯粹思辨领域内进行的。问题不在于改造世界，而在于认识世界，只要达到了绝对知识，自由就完全实现了。因此，黑格尔并没有给自己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而是为现存的制度辩护。这表明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一面。

（三）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

费尔巴哈是自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的殿后人，是“在黑格尔以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②的杰出人本学——唯物主义者。他的人本学异化思想，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直接来源之一。

费尔巴哈从人是现实感性的实体以及人具有感觉和思维能力的实体出发，从人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的一部分的思想出发，批判了黑格尔在异化主体设置上的唯心主义。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理性的神秘化，哲学的对象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哲学上最高的东西是“人的本质”，人是肉体 and 灵魂相统一的现实存在的感性实体，是有感觉、能思维、有意志、能依照目的活动的感性实体。可见，在费尔巴哈

①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4页。

那里，“异化”这一概念开始有了唯物论的内容。

费尔巴哈用人的自我异化来说明宗教的人学根源。他指出，宗教是人类精神的噩梦，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由于人对自然有依赖感又企图控制和征服自然，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就把自己的本质移到自身之外，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上帝，然后又反过来把上帝当作独立的主体，宣称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这样就造成了人神关系的颠倒，人的头脑的产物反过来统治了人自己。费尔巴哈说，人的本质就是人的“类”，即理性、意志、爱。在宗教中，人把这个类异化为一个上帝，人把自己的本质看成了某种彼岸的东西。实际上，上帝的本质正是人的本质，上帝本质的一切规定也都属于人的本质。但是由于人把自己的本质赋予了上帝，他自己就变得贫乏了；上帝越是富于人性，人就越是要放弃自己的人性。所以，宗教是人与自己的本质分裂，人与上帝的对立，即是人与自己本质的对立。

人由于把自己的“类”异化为上帝，人就丧失了自己的本质，变成了孤独的、利己主义的个体。因此，费尔巴哈指出，为了把人的本质还给人，使人能够过符合自己本质的生活，必须消灭宗教，废除宗教禁欲主义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和自然需要的禁锢；用人类的爱来代替对神的爱，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界、人和我之间的统一。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彻底摆脱宗教的影响。在摧毁了那个崇拜上帝的宗教之后，他还想建立一个新的宗教，去崇拜和上帝一样的抽象的人。他自己曾经说过：我使神学上升到人本学，倒不如说是使人本学上升到神学。

二、马克思对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扬弃

（一）马克思对卢梭异化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在马克思的学说中，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与对人类解放的追求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人文关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维度。马克思博大精深的人文关怀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异化理论表现出来的。传统观点一般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思想渊源局限于黑格尔、费尔巴哈、英国古典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而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很少涉及。事实上，卢梭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在批判性地吸取卢梭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科学的“异化观”。

马克思曾认真研读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写下了大量读书笔记，尤其是卢梭对专制社会种种异化现象的批判，对人的自由、平等的追求，成为日后马克思异化理论形成的丰富的思想养料。这样，在“异化论”上，卢梭因其首开先河而闻名遐迩，马克思则由于最为深刻而铄古振今，双方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首先,在有关人是否具有“本然”价值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和卢梭有承接关系。马克思认同卢梭关于人类具有“本然”价值的思想,认为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总要为自身设立“本然”价值作为努力争取的理想目标,这是完全符合人的本质生活的。但是,马克思不赞同卢梭所设定的抽象的“德性”价值,而是将自由自觉性的劳动设立为人的最深层本质,认为在此基础上,人作为有理性的社会存在物通过劳动实践活动,达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卢梭的缺失就在于割裂了道德与实践之源的内在联系,看不到道德的功能从来不是天赋的,而是由人们在劳动实践中自己建构的。

马克思也赞同卢梭有关人性的历史的发展观念,抛弃人性是固定不变、普遍永恒的提法,认为它们都脱离了人的社会性、实践性去谈人性,并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人性是存在的,它包括劳动性、意识性、社会性、需要性;人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的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卢梭虽然触及到了人性的历史的发展的观念,但他远未达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

其次,在探讨人的异化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时,卢梭和马克思都看到了劳动和私有制在人类异化中的作用。卢梭认为,劳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促进人类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导致私有制的产生,从而将人类引向了腐败和堕落,私有制是社会异化和人性异化的主要根源。马克思在上述卢梭有关异化思想的描述中觅得了他劳动异化理论的源头,并对其进行了超越性的继承。同卢梭一样,马克思也认为劳动是私有制和分工产生的原因,私有财产起源于异化劳动,但私有制一经产生就成了异化劳动的根源。正是私有制和异化劳动一起造成了劳动和劳动条件的分裂,导致劳动者和劳动活动、劳动产品、人的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了异化。

马克思虽然和卢梭一样,认为劳动会产生分工和私有制,私有制和分工又会导致任何社会的异化,但他在私有制如何产生和私有制的历史作用等问题上,对卢梭进行了本质性的超越。其一,卢梭看到了土地耕种必然导致土地分配,从而产生私有观念,私有制是科学技术(冶金术和农业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隐约猜测到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从而表现出了某种唯物主义倾向,但他又把私有制的起源归结为人的主观意志的偶然产物,从而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之中。马克思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来探讨私有制的产生,认为私有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异化的原因。其二,卢梭只看到了私有财产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并且将私有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理解成了存在的永恒性,因此并没有提出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结论。并且,他的异化克服论,即道德理想国的设计也仅停留在“政治解放”的表层和“伦理重构”的幻想,并没有触及异化的根源——生产力的不发达和私有制。马克思从现实的历史的角度出发,区分劳动对象化和异化的本质差异,科

学地、辩证地指出，私有制既是异化的结果，又是人的进一步异化的原因，只有通过共产主义运动，在保留了私有制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基础上，对私有制进行彻底扬弃，才能真正消除人和社会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

最后，卢梭异化思想中所体现出的批判精神和辩证法思想深深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同卢梭一样，具有博大深刻的人文关怀思想，充满了对现存社会的伟大批判精神，拥有对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共同追求。但是，由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其批判更为彻底、更为深刻，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也更为重大。卢梭的思想中还体现着深刻的辩证法因素和历史主义的成分，这对马克思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理论影响。恩格斯曾将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看作是辩证法的杰作，并指出：“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完全相同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否定的否定。”^①但是，由于这种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在卢梭那里带有明显的猜测性和情感色彩，所以还远未达到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高度。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异化理论的批判、继承和弘扬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论是建立在对黑格尔异化观的扬弃的基础之上的，对于黑格尔异化理论的扬弃，包括否定（批判）和肯定（继承）两个方面。先从继承方面说起。

第一，黑格尔的异化论中潜含着对一切进行批判的因素。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由于紧紧抓住了人的异化，尽管人只是以精神的形式出现的，从而使其理论中隐藏着一切批判的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工过了。换言之，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隐藏在唯心主义外壳中的批判，他自己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辩证批判的革命意义，因此尚有待于从其唯心主义外壳中将它发掘出来，这一发掘工作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

第二，黑格尔异化论中包含着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将人看作自我创造发展的过程，把人的本质看作是异化和扬弃的发展过程。在主客体关系上，黑格尔认识到，人们的活动服从不依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里包含着历史唯物论的幼芽，还包含着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转化的思想。这对马克思辩证唯物论的形成有很大的启发作用，马克思将黑格尔颠倒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把自然、物质当作出发点，认为精神最初是从物质异化出来的，人是从自然异化出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3页。

的；在承认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前提下，在一定意义上承认存在由精神向物质异化的过程。

第三，黑格尔把劳动看作是人的自我肯定，是解放人的手段，认为正是由于人与自然的对立，所以人需要用劳动来征服自然，并在劳动过程中锻炼和教育自己，使自己成为自为的存在。黑格尔的上述观点对马克思创立异化劳动理论无疑起了积极作用。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有关劳动的论述的合理内核，认为“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①

马克思在肯定了黑格尔异化观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对他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和整个哲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批判，从而提出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劳动异化论。

首先，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混淆了“对象化”和“异化”。认为黑格尔从抽象精神主体的自我运动来看问题，把二者混为一谈：对象化被看作是精神自身的异化，扬弃异化被看作是对象回到精神。这样，就把异化当作任何社会形态共有的属性而永恒化了。扬弃异化也就变成了纯粹思想范围的事情，现实的异化消解为纯粹思维活动，因而实际上是维护了现实的异化。在对黑格尔混淆“对象化”和“异化”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将异化确定为一个历史概念，认为对象化活动是人的劳动，是人的永恒的必要的活动，是人赢得自由和解放的依据；异化则是人的“非人”化，是人的劳动和对象化活动中的一种特定形式，是劳动在私有制条件下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一种特殊的客体化、对象化、物化。异化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也在一定条件下消失，就如同阶级最终将被消灭一样。

其次，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是错误的。其一，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是唯心的，他只承认一种劳动，即抽象的精神的劳动，认为劳动只是精神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其二，黑格尔只看到了劳动的肯定的一面，没有看到劳动的否定的一面，也就是劳动的异化。在对黑格尔的上述错误观点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在《手稿》中重新考察异化问题，用现实的劳动的异化来说明私有制社会，并且从分析异化劳动引伸出了共产主义的结论。这样，“异化”这一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就开始获得了崭新的、唯物的涵义。

最后，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指出黑格尔只是对人类历史和自由作了抽象思辨的表达，“他把财富、国家权力等等看成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时，……只是纯粹的即抽象的哲学思维的异化。”^② 黑格尔把真实的人类劳动看作只

①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② 同上，第118页。

是抽象的精神和它的自我意识活动，把真实的世界和历史主体——人看作只是抽象的绝对精神及其自我意识。这样，主体、对象和主体对象化活动三者，统统都被神秘化了；人类社会中的本质的异化及其扬弃，统统变成了精神领域之内的演变过程。因此，黑格尔的异化思想中尽管包含着深刻的批判因素，却因为其神秘的唯心形式而不可能得到阐明发挥，相反成了非批判的东西，丝毫不会触动现实社会中私有制的一根毫毛。

马克思既读出了黑格尔异化观中有价值的东西，也看到了其唯心主义形式的致命缺陷和错误，并在批判这种错误的基础上，从实际的真实的人及其活动和历史出发，提出了具有辩证唯物性质的劳动异化理论。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异化思想的扬弃和超越

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启发了马克思：

首先，马克思早期异化理论中有关人的本质的观点，受到了费尔巴哈人本论的启发。费尔巴哈认为动物都是单个的存在物，人却是类的存在物，具有类的意识。在《手稿》中，马克思接受和运用了“类”这一术语，用来描述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即“类本质”的异化。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费尔巴哈抽象的类的基础上，而是把类的观点进一步深化，从而超越了费尔巴哈。马克思从人的现实活动中来理解“类”这个概念，认为人之所以能作为类来生活，就在于人具有不同于动物活动的生产活动，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和类意识源于有意识的自觉的生产活动；类的意识不仅把对象、客体、自然界看作是人的无机身体，而且把人看作是一个社会整体。在这里，费尔巴哈的理论为马克思从内部理解社会，把人作为历史主体提供了科学的基础，也为以后马克思从理论上概括生产关系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作用。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是在扬弃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将人类自身看作是唯物主义大厦的主体，把关于自然的唯物主义只当作哲学大厦借以建立的基础。马克思高度重视费尔巴哈的这一理论，并把它作为自己探求新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理论来源。

最后，费尔巴哈是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用神的眼光来谈论人及其本质的，是以有血有肉的感性现实的人而不是自我意识的人为出发点来批判宗教异化的。他对宗教和唯心论所作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不仅指出了宗教和唯心论哲学的错误，而且揭示了它们的认识论根源。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上述观点影响下，和黑格尔的唯心论决裂而转到了唯物论方面。当然，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一开始就是指各种社会关系的对立，而不是像费尔巴哈那样只限于宗教方面。

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断成熟和异化概念的不断发展中，马克思清楚地意识到费

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思想的局限性，从而在彻底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异化观和唯物史观。

第一，费尔巴哈以他的“人本学”批判了黑格尔在异化主体设置上的唯心主义的同时，恢复了唯物主义传统。但他也和黑格尔一样，都是从人的某种属性出发去考察异化的，他心目中的人是抽象的人，理性、意志和爱是这个人的绝对本质；因而，这个人仅仅是感性的对象，并不是活动的主体。这样他就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现实历史性，抛弃了辩证法，失去了从自然通向现实世界，通向人类社会的道路。另一方面，黑格尔却异常强调能动性，不过这个能动的主体是抽象的精神。马克思克服了两者的片面性，把辩证法和唯物论结合起来，指出从事社会实践的人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人的活动又是受一定的条件所制约并服从于一定规律的。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卢梭所说的“自我完善化能力”，不是黑格尔说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说的抽象的“类”，而是有目的的、自觉的活动，是劳动。后来，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异化观出发，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社会关系的总和”。

第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又是直观的、不彻底的。他只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考察人，没有看到还应从人与社会的关系来考察人。因此，一涉及到社会历史领域，他就重新陷入了唯心论。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是对费尔巴哈有所保留的，他不满意费尔巴哈对政治问题的忽视，认为费尔巴哈的工作是重要的，他把宗教的世界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但这个工作又是半途而废的，对宗教的批判只是第一步，主要的是要分析世俗基础本身的分裂，然后用革命的方法加以改造。这里，马克思把对神学的批判转变为对政治的批判，从宗教的异化进而分析社会的异化。通过这一批判，马克思把“异化”概念加以彻底的唯物的改造，而且运用到思想、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从而使这一概念获得了全新的内容。并且，正因为马克思把“异化”概念作了唯物的改造，所以克服异化的方法也不同于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指出，异化的克服必须要在实践中解决。正是在实践中，马克思不但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哲学，而且远远地超越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史观。

综上所述，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对异化现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并提出了自己克服异化的途径的观点。卢梭作为近代西方社会异化现象的第一个揭示者，提出了私有制是人类社会不平等的起源的重要思想；黑格尔运用辩证的方法研究异化问题；费尔巴哈则以他的“人本学”批判了宗教异化，重新树立了唯物论的权威。但是，他们都是在思想范围内谈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因此，他们不可能创立真正科学的异化观。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卢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异化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并对其进行了超越，从而建构了自己科学的、唯物的异化理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揭露

资本主义的秘密、创立剩余价值学说中，起到了直接的作用。今天，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仍是我们用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的重要武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坚持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把握社会发展

——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

张 磊

20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先后出现了“后工业社会”理论、“第三次浪潮”理论、“信息社会”理论等形形色色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在社会发展趋势以及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上进行了深入探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这些理论同时也存在诸多的缺陷,其中最严重的缺陷就是它们很少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分析社会的发展。然而,同是基于西方社会而产生的理论,英国著名学者柯亨的观点却显得有些“标新立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另类”。他坚持从生产方式的角度剖析社会的发展,运用分析哲学和功能解释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进行了辩护。当前,正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重读柯亨这位“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辩护”的哲学家,梳理他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精华,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柯亨对唯物史观的辩护

格·柯亨(G·A·Cohen)是英国伦敦大学哲学、社会政治理论教授。他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就分析马克思主义而言,其著作主要有 1978 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和 1988 年出版的《历史、劳动和自由》。柯亨是人们公认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和具有深刻影响的重要代表者之一。他的重要地位在于他首次运用分析哲学的原则和方法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进行辩护:“我要辩护的是一种老式的历史唯物主义,一种传统的概念。按照这个理论,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社会形态的兴衰和衰落要以它们促进还是阻碍这种增长为转移。”^①

^① 柯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3 页。

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中，柯亨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尤其是逻辑分析的方法，对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和分析，澄清了某些混乱和模糊。在柯亨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功能主义的历史和社会理论，是一种功能解释。所谓功能解释，柯亨认为“它的含义很粗略的说就是，被解释项目的性质是由它对解释它的项目的作用决定的”。^①按照这种观点，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决定的。但是，生产关系的这种反作用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来解释的。这是因为，先进生产关系之所以对生产力有促进作用，就是因为它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落后的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之所以有障碍作用，则是因为它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同样，上层建筑的性质是由经济基础对它的决定作用来解释。据此，柯亨提出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优先地位的首要命题和生产力的发展决定整个历史发展的发展命题。柯亨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辩护主要就体现在他对这两个命题的辩护上。

1. 柯亨的首要命题

柯亨的首要命题主要是运用功能解释的方法分析，说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解释上的首要性。

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柯亨认为，特定的生产关系的出现是因为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的结果，“如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一致，生产力就会不发展，但这就是为什么生产关系不是与生产力不一致——因为既定类型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②“现行的生产关系之所以会流行，其原因就在于它们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现存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将适应其水平，那种适应其水平的生产关系因而就流行起来。换句话说，如果K类型的生产关系得以流行，那是因为就现存的生产力水平来看，K类型的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通常情况下解释的标准的形式。”^③换句话说，特定社会关系的存在可以由这些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来做功能解释：当生产关系稳定持续的时候，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停止存在时，是因为它们不再有利于生产力。由此可见，“如果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它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它们适合生产力的发

① 柯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295页。

② 同上，第175页。

③ 同上，第174页。

展。”^①从柯亨对生产关系所作的功能解释，不难得出这样命题：生产关系的性质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来解释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柯亨赋予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在解释上的首要性。正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了为什么是K类型的生产关系，而不是其他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因为K类型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才导致其得以流行。这就是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释了某种生产关系的流行，体现了生产力的首要性。

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可以对生产关系的性质做功能解释，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有决定作用，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有反作用，这两种作用是否矛盾？柯亨针对生产力的首要命题做了进一步说明，“经济结构促进生产力发展明显事实并不损害生产力的首要性，因为生产力是按照结构促进发展的能力来选择结构的。”^②可见在柯亨看来，尽管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至于哪种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却是由生产力而非生产关系来决定的。换句话说，是生产力选择了特定的生产关系。

当然，柯亨也认识到，“限制是对称的”，“如果高技术排除奴隶制，那么奴隶制也排除高技术”^③。从这个角度上讲，柯亨的生产力首要性命题显然有些牵强。因此，“要使生产力的首要性成立，还必须对相互制约增加某些东西。”^④这个“某些东西”就是柯亨的发展命题，即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生产力总是向前发展的，对于旧的生产关系而言，由于自身的限制，就不再与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相适应。这时，旧的生产关系要么不停滞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要么与生产力发生矛盾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后一种情形下，阻碍不会无限期持续下去，因为生产力总是向前发展的，最后会出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新的选择。因而，总是生产力选择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

据此，生产关系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命运是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命运是一致的。这是因为按照功能解释的方法，正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说明了生产关系的性质，说明了为什么它们如它们所是。

柯亨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首要性的论证与对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首要性的论证基本相同。

2. 柯亨的发展命题

发展命题是柯亨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出发提出的一个命题，该命题的核心观点是

^① 同上，第176页。

^{②②} 柯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③ 同上，第166页。

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贯穿整个人类历史。“柯亨之所以要提出和论证这一命题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一命题是历史唯物主义中最基本的命题，但这一命题在马克思本人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却缺少深入和严谨的论证。”^①

柯亨从人具有理性和理智以及自然环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出发来说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趋势。他认为，“发展命题的可接受性的尺度是由反思三个事实诱导的：（c）人，就其特点来说，是有理性的。（d）人的历史境遇是一种匮乏的境遇。（e）人具有的聪明才智及其程度使他能够改进他的处境。”^②

（1）人具有理性

人的理性表现在，面对尚未被满足的需求，人知道如何满足这种需求；为了满足需求，竭力去攫取和使用可以满足要求的手段。从这个角度上讲，人是有理性的，而且这种理性是永久的。

（2）历史境遇的匮乏性

人的历史境遇之所以匮乏，是人的需求和外部自然的特点使然，因为“如果他们不花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就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他们从事劳动不是目的本身。人类的需要，不管其历史上其种种不同的内容是什么，很少是完全单独由自然来供给的。某些哺乳动物容易得到它们所需要的东西，而对其他生命来说却要获得生活资料进行无穷的斗争。人，除了特殊情况，是处于不幸者当中的，它们只能不断的改造环境来适应自身。这是由于（e），缺少智力的哺乳动物，不能做到每一代在其前辈的基础上不断的去改造它们的栖息地。”^③

（3）人的处境的改进得益于人的聪明才智及其程度

柯亨指出：“人倾向于反省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和识别做事的最好的方法。”^④这种反省和识别导致人类知识的扩大、智慧的增加，扩大的知识用于生产，结果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由于他们的理性和他们的严酷的处境，当知识提供扩大生产能力机会的时候，他们将倾向于抓住它，因为不这样做是不合理性的。”^⑤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人类的聪明才智，人类具有开发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等能力，从而不断地提高生产力、生产方式，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

柯亨对发展命题的论证表明，人类正是由于面临匮乏问题、具有理性的、富有创造精神，促使他们通过提高生产力水平来设法减缓匮乏问题。正是由于人具有理性，

① 段忠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征及其三个代表性成果》，《教学与研究》2001年第12期。

②③④ 柯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6页。

⑤ 同上，第169页。

正是由于匮乏的历史境遇以及人的智慧,促进了生产力的永恒的进步,这种永恒进步的趋势在人类历史的不同阶段都得到证实,即生产力屡次被更高的生产力所代替。尽管在某些特殊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似乎有某种程度的倒退,但历史选择的结果却是对这种似乎倒退的生产力的抛弃,因为道理很简单:就生产力而言,“倒退”在技术上是不可可能的。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农业一旦与城镇工业相联系,它为农民提供机械、化肥和更多的动物饲养场,那么使人类回到工业前的耕作和饲养,在事实上就是不可可能的了。同时,人类的需要是由现存的生产力而不是既往的生产力来满足的。人对新的生产力总是无法抗拒,因为新生产力不仅满足人的现存需求,还促使新的需求的产生;而满足人的需要的旧的手段没有存在的条件,“铁路一旦被使用,要回到马拉的运输方式很难了,这不仅因为在那时期以后,马的数量减少,而且制造马车的行业、马夫等等,都已消失,同时也很难抛弃铁路带来的高度的机动性”。^①一言以蔽之,由于理性和惯性,生产力不会倒退,除非它们被更高级的技术所代替。生产力向前发展的普遍趋势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贯穿于每一个遭受匮乏的社会的历史。

柯亨指出,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是自律的,“它独立于社会结构,它根植于人的本性和人的处境这些根本的物质事实”。^②柯亨强调,在他对发展命题的论证中,用来支持发展命题的东西都是与社会结构无关的非社会的物质事实,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生产力的发展会由于非社会的物质事实方面的原因无法实现,如发生了一场毁灭性的地震或生产力发展所需的能源已经耗尽。但柯亨同时指出,在这些特殊情况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原因都与当时的社会结构无关。毕竟,这些非社会的阻碍不是普遍存在的。历史理论不能回答非正常的情况,发展命题所要考察的是正常状态下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即生产力的正常发展趋势,而不是在非正常状态下的发展趋势。

有些学者指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存在有利的生产关系,柯亨的发展命题只有在假定生产关系始终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对此,柯亨指出,有利的生产关系只是生产力发展的外在条件,不是生产力趋于发展的内在根源。是那些与人性有关的非社会的事实促进了生产力的永恒的发展,即是人类的理性、革新精神以及遭受匮乏的折磨,而不是生产关系,造成生产力的发展趋势。当然,排除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趋势的根本原因,不等于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要通过有利的生产关系才能实现,与生产力自律的发展趋势是根植于人

① 柯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岳长龄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② 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页。

性相关的非社会的事实并无矛盾，相反，生产力存在这种自律的发展趋势恰恰使有利的生产关系得以流行或者说被选择。总之，生产力的发展要通过有利的生产关系并没有取消生产力的自律的发展趋势。”^①

二、柯亨的辩护对我们的启示

正确的社会发展的观点是社会发展的实践的指路明灯，失去了正确的社会发展的观点，实践将迷失方向。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这需要一个正确的社会发展的观点指引前进的方向。柯亨的辩护恰恰给了我们重要而深刻的启示。

首先，要坚持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创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指出了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些非生产力的社会因素越来越多，一些非物质的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所增加，于是一些学者渐渐迷失了方向，误认为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的发展不再重要了，不是根本了。如奈斯比特所提出的“信息社会”理论就认为在人类未来的发展中，信息处于主导地位，一切都要以信息为核心。国内一些学者也将生产力排除于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之外，如提出社会经济发展非物质化等。

根本动力之“根本”，意为本原，强调的是最“根”、最“本”的东西。据此，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应该理解为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本原”力量，而不是所有力量的总和。诚然，阶级斗争、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知识等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但从根本上说，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却是生产力的发展。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形态的更替，哪一次都是通过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从而实现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何以会产生矛盾？生产力的发展使然。因此，追根溯源，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活动的社会形式，是受生产力的决定和制约的。

柯亨的辩护重新提醒我们，物质生产活动和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永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其次，要从生产方式的视角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柯亨的辩护，我们很容易再次确立生产方式的视角来观察人类社会的发展。

^① 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事实上,从人类自身讲,人类的发展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身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人类自身不断增长的需要本身也是一种内在的发展机制,它促使人类循着自然物质的层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认识与改造自然。自然的进化在本质上可以说是物质形态的进化。这种进化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场与基本粒子的物理物质;二是原子、分子的化学物质;三是细胞、机体的生命物质;四是人及其创造的文化。”^①自然的进化是一个由小到大、由表及里的演化过程,这在人类生存的地球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我们从地球表层的宏观物质结构看,它可区分为岩石圈、土壤圈、水圈、大气圈、生物圈、人类及其文明圈等六个圈层,其中前四个圈层属于物理和化学圈层,人类是直接诞生在生物层面上,并且直接依赖生物圈存在和发展。因此,人类首先要认识的是生物层,然后再由浅入深地触及物理层和化学层。按照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是不断由浅入深的发展机制来看,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要经历三个阶段:生命物质的认识与改造,化学物质的认识与改造,物理物质的认识与改造。在这三个大的阶段中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的阶段:初级阶段,也就是天然的利用某种自然物质;高级阶段,人类能够人工生产出这种物质。

当我们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上述阶段与人们公认的文明形态即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这三种人类文明历史对应时,就会发现:采猎文明实际上就是天然生物时代,也就是天然采集渔猎自然存在的动植物;农业文明则是人工生物时代,即可以人工生产出动植物;工业文明实际上就是天然化学时代,即采掘和利用自然的化学物质。那么,在工业文明之后,则将进入新工业文明,也就是“人工化学时代,即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时代。”^②

历史事实证明,物质生产力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与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也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正是柯亨所要辩护的。人类社会的发展之所以区分为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新工业文明,主要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层次的不同、水平的不同,也就是物质生产力、生产方式的不同。

(作者单位: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院)

① 韩民青:《文明的演进与新工业革命》,《光明日报》2002年4月11日。

② 韩民青:《论新工业革命——从工业时代向新工业时代的转变》,《光明日报》2002年5月11日。

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探析

田 贵

越南共产党在革新开放的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001 年越共九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在计划与市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那么，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怎样提出来的？主要含义和特点是什么？当前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建设的最新进展如何？对这些问题本文想作一简浅探讨。

一、“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形成过程

革新开放以前，越南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受苏联传统模式的影响，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商品与货币的理论，把市场经济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而把计划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实行集中的“统包统管”的经济体制。1976 年 12 月，越共四大政治报告指出：“在我们的制度下，一切经济活动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因此，国民经济的计划是经济管理工作中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国家计划是管理经济的主要工具，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国家计划是党的发展经济路线的具体化。”^① 强调要“把全国组织成一个建设大工地，每个地方成为一个工地，每个县成为一个工地”。1982 年越共五大仍强调，在建立新的管理体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必须使国家计划真正成为党的第二纲领，成为管理系统的中心工具。

随着革新开放的进行和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越南不断突破对计划与市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的传统认识，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

^① 转引自古小松：《越南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10 页。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首次将生产与市场联系起来。大会报告指出:“多年来的官僚集中统包统管管理体制无法形成发展动力,削弱了社会主义经济,限制了对其他经济成分的利用和改造,钳制了生产,使效率、质量和效益下降,造成了分配、流通中的混乱,导致社会许多消极现象的发生。”这种体制“没有充分注意商品——货币关系和经济效益”。所以,要“废除官僚集中统包统管制,建立符合客观规律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新体制。”“正确地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这是我们正着手建立的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第二个特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要求生产必须与市场密切联系,一切经济活动必须权衡费用和效益。”^①

1991年越共七大提出建立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越共认为,发展商品经济是走向大生产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性问题,为发挥多种经济成分的巨大潜在能量,必须废除官僚统包制度,转向由国家以法律、计划政策和其他工具进行管理的市场机制。大会通过的《越南到2000年经济社会稳定发展战略》指出:“从根本上改革计划机制,由集中的计划模式转向市场调节的计划模式,从直接的指令性计划转向以目标为引导的计划指标。政府通过对行业、区域进行重点投资和财政资助,使用财政货币和储备力量等工具,发挥国营经济主导作用等来调节市场,保证经济各种比例的平衡。企业依据政府的引导和市场的需要,制定和实现生产经营计划。”^② 1992年4月颁布的《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国家通过对市场机制的调控来发展社会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市场经济。

1994年1月,越共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首次使用了“朝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概念。会议文件在论述国有经济在多种经济成分中的作用时指出,国有经济是“国家调控和引导朝着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的一个强有力的物质工具。”^③ 1996年越共八大在总结革新十年新经济管理机制时进一步指出,商品生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是客观存在,与社会主义并不对立,而且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要继续发展按照社会主义方向、由国家管理、遵循市场机制运行的多种成分的商品经济,从现在起至2000年,继续革新经济管理体制,以废除官僚主义集中与包给的体制,同时建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由国家管理相对同步的市场体制。

2001年4月,越共九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不仅进一步肯定了市场经济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

① 吴彬康等主编:《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234页。

② 转引自古小松:《越南的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③ 周新城:《越南、古巴社会主义现状与前景》,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

济，为社会主义打下物质技术基础，而且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体制革新的目标模式。大会提出，要在2001到2005年期间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而到2010年“基本上形成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含义与特点

在越南，虽然人们通常用“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定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朝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等不同概念，来表述越南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但其含义是相同的。

越南《共产主义》杂志总编辑、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何登认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双重意义、运动、开放的观念。按照名词的含义，是个在运动的市场经济，其中包含着社会主义性质并被其所支配。按动词的含义，是用社会主义的原则制约市场经济，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进程。”^①

越南社会和人文科学国家中心高级专员、原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阮辉教授认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包含着三层含义：“第一，越南要搞市场经济；第二，给越南市场经济设定的发展方向是朝向社会主义；第三，这意味着越南目前还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只是向社会主义过渡。”^②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主席阮富仲认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历史上的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普遍的”，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则是越南的“特征”，它符合越南的具体情况和特点。

根据越南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和学者发表的有关文章来看，“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内涵和主要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一种体现商品经济发展共同规律的具体的经济组织形式，“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体经济模型”。越南认为，市场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具体形式，是一种公认的经济体制，市场和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财富而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就，“它既可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作，又可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绝不是相互对立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市场经济的规律仍然能

① [越]何登：《在越南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5页。

② 转引自清明：《定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上海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第34页。

够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是相互适应的。”^① 越南认为，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运作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既然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具体形式，它本身也应具有其他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某些经济规律，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同时也必然“带有越南走向社会主义方向的特征”。所以，2001 年越共九大指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是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模式。

第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因素起“开拓、引导、定向”作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区别的市场经济。越南认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虽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是在市场法则之下运作，但两者有着天壤之别。一是目的不同。在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用来促进生产，解放生产力，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早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并为全体劳动人民服务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使一切社会关系都向着商品化货币化发展，金钱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市场经济是为资产阶级带来最多的利益服务的。二是所有制性质和基础不同。虽然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一样，都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和多种经济成分，但在越南，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在合资、合营经济单位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部分在内的公有制是基础，特别是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私有制占统治地位。三是国家管理的目的、原则和方向不同。“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有国家的管理，但其目的和原则不一样，在越南，国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国家根据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原则管理经济，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限制其消极作用，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正确地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不让市场自发地走向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国家是维护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以最大限度满足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目的，其管理往往使“市场失效”。四是收入分配制度和结果不同。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实行按劳动成果和经济效益分配为主，同时也按投入的资金和智力进行分配，并伴之一定的社会福利，使经济增长、社会公平和社会进步紧密结合，避免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按资金分配，导致社会的不公平，两极分化。总之，越南认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不仅内含着共产党领导、国家管理、社会主义方向和市场运行四个因素，而且这四个因素有机统一，缺一不可，社会主义因素在其中起着“开拓、引导、定向”的作用。

^① [越] 梅胡蒂：《越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国外社会科学》2001 年第 4 期，第 113 页。

第三,“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是受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性质决定的、发展中的、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有着很大差别的市场经济。越南认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目前还处在市场机制阶段,它是在生产力不发展和各地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建立的,又刚刚从高度集中的官僚包给制下摆脱出来,是一种低水平的不完全的正在发展中的市场经济,这与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并取得现代化建设很大成就的中国等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越南不仅是首次承认市场,而且是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进行市场经济运作的,“而中国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①

三、“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建设的最新进展

2001年越南共产党的九大正式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越南加大了革新的步伐,从宏观和微观的层面上不断推出构建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新措施,取得了明显进步。

第一,深化多种所有制结构改革,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奠定动力基础。越南认为,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形式,是越南过渡时期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客观基础,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和多种经营形式是推动“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越共九大后,越南在全面深化多种所有制结构改革的基础上,重点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私营经济。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从2001年8月到2003年6月,党和政府先后通过和颁布了《关于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革与发展,提高国有经济效益的决定》、《关于国有企业转为股份公司的决定》、《国有企业法》修正案等,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方向和措施。对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国家独资或国家控股的公司制,对不需国家独资和控股的部门和领域的国有企业实行多种所有权的股份制,对规模较小、国家资金在50亿越盾、难以股份化的国有企业实行转让、承包和租赁,对没有效益的国有企业实行破产。到2002年,越南的国有企业已由原来的12300家减少到5000多家。在发展私营经济方面,2002年越共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继续改革、完善机制政策,鼓励并创造条件促进私营经济发展的决议》,认为私有经济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要在体制和社会心理上为私有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环境,加强有关法律的建设,对一些机制和政策进行补充和修改,以保证私有经济具有与其他经济成分同样的平等发展的权利和条件,要继续完善和加强国家管

^① [越]阮德平:《关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若干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理,通过政策、法律、法规手段对私有经济监督检查等。从2002年5月到2003年5月新增私营企业2万多个,新增投资金额34亿美元。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从宏观上调控和管理“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发展。2001年越共九大后,越南进一步提出要把政府的管理职能与企业的经营职能及各项公共事业、服务业和活动区分开来,保障企业在生产、经营上的自主权和自负盈亏,政府与企业要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2003年越共中央委员、中央理论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黎友义在北京中越理论研讨会上所做的《越南在发展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共产党的领导和国家管理的作用》的报告认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主要是设计“游戏规则”,颁布制度、政策,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宏观问题。为了真正转变政府的职能,以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近几年越南废除了7000个规范性文件中的2000多个,修改了1000多个。除中央外,省级的54806个规范性文件中废止的有9985个,重新修改和补充的有1276个。同时,为了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对政府机构和人员也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中央政府机构由九大前的27个减为当前的23个,省级政府机构平均由30个减为20个,市级政府机构由38个减为24个,市辖郡(区)政府机构由18个减为10个,县政府机构由20个减为10个,平均精简幅度在10%—15%之间。在精简机构的同时,对人员编制也进行了控制,省、直辖市行政编制总数为150—3000人左右,省属职能部门为22—73人不等,省会城市行政编制为145人左右,县级行政编制总数为70人左右,县级各职能部门为5—12人不等。^①

第三,加强法制建设,为“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法理环境。越南早在1986年越共六大就提出要“以法治国,而不是以道理治国”。六大报告指出:“要依靠法律,而不仅仅靠讲道理去管理国家。法律就是把党的政策、主张机制化,它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必须在全国统一执行。”“用法律实施管理必须关心法律的制定。要逐步补充并完善法律体系,以保证国家机构能依据法律建立起来并进行活动。”^②2001年的越共九大和近几年召开的中央全会,都将依法治国,为发展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创造法理环境作为自己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把党的纲领、路线、主张、政策体制化、法律化,由“党治”、“人治”向“法治”转变。从实践看,越南国会于2001年11月20日至12月25日对1992年宪法进

^① 吴彬康等主编:《八十年代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转引自张勇:《越共九大以来越南革新开放的新进展》,《学术探索》2003年第11期,第41页。

行了修正，正式将“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对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问题作出了规定，强调越南“经济结构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有多种生产经营形式，是建立在全民所有、集体所有、私人所有制度之上”，“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潜力，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小手工业者经济、私人资本经济、外资经济。各种经济成分都是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①2003年，越南的立法工作明显提速，一年就制定和修改了《土地法》、《刑事诉讼法》、《国家银行法》、《增值税法》、《企业收入税法》、《国有企业法》、《合作社法》、《特别消费税法》、《企业所得税法》等17部法律。为适应加入WTO的需要，越南从2005年开始对《企业法》和《投资法》在内的25项法律法规进行新的修改和调整。

第四，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近年来，越南加大了革新的力度，不断加强对商品—服务性市场、劳务市场、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科学技术市场的建设和完善，有的已取得明显进步，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体制在逐步完善。例如，在价格体制改革上，越南自1987年开始，对价格体制实行彻底的改革，目前除水电、石油、化肥和农药仍由国家控制价格外，其他完全靠市场定价。在税收体制改革上，越南在2003年5月通过了《增值税法》、《特别消费税法》和《企业所得税法》等税法，降低了税率，扩大了税收的征收面，统一了内外资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在金融体制上，越南早在1990年就颁布了《银行法》，建立起以中央银行领导，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外贸银行四种专业银行为支柱的国家银行体系。1992年开始实行把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的职能分开的制度，允许开办合营、私营银行，准许外国银行在越南开办分行或办事处。2001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以后，越南制定和通过了对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计划，决定根据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要求对4家国有商业银行进行重组，2003年5月又通过了新的《银行法》。到目前，越南已有50多家商业银行，56家合股、合资银行，23个外国银行分行和62个外国银行代表处。到2002年，越南各商业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7.6%。证券市场得到初步发展，2001年，越南的上市公司为11家，在各证券公司开设的帐户为9000个，2002年发展为20家，在各证券公司开设帐户为1.3万个。

综上所述，通过对越南“社会主义定向市场经济”的形成、特点和最新进展的探讨，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但人们对其认识、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却是漫长和复杂的；市场经济有多种类型，都带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但

^① 转引自张勇：《越共九大以来越南革新开放的新进展》，《学术探索》2003年第11期，第41页。

并不是每一种类型的市场经济都适应本国国情。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